

內容簡介：

你想知道毛澤東怎麼從“山大王”到“紅太陽”的嗎？
你想知道毛澤東的兒女媳孫們又是什麼樣的人嗎？
你想知道毛澤東“寵幸”過什麼樣的女人嗎？
你想知道毛澤東的親家當年的奇特遭遇嗎？

.....

本書作者以許多親歷親知的第一手材料，如實披露了這些當年秘聞。讀者從中不僅將獲知許多為人罕知的史實，更將享受一次閱讀樂趣。

Mod.^{PRO}E[®]
ISBN 978-962-7123-48-X
9 789627 123484
定價：HK\$98 NT\$400

紅太陽

的影子

盧弘著

七星書社

“紅太陽”的影子

毛澤東和他身邊人的故事

盧弘著



七星書社
Editions la pleiade

“紅太陽”的影子

——毛澤東和他身邊人的故事

盧 弘著

七星書社有限公司

前 言

在這部書中，讀者可以看到：被稱為一代偉人的毛澤東，是怎麼從自稱的“山大王”，最終成為被億萬人民景仰的“紅太陽”；他又怎麼將原本異己的力量，反過來為己所用，從而成其大業；他的子女、媳孫們各自命運如何，又曾有何“業績”；他的“后妃”們，又是些什麼樣的人，各自有何遭遇；還有他的親家母，在他所領導的革命歷程中，都有過什麼奇特甚至慘痛的經歷……這些史實資料，不少為作者獨家所有，特別是本書的最後幾篇，都有很強的可讀性與文學性，前幾篇也有獨到的史實和史料價值，料想讀者會有濃厚興趣。

本書來源是這樣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我為一些革命老前輩代筆撰寫回憶錄和寫作傳記，瞭解到我國現代史、黨史和軍史上尚有許多至今仍然為人罕知的史事，其中特別是關於毛澤東以及他周圍的人物與故事，這都生動反映了一個時代及一代人的獨特歷程。我在完成主要工作之餘，也寫作並發表了一批作品，有的還曾頗有影響，多處被媒體轉載或摘要發表。有友人建議我將其匯輯起來，我欣然從命遂成此書。

這些文字有的寫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的就出自本世紀內，在對史料史實的瞭解和認知上，有的不能不受到當時大環境的影響與局限，例如對毛澤東及林彪、江青等人的看法，仍未跳出傳統觀念。其實，現在早已突破原來的框框。因我主要注重的是史實，所以當時寫的這些文字在今天看來，仍不失為一家之言、一方之見，所以我還是將其奉獻給廣大讀者。

作者 二〇〇九年二月於北京

書 名： “紅太陽” 的影子
——毛澤東和他身邊人的故事
著 者： 盧 弘
責任編輯： 季 鏘
封面設計： 建 柏
出 版： 七星書社有限公司
Editions La Plaiade Limited
郵 箱： sevenstar@126.com
國際書號： ISBN 678-962-7123-48-X
定 價： 港幣98元
版 次： 2010年11月第一版

目 錄

前言.....	(III)
從“山大王”到“紅太陽”	
——聽老前輩談毛澤東又如何成為毛主席.....	(1)
以夷制夷，為我所用	
——話說毛澤東的一項成功策略及方法.....	(56)
軍報“震源”肖力	
——李訥造反奪權紀實.....	(65)
高處不勝寒	
——偶見李訥，略聞李敏隨記.....	(177)
“紅色公主”軼聞.....	(207)
盜名欺世，滿紙謊言	
——毛岸青、邵華“生平”批註.....	(219)
紅色佳人淚	
——紀李氏姐妹.....	(247)
毛澤東親家張文秋之“家”.....	(287)
後記.....	(351)



毛澤東1924年在上海留影



毛澤東1931、11、7攝於瑞金（江西）

從“山大王”到“紅太陽”

——聽革命前輩談毛澤東如何成為毛主席

在現代中國，一提“偉大領袖”或“紅太陽”甚至僅僅是“主席”二字，誰都知道是指毛澤東。然而他並非一開始就享受如此殊榮，早先也曾多次受氣遭貶挨過整，並且長期只是中國共產黨一個地區和一支部隊的負責人。那麼，他是如何成為全黨、全軍和全國的最高領袖的呢？他的同時代人與追隨者，為此提供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史實……

毛澤東對稱他為“偉大領袖”和“紅太陽”等等，曾表示“討厭”。他對自己另有稱呼。有事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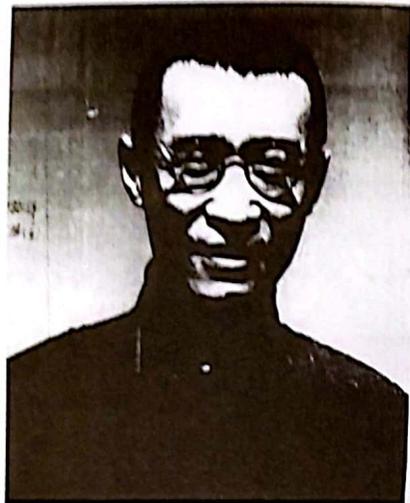
籌備中共“十大”即他生前最後一次黨代表大會時，毛澤東有次見到王洪文問起其年齡，在聽王洪文答“三十八歲”後，他說：

“你比我強，我在你這麼大時，還在井岡山上喝南瓜湯呢！”

王忙說：“主席那時已經是偉大的革命領袖了。”

毛澤東卻把手一揮道：“不，我是‘山大王’！”

他早就欣賞並自稱過“山大王”，從小就愛讀充滿“山大王”精神的《水滸》等書，他領導革命的第一個重大行動就是上井岡山，直到晚年，他情繫夢繞的還是山；他的詩詞有三分之二是寫山或寫到山的，致使從未見過他的魯迅，僅讀到他當年的幾首詩詞，也說他像“山大王”……



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

那麼，早期的“毛委員”、“黨代表”至多是個“總政委”，後來到底是怎麼成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即從“山大王”搖身一變成爲“紅太陽”的呢？

1、“山大王”的雄風與“鄉村塾師”的魅力

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一批又一批青年革命家，從國外“出口轉內銷”地回到祖國。他們大都在蘇聯接受過正統的馬列主義理論教育或正規的軍事訓練，因此倍受世界革命指揮中心——共產國際的信任 and 重視。他們中的王明、博古等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二十多歲就成爲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王明等在蘇聯的同學張聞天、王稼祥等人，也都被委以重任。王明曾自稱他們這些人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對於從未出過國門只是在山溝溝裏打遊擊的毛澤東，則是百分之百的瞧不上眼。他們把馬列主義當成自己這批住過洋樓、讀過洋書又吃過洋麵包的人的“專利”，認爲“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



伍修權長征後在陝北留影

義”，因此毛澤東的那一套，無疑是些旁門左道甚至異端邪說，認爲出生於山溝溝，只會和“泥腳桿”們打交道的毛澤東，無非是個打著“共產主義”時新旗號的“山大王”。這個看法與共產國際的“官方”觀點也是吻合的，繼列寧之後成爲國際共運領袖及導師的斯大林就認爲，中國還沒有成熟的無產階級，卻有著汪洋大海般的農民小資產階級。因此中國本土也就出不了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至多只有代表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毛澤東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爲此，當王明於一九三一年初，在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直接導演和現場指揮的六屆四中全會上，抓住了中央領導大權後，馬上又派出了包括王稼祥在內的國產“欽差大臣”，作爲“中央代表團”親臨毛澤東所在的贛南、閩西地區，以貫徹推行其“國際路線”和“中央指示”，並對毛澤東的所作所爲予以檢查、管束和監督。誰知王明低估了毛澤東這個“山大王”的能量，毛雖在外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出沒“綠林”，結交“好漢”的“農民頭領”，其本人卻不是一個等閒之輩。原擬來“收服”毛澤東的王稼祥，接觸了毛澤東，特別是與其長

談之後，竟然“倒戈”，反而被毛澤東“收服”了。王稼祥在幾十年後，曾這樣回憶道：

“在（江西）龍岡地區，我第一次見到領袖毛主席，……初見了幾次面，他就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印象：

“他是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完全不同的，是有其獨特的地方，雖然我當時還掌握不到這些獨特的地方。只覺得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簡單明瞭，又是那樣的有力並具說服力。

……”

曾與王明和王稼祥等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伍修權老人，也這樣回憶道：

“我是一九三一年夏季回國並進入蘇區的。在此前後，我也聽到過‘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的說法，以為毛澤東搞的可能是非正統的馬列主義。但是我又聽說，他當時和朱德等共同領導的‘朱毛紅軍’，創建的‘蘇維埃區’，不僅在全國影響很大，力量最強，軍隊和地區在不斷發展擴大著，已經成為敵人的心腹大患，並且一直‘剿滅’不了。我猜想，打出這塊天地，創造這個成果的毛澤東，必定是個政治家和軍事家。可是我進蘇區並見到他以後，發現他根本不是我想像中的，如我在蘇聯見到的斯大林、托洛茨基那樣的‘革命領袖’和‘軍事統帥’，而是一個不修邊幅、作風隨便和言談談諧的中國書生，其風度舉止更像一個農村裏的私塾先生……”。

據王稼祥回憶，他所以一下被毛澤東“征服”，是發現毛澤東對於蘇區以至中國，有廣博的知識和深切的瞭解，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儘管毛澤東的若干想法、說法和做法，在馬列的“本本”上找不到，但卻證明是切合實際並行之有效的。

伍修權幾乎是聽毛澤東講了一次課，就不僅改變了對他的看法，並且作出了從此追隨他的決定。他曾興致勃勃地回述這段幾十年以前的往事：

“新成立的紅軍學校有回請毛澤東來給大家講課，我當時是紅校學員連隊的指導員兼教員。那天他講的是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民族經濟的破壞。這本來是個比較枯燥甚至深奧的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問題，

我在蘇聯學習時，每逢這類課程，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強記政治名詞、理論定義、專用術語和比例數據上。可是毛澤東來講課時，根本沒有那些東西，他像敝家常似的說著周圍正發生的事，有的內容我至今還記得。例如他說我國農村的木桶木盆，本來都是用竹篾來打箍，後來從外國進口了鐵絲，就改成用鐵絲來打箍。結果不僅佔有了我國原來的竹篾市場，還使大批以箍桶箍盆為生的竹器手工業者失去財源，中國的市場直至山區農村的經濟生活，都受到外國資本家的影響甚至控制。毛澤東就這樣通過生活中的實際事例，講解了一些不太好懂的理論問題，使我和所有的人都聽得津津有味。以後我又多次接觸並聽他講話，每次都那麼吸引和教育人，我開始認為他不比外頭的什麼教授專家學問少，並且承認：山溝裏也有馬列主義。我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尊重和信服起毛澤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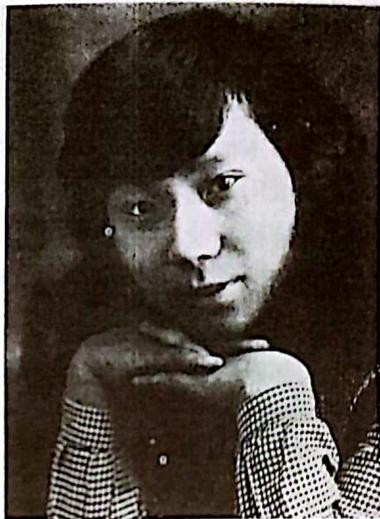
看來也正因此，儘管有不少“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後來被列為“反對”過毛澤東的王明“左”傾教條小宗派成員，伍修權卻不在其中。六十年代，毛澤東曾當著他的面向外國客人這樣介紹道：

“他是個老實人，在從莫斯科回來的人中，他是從來沒有反對過我的。”

其實，像伍老這樣的人為數不少。許多人都是這樣，與毛澤東一旦認識，就從此一生追隨。也是從莫斯科回來的紅軍女藝術家李伯釗，她曾這樣和毛澤東相見：一九三一年秋，她從閩西來到瑞金，去蘇區中央局報到時，只見有一個留長頭髮的同志在看白區報紙，當他知道李伯釗的來意後說：

“好哇，你來得正是時候，如今蘇區正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你會大有用武之地的。正像咱們這裏山歌中唱的：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你是吃過洋麵包的人，這南瓜能吃得來嗎？”

李伯釗作了肯定的回答，那同志又連聲說好，接著又十分隨便地同她東拉西扯地談著，問了她許多在蘇聯和上海的事。吃晚飯時，李伯釗見朱德總司令回來了，她早已聽說“朱毛”如何如何，以為“朱”和“毛”都是在一起的，就隨口問道：“總司令，毛澤東同志呢？”



19歲的李伯釗攝于莫斯科



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1939）

她這一問，在場的人全哈哈大笑了。朱德說她真是“有眼不識泰山”。那看報的同志忙對李伯釗道：“這事怪我，沒有先自報家門。請你這位紅軍女藝術家原諒本人。”

李伯釗滿面通紅地說：“真對不起，我不認識你，也沒想到是你，還以為你是個‘文書’或者‘收發’呢！”

毛澤東又笑道：“我們初次相見，就能談得投機，以後一定能愉快合作，共同奮鬥！”

果然，李伯釗此後成為了毛澤東在文藝問題上的好朋友，曾為其延安文藝講話，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使其講話更加充實。全國解放以後，她又在歌劇《長征》中，塑造並推出了毛澤東的第一個舞臺藝術形象，直到她晚年的最後一部力作話劇《北上》中，又再現了毛澤東的生動形象。她這位“從莫斯科回來的人”，一生都在歌頌毛澤東。正如她的同學、戰友兼丈夫，同為“從莫斯科回來的”楊尚昆，在毛澤東身邊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一幹就是幾十年，一直盡職盡心甚至任勞任怨地為毛澤東服務。

當年正是這樣，除了王明之類極少數人，許多人雖然一度受過“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後來卻都一一轉而敬服和追隨毛澤東。他以自己“鄉村塾師”和“山大王”的特有魅力，吸引和感召了他周圍的人——包括某些“反對者”。

2、一個被“打入冷宮”的主席

毛澤東最初成為“毛主席”，是一九三一年的事。那年十一月，也就是蘇聯十月革命節時，在中國江西南部山區小縣瑞金，誕生了一個“仿蘇”式的“蘇維埃政權”，毛澤東榮任第一任主席。其全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

在此以前，毛澤東主要是黨在一個地區和紅軍一支部隊的領導人，並未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從這時起，毛澤東才由以前的“毛委員”、“黨代表”和“總政委”等等，改稱為“毛主席”。

席”。儘管他初任主席的“共和國”和“中央政府”全是臨時的，但他這個“主席”卻成了唯一永恆的，並且從此這樣叫了他一輩子。

不過，別說過去許多人並不知道，至今也有人不太清楚，毛澤東當初榮任主席之日，恰恰是他被批判受打擊最嚴重之時。他是個正挨整受氣的主席。就在毛澤東當“主席”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兩天，蘇區中央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對他進行嚴厲的批評指責，說他犯了“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等等錯誤，決定取消他在蘇區黨內軍內的領導權。但為了體現黨的政策和寬容態度，其實是由於毛澤東在蘇區軍民中的重大影響和特殊威望，照顧性地給了他一個“蘇維埃主席”虛銜，算是賜以“安慰賽冠軍”式的“榮譽”。所以，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博古，曾嘲笑地說毛澤東只是個“加里寧”，同蘇聯的蘇維埃主席一樣毫無實權，僅僅是個裝點門面的“擺設”。

毛澤東雖然當了主席，其處境卻每況愈下。一九三二年秋的寧都會議上，他又被撤銷了原有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等軍隊職務，並限令他離開紅軍部隊，到後方去“專職從事地方政府工作”，實際上完全剝奪了他的軍權，將他趕出軍隊。在“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這無疑是斷了他的後路。寧都會議兩個多月後，原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和博古等人，為逃避白色恐怖來到蘇區。當時在蘇區的伍修權老人後來說：這事本身就很有諷刺意味。“完全正確”的中央領導人，不得不到“一貫錯誤”的毛澤東創建的根據地內立足存身。隔了不久，蘇區內又來了一位“進口”的“太上皇”，他就是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身份出現的德國人奧托·布勞恩，其中文代號為“李德”。讀過洋書的“中央總負責”博古，和來自洋邦的“國際總顧問”李德，二人一文一武一唱一和，霸佔了軍政舞臺，毛澤東不僅更沒戲唱，反被遠遠地趕出“紅都”瑞金，不是在深山古廟或後方醫院療養治病（他當時確實有病），就是到蘇區各縣山鄉去搞農村調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由此被徹底打入“冷宮”和“靠邊站”了。當年奉命為李德翻譯的伍老，憶起這一段時沉重地說：

“博古和李德等人進蘇區以後，為了更全面深入地推行王明的

‘左’傾路線，對毛澤東在蘇區實行的一系列方針策略，進行了根本否定和徹底批判，中央和軍委的會議，也不再通知他參加，黨和紅軍中也不再聽到他的聲音了。”

然而毛澤東畢竟是毛澤東，他居然利用這一時機，一邊治病一邊深入蘇區各地進行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關於中國農村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問題的第一手材料，不僅使他自己成為這方面的專家權威，更為研究中國社會和指導中國革命，提供了切實依據和詳盡資料。他當時取得的這些“軟件”成果，無疑是對黨和國家的重大科學貢獻。

這時，敵人五十萬大軍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已在蘇區各地打響，正在後方的毛澤東，又奉命去組織支援前線的工作。他居然又在任務緊迫和處境困難的情況下，滿足了反“圍剿”前線的各項要求，連一直在打壓他的博古，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創造了“模範的後方工作”。

可惜，毛澤東領導的後方工作，雖然成了“模範”，他全力支持的前線，卻出現了極大“麻煩”。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在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揮下，喪師又失地，兵敗如山倒，敵人從四面八方步步為營圍上來，“蘇維埃共和國”的地盤越縮越小，“紅都”瑞金眼看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博古和李德不得不作出了新的更重要的“英明決策”——黨和紅軍撤出蘇區，進行“全國大搬家”式的“戰略大轉移”。也就是後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在這一重大決策和行動計劃之內，還有一條具體措施。正是這一條措施，幾乎徹底斷送了毛澤東，並且很可能因此根本改變了後來的中國革命歷程。

3、“中央”高抬貴手 “主席”幸免厄運

博古和李德在密謀進行“戰略大轉移”時，打算趁機把一批礙事不聽話的“異端”和“異己”分子，儘量甩掉，不讓他們隨軍轉移，

都留在即將撤離的蘇區，或隱蔽打埋伏，或將來轉入白區。他們計劃甩掉的重要領導幹部中，有與毛澤東同為黨的“一大”湖南代表的中共元老何叔衡，有曾任中央“一把手”後被王明趕下臺的革命文化人瞿秋白。其餘的人中，有一個就是早已“靠邊站”的毛澤東。

這份“另冊”名單很不得人心。“戰略大轉移”連“蘇維埃主席”都甩掉不管，將來萬一落入敵手，這個政治影響就太壞了。博古聽了認為也有道理，心想反正毛澤東已有職無權，加之一身疾病，料他也翻不起大浪來，便改變初衷，高抬貴手，恩准毛澤東隨軍轉移，只是得作為“病號”跟在二梯隊的休養連後面行軍。毛澤東一個“主席”空銜，竟使他獲得不被甩掉的“實利”，他和周圍的人，都為此喜出望外。

這事確實值得慶幸。紅軍撤出蘇區不久，何叔衡、瞿秋白等一批被迫留下的同志，在敵人重兵壓境鐵壁合圍中，一一不幸被俘，先後壯烈犧牲……如果毛澤東也在其中，其結果可想而知！

不少長征老將說起此事時，都帶著“萬幸”的語氣說：虧得博古他們最初的決定，沒有成為事實。否則後果就太嚴重了。毛主席很可能遭到何叔衡、瞿秋白等同樣的命運。這樣，中國革命的歷史，就必然從此全部改寫。

看來確實是如此。如果毛澤東沒有參加長征，有極大可能不會有後來的“通道轉兵”，長征紅軍也就不會“西出貴州”，也更不會有什麼“遵義會議”。或許在長征出發的當年年底，圍追堵截長征紅軍的幾十萬國民黨大軍，就會在“剿共”總司令蔣介石親自主持下，慶祝“全殲流串赤匪”和“一舉撲滅匪患”的“偉大勝利”了。同樣，毛澤東不僅不可能在長征途中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就“實際上取得了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甚至在後來的中共黨史和紅軍史上，除了某些原始史料中還有毛澤東的名字，中國現代歷史上也不會有什麼“偉大領袖毛主席”了！

博古當時當然沒有想到這些。他並未意識到准許毛澤東隨軍長征，是為黨和人民以及中國歷史做了件大好事，更未想到那個隨休養連行軍的“病號”毛澤東，居然獲得了自己東山再起並扭轉革命命運

的有利條件和大好機會。

據說有個宇宙巨人宣稱：只要在地球上按個把柄，他就能把地球舉起來。“病號”毛澤東，正是在行軍途中和休養連裏，找到了舉起地球的“把柄”。這個“把柄”，其實是個“傷員”，他就是正擔任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4、“病號”和“傷員”在擔架上的“陰謀”

王稼祥是王明和博古、洛甫(即張聞天)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是個書生型的青年革命家，勤於思考且認理不認人。他本來是王明派到蘇區來的中央代表之一，但在結識毛澤東以後卻改變了自己的態度，以致在毛澤東受到不公正批判和處分時，公然仗義執言為其辯護。他在第四次反“圍剿”中，不幸負了重傷。引發各種病症，長征開始以後，也按中央決定作為“傷員”隨二梯隊休養連轉移。

“病號”毛澤東是坐擔架隨軍行動的，“傷員”王稼祥也坐著擔架隨隊行軍。兩副擔架在行軍途中不期而遇，兩個戰友在休養連裏正好重逢。他們本來一個在前線，一個在後方；一個在軍隊，一個在地方，已久不相見，加之一傷一病行動不便。一直沒有機會談心論事，更難相互研討軍情政事，如今忽然走到一起，不由分外高興。於是他們兩人每天行軍在一起，宿營在一起，一口鍋裏開飯，一盆水裏洗腳，走一路談一路，住一夜談一夜，共同論敵情想對策，相互談前景找出路，王稼祥把心中的憂慮疑惑，一一向毛澤東坦陳請教，毛澤東把自己的設想方案，一一與王稼祥交談磋商，他們終於逐步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得出了一致的結論，找到了一拍即合、一起解決問題的良方……

在毛澤東和王稼祥的擔架後面，又吱吱啞啞地上來了第三副擔架。上面坐的是紅一軍團政委、曾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聶榮臻。他因為腳傷化膿開了刀，不能隨軍作戰，也來到了休養連。聶榮臻所在的一軍團，從井岡山起就跟著毛澤東，過去在毛澤東指揮下，一直打勝

仗，到第五次反“圍剿”中竟和全軍一樣節節敗退。包括聶榮臻在內的全軍指戰員，對於博古和李德的指揮非常不滿，十分懷念他們的老領導毛澤東。他們在休養連喜相逢後，相互交談了各自的想法，聶榮臻興奮地對王稼祥說：

“我完全同意你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應該及早召開黨的會議，討論和解決當前的問題，把拒不聽取正確建議的人，特別是那個瞎指揮的洋顧問，乾脆給轟下來！”

這樣，在毛澤東、王稼祥的商討策劃和聶榮臻等紅軍將領的支持回應下，一個重大的政治行動方案，就開始在不動聲色地醞釀和實行了。

著名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其名著《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到這段史實時，將這一章題為“擔架上的陰謀”，而且是不帶引號的“陰謀”。

外國人這麼看，怎麼寫，咱們管不了。本國同胞如也這麼寫，很可能通不過。因為這太犯忌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偉大領袖，怎麼能搞陰謀呢？可是，歷史事實恰恰是這樣，並且也不能不是這樣。難道毛澤東當時能到處公開進行“反對中央領導”的宣傳煽動嗎？他最初只能這樣不動聲色地用秘密串連方式悄悄進行活動。“病號”毛澤東和“傷員”王稼祥，正好利用並無軍務政事壓在身上的機會，分別與聶榮臻這樣的領導幹部和紅軍將領交換意見並尋求支持。也就在這時，王稼祥又為毛澤東找到一位更為重要的以至於舉足輕重的支持者——當時的中央常委之一、黨內地位僅次於博古、也是從莫斯科回來的洛甫（張聞天）。

有着作家、學者身份的洛甫，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出來的，他還與王稼祥一起進過蘇聯紅色教授學院，是中共黨內重要甚至主要的理論家和領導人之一。他也有著知識份子追求真理和不搞“朋黨”的品格作風，他和博古原來作為王明的代理人以至左膀右臂來到蘇區，誰知鬥爭的現實使他對王明的指示、博古的領導尤其是李德的指揮，越來越懷疑和不滿，在中央的會議上，與博古發生了重大分歧和激烈爭執，當李德來勸他們“都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不要相互鬧磨擦”

時，他更為反感，又正面對李德的一套進行了批評。

洛甫與毛澤東本來沒有多少個人交往，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他開始感到毛澤東的方針辦法，看來是很有道理的。長征出發以後，他更認識到博古、李德的做法根本不行，也正考慮如何改變現狀，扭轉敗局的問題。王稼祥就在這時找到他，向他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又提出了自己的設想，有不少地方恰好與洛甫不謀而合。洛甫當下就同王稼祥一起來毛澤東身邊，三個人連續聚首交談，後來索性也一起行軍，一起宿營，日夜商談研討著這個後來得以改變毛澤東命運的“陰謀”：三個“諸葛亮”，一致下決心首先趕走那個洋人“臭皮匠”……

一系列更完整周密的行動方針，就是在他們共同的磋商中，形成並產生了共識。擔架上的“陰謀”，就這樣越來越大並即將付諸行動了！

5、“總負責”負不了責“洋顧問”顧不上問

都是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和洛甫，一下子轉到了毛澤東一邊，成為他的主要支持合作者，反而把他們的老同學博古給架空甚至“涮”了。博古本來就比洛甫、王稼祥更年輕，不像他們那樣沉著穩重和多思善謀，他的主要靠山王明正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部，只能在萬里之外遙控指揮，身邊只有個李德，偏偏又是個不懂中國事、不會中國話，連中國飯都吃不來的“洋鬼子”。從反“圍剿”到“大轉移”，已搞得焦頭爛額和一籌莫展，長征通過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一戰，把出發時的八萬人馬，打得只剩了三萬來人。全軍上下對博古、李德的胡領導和瞎指揮，由一片怨聲發展成了一片罵聲，有的紅軍指揮員對他們開始公開頂撞和表示反對，這使他們更是內外交困、束手無策。被人戲稱為“娃娃總書記”的博古，在湘江邊上拿手槍比劃著自己腦袋，想就此一了百了，被聶榮臻偶爾發現，責問他在幹什麼？博古狼狽地搪塞說是同自己開玩笑。聶榮臻不顧他比自己“官”大，批評他道：

“你是領導者，怎麼能開這種玩笑？更不能拿全軍的命運來開玩笑！”

博古這才收起了手槍，並且連自己的威信和雄心，也一齊“收”起了，他實在幹不了，也不知該怎麼幹下去了。

這樣，收拾殘局和應付眼前大事的重任，只得落在曾與聶榮臻等同在西歐學習過、正擔任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身上。

博古進蘇區以後，由於根本不懂軍事，全靠洋顧問李德也不行，就拉上已有一定軍事經驗、比較瞭解蘇區情況和組織紀律觀念特強、善於與人團結合作的周恩來，組成了一個決策性的小核心。這個核心只有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人，就被稱之為“三人團”。撤出蘇區前後的各項重大決策，都是由“三人團”先內定，再通過中央作出的。

現在“三人團”中的二人沒了主意。只剩了周恩來一人在主事。

好在周恩來為人一向謙遜厚道，能與各方同志合作共事，對毛澤東也早就瞭解十分尊重，在毛澤東挨批被整時，沒有參與“牆倒眾人推”，反為其說公道話並設法保護，當中央決定撤銷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改由周恩來擔任時，他再三堅持自己只暫時代理，總政委要職還是給毛澤東留著。面對長征以來的慘敗形勢和黨內軍內的混亂局面，促使他走向了雖在“靠邊站”，卻已“靠邊幹”的毛澤東，他常常虔誠地去向這位足智多謀又經驗豐富的前任請教和求助。

毛澤東當仁不讓地為他出謀劃策起來，首先提出了他已和王稼祥、洛甫等認真商討並取得一致的戰略決策性建議：立即放棄原定的與紅軍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調頭轉往貴州方向，避開已在預定前進方向佈陣圍堵的強大敵軍，努力保住現有的兵力和中央機關。周恩來是明白人，當然知道這一建議的分量和意義，馬上就同洛甫、王稼祥等商量，在他們的支持下，於湘西通道城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建議。久不參加中央高層會議、已無任何軍職的毛澤東，也破例地被通知重新出席了黨的最高軍事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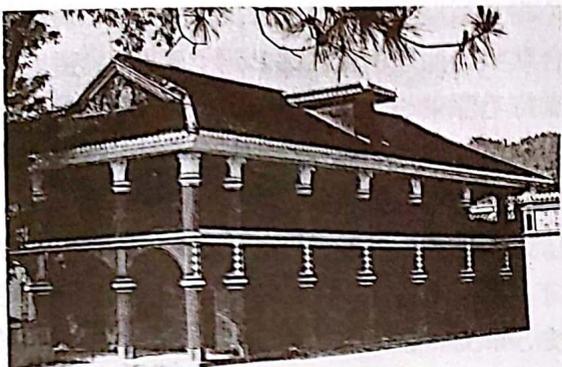
當時的紅軍總司令朱德，名義上一直是軍委主席，實際上卻早被與他同名卻不同姓更不同國籍的李德奪了權。他從井岡山起就同毛澤東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同為工農紅軍和中央蘇區的主要締造

者與領導人，相互長期合作，早已知根知底。他和周恩來更是親密無間，一直配合默契。他理所當然地站到了周恩來、洛甫和王稼祥等一道，贊同和支持毛澤東的建議。博古和李德一看大事不好，慌忙表示反對，卻又拿不出任何與之抗衡的有效方案，只得聽任與會多數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李德氣得吹鬍子瞪眼也沒人再理他，只得惱火地退出會場一走了之，反使他的威風特權，因此“一走”就此“了之”。留下還走不了的博古。這下真成了孤家寡人，也就順水推舟隨了大流。於是黨史、軍史和長征史上，由此寫下了“通道轉兵”這一章。

通道會議以後的毛澤東，不僅開始重新露面，並且公開地與周恩來、朱德特別是王稼祥、洛甫等密切聯繫，頻繁接觸，不斷聚首共商大事。部隊轉道向西佔領貴州東部的黎平後，中央又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肯定並完善了毛澤東提出的方針計劃，再次決定了深入敵軍兵力相對薄弱的貴州北部，爭取在那裏尋求和開闢新的根據地，作為中央紅軍的立足存身之地。又商定在近期選定適當時機再次召開黨的會議，討論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決定長征的方針大計等等。毛澤東本來就是政治局委員，此時不僅不再“靠邊站”，還作為關鍵甚至核心人物，順理成章地參加了中央和軍委的會議。倒是中央“總負責”的博古和“洋顧問”李德，反而負不了責和顧不上問，開始享受原由毛澤東享受的“靠邊站”待遇。當時還在為李德作翻譯的伍老，曾這樣證實上述情況：

“遵義會議以前，中央的許多活動和會議，就不再讓李德參加和干預了，有些事就根本不讓他知道，他雖然著急生氣，但也無可奈何，當時中央的日常工作特別是軍事行動，實際是由周恩來主持的，而為他出謀劃策甚至作出決策的，則是毛澤東和洛甫、王稼祥他們，其中主要的是毛澤東，突破烏江、進軍黔北、佔領遵義等一系列軍事決策，基本上都是由毛澤東提出的。所以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前，就已經在發揮重要領導作用了。”

在這個時期內，毛澤東總是同王稼祥、洛甫在一起，由於他們三人形影不離，同行同住同來同往又同作決策，人們將他們也叫成了“三人團”，並且是正在取代原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老



遵義會議會址



遵義會議會議廳

“三人團”的新“三人團”。紅軍打進遵義後，“新三人團”住在新城的同一座小樓內，“老三人團”則分散住在老城裏的幾個地點。“新三人團”開始形成新的核心，“老三人團”則正在解體和失去作為。一場新、老交替的扭轉歷史命運的重大行動，也就在這座原本不太出名的山城遵義開始了。遵義從此就作為“革命歷史名城”之一，載入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光輝史冊。

6、眾星捧月，攻其一點和區別對待

紅軍一進遵義，毛澤東就通過周恩來和洛甫、王稼祥等，決定在此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以解決長征紅軍面臨的問題。

當時中央政治局的委員與候補委員，有近一半人不在遵義。毛澤東對能參加會議的人，悄悄作了“摸底排隊”，感到除了洛甫、王稼祥和周恩來、朱德等人之外，不一定都會堅決支持他，其中還是有態度不明甚至跟博古走的。他為了保證自己能在會上穩拿多數，又提出

遵義會議參加、列席者



遵義會議參加、列席者



將參加會議者擴大到紅軍的軍團以上幹部，請非政治局成員的總參謀長劉伯承，在王稼祥傷病後代理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富春及各軍團指揮員彭德懷、聶榮臻、楊尚昆、李卓然和林彪等，都來參加這次討論和決策。

上列這些紅軍將領，對毛澤東都很熟悉與尊重，毛澤東曾帶領他們從井岡山打到閩贛地區，使部隊和蘇區一天天發展擴大，又一起打贏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第四次反“圍剿”時毛澤東雖已不在紅軍，部隊仍然用他的戰略戰術打，又打了勝仗，第五次反“圍剿”時完全否定和徹底取消了毛澤東的戰法，其結果就正好相反。因此這批紅軍將領早就對博古、李德極其不滿，他們正盼望還由毛澤東來指揮部隊。他們來參加會議，就如眾星捧月似的，使毛澤東一下增加了一批有實力掌實權的積極支持者，保證他在會上能穩操勝券。

毛澤東在作出以上安排的前後，又作了一項關係到會議前途的重要工作。早在遵義會議以前，黨內已有人認為由博古“總負責”的臨時中央，不僅在軍事方針上是錯誤的，在政治路線上也很有問題，應該把軍事政治問題新賬舊賬一起算，徹底批判和堅決糾正他們推行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提出這一問題的同志，都是黨和紅軍的

得力幹部和忠誠戰士，很想讓毛澤東這次再挑個頭，反掉那個錯誤的中央領導。

毛澤東聽了他們的想法，連忙一一勸止了。他比這些同志想得更深更遠，反復對這些同志說，這次會議上要解決的問題，當時只能集中一點：即只檢查、總結和批判、糾正中央某些人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不忙涉及其他問題。政治路線問題不僅不能碰，相反還要表示肯定甚至擁護。因為當時中央的政治路線，都是經過共產國際批准和按國際指示辦的，批判這個路線，就成了“反對國際路線”，這事兒就鬧大了。不僅博古決不會接受批評，洛甫和王稼祥也可能改變態度，因為他們都是共產國際所信任和支持的幹部，在反對軍事路線錯誤上，他們身上都沒有眼，因此能理直氣壯地批判李德和博古，但在政治路線上，他們也是擁護和執行者，各自多少都有些眼，批判政治路線勢必牽連到他們自己，就會把他們也推到對立面。如果他們重新與博古站在一起，這次會議不僅解決不了政治路線問題，反而會直接影響到對軍事路線錯誤的批判和糾正，結果將事與願違。毛澤東對那些熱情有餘而冷靜不夠的同志說：飯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個胖子；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不能畢其功於一役。這次先集中火力解決軍事問題，其餘的以後再說，一步一步地來。那些同志恍然大悟，連說有理有理。

後來開會時，毛澤東不僅在自己的發言中，還讓執筆寫出遵義會議決議的洛甫，在批判軍事路線錯誤的同時，又特意加上一句，肯定當時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不僅“正確”，而且“無疑”。這不僅使洛甫、王稼祥更堅定地站在自己一邊，也使博古及其支持者無話可說。結果使會議大大減少了阻力，比較順利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這正是毛澤東遠謀深慮以至“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結果。直到黨的“七大”以前，共產國際已於一九四三年宣告解散，全黨思想通過整風運動已經基本統一，洛甫、王稼祥和博古以及一向倚共產國際之勢欺人的王明先後一一都對毛澤東表示“臣服”，他這才根本否定和徹底批判了遵義會議以前中央所遵行的政治路線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為此等待了整整十年。

遵義會議批判的對象主要是博古和李德，毛澤東在會前和會議期間，將他與洛甫、王稼祥共同的發言提綱和在他自己的發言中，有意將批判的矛頭、份量和程度，對於博古和李德又作了明顯的區別。五軍團政委李卓然，未能趕上第一天會議，第二天趕到遵義時，先見了毛澤東，聽他講了會議的情況，又接受了他的提示和建議，在第二天會議上發言時，對李德從錯誤指揮到蠻橫作風，進行了無情的批評揭露，對博古卻留有餘地，只以實例指出了他的錯誤所在。參加會議的其他紅軍將領，也都採取了同樣的態度，不僅大大改善了會議的氣氛，也使本來有些對立情緒的博古，態度慢慢和緩冷靜下來，逐步聽進同志們的批評，開始思考並承認自己的錯誤。

毛澤東的這個做法很得人心。博古畢竟還很年輕，政治經驗少，也不夠成熟，他作為本國同胞，以後不免還要共事，對他應該“手下留情”。那個李德就不同了，假充內行瞎指揮，造成惡果還不認賬，他將來無非是拍拍屁股一走了之，這次索性讓他當一回“靶子”和“反面教員”，讓大家出口氣，使博古也受教育。這樣做的效果很好，博古後來逐步認識到錯誤，幾次向黨作出檢討和自我批評，並且以實際行動支持了毛澤東的領導。倒是李德一直思想不通，對於遵義會議上對他的批評一直感到委屈，長征結束以後見到斯諾時發過牢騷，直到60年代還寫文章攻擊毛澤東和反對遵義會議，使他自己成了中國現代革命史上“進口”的“反面人物”之一。

在遵義會議的決定性時刻，毛澤東又出高招，並且出奇制勝。

7、提供“炮彈”確定目標，用其所長開頭炮

紅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進遵義，遵義會議於一月十五日晚上正式召開。在這一個星期的時間裏，新、老“三人團”都作了必要的準備工作。

按照已定議程，這次會議先由博古代表中央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當時稱之為“主報告”或“正報告”，再由周恩來專門就反“圍剿”中的軍事問題作報告，人們稱為“副報告”。兩個

報告之後就進行發言討論。人們都已知道，由毛澤東和洛甫、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準備了一個全面批判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路線錯誤的發言，由於它正好是與博古報告中的觀點完全對立的，人們就稱之為“反報告”。這個反報告的提綱實際是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其中包括了他和王稼祥、洛甫等多次交談過的一系列重要觀點、論據和例證等材料。毛澤東為準備這個提綱，在住進遵義以後，他的房間裏通夜燈光不滅，每天一早就拿出寫成的手稿，交給分別住在鄰室和樓下房間的王稼祥、洛甫，請他們再修改補充。會議前夕，他們三人共同研究的發言提綱，就這樣定稿完成了。

會議第一天，由博古和周恩來分別作了正、副報告，以下的會議就開始討論發言，其“重頭文章”當然就是“新三人團”的反報告了。許多人都以為這個反報告將由毛澤東來開講，因為其中主要的觀點材料都是他的，連發言提綱也出自他的筆下。後來的有些史書也就這樣寫了，只是史實並非如此。這事又體現了毛澤東高人一籌的策略思想。

當初連洛甫、王稼祥都認為，自然應由毛澤東代表他們三人來發言。可是臨發言以前，毛澤東卻提出請洛甫作為代表出面發言。王稼祥覺得不必，洛甫自己也表示謙讓。但毛澤東堅持由洛甫作主要發言，他自己可以在洛甫發言後另作一些補充。幾番推讓以後，洛甫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意按照毛澤東起草的提綱發言。人們很快就看出，毛澤東的這一著棋，下得實在高明。

在遵義會議以前的“左”傾錯誤領導時期，從王明到博古等中央領導人，一直把毛澤東視為“異端”甚至“異己”分子，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央的錯誤方針一貫徹到蘇區，毛澤東就不斷受到中央及其代理人的攻擊指責，直到將他撤職下放靠邊站。確實挨整受氣吃夠苦頭。因此，如果由毛澤東挑頭來批評以博古為代表的中央的錯誤，很可能使人認為是因為心懷不滿，故意找岔和乘機報復。加之他已長期不在領導崗位，也一直不是中央領導人，其身份地位和處境必將影響到他發言的份量作用，而由洛甫來發言，儘管內容一樣，則會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首先，洛甫本來就是王明、博古等的老同學、好朋友，都是從莫斯科回來的。由他來出面批評博古的錯誤，將沒有任何個人恩怨，也不存在什麼“山頭”、“宗派”方面的問題，只有真正的思想分歧，有助於人們和博古本人正確理解和認真思考他們的意見。其次，洛甫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古，他又是黨內主要的理論家，為人也沉穩成熟得多，在領導幹部中有相當的影響和威信，讓他來作這個“反報告”，將會引起人們的格外重視，其分量和作用當然會不一樣了。此外，毛澤東早已觀察並瞭解到，洛甫對於比自己小七、八歲、又過分鋒芒畢露顯得浮躁的中央“總負責”博古，內心不僅並不佩服，還時常流露出一種輕視態度，當博古有了明顯錯誤又不承認時，他就表現得很不滿意，大有“與其由你幹，不如讓我幹”的意味。遵義會議前他與毛澤東的多次交談中，也一再露出對中央“躍躍欲試”，將博古“取而代之”的情緒，也正因此，洛甫對批評博古是主動和積極的。毛澤東正好發揮其積極性，用其所“長”，讓他來起自己起不到的作用，推他作為“新三人團”的代表，在會議上對博古和李德的錯誤，發出第一陣重炮！

洛甫開的這頭一炮，果然震驚四座，別說博古和李德沒有想到，不少別的參加會議者也很意外，這位也是從莫斯科回來的洛甫，平常文質彬彬，沉默少言，居然同從山溝裏出來的毛澤東站在一起，向自己的老同學、好朋友以及來自共產國際的顧問大人，狠狠地開了第一炮。這一炮的“目標”偏偏又是“非正宗”馬列主義的毛澤東“測定”的，連“炮彈”都是毛澤東“製造”和裝進炮膛的。

洛甫剛剛一炮打響，毛澤東就來一槌定音。

8、從“一槌定音”到“一呼百應”

洛甫發言以後，毛澤東馬上作了補充，這個“補充”其實是對洛甫剛才的發言，作了歸納概括和結論定性，等於是給“左”傾軍事路線錯誤和這次會議的主題，來了個“一槌定音”。

曾經列席遵義會議為李德翻譯，也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伍修權事後這樣回憶道：

“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發言具體的話我記不得了，幾條結論性的意見我卻一直難忘，因為從當時的會議上，到延安整風以至開‘七大’時，只要一提到反‘圍剿’失敗和‘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都是按毛主席當時所說的那幾條來統一認識的。他的話成為中央的結論一再被人們引用和闡述，不僅寫進了會議決議中，也列入了有關文件和毛主席自己的著作中。其中有些話我都背熟了，例如他說反‘圍剿’軍事上的錯誤，主要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和退卻時的逃跑主義，其根本原因是完全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即‘左’傾教條主義。

“由於洛甫在發言中已列舉了大量事實，證明李德、博古等正是這樣決策和行動，才導致了嚴重後果。毛主席的發言顯得更為有理有據，其論點可說不容置疑，使得本來心裏並不服氣的博古，也不得不低頭承認事實確是如此。至於像受審似的列席會議的李德，除了乾生氣也無言以對。”

王稼祥緊接著毛澤東也作了發言，他明確提出，應該撤銷事實證明不能勝任的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認為應該由毛澤東這樣有經驗高水平的同志，來負起指揮戰爭的重任。

洛甫作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王稼祥的發言，等於給會議定了調，被擴大來參加會議的紅軍將領們，早就按捺不住了，馬上異口同聲地從不同角度、用不同事實首先對李德、其次對博古進行了激烈的批評。憋了一肚子火的彭德懷和聶榮臻、李富春等的發言尤其尖銳，連一向謙和的朱德，也對李德和博古說，決不能再由你們這樣搞下去了！正式參加會議的各位政治局成員，都一一表示態度，贊同毛澤東、洛甫等對博古、李德所推行的軍事路線錯誤的批評，周恩來也對自己執行了錯誤軍事路線，作了真誠的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應負的責任。當時參加和列席會議的，總共雖然只有二十來人，毛澤東等的發言卻起了一呼百應的作用，幾乎完全一致地接受和支持毛澤東等提出的意見和主張。

所以說是“幾乎”，是因為除了博古、李德本人外，還有一個反對者。就是正任“少共”中央書記（即青團中央書記）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何克全）。他是參加遵義會議的第五個從莫斯科回來的人。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就同王明、博古等交往很多、關係密切，後來就成為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和“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之一。到蘇區以後就和博古搞在一起，他對於老同學洛甫、王稼祥如此“反水”站到了毛澤東一邊，支持和參加毛澤東的“非組織活動”，十分不滿。認為毛澤東等“結夥煽動反對中央”即他的好朋友博古和國際顧問李德，簡直是大逆不道。他在會上和會下冷言冷語地說：

“毛澤東算什麼？不過就是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那一套老玩意打仗！”

毛澤東聽到後，十分輕鬆地反譏道：“《三國演義》我是看過，但是打仗時，誰還記得那些？你說的《孫子兵法》，我偏偏還沒有看到。你說我是按照那一套打仗的，想必你是讀過了。那麼請問，《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第一章開頭講的什麼……”

洋書讀過不少的凱豐，一下子被毛澤東“將”了“軍”。其實他也只是聽說過《孫子兵法》一書，總以為來自山溝溝裏的“土包子”毛澤東，最大的“本事”也就只出自一些古書。不料他卻在毛澤東談笑自若的“反擊”中，弄得啞口無言，狼狽得很。因為不服這口氣，就在會下去鼓動博古，不要向毛澤東認輸，“中央的擔子”決不能輕易讓人奪去。

好在博古雖然少年氣盛，卻也心中有數，他知道“中央的擔子”壓在身上是什麼滋味，真想一推了之。這時也只心領了凱豐的“好意”，還是在遵義會議上認了“輸”。倒是凱豐自己後來改變了認識，回心轉意地也“歸順”到了毛澤東麾下，在後來張國燾搞右傾分裂時，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反對和批判了張國燾。一九三八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成為政治局委員，不久又擔任了中宣部副部長，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中，成為毛澤東的重要支持和合作者。只是在黨的“七大”時，有人將他在遵義會議時的表現“奏了

一本”，使他從中央委員中落選，以後就離開了中央。這都是後話。

當年的遵義會議，就在幾乎是“一邊倒”的情況下，肯定和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使會議基本按照他的意圖一一取得結果。正在人們以為毛澤東即將對博古、李德“取而代之”，“東山再起”地接過“兵符”重掌軍權時，毛澤東卻又出人意外地虛晃了一“槍”。

善於審時度勢的毛澤東，想得總是比別人深遠。

9、中央的“擔子”，該由誰來接？

遵義會議的最後一天，是討論並決定組織調整和人事安排。

由於博古、李德對軍事路線錯誤負有主要責任，撤銷他們的軍事指揮權，已是不言而喻的事了。但是今後的指揮重任，將由誰承擔呢？

王稼祥和周恩來等特別是一些紅軍將領，都認為應該由毛澤東來指揮戰爭。只是按照黨章規定，當時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王稼祥以及被擴大進來的非政治局成員的紅軍將領們，都沒有表決權。更重要的是還有近半數政治局委員不在遵義，沒有參加這次會議，那些人中的王明、張國燾等人肯定不會支持毛澤東，他們的態度以後必將影響到這次會議的決定在組織上的合法性。這樣毛澤東能否穩拿多數和穩坐“交椅”，就很難說了。從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毛澤東，在這天會議開始後，一反常態地沒有發言，只在一邊靜觀傾聽著。

在場的幾位政治局成員中有人表示，鑒於紅軍總司令朱德本來就是軍委主席，僅僅因為李德來後奪了他的權，但是對外對下他在名義上還是軍委主席，並且一直用他的名義指揮作戰。現在既撤銷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就應該權歸原主，由朱德繼續行使職權，承擔軍事指揮重任。此外，在博古、李德“執政”期間，日常軍事行動和具體指揮任務，實際是由周恩來主持的，他雖然執行了博古、李德的決定，但也力求減少和彌補了由於他們瞎指揮造成的損失，黨和紅軍中多數同志都很信服和尊重他。從黨的“四大”時開始，中央一設有“軍

委”或“軍事部”，周恩來就是軍委書記或軍事部長，他一直是中共中央軍事上的主要領導人。他的能力、經驗和威望，也足以擔此重任。因此應該名正言順地由他繼續主持黨的軍事工作。

與會者對以上意見並無異議，於是在遵義會議上關於軍事指揮問題，就通過了這樣的組織決定：

取消原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軍事指揮決策機構“三人團”。

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鑒於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的豐富經驗和重要作用，會議又決定：“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會議考慮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以及近一時期內，有著實際貢獻，起了重大作用，特別是在中央蘇區和紅軍部隊領導有方，成績顯著，又長期受到原中央領導錯誤的壓制、排斥和打擊，又決定將“毛澤東同志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以上決定，均見之於《遵義會議文獻》等重要史冊中。就是這幾行看似簡單的文字，卻揭開了一個因襲傳聞已久的歷史謎案或誤區。即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並沒有馬上“取得了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他僅僅成為“全黨”的中央常委之一，和全軍最高指揮者、負責者周恩來的一個“幫助者”。所以後來在有關的文件、文章和宣傳材料中，都“虛晃一槍”地加上了“實際上”三字。所謂“實際上”，說白了就是毛澤東當時“事實上”並未成為全黨全軍的合法領袖。這個“實際上”的“馬虎眼”，打得人們幾十年來都不明真相，不知底細，但是不少史書上這麼寫也是“事出有因”，未必“查無實據”。

遵義會議上雖然撤銷了博古的軍權，卻沒有觸及由他“總負責”的黨權。倒是他自己到底年輕，有點沉不住氣，挨批以後一直精神不振，有些無所適從，反正負不了責，也就不負其責，開始“撻挑子”了。當時政務雖然不多，軍情卻很緊迫，黨和紅軍豈能一日無“君”，中央馬上商討由別人來接替他“總負責”。由誰來接呢？威望高、人緣好的周恩來是從來堅決不當“第一把手”的。

新任中央常委毛澤東呢？遵義會議前後已有風言風語說他想“陰謀奪權”、“顛覆中央”，如讓他上臺，正好證實了這些說法，不如暫時避嫌。只有原中央常委洛甫，其水準、資歷和影響不僅不低於博古，還比這位“娃娃總書記”更有修養，他在糾正博古等的軍事路線錯誤時又開了頭炮，立了首功。加之當時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一把手”的任免，必須由共產國際認可，不然將是非法和無效的，洛甫正好和王明、博古一樣，也是共產國際所熟悉和信任的人，如由他來當“一把手”，在共產國際那邊將比由周恩來或毛澤東來當更容易通過。對此早已考慮的毛澤東，也積極主張由洛甫來接替博古，只是有一條理由沒有說出口。博古在許多方面確實不如洛甫，洛甫對其“總負責”權位，常常表現得不以為然甚至“躍躍欲試”，這也是他能和毛澤東一起批評和反對博古的內在因素之一。如果將來中央改由洛甫來“總負責”，不僅會比博古更合適，也能與毛澤東繼續合作相處，並且他畢竟也是一個書生，許多軍事問題和實際事務，必然還要聽聽他毛澤東的，而毛澤東也會在若干問題上影響甚至左右他。毛澤東更意識到，遵義會議雖然開過了，反對和糾正王明錯誤路線的大任遠未完成，必須團結各種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才有助於徹底解決問題。大有積極因素的洛甫，正是他必須團結的重要力量。這樣，洛甫就在毛澤東等人的支持推舉下，接過了博古撻掉的“中央的擔子”。這一組織決定是在遵義會議結束的十幾天後，在行軍途中一個雲貴川“雞鳴三省”的山村裏臨時作出的，當時也就是開會時口頭上說一下，並且像博古當“總負責”一樣，連個正式名目也沒有，只是一個專管黨的工作的中央書記。後來有人在洛甫的職務前加了一個“總”字，他連忙聲明，當時中央並無“總書記”一職，他也從未當過什麼“總書記”。

洛甫說的是老實話，他也確是位老實人，他就任中央“總負責”後，果然許多事情都由毛澤東來為他拿主意。

10. 當仁不讓 後來居上

遵義會議及其稍後的組織決定，將“軍權”還給了朱德、周恩來，將“黨權”交給了洛甫。毛澤東倒是有著一個“蘇維埃主席”的“政權”，但他早就是個光桿司令，連大印都不歸他管。當時他雖然起了一些“實際上”的領導作用，只是事實上僅僅是中央領導人洛甫和軍委負責人朱德、周恩來的一個特別助手，相當於“高參”或“智囊”等角色，他個人並無可以作出直接決定的權力和職務。

不過，這時的毛澤東，不僅比他在蘇區被打入“冷宮”時好過多了，他在黨內軍內的影響作用及其中央常委地位，確是今非昔比甚至前所未有了。他在遵義會議前後，事實上不斷參與和干預了關係到全黨全軍的許多大事，特別在軍事問題作戰方案上，他的高招和智謀就是比別人來得多和快。主持軍務的朱德、周恩來一向謙遜厚道，從不爭功抓權，遇事總主動找毛澤東商討請教甚至言聽計從。遵義會議後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戰，就是按毛澤東出的主意打的，所以此後毛澤東本人也說這是自己的“得意之筆”。雖然當時所有的作戰命令上只有朱德或“朱周”的簽署，從來沒有他毛澤東的名字。這一狀況不久略有改變，朱德、周恩來開始對毛澤東分權甚至讓權。

部隊在赤水兩岸和遵義周圍轉戰近兩個月後，中央縱隊進駐到遵義西南的鴨溪時，一軍團林彪來電報要求攻打新場的敵軍，中央和軍委也就是洛甫和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加上毛澤東等人，馬上開會討論此事，多數人都同意打這一仗，毛澤東有不同意見，卻只有他一票，就沒有被接受。周恩來根據多數通過的決定，連夜去起草作戰命令。毛澤東在會後反復考慮，認為這一仗絕對打不得，當夜提著馬燈趕到周恩來那裏，讓他先別下命令，聽他重新陳述不能打的理由。本來就尊重毛澤東並且很好說話的周恩來，終於被毛澤東說服了，認為他的意見確有道理，又按毛澤東的意思立即去找中央“總負責”的洛甫和軍委主席朱德，說服他們改變和撤銷已經作出的決定，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停下作戰命令，不打這一仗。洛甫對軍事問題本來不大懂

行，朱德又更好說話，幾下一商量，還是通過了毛澤東當初的建議。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意見是正確和必要的。朱德連聲稱讚毛澤東的機敏和高明，連洛甫對毛澤東的這一手也很佩服。就在這時，毛澤東又提出了一個重要意見：

這次雖然及時收回成命，沒打這一仗，避免了損失。但是軍事行動，瞬息萬變，再碰到這種情況，我們決定了再推翻，然後再作決定，這樣議來議去，猶猶豫豫，反反復復，反而會貽誤戰機搞亂部署，弄不好會吃大虧。今後在作戰問題上，到關鍵時刻最好只由某一個人相機行事，作出決定立即實行，可不能再這樣推延拖拉了！

深諳帶兵之道，又與毛澤東長期共事的朱德，當然明白他的用意，就對周恩來和洛甫說：

“我同意澤東同志的意見，我看以後索性就由毛澤東同志相機行事，必要時由他說了算。他硬是比我高明，主意也多嘛！”

洛甫、周恩來和也是軍委副主席的王稼祥等，也都同意了這個意見。於是，毛澤東又說：

“既然如此，就不能像過去打仗那樣，那麼多人集體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個人的小組，比如說，有我，恩來，還有稼祥，就三個人，具體負責，指揮作戰。”接著又對朱德說：“你是軍委主席、總司令，還是我們的總頭頭。”

這樣，就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周恩來、王稼祥二人當然地推舉毛澤東當他們的“頭”，但是對外卻不公開提這個小組，仍舊用軍委主席、總司令朱德的名義下達各項命令。

也就從這時開始，毛澤東才從遵義會議上定下的軍事上的“幫助者”一下變為“實際主持者”以至“最後決策者”，他也從原來的“助手”位置上，躍登了軍事上的“一把手”位置。早就創造了“槍桿子裏出政權”學說的毛澤東，一旦重掌軍叔，又掌握了“槍桿子”，一切也就隨之改變和改觀了。長征紅軍從此轉危為安，反敗為勝，他本人也不再是那個靠邊站的受氣者，重新到手的“槍桿子”，不久又為他“出”了“政權”、“黨權”……

毛澤東當年曾在遵義北郊婁山關上吟《憶秦娥》一闕，詞曰：

“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

當時當地的毛澤東面前，確曾有過一道道如鐵“雄關”。雖然，都被他一一“邁步從頭越”過，但卻“越”得並不像詩詞中寫的那麼瀟灑輕鬆，特別是後來發生的張國燾分裂危機以及和王明分庭抗禮時，使走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的毛澤東，始終都處在艱險的“長征”中！

11、言順名不正 雙雄難並立

以毛澤東為首的“三人軍事小組”，雖然一度有“職”有權，畢竟不是黨和軍隊的正式機構和職務，多少有點名不正言不順。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帶領下，從貴州打到雲南又轉入四川，連續渡過了金沙江、大渡河，越過了大雪山等天險。三人小組中的王稼祥本來就是個傷員，加之不懂軍事，很少直接參與指揮，後來周恩來又生了重病，難以堅持工作，只能用擔架抬著隨隊行軍。軍事指揮重任就落到了毛澤東一人肩上。部隊越過夾金山後，終於同張國燾率領的紅軍四方面軍相逢會師。

當時由毛澤東直接指揮的被稱為中央紅軍的一方面軍，連同中央機關的老弱幹部和勤雜人員，總共只剩了一萬來人，並且大都武器破舊，彈藥有限，裝備很差，連軍衣都是破破爛爛的，什麼顏色和樣式的都有。四方面軍不僅有六七萬人馬，並且有大量川陝地區參軍來的年輕力壯指戰員，武器、彈藥和裝備都比較齊全充足，軍衣也比較整齊統一，中央紅軍同他們一比，簡直成了一群叫化子兵。

作為黨的中央常委之一，從鄂豫皖到川陝蘇區和四方面軍集黨政軍權于一身的張國燾，不僅沒有把一方面軍部隊放在眼裡，連同中央機關及其領導人都沒有放在眼裡。張國燾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他不僅與毛澤東同為中共創始人之一和“一大”代表，並且是黨的首屆三



毛澤東和張國燾

人“中央局”成員兼“組織主任”，地位僅次於中央“一把手”陳獨秀。六屆四中全會後代表中央去直接領導鄂豫皖蘇區及四方面軍，因此他在黨和紅軍中的地位、影響和實權，絲毫不下於毛澤東，其資歷更比王明、博古和洛甫等老，毛澤東等人和張國燾的部隊會師以後，由於自己一路饑寒勞累，個個都瘦弱疲憊不堪，張國燾卻是肥頭大耳，穿著講究的軍服和馬褲，派頭很大，神氣十足。中央紅軍中有些同志對張國燾很看不慣，連遵義會議上支持博古的凱豐，也公開批評張國燾的“軍閥作風”。可是毛澤東卻表現得和別人並不一樣。

他見到張國燾後不僅自己十分謙恭有禮，還再三叮囑周圍的人千萬注意尊重張國燾，提醒人們一律稱呼他為“張主席”。雖然張國燾只是鄂豫皖和川陝蘇區與四方面軍軍政委員會的主席，在“中華蘇維埃”也掛了個名，卻是排在毛澤東之下的副主席。然而正是這位毛主席，卻帶頭對張國燾一口一個“張主席”。又在各種場合當面大肆宣揚介紹張國燾的功勳業績，使這位“張主席”一時也雲裡霧裡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以為毛澤東等人都向他稱“臣”拜服了，哪知他小看並且看錯了毛澤東，

當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好兵力強，提出由他出任軍委主席並指揮全軍時，毛澤東便客客氣氣並且顯得很為難地同他商量道，我們的軍委主席，一直是朱德總司令，他不僅在全黨全軍德高望重，連敵人也懾于他的威名，國內外都承認他是我軍的最高領導人。如果突然免掉他的軍委主席職務，恐怕對內對外都不好交代，對總司令本人也不好說。所以請您再慎重考慮一下，軍委主席一職是否暫不換人。

一席話說得張國燾也覺合情合理，不便再堅持己見，但又覺得心猶不甘。毛澤東心裡有數，便在下面做了工作，回頭再主動去與張國燾商量道：

“中央和軍委的同志考慮到您在全軍的影響和威望，想請您出任與朱德總司令齊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這一職務前一時期是由周恩來同志兼任的，他後來因為生病體弱，難以承擔領導重任，這個位置正虛席以待，看來非你莫屬，恩來同志也支持由您擔任，中央和軍委的許多同志都希望您來接任這一職務，認為您是最合適和會稱職的。”

張國燾見毛澤東給自己送來一頂似乎同軍委主席差不多的“高帽子”，便順水推舟地欣然接受了。於是從毛澤東本人到他周圍的人，以及中央紅軍指戰員，見張國燾都恭恭敬敬地改口叫他為“張總政委”，使這位“總政委”感到十分入耳快慰。張國燾接受這一全軍領導大任後，毛澤東又建議總政委和總司令，將已會師的第一、第四兩個方面軍，合編為“左路軍”和“右路軍”，分兩路齊頭並進越過草地北上，並且建議總司令朱德和總參謀長劉伯承等都到張國燾所在的“左路軍”即原4方面軍總部去，以便與張國燾總政委一起指揮全軍。中央機關及毛澤東等人則隨原中央紅軍的第一、第三軍團及原四方面軍部分部隊組成的“右路軍”行動。張國燾見朱德等人都贊成毛澤東的建議，也接受了這一方案，兩個方面軍開始混編並分別過草地北上。

在此期間，毛澤東又從中央紅軍抽調出不少政工幹部，深入到四方面軍部隊中去進行慰問和宣傳鼓動，其中有三軍團宣傳部長劉志堅和著名的紅軍藝術家李伯釗等。他們到4方面軍部隊後，用各種方式

宣傳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針重要意義，鼓動部隊擁護中央的正確決定。

毛澤東這樣做，其中大有文章。張國燾帶部隊與中央會合以後，他不同意毛澤東等人原定的北上方針，不想把部隊帶到偏遠貧瘠的西北地方去，想返回到“天府之國”四川等富庶地方去，實際上正同中央方針和毛澤東等頂著牛。面對這一嚴重分歧，毛澤東一直引而不發地採取著隱忍態度，他三顧茅廬地幾次親自來到張國燾的住處，耐心地向對方解釋北上方針，反復勸說他同意多數的決定。有一次他帶王稼祥和他同去找張國燾“談心”，張國燾傲慢地躺在床上，手托腦袋旁若無人，對坐在他床前正禮賢下士地向他商討請教的毛澤東愛理不理，使作陪的王稼祥和邊上的警衛戰士都看不下去。可是毛澤東卻似乎並不介意，照常謙和耐心地向對方“說項”，其高姿態反而弄得張國燾很不自在。與此同時他又讓洛甫和朱德等用中央和軍委的名義，開會宣佈堅持已定的北上方針，迫使張國燾不得不和朱德、劉伯承等一起，帶著合編後的“左路軍”越過草地。

張國燾從來是個只能由他說了算的角色，現在由毛澤東等人限制、牽制甚至壓制着他，簡直一天也受不了。按照原定計劃，“左路軍”過草地後就與中央所在的“右路軍”靠近，再一起向甘肅南部行動。但是張國燾到了草地邊緣阿壩以後，卻違反決定按兵不動，不僅不向“右路軍”靠近，反而電令全軍停止北上，都跟他掉頭重過草地，南返轉回到四川中部去。當時他一天幾份電報，催促“右路軍”按他的命令行動，開始同中央和毛澤東等人“對著幹”，毛澤東和中央多數人當然不能接受張國燾的“命令”，於是就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卻又使人生疑的“電報事件”。

12、緊急脫離險境，留下黨史之謎

當時帶領右路軍行動的是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但是實權卻在原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手上。陳昌浩也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並且也

是由王明等人派到鄂豫皖蘇區和四方面軍，協助張國燾執掌大權的。由於左、右路軍是由第一、第四兩個方面軍混合編組的，出任右路軍參謀長的是原中央紅軍的葉劍英。當徐向前、陳昌浩和葉劍英帶著包括中央機關在內的右路軍，通過草地來到川北巴西一帶等待左路軍來會合時，張國燾連續發來電報命令本來就與他一唱一和、緊密配合的陳昌浩，帶領右路軍馬上隨他南返，並且要陳昌浩去勸阻毛澤東、洛甫等都停止執行原定的北上方案，跟部隊隨左路軍回頭南下。據說在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電報中，有這樣一道密令：如果毛澤東等不聽勸告，堅持繼續北上，應監視其行動，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這最後一句後來又被傳為“武力解決之”。

一位自稱當時看到這份電報的老同志在復述上列電報內容後，特地加注了一句話道：“企圖用武力危害中央”。這就成了這件“密電”裏最要害的問題：張國燾密令陳昌浩“武力解決”與毛澤東等的分歧，即“用武力危害中央”。據這位老同志“回憶”，他見到這一電報後，“大吃一驚”，當即將電報送給了葉劍英參謀長。由於電報是發給陳昌浩的，葉劍英拿著電報去找他時，他正在一個會議上講話，沒顧上看電報，按慣例讓葉劍英參謀長先去處理。據說葉劍英的“處理”辦法是立即將這件電報送到中央交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一見電文，這還了得！張國燾居然企圖“武力危害中央”，與葉劍英等緊急密商之後。當即悄悄通知中央機關和原中央紅軍的一、三軍團，連夜秘密撤離了“危險地區”。葉劍英參謀長也與他的總指揮徐向前、總政委陳昌浩不辭而別，從右路軍“逃”了出來。當陳昌浩發現從中央機關到參謀長葉劍英和原中央紅軍的部隊都突然“逃跑”了時，一面氣得大罵，一面立即電告張國燾。他和張國燾的追隨者們，有的“義憤填膺”地要去“追擊”中央紅軍，被徐向前堅決制止了，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無論如何不能打！”

當時也在右路軍的原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在陳昌浩的授意下，還是帶了一個騎兵連，尋蹤追上了毛澤東等人。李特煽動紅軍部隊都“跟張總政委南下吃大米去”，“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當面指責毛澤東等是“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者”。氣得在場的中央紅軍

指戰員把李特從馬上拉下來，有的幹部要帶部隊去同四方面軍對打。一場黨內分裂和紅軍火併的危險局面，一下擺到了眼前。

就在這時，毛澤東站了出來，連忙對中央紅軍的同志說：“打不得，打不得呀！”他毫不見怪地把李特拉到房子裏頭，請他坐下來好好談談。那李特卻甩開他又跳出門外，對在場的原四方面軍的人喊著都跟他回去，不要聽“機會主義者”的，都跟“張總政委”走。

毛澤東馬上又出來，站到一處高坡上對大家說：“我們和四方面軍，都是紅軍，都是共產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現在願意北上的就跟黨中央走，“願意南下的也可以跟張國燾同志回去。我相信我們以後還會走到一起來的。”又說：“捆綁不成夫妻，有的同志要走，就讓他們走，不過以後他們自己就會回來的。”

以上這段史實是當時在場的伍修權親口提供的，別的史料也證實了這一說法。資料記載還說，張國燾帶著原四方面軍全部人馬以及原一方面軍的第五、第九兩個軍團，又脅迫朱德、劉伯承所在的原紅軍總司令部，一起重過草地南下，與中央完全決裂並背道而馳了。不僅如此，張國燾掉頭南返時，公然另立中央自封為“王”，居然電令洛甫、毛澤東等不得再用“中央”名義，甚至要開除他們的黨籍，“通緝”毛澤東和“查辦”葉劍英等人。

鑒於這一嚴重情況，毛澤東和洛甫等也相應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先向黨內高層通報了張國燾的問題和面臨的形勢，在川甘交界處的俄界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部隊也收縮重編，迅速北上進入甘南地區。

這裏有幾點值得注意，張國燾自立“中央”時馬上宣佈“開除”和“通緝”毛澤東等人，根本不承認他們還是“同志”了。但是按照毛澤東主張作出的關於張國燾的決定，不僅仍然稱張為“同志”，並且嚴格限制這一決定的傳達範圍，只讓中央委員和極少數高級幹部知道此事，連當時發給張國燾的電報，用語措辭還是客氣有禮地用著商量口氣。一度還實際上遵從了張國燾的意圖，暫時不以“中央”名義發電下令，並將僅剩的隨中央北上的一、三軍團，合編改稱為“紅軍陝甘支隊”或“北上先遣支隊”，司令員是紅軍副總司令彭德懷，

自己只是這個支隊的政委，連“總”字也自行取消了。當時的許多電文及檔案資料都證實了這些事。

毛澤東對張國燾的忍讓以至遷就到如此地步，確實非同一般，使人不可理解。其實這正是他善於審時度勢和靈活處事。深知“槍桿子”重要性的毛澤東比誰都清楚，當時張國燾的兵力太強大了，原四方面軍部隊加上以後編入左路軍的原一方面軍兩個軍團，共達八萬人馬。而中央紅軍加上中央機關通過草地後，總共只剩了八千多人。兩方恰是十與一之比。萬一發生內部火併，不僅很可能被對方“收拾”掉，其政治後果就更可怕了。所以毛澤東以最大的耐心和涵養，繼續對張國燾採取挽救、爭取和團結的態度，不和他鬧翻，不同他硬頂，講究有理有節，來個以柔克剛，既維持了表面的關係，也保存了自己的實力，反而亂了張國燾的陣腳。

直到幾年以後，張國燾南下後碰了釘子，四方面軍只得重新北上並被改編分散了，張國燾失去了兵權，被迫到延安去作檢查認錯後，毛澤東才提出只能“黨指揮槍”，不得“槍指揮黨”。這“槍”指的就是張國燾，代表“黨”的則是他毛澤東了！儘管當時他還不是中央“一把手”，還是以中央名義將張國燾定為“分裂主義”和“逃跑主義”者。內心不服輸的張國燾，卻始終認為毛澤東才是真正的“分裂主義”和“逃跑主義”者，因為當時恰恰是毛澤東領著很少一部分人悄悄“逃”走的。所以張國燾至死也堅持著原有的“反動立場”，使這場“官司”打了好幾十年。

不僅如此，導致“分裂”和“逃跑”的那份著名的電報，因為一直查無實據，也打了幾十年“官司”。包括徐向前在內的原四方面軍幹部，從來否認有這份“武力解決”和“危害中央”的電報，中央的許多領導人也說並未見過這份電報，並且當時和以後各項有關張國燾問題的文件、決定和資料，都未提過電報的事。只有毛澤東和葉劍英本人說過有此電報，因此他們當年才採取了那次緊急行動。事後毛澤東還因此表揚了葉劍英，說他“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和“板蕩識英雄”等等。只是幾十年來誰也拿不出這份“物證”，使這個電報事件成了中共黨史上的一大疑案。

當年張國燾與毛澤東之爭，最後是以張國燾的徹底失敗而告終的。一度被他強令南返的四方面軍部隊，正如當初分手時毛澤東所預言的，“以後他們自己會回來的”。當然“回來”得很不容易，在四方面軍內的朱德、劉伯承和徐向前等都不支持張國燾，外部的敵情和環境也使部隊無法存身，被擠到川康等偏僻地區。後來任弼時、賀龍等帶著紅軍第二、第六軍團與他們會合了，毛澤東為了不使二、六軍團被張國燾“吃”掉，忙致電讓他們組成紅軍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並列直屬中央指揮。任弼時、賀龍和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根據毛澤東等人的意圖，聯合與張國燾力爭，使其只得同意與二方面軍一起北上，三過草地到達陝甘地區，與一方面軍再次會師，使全軍都結束了萬里長征，實現了毛澤東預定的北上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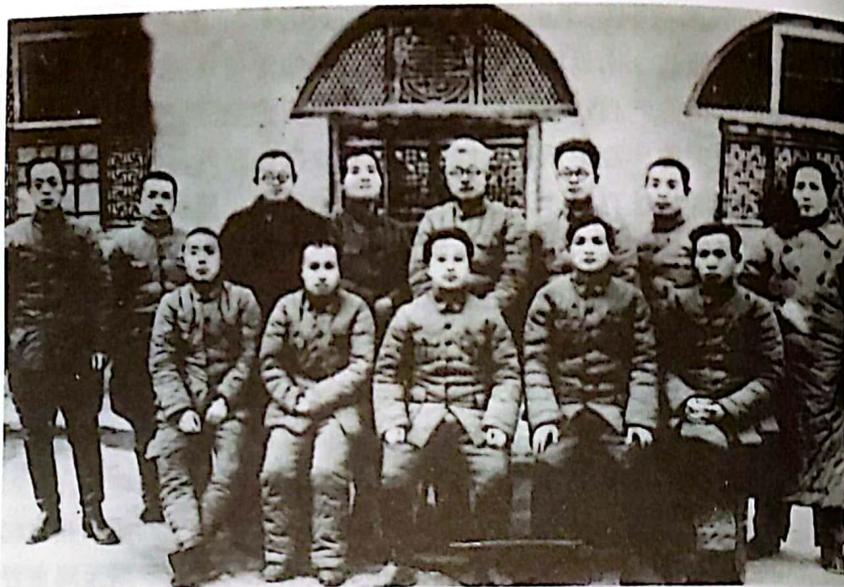
不過，毛澤東的能夠取得勝利，迫使張國燾“浪子回頭”並收起偽“中央”旗號，除了毛澤東本人的堅定機敏外，還有一項至關重要的外力因素，他之所以最後成功，還得益於他能借“天”之力。

13、忽降“天外來客” 借得“尚方寶劍”

在本章以前，對於當時那段歷史的敘述中，有一個重要的背景情況未及具體交待。就是作為中國共產黨“頂頭上司”的共產國際，和在莫斯科一直遙控操縱中共中央的王明，在中央紅軍撤離蘇區開始長征以前，由於黨在上海的地下機關被敵人破獲，與莫斯科就完全失去了聯繫，共產國際再也接不到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共中央也從此得不到共產國際的指示，這使共產國際和王明不僅干涉不了中國黨和紅軍的行動，連他們到了哪里幹些什麼都不知道；同樣，中國黨和紅軍的內部事務也不必再向共產國際和王明不斷請示彙報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獲得了完全獨立自主不受外來干預的機會。

正是由於這一狀況，黨和紅軍才能“擅自”改變軍隊行動方向，特別是“自行”撤換黨和軍隊的領導人。

也正因此，毛澤東的主張、計劃和方針、策略，才能一步一步成



王明（前中）毛澤東（後排右1）與項英、凱豐（前左1、2）劉少奇、陳雲（前右1、2）後排左起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梁、博古、周恩來，

為現實，也才能一點一點地掌握了對軍隊的指揮權和在中央的發言權以至決策權，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實際上取得了在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

因此，遵義會議的成功原因和重要特色之一，就是首次擺脫和排除了外部干涉，真正獨立地自行決定了自己的命運。

不過這狀況雖屬“空前”卻又“絕後”，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國際大家庭”中“家長”的共產國際，特別是自命為中國革命“最高領導”的王明，對於與國內黨和紅軍的中斷聯繫並無法控制，當然不能無動於衷置之不理。紅軍還在長征途中，就由莫斯科派出了一位原在共產國際和國際工會工作的中共老黨員、即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化名為張浩，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及通訊聯絡設備和密碼等等，喬裝改扮輾轉回國，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即中央紅軍剛剛到達陝北時，找到了毛澤東所在的中共中央機關。

這時的中共黨內，正是由洛甫和毛澤東主持的原中央，同張國燾自立的“新中央”南北對峙時，勢大氣粗的張國燾，正同兵少力弱的



左博古、中王明、右周恩來1938年攝於武漢

毛澤東等人“對著幹”。

雖為中央“總負責”的洛甫和足智多謀的毛澤東，都一時治不了也整不住張國燾。就在此時，“天外來客”張浩到達，這真是“天”賜良機，毛澤東馬上借“天”之力，取得了制服張國燾的“尚方寶劍”。

毛澤東對於許多“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從來是敬而遠之甚至存有戒心的，連對他積極支持和密切合作的洛甫、王稼祥等，他都在重要問題上留了一手。

例如在遵義會議上只批軍事路線錯誤，不碰政治路線問題，更力求不觸犯似乎神聖的“國際指示”，做到表面“求同”實際“存異”。

從王明、博古到陳昌浩、凱豐等等“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因為背後有共產國際的信任支持，總是同他不一條心並使他吃過不少苦頭。但是他見到張浩以後，對於這位剛剛從莫斯科直接回來的人，卻一反常態地格外歡迎和特別尊重。



林育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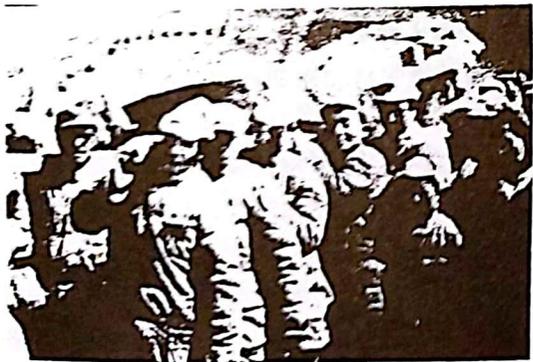
(1897-1942)

林育英

1897年 出生

于林家染铺塆，
1922年经林育南、
恽代英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改名林
仲丹，化名张浩，
他是中国工人阶级
杰出的领导之一，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

会上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曾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抗战初期，担任过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他从1936年1月起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1942年3月6日积劳成疾，在延安病逝。病逝后，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安葬仪式，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为执绋、抬棺、挥锹奠土，毛主席为林育英同志写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词，悼念和赞扬林育英同志的光辉一生。



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为林育英抬棺

毛澤東認真而謙恭地向張浩介紹了黨和紅軍尤其是長征以來的情況，聽取了張浩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

在向他請教下一步行動方針時，毛澤東委婉地提出，最好張浩能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致電張國燾，代表共產國際肯定和支持原中央決定和毛澤東等人的北上方針，讓張國燾自己取消“中央”稱號，並率四方面軍部隊根據中央原定方針重新北上，各項問題待張國燾等到達後，與中央各同志及共產國際代表，共同商討解決。

張浩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按要求給張國燾發去了電報。

張國燾氣再粗膽再大，也不敢反對“國際指示”，又不摸這位“國際代表”的底，加之當時各種內外壓力，只得聽從了張浩的電報指令，乖乖地和二方面軍一起北上，終於也到了毛澤東、洛甫和張浩等所在的陝北，實際上重新承認了名為洛甫、實為毛澤東的中央領導地位。

他的另立“中央”活動，至此宣告徹底破產，他的對手毛澤東卻獲得了完全勝利。

毛澤東借助張浩不僅制服了張國燾，由於他對“國際指示”和“國際代表”的尊重歡迎，也使洛甫、王稼祥和博古、凱豐等一批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對他更加信任支持，與他更加團結和諧了，連被他趕下臺的洋顧問李德也改變了對他的敵視態度。

更加重要的是，毛澤東通過張浩對共產國際請示報告的資訊回饋，使“國際大家庭”的“家長”即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也開始瞭解、重新認識以至賞識起那個出自山溝溝裏的毛澤東來。他的一系列主張方針和重大作用、重要地位，終於得到了全黨全軍以至共產國際的承認。

雖然當時的中央“一把手”名義上還是洛甫，毛澤東僅僅是中央常委之一，當初執掌兵權的“三人軍事小組”早就不復存在了。

但是他實際享有的威信、影響以至權力，卻已是無可爭議的“一把手”了。連毛澤東自己也開玩笑地說，那時的中央“總負責”洛甫，已經成了個“漢獻帝”，他自己則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丞相”曹孟德。

但是“曹丞相”總歸“名不正言不順”，長征結束，三軍會師，特別是張國燾的“歸順”以後不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旬，毛澤東通過又一次政治局會議，調整了中央軍委的領導成員，寬厚謙和的朱德決心讓賢，張國燾垂涎已久卻不可得的軍委主席寶座，終於落到了毛澤東的臀下。不過他得理得勢也讓人，還是給張國燾留了一個“軍委副主席”位置，使人們更感到他的寬宏大度和待人以德。

至此，毛澤東才由原來的“蘇維埃主席”，正式成為“中央軍委主席”，他已享有了整整十五年的“主席”頭銜，才真正有了實際內容。

哪知在他大局初定，開始“名正言順”之時，他的“寶座”又出現了不穩之狀，來“撬動”甚至企圖“佔座”的，恰恰又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

14、來者雖然不善 依然受到善待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共產國際曾對此發了專門指示），全國出現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新局面。中國工農紅軍於“七·七事變”後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共產國際肯定並稱讚了中國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加之斯諾等外國記者對陝北的訪問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特別是毛澤東的名聲威望與日俱增，中共中央機關也進駐古城延安，鬥爭形勢和生活環境相對地安定下來。這些新情況引起了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人的注意與思考。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以共產國際主席團執行委員兼東方部部長身份，帶著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康生等人，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團來到延安。

這真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王明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時，就在共產國際直接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權，接著又成了共產國際的領導成員和頭面人物，自以為當然握有領導監督中國黨的絕對權力。因此他一到延安就當仁不讓地對毛澤東等人訓導指示和發號施令起來，毛澤東在他眼裏，還是個沒出過山溝溝的“山大王”，

必須由他這位“正宗”的“馬列主義者”來管束和引導。

毛澤東在一年以前，曾借張浩的“共產國際代表”之力，最後制服了強大對手張國燾。如今又來了“代表共產國際”的王明等人，明擺著是衝著他尤其是其身下的“寶座”來的。他早已領教過王明的一套，卻從未與其直接打過交道，這次見到王明，發現其從年齡、個頭到氣量、能耐都比自己小得多，並不比張國燾難對付。只是對於此人背後倚托的共產國際，他卻不敢冒犯，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他就又採取了“退避三舍”、“避其鋒芒”的對策，像當初對張國燾那樣，時時處處對王明謙恭有禮，對“國際指示”更表示聽命服從。他的這種姿態有當時的照片為證，那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集體合影，常常是小個子的王明坐在前排正中的領袖位置上，高個子毛澤東反而站到後排甚至被擠到一邊。這種狀況持續了一年左右，毛澤東暫時隱忍埋頭實幹了一年多，從一九三八年八月起，情況又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領導人再一起照相時，毛澤東重新居中為首，王明卻開始“靠邊站”甚至漸漸不見影蹤了。

造成這一變化，幫了毛澤東大忙的，還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他就是在遵義會議前後一直積極支持毛澤東的王稼祥。長征以後，他因傷病未愈，在中央安排下去蘇聯治療。在他去的前後，一起長征並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陳雲、鄧發也去了蘇聯，他們都向共產國際彙報了中國黨和紅軍長征以來的情況，又都著重介紹了遵義會議和毛澤東的情況。這些情況是王明等人不瞭解、不承認、也從未向共產國際報告過的，當然也引起了共產國際領導人的重視。王稼祥經過一段治療後，應邀為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機關以及大批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國同志，作了關於中國紅軍長征和抗日形勢的專題報告，贏得了各方面的注意與歡迎。一九三七年秋，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作為國際共運領導人，召見了王稼祥和王明、康生等人，王稼祥又當面向斯大林等介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與作用，使斯大林等對毛澤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良好的印象。

這使王明等在莫斯科更坐不住了，他感到自己在中國黨內的影響及位置受到了極大威脅。他已瞭解到國內正在進行國共合作，中共中

央機關長住在延安城內外，黨的領導人和代表機構可以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大城市內公開活動，也可以在國共合作的軍政機關擔任要職並出頭露面，“紅區”延安和“白區”城市也有了不斷往返的汽車、飛機等交通運輸，從政治環境到生活條件都已大大改善。中國黨和紅軍經過十年內戰特別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艱苦奮鬥，終於開始轉機發展。王明認為時機已到，該他回國搶摘“桃子”，不然就什麼也撈不著，全被毛澤東等獨佔專享了。王明就約了老搭檔康生一同回國，強拉王稼祥接替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領導職務。王稼祥不想久居國外，請求中央另派人來，幾個月後，新任中共代表團長任弼時來到莫斯科，和王稼祥一起面見了季米特洛夫，向共產國際報告了情況並聽取了指示。

共產國際與中國黨恢復聯繫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國際共運領袖，已通過各種管道和情報資料特別是中國來人的報告，比較具體準確地瞭解了中國黨和毛澤東的情況，也發現了王明和毛澤東的矛盾以及王明回國後的表現。在王稼祥回國以前，季米特洛夫作為共產國際執行主席特地約見王稼祥，代表共產國際對中國黨作了重要的口頭指示，讓他帶回國去傳達並貫徹執行。

王稼祥受領了任務，身負重托並帶著一批蘇聯出版的中文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有延安急需的高射機槍等武器彈藥，乘著蘇聯提供的專機經由我國新疆，又改乘蘇聯提供的汽車，於一九三八年八月帶著浩浩蕩蕩一個車隊回到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就回國並到達延安的王明，住了一段時間還是不習慣這陝北山溝裏的生活環境，同時深切感到邊區軍民只認那個“山大王”式的“人民領袖毛主席”，根本不“尿”甚至不認得他這位“出口轉內銷”式的“大人物”，他還是留戀大城市裏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抽水馬桶嘩啦啦的洋派生活，更不願在此屈居於毛澤東之下，就提出去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在地武漢去，擔任設在那裏的統管中共南方各省黨組織的中央長江局書記要職，把原來主持長江局工作的周恩來降為他的副手。

王明到武漢以後，最熱衷的事是拜會結交國民黨的上層人物，接待會見大小報刊和廣播電臺（那時沒有電視）記者的採訪，最得意的

事是出去公開演說或發表文章，不僅硬把自己“炒”成一個熱點新聞人物，還時時擺出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以至世界革命領袖的派頭。他為了引起國民黨方面對他的重視，努力顯示自己高於更不同於正蹲在延安窯洞裏的毛澤東，常置中共中央的方針決定於不顧，自作多情地向國民黨高層獻媚討好，大肆鼓吹“一切經過”和“一切服從”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形成與延安完全不同的另一調子，不僅使人以為中共黨內又出現了一個以王明為首的“中央”，他還把自己打扮為“唯一”和“正宗”的黨的“領袖”，延安的中央機關和毛澤東等人，反而被他視為既非正統又不正規的“山大王”隊伍。

正在延安的毛澤東，一面努力在大面兒上維護著同王明的“團結”和對他的“尊重”，一面不得不思量盤算著怎麼對付以至制服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假洋鬼子”。

15、又一“尚方劍”“不善”也得來

就在王明的武漢“中央”同毛澤東的延安中央大唱對臺戲並一度難分高下時，毛澤東的“救兵”來也！手握共產國際“尚方寶劍”的王稼祥回到延安了。

毛澤東得知王稼祥帶回的共產國際“最新最高指示”後，心裏完全踏實有了底了。

那位個子小野心大的王明，多年來總是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來唬人和整人，如今卻“老天”開眼了，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將不再為王明所用，反而再次為毛澤東所用了。這回要挨“斬”的恰恰就是老拿這“尚方寶劍”亂“斬”別人的王明本人。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於當年即一九三八年九月亦即王稼祥回來的下一個月，在延安召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以及包括中央各部門、各解放區與各部隊的“各路諸侯”在內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傳達貫徹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專門指示，並討論決定今後的方針策略。王稼祥成為負責籌辦這次全會的秘書長，他按照和毛澤東、洛甫商定的內容，發出了會議的通知。

在武漢的王明收到這一通知後，馬上給延安回了一份電報，讓毛澤東和洛甫等立即收回剛發出的上述通知，取消延安中央已作出的決定，要王稼祥立即趕到他所在的武漢去，先向他這位共產國際領導成員報告新的“國際指示”，再由他決定何時傳達和怎樣貫徹。

如必須召開中央全會，就到武漢即他那裏以他為中心召開，這個會議也必須由他來主持。此前他與延安還只是分庭抗禮，現在則表明他要唯我獨尊，中共中央的大事，必須由他說了算。

天無二日，國無二君，黨內豈能出現第二個“中央”？

毛澤東拿著王明的回電，問王稼祥該怎麼辦？早對王明有看法的王稼祥，不假思索地說，他這簡直是異想天開，當然不能聽他的。毛澤東連說對，對！就是不能聽王明的，共產黨的中央全會，怎麼能到國民黨的地方去開呢？他王明不想來延安，我們也絕對不會去武漢，如果我們去參加由他主持的中央全會，等於承認他王明成了“中央”，我們這些人不是反而成他管轄的“各路諸侯”了嗎？毛澤東對王稼祥說，我們誰都不要去武漢，堅持中央已經作出的決定。

心裏有底的王稼祥，又給王明發了一份電報。明確指出，王明必須服從中央決定，按時來延安報到開會，否則由他自己承擔“一切後果”。

這後一句引號內的話，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幾十年以後說是電報原文。

此說值得懷疑。因為當時朱氏並不在場，也未看到電報稿，引號內的話顯然是當代外交語言，而不是當年的電文用詞。

儘管如此，王稼祥的回電還是夠立場堅定和態度強硬的，使他那位企圖霸守江天自稱王的老同學王明，不得不考慮可能有的各種“後果”，加上同在長江局的周恩來等人的勸慰，後來還是捏著鼻子忍氣吞聲地來到陝北的窮山溝裏，惴惴不安地參加了由別人唱主角的中央政治局和擴大的中央全會。

正式參加這次會議的近八十人，從九月二十四日一直開到十一月六日，歷時四十多天，是十年內戰以來中共黨內人數最多、代表面最廣、時間最長、規模也最大的一次盛會。中央“總負責”的洛甫致開

幕詞後，首先由王稼祥向全會正式傳達季米特洛夫向他面授的共產國際指示。

已在政治局會議上聽過王稼祥傳達的王明，早已被這一新的“國際指示”一桶涼水澆到底，徹頭徹尾地寒了心，這時雖然還被“供”在主席臺上，明白自己已成了個空“牌位”，正面臨了被扔掉踢開的命運。一些不知道傳達內容的中央委員及“各路諸侯”，都全神貫注地認真聆聽著、匆忙記錄著王稼祥的傳達。

只有這次會議真正的主角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顯得悠然自得，對木然呆坐在他近旁的王明，還是那麼客氣和謙恭，只是其中似乎多了點嘲弄加憐憫的特別意味。

王稼祥開始傳達了。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煙，然後慢慢地嘔吐出來，恰在他的面前散開了一層輕煙淡霧，使台下的人一時更難看清他的“廬山真面目”，他自己卻透過霧簾悄悄觀察著會場中人們的各種反應。

他發現絕大多數人是由衷興奮的，也有個別人似乎呆了眼，還有人陷入了沉思之中……

只聽王稼祥用他那帶安徽鄉音的普通話。一字一句地說：

“……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共產黨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德、毛澤東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季米特洛夫同志明確地指示我們說：在當前，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中央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季米特洛夫同志還特別指示：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的關鍵，而中國共產黨的團結又是統一戰線的關鍵。只有黨的團結，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

王稼祥最後又特地重複了季米特洛夫的一段原話：

“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讓王明等人，不要

再和他爭吵了！”

王稼祥講了最後一句話時，全場掌聲雷動，一片興高采烈。只有兩個人似乎無動於衷，一個是王明，一個就是毛澤東本人。他們倆都沒有注意到，在他們兩“極”之間另有一人，此時此地迅速調整改變了自己的立場態度，帶著“好馬快刀”要改換門庭投向新主了。此人就是多年追隨王明的康生。不過此人之事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且將其掛到一邊。

卻說正在接著進行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此次會議主題性的重要報告：《論新階段》，其中不指名地批判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與國民黨只講聯合不講鬥爭的錯誤，使王明從原先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代表，又成了現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代表，是個集“左”右於一身的“雙料”機會主義者。

會上又通過了加強黨的組織紀律和鞏固黨的團結統一等一系列文件決定，使王明越發感到這都是衝著他來的。

最使王明惱火的是，會議決定撤銷了設在武漢的中央長江局，把他藉以同毛澤東等人分庭抗禮至少保持一點舒服生活的“窩”也給端掉了。

也許是為了表示對王明的關懷，也給他重新分配了工作，任命他為一個什麼“戰”也“統”不了的中央統戰部部長，加上以後又給他的“延安女子大學校長”頭銜，使人感到簡直是在嘲弄和“埋汰”他。

六中全會以後，王明就因為“心臟”不好一下“病”倒並且日益加重了，中國的政治舞臺上，也從此消失了他那個頭不大的身影和嗓門不小的聲音，他成了我國革命星空中一顆偶然閃亮卻迅速墜落的政治流星。

與此同時，毛澤東卻正式從中共中央的幕後走向了前臺，他成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書記之一，原來“總負責”的洛甫，實際上成了他的助手。

他的一系列思想主張和方針策略，開始一一成為全黨全軍和全國各地區黨的工作的唯一指針和最高準則，他本人也從此邁上了新的更

高的臺階。

四十年代初，毛澤東先在延安繼而在全黨發動了從上到下、普遍深入的整風運動，在全黨特別是中央機關的全體幹部中，對黨內歷史上的若干問題，主要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從“左”傾教條主義到右傾投降主義的兩次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全面、系統和深刻的批判，並且是從軍事路線、政治路線直至思想路線，聯繫起來徹底批判，從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完全剷除肅清了王明的影響。

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宣告解散，至此，一直排斥、壓制和打擊毛澤東的“從莫斯科回來的人”的總代表王明，不得不承認在他同毛澤東的較量和角逐中，自己徹底失勢以至慘敗了。不過寬宏大量的毛澤東，仍然把王明、博古這兩位當年的中央“一把手”，都安排進了後來的七屆中央委員中，只是其名字都在末位，並未“以姓氏筆劃為序”。

16、“一把手”正式登位 《東方紅》響徹紅區

整風運動開始以後不久，洛甫就離開中央領導崗位，長期下鄉“蹲點”，仿效毛澤東早年在蘇區所做的，埋頭去搞農村調查了。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都出過大力、立了大功的王稼祥，因為一直身體不好，加上歷來不愛出頭露面和攬事爭權，也逐漸退出了高層政治中心，邊養病邊進行理論研究去了。早就下臺的博古也逐漸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一次再次地作出檢查和自我批評，後來到周恩來領導的黨的南方局，當了一名組織部長。朱德等軍事將領，也分別離開延安到各地領兵抗日去了。坐鎮延安的毛澤東，就成了真正由他一人說了算的中共中央兼中央軍委的“第一把手”，從而完完全全、有名有實地取得了全黨全軍以及全國的領袖地位。

體弱多病卻深沉多思的王稼祥，這時又默默地做了件大好事。隨著毛澤東地位和威望的提高，黨內一些領導人特別是宣傳理論工作者，開始注意研究總結和宣傳毛澤東的一貫主張及其思想觀點，只是一直沒有一個確切提法和界定名稱，有人寫為“毛澤東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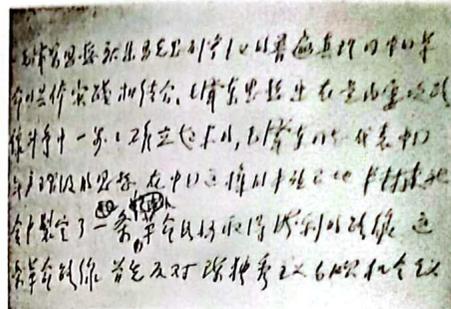
還有人索性稱之為“毛澤東主義”。而毛澤東本人不同意後而這一提法，他不承認自己在全球共產黨都遵行的“馬列”之外另有“主義”。王稼祥也注意並思考了這一問題。他於中共建黨二十二周年即一九四三年“七、一”紀念期間，在與毛澤東認真商討並取得他的同意支持後，發表了一篇重要理論文章，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王稼祥在文章中寫道：

“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布爾什維克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相結合的結果”，“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共產主義勝利前進的保證……”。

從此開始，從黨內到黨外，從中國到外國，正式提出並普遍使用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和政治名詞。王稼祥發表上述文章後不到兩年，在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上，正式寫進了“毛澤東思想是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此後，又將“毛澤東思想”歸結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至此，在毛澤東以前的黨的領導人，從陳獨秀到王明，更不要說博古和張國燾等他們的言論、著作及其“指示”、“路線”和“主義”等等，不是成了“反面教材”，就是從此消聲匿跡了。

毛澤東首先在軍事上，繼而在政治上、組織上，最後又在思想上、理論上，成了無可爭辯的“一把手”，從而確立和鞏固了他在全黨全軍直至全國的領袖地位。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堂堂正正地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並且從此直至終生未變。一九四九年十月起，他又成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首屆全國政協主席，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再榮任共和國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等職……

當毛澤東開始成為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和將來的共和國頭號領導



147 王稼祥起草的毛澤東思想的部分手稿。

148 1943年夏天，王稼祥在延安會議。



延安時期的王稼祥及其手書

人時，從他所在的延安就開始唱出並傳開了一支“陝北民歌”，這支很快成為唱遍各解放區、傳遍全中國進而傳向全世界的“革命民歌”這樣唱道：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毛主席，像太陽，照到哪裡哪兒亮……”

於是，毛澤東就成了萬眾齊呼、光照大地的“紅太陽”。開始還是“我們的”或“中國的”，後來又成了“全世界勞動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紅太陽”毛澤東從“中華蘇維埃”主席到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共和國主席等等，一當就當了四十五年，以致後來有一個時期，我國將“工會主席”、“婦聯主席”和“革委會主席”等等，一律改稱為“主任”，做到全國只有他一個主席，使“主席”二字成了毛澤東一人獨享的專用稱謂。

從他在一九三一年成為“中華蘇維埃”主席（雖然是個蹲“冷宮”的“主席”），直到他老人家辭別人間，被人們叫了近半個世紀“主席”。老人家在世共八十四年，恰恰在他生命歷程一半對一半的時期，他參加並領導了舉世無雙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正是在無比艱險曲折的長征過程中，他也進行了自己從邊緣走向前導、從權力週邊走向權力中心這樣一個同樣艱險曲折的“長征”，在戰勝外部敵人圍追堵截和自然環境險阻艱難的同時，又戰勝了一個又一個“黨內同志”和一次又一次的明爭暗鬥。長征終於勝利了，他在全黨全軍以至全國的領袖地位及其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也由此開始奠定。毛澤東在長征中的“長征”，同樣令人驚歎不已。



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以夷制夷 為我所用

——話說毛澤東的一項成功策略及其方法

標題中的“夷”字，應加引號。因為我國古代，常將外國視為“夷蠻之地”，本文所指的“夷”，只是被利用和借重來自外國的力量，以求達到自己的目的，即以外力來制服內部的反對者。而這正是毛澤東的一項精明高明的策略及其方法。

誰都知道，毛澤東一生中，對於外國侵略和外來干涉，從來是非常敏感，並且總是採取抵抗和抵制態度。然而卻有多次，反而巧妙地借用利用甚至重用外國和外來力量，解決了國內與黨內的重大難題。這表現出了他機敏的策略思想和靈活的方法手段。且看幾例：

團結“國際派”，分裂又收服了“國際派”

從中共建黨開始，她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的方針決策以至黨內重大人事安排等等，無不都得聽命於國際總部。但是那裏的指示，由於對各國國情特別是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缺少深入的瞭解，不少都是脫離實際甚至根本錯誤的。中國共產黨人中，凡植根於中華大地又由中國文化哺育成長者，都會懷疑以致反對這種瞎指揮，毛澤東是最早也最堅決的一個。同樣，共產國際方面對他也由於很不瞭解以致極不信任，長期將他視為革命運動中的“異己分子”和“旁

門左道”，支持一批“從莫斯科回來的人”，這些人通常被稱為“國際派”，如王明、博古等原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他們在共產國際來人的操縱幹與下，獲得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權，對毛澤東等不斷排斥、壓制和打擊，由於他曾發展了黨和軍隊，在根據地軍民中享有威望，就給了他個中華蘇維埃主席的空頭銜，卻撤銷了他在軍隊的各項職務，剝奪了他的軍事指揮權，並不斷受到批判。這成為他鬥爭歷程中一次重大挫折。然而正是在他的這一“生命低谷”時，不失時機地借用和利用了黨內“國際派”的力量，從由共產國際支持的中共領導人手中，奪得了黨和軍隊的領導權指揮權。其標誌是成功地舉行了遵義會議，通過這次會議，達到了他的目的。

遵義會議的重要內容，是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作出總結。反“圍剿”戰爭徹底失敗，丟掉了蘇區，開始了長征。毛澤東利用自己正“賦閑”的機會，分別爭取到了也是“從莫斯科回來”的“國際派”成員的同情、理解和支持，首先是王明、博古的中大老同學，書生氣很足的王稼祥。在長征初期，王稼祥因為負過重傷，躺在擔架上隨軍行動，毛澤東在“打擺子”也坐擔架，並且和王稼祥編在一個隊，他們就在行軍中走在一起，宿營時住在一起，日夜交談和互相討論，一點點使王稼祥瞭解並接受了他的思想主張，接著又爭取到了張聞天。張不僅也是王明、博古的老同學，還和王稼祥一起曾是蘇聯“紅色教授學院”的高材生，是黨內公認的馬列主義理論家，當時的地位僅次於“總負責”的博古，毛澤東這時和王稼祥一起，長時間與他單獨交談，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取得了共識。當時中央的領導核心，是博古、周恩來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組成的“三人團”。由於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三人，在黨和紅軍命運特別是對當前軍事問題上的一致認識，逐步形成了與博古等對立的新“三人團”。正是由這個新“三人團”，在遵義會議上得到了多數的支持，使黨的領導核心，實際上由他們取代了原“三人團”。

這一結果不是自然取得的，而是毛澤東精心策劃而成。在會前和會中，不少同志鑒於蘇區反“圍剿”的失敗，認為不僅要否定和批判原“三人團”的軍事指揮，也要檢查和討論中央在政治路線上的錯

誤。而當時中央的錯誤方針，都是按共產國際指示制定的，批判它勢必要觸及到國際總部的問題，而這不僅是個禁區，也將涉及同是“國際派”的王稼祥、張聞天等人，他們很可能會和博古等一起來維護共產國際的指示，而這對毛澤東將極為不利。他就一一說服了要批判政治路線錯誤的同志，讓大家集中精力專批軍事路線的明顯問題。這樣做仍然有著王稼祥、張聞天等“國際派”的支持，更得到了黨和紅軍中多數人的擁護。直到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中，仍然肯定了當時的“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以此團結了大多數特別是原“國際派”的同志。即使在會上批判軍事路線錯誤時，毛澤東也讓人將博古和李德區別對待，只狠批李德這個“洋人”，對博古卻留有餘地，周恩來又及時作了自我批評，取得了大家的原諒和讚賞，這才使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將“國際派”推上前臺，自己仍然隱在幕後

遵義會議批判了博古等的軍事路線錯誤，剝奪了原“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後，將由誰來取代他們呢？鑒於會議上肯定和支持的主要是毛澤東的主張，黨和軍隊內的不少同志，認為應由他出來取而代之。毛澤東考慮到自己長期受到“國際派”的排斥打擊，由自己來取代他們的領導，很可能被認為他是在伺機報復，甚至有“篡黨奪權”之嫌。他又說服了這些同志，在會議的組織決定中，只將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交還給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一直是黨內軍事負責人的周恩來，仍然由他在軍事問題上作最後“拍板”的“負責者”，毛澤東本人只是周“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不過他又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不顯山不露水地參與了最高軍事決策，看來並沒有馬上取得什麼顯赫地位，卻為自己蒙上了一層保護色。

博古受到批判後，一度情緒不高，在許多問題上感到不知所措，出現了“撻挑子”現象。有人主張索性將他撤換掉，並且當仁不讓地由毛澤東上臺。精明的他對此不是沒有考慮，但他卻按下了這種想法

和說法。因為中共領導人向來是由共產國際指定和任命的，也只能是國際總部所瞭解和信任的人。而他不僅不是“國際派”，反而是他們一貫反對的，由他來擔任黨的“一把手”，不可能得到共產國際的承認，還會被視為他乘機奪了“國際派”的權。這時他已看到比博古年長也更沉穩的張聞天，早就對博古表示不滿，頗有躍躍欲試之心，而他既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更是受信任的“國際派”重要成員，在黨內的地位又僅次於博古，由他來取代博古，是順理成章的事，更不會如毛澤東似的，會受到懷疑與反對，就說服了對他“勸進”的同志，支持張聞天取代了博古的“一把手”位置。

遵義會後的長征紅軍，在與敵軍的戰鬥周旋中，毛澤東又逐步取得了軍事指揮權，由於周恩來、朱德的謙讓支持，組成了由他主持，以周恩來、王稼祥為成員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這雖然是個不列編的臨時性組織，但當時黨和紅軍的首要任務，就是順利長征安全轉移，全力保護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毛澤東在這方面就取得了最重要的決策地位。而已成為中央“一把手”的張聞天，只是個學者型的理論家，在軍事上總是聽毛澤東的，這使毛在組織上雖然沒有正式任職，卻在事實上成了中央的最高決策者。所以在後來有關遵義會議的論述與文章中，都說當時的毛澤東，“實際上取得了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在此以前，毛澤東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卻只是黨在一個地區（中央蘇區）和紅軍一支部隊（中央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從遵義會議開始，他才成為黨和軍隊的最高領袖。他所以取得如此成果，主要是他團結了張聞天、王稼祥等“國際派”，使他們從“國際派”中分裂出來，又從“國際派”手中奪取了權力。

依靠“國際派”，化解分裂危險

毛澤東通過遵義會議，雖然“實際上”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在組織上卻仍是“名不正言不順”。他的地位很快就受到了挑戰而動搖。那是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率領四方面軍的張國燾，自持他們

人多勢壯，實力超過一方面軍幾倍，並不承認那個臨時性的“三人軍事小組”，不僅要求改組和充實原由一方面軍為主的中央領導機構，更要自任軍委主席。毛澤東再次依靠張聞天、王稼祥和博古等“國際派”，甚至拉上在遵義會議上反對過自己，也是“國際派”的凱豐，一起支持他說服張國燾，讓他服從中央決定，並將一、四方面軍合編為左、右兩路共同北上。為了滿足張國燾的要求，讓周恩來將紅軍總政委的職務給了他，又讓軍委主席和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及其總司令部，都隨張國燾行動，形成以他為主的態勢，後來使張國燾錯以為自己真成了“核心”，竟自立中央，居然要“通緝”不聽調遣的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使黨和紅軍出現了分裂危機，甚至要發生內部“火併”的嚴重險情！

毛澤東這時雖然處於危險境地，但是他將張聞天、王稼祥和博古等中央領導人團結在自己周圍，也就是仍然與“國際派”主要成員“戰鬥在一起”，他們一面通過決議，批評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又為不刺激對方，只在小範圍內傳達這一決議，同時甘拜下風地自動取消了“中央紅軍”番號，只自稱為紅軍“陝甘支隊”和中華蘇維埃的“西北辦事處”，實際上在有強大兵力的張國燾面前表示“臣服”。這確是毛澤東“軟”的一手，早在與四方面軍會師前，他已不再自稱為“中央紅軍”，只是與四方面軍平起平坐的一方面軍，都是為了不觸犯雖狂妄卻少心計的張國燾。毛澤東這樣是很必要的，因為在中共中央高層，張國燾無論在資歷、影響和地位上，都不低於毛澤東，完全可以與他一決雌雄。已經“實際上取得了全黨全軍領袖地位”的毛澤東，當然沒有也不能就此認輸，正在他為此焦慮又一時無計可施時，他這個從不被共產國際所信任和重用的人物，卻又借重了共產國際的威名，及時地收服了與他同樣野心勃勃，又正與他分庭抗禮，並已佔了上風的張國燾，使他又安度了一次嚴重危機。

借力“國際特使”，收服爭權對手

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毛澤東的成功，其先決條件是當時與共產國

際中斷了聯繫，國際總部已管不了中國黨，影響不了中共的決策，正是在擺脫了共產國際外來干涉的情況下，才能撤換了博古的領導，並剝奪了他的軍事指揮權，從而在實際上由毛澤東執掌了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在長征即將到達西北取得勝利前夕，又遇到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危機。就在這時，當毛澤東、張聞天等所在的中央紅軍，已改稱為“陝甘支隊”，並到達陝北地區時，由共產國際派出的張浩（即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從莫斯科經過蒙古越境回國，找到了正精疲力盡甚至焦頭爛額的毛澤東等人。張浩原是中共的重要活動家，後來在共產國際工作，當國際總部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後，他奉命帶著國際指示和電臺、密碼等等，來重建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聯繫。張浩的忽然出現，竟使困境中的毛澤東一下看到了絕處逢生的轉機，又得到了一位“救星”。共產國際的威名，終於為毛澤東所用，實際是被利用了。

由於張國燾已另立中央，毛澤東、張聞天等再用中央名義對他下令，已經不起任何作用了，陝北的中央和張國燾的“偽中央”，誰也不服誰。但是按照組織原則，中國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中共中央到任何組織與個人，都得聽從國際總部的領導。張浩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毛澤東自己制服不了張國燾，他就請張浩用共產國際的名義，出面處理他們間的爭端。張浩與張國燾早就相識，張國燾接到這位“國際特使”的電報，當然不能也不敢抗命，按張浩要求收起“中央”的旗號，帶著四方面軍重新北上。部隊來到西北後，他本人赴延安面見張浩並聽取指示，當然也會見了毛澤東、張聞天等人，他們在張浩的主持下，開始了對張國燾分裂和另立中央錯誤的揭露批判，平息了他與毛澤東間的嚴重衝突，也使毛澤東不只又安全度過了一次黨內危機，更由此重佔了上風。

正是在毛澤東徹底收服了張國燾以後，他才正式取代朱德、周恩來等，成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又通過“開明君主”張聞天（毛澤東對他的評語），實際上取得中央的最高領導權。而他這次的成功，恰恰是借重和利用了共產國際的力量和影響，雖然國際總部對毛澤東其人，一直不瞭解也不信任，他卻不計前嫌，並將其為我所用了。

用“國際指示”徹底打下與其爭權的“國際大員”

就在毛澤東通過張浩，以共產國際名義，制服了張國燾後的當年，他的最高領袖地位，又受到了嚴重威脅，並且直接來自共產國際。一九三一年就去了莫斯科的王明，一直在共產國際工作，已是國際執委會成員和東方部長，於一九三七年底回國到達延安。他在出國前就已佔據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崗位，這次更有了“國際大員”的顯赫身分，不由趾高氣昂，根本不把“土老冒”毛澤東放在眼裏。毛澤東在他面前，不得不處處裝“孫子”，竭力捧著他順著他和讓著他，一點不敢得罪這位“出口轉內銷”的“假洋鬼子”，實際使王明中了他的“韜晦之計”。在此以前，還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就先派陳雲，一到陝北又加派了王稼祥，分別趕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的情況，特別是介紹毛澤東的主張與功勞，正是他們的“公關活動”與遊說，使國際領導人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等，終於對毛澤東有了瞭解並取得信任，當時中共中央正與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共同進行抗日戰爭，共產國際完全支持這一正確方針，也贊成中國黨由毛澤東來領導，又讓王明不要和他爭奪領袖地位，並責成王稼祥回國向中國黨傳達這一“國際指示”。一九三八年八月王稼祥奉命回到延安，已經得訊的毛澤東，連忙藉此大作了文章。

毛澤東對於他有利的國際指示，讓王稼祥在政治局傳達後，又決定召開中央全會進一步傳達，將其指示精神貫徹到全黨全軍。這時的王明作為中共代表團長，長住在國民黨中央所在的武漢，代表中央與國民黨打交道，又以中共名義對外發表談話。中共代表團在黨內稱為“長江局”，周恩來、博古等都是王明的助手，此人就以中共中央領導人自居，與毛澤東在延安的中央，大有分庭抗禮之勢。當王明接到召開中央全會，傳達貫徹國際指示的通知時，認為自己正是國際總部的領導成員，讓王稼祥先到武漢來向他彙報，並將中央全會挪到武漢來開。毛澤東和王稼祥當然不聽他的，以王稼祥名義電令王明，服從中央決定，不然“一切後果自負”。加之這時的周恩來、博古等，早

已“歸順”了毛澤東，迫使王明只得乖乖地回到延安，在中央全會上聽取了王稼祥又一次傳達的國際指示，其核心內容就是：王明不能與毛澤東爭奪領導權了。

在此以前毛澤東已將全黨全軍，包括反對過他的人，都收服到自己麾下，連一直追隨王明的康生，也反戈一擊地臣服予毛澤東，又促成了毛與其同鄉江青的結合，由此更討好了毛。這都使王明一下成了孤家寡人，除了自己老婆誰都不聽他的了。他這個“國際大員”和中共“國際派”領袖，就這樣被徹底推倒了！毛澤東這次大獲成功的法寶，恰恰就是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他又一次借重和利用了至高無上的共產國際，使自己從此成為無可爭議的中共全黨全軍唯一的“第一把手”。

接著他又和王稼祥、康生等原“國際派”的人，發動並組織了全黨的整風運動，藉以批判和肅清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又捎帶批判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從思想上消除了王明等“國際派”的影響，也收拾了一度追隨“國際派”的周恩來等人。把全黨的思想都统一到毛澤東的軌道上來。後來又由王稼祥最早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從而使“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黨的指導方針和理論基礎。毛澤東正是這樣，從遵義會議開始，一步一步，一天又一天，先從軍事上，再從政治上，又到組織上，直至思想上、理論上，都確立了他的唯一最高領袖地位。

毛將“以夷制夷”策略發揮到了極致

毛澤東所以一再取得成功，都是在“國際派”的支持下，又以“國際指示”為“尚方寶劍”，才一一制服了自己的對手，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正是共產國際及其“國際派”，過去對毛澤東是不瞭解、不信任、不重用的，長期對他採取排斥、壓制和打擊態度，但是他卻反而多次依靠了“國際派”，借重了共產國際的威力影響，更直接利用了“國際指示”，逐步實現了自己的意圖，他將所有原本是

自己的“對立面”，陸續拉過來為其所用，正如我國一句老話，叫做“以夷制夷”，他將屬於“夷”的外來和外國的東西，轉化為支持自己的力量。正如他總結出的一條“經驗”所說，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反對過自己的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才能使他成其大業。他的過人之處也正在此。

“以夷制夷”這一“國粹”，經過毛澤東的發揮創造，以此成為他取得成功的“法寶”之一。在他以前的中共歷屆領導人，幾乎都因執行了共產國際的錯誤方針，而被迫下臺的，只有他反而借重了“國際派”和“國際指示”等等，使自己取得了領導權並鞏固了地位。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宣告解散後，他更放開了手腳，沒有任何外力能再影響和束縛他了，但他卻仍然不斷利用原是“國際”的蘇聯、蘇共等，原是“國際派”的張聞天、王稼祥和博古等，使他們繼續都為其所用。他的這一重要戰略戰術，在後來的中國對外政策上，更得到了新的發揮，例如抗日戰爭後期，他一面按照傳統做法依靠著蘇聯，卻又在延安“引進”了美軍觀察組，甚至要求美國政府在延安設立領事館，他要使蘇美兩國分別成為自己的合作夥伴，曾引起美國軍政界很大的興趣。

新中國成立前後，斯大林意識到毛澤東的這一戰略意圖，認為他很可能成為“東方的鐵托”，就蓄意挑起了朝鮮戰爭，把美國和中國都拖下水，使兩國為敵幾十年，藉此鞏固了中蘇同盟的“一邊倒”。但是後來還是發生了中蘇分歧，鑒於“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他又成功地與美國聯手，借重了一個“超級大國”，來抵銷另一“超級大國”蘇聯的威脅，這使“以夷制夷”的策略，得到了更大的發揮並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上述一系列事例，不只表現出毛澤東的機敏與智慧，更表明了他對“以夷制夷”等“國粹”，怎樣“活學活用”，融會貫通並發揮到了極致。



1943年冬，毛澤東同李納在延安棗園



1946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教李納識字

軍報動亂“震源”肖力

——“紅色公主”李訥造反奪權紀實

“文革”中的《解放軍報》社，連續發生巨大“地震”，在很短時間內，幾屆領導班子被摧垮，領導人都被打倒，使軍報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動亂之源出自一人，即毛澤東、江青的女兒李訥，她以“肖力”為名在軍報不斷造反，最後由她奪權上了台，建立了名噪一時的“以肖力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只是其“紅色”是由多少人的血和淚染成的！

以下是我作為親歷者和受害者之一，對這段史實的回顧。

“紅色公主”來到軍隊和軍報，這就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已經內部不穩的軍報，“一月風暴”又引發了奪權危機

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後，正走紅的軍報“胡代總”，眼看著上升到他此生的權力高峰，只是“爬得高，跌得重”，就在那時他又突然摔了下來，並且從此被打下了政治舞臺。造成他如此人起人落的原因，主要出自軍報這個“後院”式的起家之地，在當年一月中旬“火山爆發”了。不過這不是偶然發生和突然起火的，使他遭難的“火種”或“地雷”，其實是他自己親手引進和埋下的，此事需從一九六六年



周恩來、李訥1966年攝於天安門城樓



李訥1990年攝

九、十月間說起。

當年國慶節前後，我發現軍報記者處來了一個年輕的女記者，雖然是個新同志，卻顯得十分自信自尊，並且一來就在極其機密的“快報組”裏，主要與原記者處的和、宋二位副處長和負責“快報組”的人交往，當時她管他們部都叫“叔叔”，只是行動似很神秘，但和、宋二位副處長等對她卻很客氣甚至敬重，使人感到她似有點來頭。她形象難說是美麗，但還算是清俊，架著一副眼鏡，很有點知識份子和大家風度，每天都是一身軍裝，腳蹬部隊發的解放鞋，肩上斜挎著一個軍用挎包，有時腰間還繫一根皮帶，常和“快報組”的人一起到軍報食堂吃飯。當時軍報記者處只有兩個管內勤的中年女同志，所以這個年輕女記者的出現，十分受人注意。我一看到她就覺得在哪兒見到過，並且其眉眼很像某個人物，多次觀察之後，我忽然發現她就是曾在天安門上與毛主席、周總理等一起合過影的，江青為毛主席所生的獨養女兒李訥。我在攝影組的照片上早已認識了她，有一張毛主席與她的合影，攝影組曾將另一張照片上的林彪剪下來，貼在她站的位置上，並且抹去了她的痕跡，拼造成了一張“毛林並肩”的照



毛澤東和三個小朋友
後排李訥、毛澤東、葉利姪（葉子龍女兒）

片。也就因為這事，我對她的形象印象很深，所以很快就認出了她。我又從傳抄的毛主席談話中，知道她曾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還瞭解到其偉人父親毛主席對她十分喜愛，因此她來報社後我總是以幾乎是敬畏的眼光，遠遠地注視著她。我聽到“快報組”的人都叫她為“小李”，又聽說她到軍報工作是保密的，也就遵守紀律儘量不對外人說，只是回家悄悄告訴了妻子，說是毛主席的女兒來我們這裏工作了，似乎自己也因此分沾了光榮。又一次好友華克雄來軍報，我帶他到食堂吃飯時，見李訥正在另一桌就餐，就示意老華說那是誰，我們見她吃的只是比較便宜的“乙號菜”，邊吃還邊同鄰座的人說說笑笑，不由因她的艱苦樸素和平易近人而十分感動，心想這真是偉大領袖親自教育出來的“無產階級接班人”。卻沒想到正是這位年輕清俊的女新兵，不久就把偌大的軍報搞得地覆天翻，連著幾任軍報領導人和幾屆領導班子，都被她一一推翻搞垮了，並且由她一度擔任了握有各項人權的軍報最高領導，我後來的成為“現行反革命”，其主要“滔天罪行”就是“瘋狂反對”過她，甚至“陰謀顛覆”由她“親自



“文革”時的江青

創建、親自領導的軍報紅色政權”。此事說來話長，還是從頭說起。

這位原名李訥的“小李”就是由“胡代總”親自領進軍報來的。據包括“胡代總”本人在內的有關人士回憶，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某日，當時的代總長楊成武和軍報的“胡代總”，被通知趕到釣魚臺的陳伯達處有事，他們按時到達時見江青也在，江青見到他們就說是自己找他們來的，並且馬上切入主題地說，她想把自己的女兒李訥送到軍隊去工作，免得她自己到處跑，由軍隊把她管起來，也可以使她獲

得鍛煉，江青說毛主席也同意這樣做。她又說李訥是學歷史的，剛從北大畢業不久，但是肯動腦子，能寫點東西，所以可以到《解放軍報》社去工作。當時林彪的女兒豆豆（即林立衡）已在《空軍報》社工作，江青也許是受此啟發才這麼安排的，她說看來李訥比林豆豆要強些，只是她看問題有些片面，還有點固執，要軍報的“胡代總”等多多幫助她，不過她又特別交代，對李訥不要抓得太緊，要發揮她的主動性，還特意關照道，自己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又讓“胡代總”等放心，說李訥“在政治上是跟我們走的”。因為“胡代總”等已經見過李訥，並且叫她“小李”，江青就讓按此諧音將她改名為“肖力”，使她在活動中更方便和安全些，並說這事只能讓極少數人知道，對其他人和外界一律保密。陳伯達也對應召而來的軍隊楊代總長和軍報胡代總編說，要他們一定要照顧好“肖力”，又說這表明了毛主席和江青對軍隊和軍報的信任，才作出了這樣的安排。楊成武和“胡代總”馬上表示，感謝毛主席和江青的信任，軍隊和軍報都歡迎“肖力”來工作，請毛主席和江青放心。“胡代總”又說這事他將通知總政蕭主任和主管軍報的劉副主任，江青卻說不必了，可以由楊代總長轉告他們一下。

江青、陳伯達對軍隊楊代總長和軍報胡代總編的接見與密談結束後，受領了這一光榮任務的楊成武和“胡代總”，心裏總是有點不踏實，他們在離開釣魚臺以前，楊成武又對“胡代總”鄭重地說：“肖力”是毛主席的女兒，軍報一定要幫助並照顧好她，決不能出什麼問題。“胡代總”說自己也正是這麼想的，他會努力安排好此事。在這以後不久，肖力就在外人不知的情況下來到軍報，成為一名剛剛入伍的並且是軍報唯一的一位女記者，她雖然是悄悄而來，軍報和它的上級機關總政治部，卻為她作了重要而周密的安排佈置，總政蕭主任、劉副主任與軍報“胡代總”密商後從軍事博物館調來一位政治可靠、歷史清白又有些文化的年輕女同志，也以記者身分陪伴著肖力，作為專職保鏢兼隨從，專門負責在生活上和安全上照顧她。只是那位女同志來後，“胡代總”遵江青所囑對她還保著密，沒有將肖力的真實身分告訴她，她和肖力一起活動了幾天後，看出這位比她更新的“新同

志”不似“凡人”，至少是個高幹子女，便悄悄問她父親是誰，肖力讓那女同志猜，她連猜了幾個大幹部，肖力都說不是，比這幾個“官”還要大，使那女同志就不敢再往上猜了，直到一、二個月以後才發現了肖力的秘密，這不由使她大吃一驚，心中既覺十分榮幸又感到格外耽心，她將如何完成這一神秘而又神聖的任務呢？她當時沒有想到自己所執行的這一光榮任務，不僅沒有為自己忽然成為與“紅色公主”朝夕相處、形影不離的“同事”甚至“戰友”，而沾上肖力什麼光，後來反而為此蒙受了許多冤枉又擔當了可怕的惡名。此事下面將會寫到。

對於肖力的來軍報工作，江青說是毛主席也同意的，但當時已在“中央文革”的宋副處長後來卻說“並非如此”，他在“四人幫”垮臺後揭發江青道：“當時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展開，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了更多地瞭解各地的實際情況，經常派肖力戴上紅衛兵袖章外出串連，把所見所聞向他老人家直接報告。江青呢？她三番五次地下令要我們派人去把正在執行串連任務的肖力找回來，要軍報對肖力‘管嚴’些，‘不要讓她到外地串連’。原來江青是要和毛主席唱對臺戲，阻擋肖力去執行主席交待的任務。江青在一次談話中曾經說過，為這件事，她和主席大吵了一架，充分暴露了她頑固對抗主席指示的反動面目。”軍報別的老同志也回憶出，早在肖力來到軍報以前，報社記者處就已同她間接打過交道，只是他們當時並未謀面，這與宋副處長所說的基本一致。“文革”開始後，李訥對江青“不辭而別”地外出串連，到天津後曾寫信回家來過，這使江青很不放心，就讓“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設法把她找回來，說她是毛主席最喜歡最疼愛的小女兒，不能使老人家為此著急。戚本禹要已是“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的宋副處長，從軍報記者處找兩個人，以北京大學的學生身分隨他去找李訥。宋副處長指派一位男記者和記者處一位搞內勤的女同志，隨戚本禹去了天津，他們還得知，李訥出來用的名字是“李小江”，就到“李小江”可能去串連的南開大學等幾座高等院校，認真尋查了一陣，結果都是毫無蹤影。他們無所獲地回京後，宋副處長又派那女同志和另二位年輕記者，一起再去了上海、杭州等地，但是

仍然沒有找到“李小江”。後來還是李訥自己逛夠了回到北京，這以後她才被按進軍報。她來到後，曾去找過她的同志問這位已叫“肖力”，曾叫“李小江”的李訥，當時到底跑到哪兒去了，怎麼到處也找不到她，她卻樂呵呵說自己是去山東爬泰山了，又說她這次外出途中全是自己找車坐，自己找住處，全憑自己到處闖蕩，不只長了很多見識，更受到了不少鍛煉，她對於自己實為任性的自在行動十分得意。以後不少人都聽說李訥當年“外出串連”的事，近年有些記述“文革”的作品或回憶中，都說是軍報記者把她從上海找回來的，其實這是道聽途說和以訛傳訛的事，不過顯然也正因此，江青才決定把李訥送到軍隊和軍報，好將她“管”起來，以免她再到處跑。

原為“紅色公主”李訥的“肖力”，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和十一月間到軍報“上任”的，她一到就在“快報組”工作，每天和幾位老記者還有那位原專門陪她的女同志，一起外出搜集調查各地各單位的“文革”情況，並未直接參加軍報內部的活動和運動，因此編輯部的人大都不認識她，見到她也不知其真實身分。儘管如此，她的來到等於是在軍報甚至軍隊內，安下了一顆“定時炸彈”，不久就會顯出她的威力，並暴露其真實的來意，從而使她“一鳴驚人”並“一舉成名天下知”。這時由於軍報的內部運動已經開始，正處於人心浮動處處不安之際，部隊在“文革”風潮的衝擊下，也出現了軍心不穩軍營不靜的跡象與動向，全國“文革”運動更是到了一個關鍵和轉折階段，黨內、軍內和國內連續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

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召開了一個據稱有二萬“革命文藝戰士”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軍報不少人去參加了大會，我也榮幸地跟著去了。這次大會實際是為江青，具體地說是正式樹江青為“文化革命偉大旗手”而召開的。我聽主持大會的陳伯達在開幕詞中，先慷慨激昂地大講了一通“文革”的偉大意義與鬥爭歷程，講著講著忽然改用十分柔和的腔調，媚態十足地當著江青的面說：“我在這裏想說，堅持文藝革命方針，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貢獻的。”接著由包括周總理在內的中央首長一一講話。都對江青作了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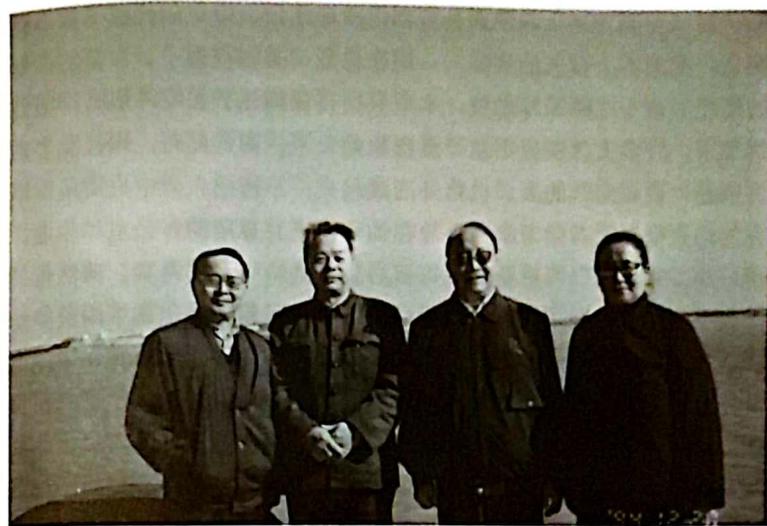
烈的讚揚實際是肉麻的吹捧，說我國“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在從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與“文藝黑線”的鬥爭中，“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建立了“豐功偉績”，受到了人們的“擁護”等等。正是在這次大會上，“中央文革”成員、總政文化部長謝鐘忠“向大家宣佈了一個大喜事：中央軍委決定，江青同志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謝部長宣講道：“這是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對我軍文化工作的極大關懷。江青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得很好，領會得很深，運用得很活，很堅決。由她擔任我軍文化工作顧問，是加強部隊文化工作革命化、戰鬥化的最重要的部署”。根據這一決定，江青從此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直接過問和插手軍隊的事，並且也將不限於文化工作方面了。這次大會上還有一件當時令人振奮，過後成為笑柄的事，就是又宣佈根據“中央文革”決定和軍委指示，將幾個國家級的文藝團體，如中國京劇院、中央樂團、芭蕾舞團和北京京劇一團等，都“劃歸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列入部隊序列”，即一齊集體參軍入伍。這一決定不僅使在場的人都群情激奮狂呼口號，又引起這幾個文藝團體以外的單位和個人，都紛紛要求光榮參軍，一片強烈要求、表決心和宣誓之聲，使“中央文革”和軍隊方面無法招架也應付不了，使這次大會形成了一場鬧劇。這事其實是江青他們頭腦一熱時決定的，結果卻給自己惹了麻煩，因為根本無法落實此事，後來只好悄悄收場不了了之，為後人留下了一個不好笑的“笑話”。不過由此可以看出，江青確是正在力圖插手軍隊，也想來抓“槍桿子”，以實現其“槍桿子出政權”出黨權更出文權的圖謀。李訥也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才來到軍報和軍隊的。

到一九六六年底，“中央文革”決定由軍報的“胡代總”去接管新華社並任“代社長”，他就一面仍然“關心”著軍報的工作，一面去新華社走馬上任了。這時軍報內部的“文革”運動，已由原記者處和副處長在實際主持著，報紙宣傳的日常工作由一位呂副總編負責，這位呂副總編與唐、胡二位“代總”，都是從西南軍區來的，不僅業務熟練，而且勤勤懇懇，只是為人雖可信任，卻有些軟不郎當

膽小怕事，難以擔當重任，倒是那位和副處長顯得更為年輕能幹又異常忠順，因此唐、胡二位“代總”就內定他為自己在軍報的“接班人”。正當他們為此進行策劃安排時，黨內軍內又發生了幾件大事，一九六七年元旦過後幾天，即一月四日“中央文革”突然宣佈，原中央第四號人物陶鑄作為“劉鄧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被中央也就是“中央文革”揪了出來，從此被一下踢出政治舞臺，與劉少奇、鄧小平並列為第三號“打倒”對象，在全國喊開了“打倒劉鄧陶”的口號。在揪出陶鑄的同一天，江青和康生、陳伯達加上周總理等中央首長，在接見一批部隊“造反派”時，又突然宣佈，原為“中央文革”副組長的總政劉副主任，是“劉鄧路線在軍內的代理人”，本來以他為首的“全軍文革小組”，是“在軍內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因而必須改組並將他揪出。劉副主任的忽然倒臺不由馬上影響到軍報，他是總政直接分管軍報工作的，與唐、胡二位“代總”早就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文革”以來更是如此，相互都很支持信任，按照黨內鬥爭“一揪揪一串，要倒倒一片”的“株連法”不良傳統，包括我在內的軍報幹部群眾，不得不認真觀察和深入思考起來，軍報和唐、胡二位的頂頭上司出了問題，軍報和唐、胡二位本身有沒有，又有什麼問題……？

人們首先提出，前一階段軍報內部運動中的“群眾鬥群眾”等等，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作法，出頭露面搞這些的是“社文革”及“御用”的“紅旗戰鬥隊”，但背後卻是報社黨委和唐、胡二位特別是“胡代總”，他們至少也是貫徹了劉鄧和劉副主任的“反動路線”錯誤方針，其他方面也未必沒有問題。最早就此對“社文革”和報社黨委表示懷疑並提出責難的，是在我們組隔壁辦公室的資料組幾個小夥子，他們與報社內一些於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間調來軍報的稍有文化的年輕戰士，還有剛剛分配來的大學生，以及行政部門的辦事員、發行員、打字員等等，在相互串連和一起商討之後，也按“文革”時的流行做法，以“古田戰鬥隊”名義貼出了幾張大字報，開始把矛頭指向“社文革”及其後面的報社黨委，這成了軍報內第一批自發形成的“造反派”。

軍報是唐、胡二位“代總”的起家之地，他們為了安定“後方”，立即採取了行動，先是二位都回到軍報來，召開大會傳達劉副主任的問題，在傳達中乘機解釋說，軍報在劉副主任領導下十幾年，當然有不少事值得檢查，歡迎大家對此進行批評，但又聲明他們對劉副主任的錯誤也是逐步認識到的，並且也不知道他多少問題。唐、胡二人在講話中都強調他們正在“中央”即“中央文革”，工作是如何的繁忙與繁重，暗示人們不要隨便懷疑他們，自己現在是在“中央”工作並受“中央”信任的人。不過他們對於報社內出現的新動向，還是有些不安甚至心中發虛，據後來揭發，他們回來曾查問“古田”隊到底是哪些人有什麼背景，佈置“社文革”密切注意他們的活動。這是他們“安定後方”的動作之一，同時又搞了另一個對外的動作，即利用劉副主任下臺，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的機會，不僅使唐、胡二位“代總”都成為新的“全軍文革”成員，更將他們在軍報的“接班人”和“代理人”和副處長順勢推了上去，最初因為這位和副處長職務、資歷和聲望都還有限，只將他排為“全軍文革”的最末一名，“唐代總”覺得這有點委屈了他，竟在毛主席已經內定批准了這個名單，就要公佈和見報以前，自己動筆將和副處長的大名勾到前面，使其成為倒數第二名，避免了在“排座次”時當“尾巴”的尷尬。按照常規這種名單及其順序，經軍委主席毛澤東審批以後就不能再動了，但是“唐代總”卻敢破此例擅自這樣做了，事後他還得意地說，這次自己是“專了毛主席的政”。結果後來這成了“打倒”他的一大罪狀，說他“喪心病狂”地居然“專了毛主席的政”。其實他當時這樣做，只表明了他們急於推出抬舉和副處長這一“新人”的熱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軍報以一版突出地位發佈了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的消息，並開列了“全軍文革”經過“唐代總”私改後的名單。也許為了顯示新“全軍文革”的地位及其分量，竟由往常極少拋頭露面的徐向前元帥為組長，卻以正風頭十足和鋒芒畢露的江青為顧問，其副組長是楊成武、蕭華等軍隊各總部和軍兵種負責人，在一共九名組員中，軍報就有唐、胡二位“代總”與和副處長共三名，由一個單位佔據了三分之一名額，這既表明了軍報在“文革”中的作用與



李訥（右1）、華楠（右2，原總政副主任）、王景清（左2）與本書作者，
1994年攝

影響，更表明軍報仍然掌握在“堅定的左派”手裏，它決不因原頂頭上司劉副主任的下臺而遜色。唐、胡二“代總”及其和副處長等採取了這些大、小動作之後，自以為其“後方”可以安定一下了，哪知這僅僅是他們的主觀願望，在全黨全軍和全國的“文革”浪潮衝擊下，他們在軍報的“江山”已經難以鞏固坐不穩了。就在公佈“全軍文革”新名單的兩天後，軍報突然“火山爆發”，爆炸的“導火線”偏偏是“胡代總”等自己引進來的。

儘管由於唐、胡二位“代總”的鎮定，又有和副處長等的坐鎮，軍報表面上還沒有什麼明顯的動盪和變化，但是確已“地下火在運行”，不只“古田”隊活動頻繁，不斷相聚議事和起草新大字報，各處編輯們也都無心辦公，到處是三三兩兩的人在竊竊私議著什麼，有的人也在策劃著或者也組成了什麼“戰鬥隊”，特別是前一階段被“橫掃”時燒過的人，紛紛起來揭發批判報社黨委的“反動路線”。我也是在前一段挨過批鬥的，只覺得“翻身”的機會到了，也和幾個相熟的同志，商討著也應該來造黨委的反。只是因為還要保證正常出報，按照“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各項活動大都在業餘時間進

行，所以一到夜裏，各個辦公室都燈火通明，以致“胡代總”也得到報告，從來不上夜班的某某人，現在也天天去吃晚餐了。軍報的晚餐時間在半夜十二時即零點整，本來只是夜班編輯們去吃，這時卻突然增加了，許多人都深夜不息“蠢蠢欲動”了。與此同時，報社記者處特別是“快報組”的人，也格外活躍起來，不斷出入“中央文革”所在的釣魚臺。記者處宋副處長等在釣魚臺已有專用的辦公室和住處，唐、胡二“代總”等更是那裏每日必到、隨時可見的常客，雖然他們一直不是“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員。這時的軍報似乎出現了兩股勢力或兩大派別，一方是以唐、胡二“代總”為帥，以記者處和、宋副處長等為將，又以“快報組”和記者處的人為骨幹，並以釣魚臺為指揮中心，握有很大權勢的一派；另一方則是分散在報社各處對唐、胡和報社黨委有懷疑和不滿的人和普通幹部群眾，其中已經亮出旗號的就是“古田”隊那些青年戰士職工和“見習編輯”們，報社內也貼出了一些有的以什麼“戰鬥隊”名義，有的署個人名字的大字報，對報社黨委或某個領導提出質問或批評。有不少人雖然暫時不露聲色，但也都正如毛主席所號召的，不斷關心著“國家大事”，密切注視著形勢的發展變化。

我當時也是這樣的，只是有一件事對我思想觸動較大。那時北京的群眾組織，也出現了對立的兩大派，一派是受“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另一派則被稱為“保守派”或“保皇派”，其成員主要是普通工人和基層幹部群眾，他們對黨和政府許多領導人受到揪鬥，機關被衝擊等現象，難以理解和接受，自認應該站出來保衛他們，就結成了一個全名叫“毛澤東思想捍衛團”的“老保”組織，據說著名的勞動模範、掏糞工人時傳祥，就是“捍衛團”的頭頭。“中央文革”當然不喜歡這種“老保”組織，在一次群眾集會上，江青就宣佈說，時傳祥是個“工賊”，他已經被人收買了。她這麼信口一講，時傳祥就倒楣了，“造反派”根據江青的“指示”，馬上將時傳祥抓去連續地揪鬥遊街，當他掛著黑牌子戴著高帽子，被押在卡車前部從軍報所在的平安里駛過時，我正好看到了。在此以前，我對“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等被揪鬥遊街，看到時總是既有點惻隱之

心，覺得有點過分了，但又以他們總是有過這樣那樣的問題，群眾起來衝一頓也是事出有因甚至罪有應得，要求自己正確認識和對待群眾運動。不過我看到被遊街的時傳祥後，心中一直平靜不下來，聽說他被“造反派”殘酷折磨得死去活來，其罪名除了他是“老保”組織的頭頭，還有一條“滔天大罪”，是劉少奇曾經接見過他，還與他握過手照過相，又有畫家將此事畫成了國畫，因此他就成了“全國頭號走資派”的“走狗”等等。我對這樣定“罪”非常反感，無論怎麼說時傳祥是個普通勞動者，當然屬於工人階級，即使有思想不通和認識不同，也不應該這麼整他，至於受劉少奇的接見更不是他的錯，現在把他當“工賊”和“走狗”，用對階級敵人的方法來鬥爭他，我實在接受不了，江青的所謂“指示”我認為是不對的，至少不該這麼說。但是當時正是江青作為“文化革命偉大旗手”一步登天不可一世時，我的想法不僅不能公開說出，連一絲一毫也不能透露，我只在自己的筆記本首頁白卡紙上，用紅色大字寫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用這段“最高指示”來表示我對這種敵我不分甚至敵我顛倒的行為的反對和抵制。不過這時我僅僅對江青的個人言行作風及其後果，暗自反感和反對，對整個“文革”運動，我還是遵從偉大領袖的教導，以為那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時”，而且必須“進行到底”的，因此我還是可說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偉大運動之中。

這一段時間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以來，已是軍報記者“肖力”的李訥，很少出現在報社，其實她這時先在部隊和地方調查瞭解“文革”情況，又在她老娘即江青的直接引導啟發下，琢磨和策劃著做點什麼，所以她在一月上旬常去釣魚臺她老娘處，又與也在釣魚臺的唐、胡二位“代總”及宋副處長等不斷接觸交往。正是在那裏，即將引發軍報“火山爆發”的“導火索”，由她悄悄埋設並著手點燃了！

當時的全國“文革”運動還發生了一件極其重大又引起連鎖反應的事，這就是以大奪權為內容的上海“一月風暴”。此事始末已有許多關於“文革”的史書、資料和回憶文章詳加記述，這裏只簡要交待一下，上海的“紅衛兵”和以王洪文為首的“工人造反總司令

部”(簡稱“工總司”)等造反組織，在“中央文革”特別是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下，由包圍、佔領和接管《文匯報》、《解放日報》等宣傳陣地，進而奪取了上海市委和政府各機關的領導大權，正為實現張春橋提出的“改朝換代”目標而展開鬥爭。這一奪權行動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讚揚，他及“中央文革”指示軍報和《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轉載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市人民書》即“奪權宣言”，又於一月十一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聯名給奪權成功的上海造反組織發出了賀電，這一下引發了全國的奪權狂潮，首先在北京引起了反應。

上海造反組織的奪權成功並得到“中央”支持，極大地鼓舞了北京的“造反派”，一批“紅衛兵”也進駐《人民日報》社，試圖按照上海的搞法也來先奪宣傳大權，“中央文革”得訊馬上聲言，這裏已由陳伯達親自去奪過權了，其宣傳大權早已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無需別人再去奪，並由王力出面勸走了那批有非分之念的“革命小將”。就在這時，軍報院內也來了不少軍事院校的造反組織，他們頻頻進出報社辦公樓，躍躍欲試地也想染指軍報的宣傳大權。這時正好軍報內部極其動盪人心不穩，一股批評甚至反對報社黨委及唐、胡二位“代總”的勢力已經開始抬頭並將要有所動作。這時，已在《人民日報》的“唐代總”和剛去新華社的“胡代總”，他們又兼負著“全軍文革”的重任並“客串”著“中央文革”的大事，由於心掛幾頭“六路分兵”，不免耽心軍報的大權可能落入別人之手，就想加快速度把他們內定的“接班人”記者處和副處長，及早推出山扶上臺以便控制局勢。也就在這一關鍵時刻，原在“快報組”的肖力，忽然關心起軍報的問題，對報紙宣傳和內部運動也開始注意和過問了，這似乎為唐、胡二位“代總”的交班與和副處長的上臺提供了一個大好良機，他們連忙乘機採取了新的行動。可惜結果卻事與願違，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投機”不成反賠了老本，反而導致了自己一班人的迅速垮臺。此事且待下章敘述。

肖力“突擊”造反一鳴驚人，軍報內部“火山爆發”開始大亂，粉碎了“奪權陰謀”，揪出了一個“小集團”，又揭穿了幾點“倡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是軍報歷史上特別是“文革”中的一個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日子，造成這一轉折的，就是剛到軍報兩個來月的、許多人都不明其身分甚至還不認識她的、來自中南海的“紅色公主”，原名李訥的肖力。我也是這一天才正式“認識”了她。

這天早晨上班時，我一進辦公樓就見迎門正中大廳內，貼了一張堪稱“巨型”的大字報，不僅是字大篇幅長，標題更是觸目驚心：

《〈解放軍報〉向何處去？》

我連忙拜讀之後，只覺通篇每一段每一句甚至每一字，都分量沉重異常尖銳，把一直被稱為也自認為是“高舉紅旗”和“文革先鋒”的軍報，徹底翻了個個兒。大字報一開頭，在肯定軍報的“高舉”和“先鋒”歷史作用後，話鋒一轉寫道，軍報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來，在劉志堅反動路線的直接影響下，報紙的宣傳和社內的文化革命就背離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走上歧途。”接著一一列數了要害問題：“一、在宣傳上忠實地執行了劉志堅的‘愚民政策’，把部隊和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離開來，以部隊特殊為藉口，放棄階級鬥爭陣地，脫離階級鬥爭，脫離兩條路線鬥爭，去搞什麼正面教育……幾個月來，沒有一篇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鬥爭的社論和文章……使我軍廣大幹部和戰士，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的部隊就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利用，成為鎮壓革命群眾的工具，有的戰士不知道什麼是反動路線，看到揭發劉少奇的傳單，竟視為‘大逆不道’。這種狀態，難道和軍報宣傳沒有關係嗎？這樣的部隊能夠自覺的保衛毛主席，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嗎？”“二、這種宣傳在地方上已經起了極壞的作用，不少單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限制群眾壓制革命，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他們這些陰謀活動，卻恰恰從‘高舉紅旗’的《解放

軍報》找到了理論根據，豈非咄咄怪事！革命群眾對此極為憤慨……林副主席指示要熱情的支持左派，狠狠的打擊右派，而我們的宣傳卻起了這樣的作用，難道還不應該引起我們報社每個革命同志深思嗎？”“三、目前全國發動了對劉鄧路線的總攻擊，劉鄧路線在我軍的代表人物劉志堅也已被揪了出來，在毛主席的關懷下，全軍文革小組重新改組……軍報為此發表的社論，卻隻字不提軍隊內部存在兩條路線鬥爭，不講全軍文革小組的改組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的勝利，也沒有表達出全軍同志對偉大領袖關懷的滿腔熱情，這樣的時候寫出這樣的社論，是報社黨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解放軍報的恥辱！”“幾個月來，軍報宣傳的方向偏了，報社內部的文化革命也相當一段時間冷冷清清，黨委一開始就為運動劃框框、定調子，繼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壓制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派工作組到工廠頑固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挑動群眾鬥群眾。直到廣大革命群眾紛紛起來革命的今天，社黨委仍然以正確者的姿態出現，不承認犯了路線錯誤，軍報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完全是黨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惡果，胡癡同志身為黨委書記，在這方面是負有嚴重責任的。”大字報又說：“報社黨委在思想上貫徹了劉志堅的一套黑貨，在組織上包庇了一批有反黨罪行的、有嚴重錯誤的人，把他們放在主要的領導崗位上”，接著點了一串原軍報領導人的名字，說這個“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那個是“反黨分子華楠的走卒”，這個“具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新聞觀點”，那個又“一貫右傾”等等，“另外還有不少犯有嚴重錯誤的主編和處長，在黨委包庇下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發批判，請問報社具體工作的領導權究竟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裏？在這樣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軍報》，怎麼能高舉毛澤東思想偉人紅旗？怎麼能完成時代賦於我們的光榮的歷史使命？如果這樣下去，將被革命的群眾唾棄，以至徹底垮臺。”大字報最後號召“革命的同志們，《解放軍報》已經到了嚴重的時刻。我們必須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一邊，徹底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我社的影響，學習《文匯報》《解放日報》闖將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鬧革命。”又說：

“同時我們強烈要求報社黨委懸崖勒馬，回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上來，和革命群眾一道，把《解放軍報》辦成一張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非常無產階級化的報紙。”

大字報最後的署名是“革命造反突擊隊”，接著是以“肖力”為首，包括調來專門陪伴她的那個女同志在內的共八個人的名字。時間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六時半”。我馬上意識到，這“肖力”就是那位原為“紅色公主”李訥的新來記者“小李”。由此我就基本上定下了對這張大字報的態度，認為應該對其表示支持，只是在心裏同時產生了半喜半憂或是疑慮的兩種情緒，“喜”的是說報社內部運動也執行了“反動路線”，軍報黨委也有“路線錯誤”，這是說了我也想說的話，因為我就是身受其害，在“群眾鬥群眾”中被鬥的一個，大字報這麼說等於把我也“解放”了。對大字報說報社黨委和“胡代總”總是以“正確者”自居，我更有此同感，早就暗地認為他們是在“拉大旗作虎皮”，嚇唬別人和掩蓋自己，只是一直不敢說出來，大字報把這一點捅出來了，這自然使我感到“喜”。“憂”或“慮”的是，我感到軍報在“文革”的宣傳上，已經夠“左”夠冒尖和過頭了，大字報竟覺得仍然很不夠，並說這是軍報的“恥辱”，真不知還要“左”到什麼程度？這些“喜”和“憂”都是我當時的直感，此外，我又隱隱感覺到了一點，大字報最後說軍報也要“學習《文匯報》《解放日報》闖將的革命精神”，這不是在鼓動我們這裏也要像上海那樣，來個從上到下大奪權嗎？可像軍報這樣的單位，該怎麼奪又由誰來奪呢？我正這樣想著，聽人們說樓上還有另一張同樣重要的大字報。我上樓一看後，只覺軍報已經進入“大奪權”的緊張關頭了。

樓上迎著樓梯的中心位置，就是那另一張“巨型”大字報，標題是煽動性的《革命的同志們，勇敢地起來造反》，一開頭就寫道：“革命造反突擊隊的大字報，好得很！這是一張充滿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報，這是一張無限忠於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字報！這是一張高舉毛澤東思想偉人紅旗的大字報！我們熱烈地歡呼！堅決的支持！”接著重複了“突擊隊”大字報中的一些觀點和提法，

並提出“我們的‘高炬’（注）哪里去了？”“我們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又到哪里去了？”等等，又說軍報的“革命群眾”，“早就忍無可忍了，再也不能等待了，必須起來造反！必須一反到底！必須徹底清算劉鄧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必須肅清劉志堅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本報的流毒！必須砸碎一切與革命形勢極不相稱的官僚機構！必須搬掉一切阻礙革命發展的絆腳石！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報紙，必須由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來掌權！”下面就用當時流行的“紅衛兵”語言，“勒令”原軍報領導班子哪幾個人“滾開！”哪幾個人“檢查錯誤，站到革命群眾一邊來！”對於軍報的主要負責人和應承擔軍報所發生一切問題擔當主要責任的“胡代總”，卻只有似重實輕空洞洞的“必須猛醒”四字。大字報最後號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們……勇敢戰鬥，殺出一個嶄新的局面，使《解放軍報》永遠保持鮮紅的旗幟！”然後以一連串革命口號和“萬歲萬萬歲”等收尾。一看大字報的落款者，竟是以記者處和、宋二位副處長為首的“快報組”的那一夥人，打出的旗號是個什麼“革命到底造反縱隊”，貼出的時間也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清晨。寫大字報的人沒有想到，他們選定的日期特別是其名稱都很不吉利，“十三日”就是個“兇日”，其“造反縱隊”更是一出世就“到底”了。不過當天早上卻有點迷人，樓下樓上這兩個互相呼應的大字報，一個是“造反突擊隊”的，一個卻是“造反縱隊”，按照軍隊編制，“突擊隊”應該是受“縱隊”指揮的，看來似乎表明了，這兩張大字報是同一夥人在同一時間內搞的同一個行動：馬上在軍報奪權！

（注）“高炬”是“文革”初期軍報出現的一個筆名，連續寫了具有爆炸性的重要文章，其作者和文章都曾紅極一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軍報在發動“文革”時的社論之一，矛頭直指被打倒的彭真及其北京市委。這些社論和“高炬”的文章，一度成為軍報的“驕傲”。——作者註

這一上一下兩張大字報，把我和報社許多人心裏都搞得七上八下的，到處都有人在議論，這是怎麼回事？就在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時，“造反縱隊”的大字報旁邊，又貼出了一張“特急呼籲”，全文

如下：

“一、鑒於胡癡同志目前不能以主要精力主管本報工作，我們建議立即成立以和谷岩同志為首的新的領導班子，暫時負責報社的領導工作。二、建議各革命組織立即醞釀新領導班子的成員，選派代表舉行緊急會議，由和谷岩同志儘快召集這個會議。三、從今天起，報紙由新的領導班子和革命左派來辦。”

下署“金猴戰鬥隊”，而所謂“金猴”就是也在“造反縱隊”大字報上列名的和、宋二位副處長手下的一名胡姓記者，由和副處長手下的人來“呼籲”成立以和副處長“為首的新的領導班子”，其圖謀目的也就“精赤條條，暴露無遺”了，而和副處長本來就是唐、胡二“代總”內定的“接班人”，他是軍報黨委及唐、胡二位特別是“胡代總”所有指示的忠實執行者，由他來奪軍報的權，實際是“胡奪胡權”和“假奪權真保胡”。當時報社大多數人對“胡代總”已經不滿不信服了，對和副處長更是早已反感，大家對於這一“呼籲”當然是反對的，結果在全社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軍報“後院”開始“起火”的情況，由和副處長等迅速報告了“胡代總”，他立即趕回報社，原想來親自出面平定局勢的，哪知一進門就被人們拉到大會上回答問題，形成了一場自發舉行的辯論大會，更是一場對“胡代總”與和副處長的責問甚至批鬥大會。下面分別回述一下當時的情況及其背景。

軍報內反對“胡奪胡權”特別是由和副處長來“假奪權真保胡”的人，實際存在著兩個類型或抱有兩種目的的不同群體，一批是本來受到領導賞識的重要“筆桿子”們，他們一直自視為軍報的“主力”和“骨幹”，如果唐、胡二位“代總”要交班，他們自認是有能力也有資格來接班的，但是這次卻偏偏甩開了他們，“胡代總”只把“班”交給了和副處長及他那一夥人，於是他們中有人氣憤得哭著說自己上當了，被“胡代總”騙了，有的人則乘著報社內多數人都反對由和副處長來奪權，也以“革命群眾”身分來揭發和副處長的老底，在“金猴”隊貼出“特急呼籲”後，他們立即寫出了以《和××是什麼人？》為題的大字報，揭露了他一系列執行“反動路線”的嚴重問題，表示決不能由他這樣的人來執掌軍報大權，言外之意是要

奪權也應由他們來奪。他們有的就是曾經執筆寫“高炬”文章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社論的“筆桿子”，也就打出了“高炬戰鬥隊”等旗號。不過他們這些人在報社卻不佔多數，就聯合了也在反對“胡奪胡權”的大多數人，這批人以較早批評報社黨委的“古田戰鬥隊”為代表，其餘的也大多是報社一般編輯、職工甚至戰士，他們雖反對由和副處長奪權，卻根本不想由自己來取而代之，只希望軍報能有個真正執行正確路線的好領導。我自己就是屬於這一類的，於是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及其“戰鬥隊”，在“一·一三”這天即“突擊隊”貼出大字報的當天，一度成了“高炬戰鬥隊”的“統戰對象”或是“外圍組織”，只有“古田”隊表現得自有主張，不太受別人的控制和影響。

“一·一三”當天就因“突擊隊”和“造反縱隊”以及“金猴”等的大字報，自發形成了全社的辯論大會，肖力及其“突擊隊”的人也參加了。由於報社內特別是編輯部的人大都不認識肖力更不知道她的身分背景，上述以“高炬”隊為代表的一些人，把肖力與和副處長等看成了一回事，有人在辯論中直指著肖力責問道，你知道報紙是誰辦的嗎？軍報的“紅旗”是誰舉的嗎？意即軍報及其“紅旗”，就是他們在辦和“高舉”著的，軍報的權也只能由他們這些“筆桿子”來掌，不能由和副處長等記者處的人來奪權。“古田”隊的人也只看到“突擊隊”和“造反縱隊”的大字報，幾乎是同時貼出的，內容又是相互呼應的，以為肖力等與和副處長等是一回事和一致的，在辯論會上，“古田”隊的一個女打字員也衝著肖力憤然問道：“你是幹什麼的？你們的大字報是什麼目的？”因為當時多數人都是這麼想的，就對肖力形成了一次小小的“圍攻”。由於這次“圍攻”是“古田”隊帶頭的，結果後來“古田”隊被打成了“反動組織”，那個女打字員也成了“現行反革命”。不過這是後話，在“一·一三”當天，“古田”隊還是屬於革命派的。鑒於全社絕大多數人都反對由和副處長等奪權，“高炬”隊就聯合“古田”隊等群眾造反組織，聯名並連續發表了“聯合聲明”和“聯合通令”，表示“堅決主張用徹底革命精神改組報社黨委的領導班子”，由“堅定的無產階級左派”來掌權，

倡議“一切革命同志迅速行動起來，經過協商一致，未經軍委、林副主席批准，任何人不得接管報紙和報社任何部門。”就是這一天，全報社呼啦啦出現了一大批“戰鬥隊”，什麼“紅流”、“紅一縱”、“紅纓槍”、“紅世界”、“環球赤”、“韶山紅旗”和“紅彤彤”等等，使軍報上上下下幾乎真的“一片通紅”了。我也參加了一個臨時湊起來、只有幾天壽命的“雲水怒戰鬥隊”，當時包括我在內的報社“廣大群眾”和各個“戰鬥隊”，都支持了“高炬”和“古田”等隊的主張，實際上以壓倒多數堵住了和副處長的上臺之路。

“胡代總”於“一·一三”回到報社時，辯論大會立刻轉為對他的責問批判，人們群起而上地追問他，“突擊隊”和“造反縱隊”的大字報是怎麼回事，他承認事先知道“突擊隊”的大字報，說肖力曾當面對他說要造他的反，還將大字報的內容告訴了他，又說和副處長等曾表示“小將”們動作太快了，他們一下子趕不上，要求能緩一緩，但肖力沒有同意。他為此馬上與和、宋二副處長及“快報組”的幾個人磋商後，認為要保住軍報黨委和原定方案，有消極和積極兩種方法，現在只能用積極方法，和肖力及其大字報一起起來“造反”，設法使和副處長乘機“接班”，這就又有了“造反縱隊”的大字報及關於以和副處長“為首”的“呼籲”，這表明這一奪權行動是“胡代總”自己導演至少是參與策劃的。他的回答激起了大家的憤怒斥責，他在人們迫令下答應將此事立即向中央及軍委報告，並準備回軍報來聽取批評和作出檢查。當時在場的肖力，也證實並補充了一些情況，說明“突擊隊”與“造反縱隊”的兩張大字報，雖然各自的出發點不同，卻都是在釣魚臺的“中央文革”辦公地點產生的。在“胡代總”回答問題和辯論時，人們對“金猴”隊的“呼籲”和記者處特別是“快報組”一些人的活動，也提出了不少責問。許多人是不認識的肖力，也被人看作是其“一夥”被責問過。當時許多人認為，“胡代總”私下授權給和副處長，又利用“群眾”名義來捧他上臺，完全是在搞陰謀，他一手控制的軍報內部運動，更是地道的“反動路線”，他本人還有著不少嚴重問題，有人就提出他是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要不要“保”他的問題，有位負責“快報”工作的老

記者，立即大義凜然地站到台前，拍著胸脯大聲喊道，他認為“胡代總”當然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自己對他不僅要“保”並且“保定了！”由於這位同志名字中就有一個“保”字，他一下就被人們叫成了“×保定”，可惜他不僅沒有“保”住“胡代總”，反而使自己後來因此吃了大苦頭，以致幾乎賠掉一條老命，這都是他“保”而不“定”的結果。

在“一·一三”辯論會和對“胡代總”的責問會上，多數人都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面，使原來一些支持和副處長乘機奪權“接班”的人，即記者處和“快報組”的那批同志，當然十分惱火並很不服氣，他們也以幾個“戰鬥隊”的名義聯名發表了一份“嚴正聲明”，說是報社發生了“圍攻革命群眾”的“極不正常”情況，說辯論會是“極不民主、極不平等的會”，有“蠻橫地剝奪別人發言權”的“惡劣做法”等等。這張大字報是和副處長親率的“造反縱隊”及其追隨者“金猴”等“戰鬥隊”的人搞出的，但在“聯合署名”時卻把肖力名列首位的“突擊隊”排在第一個，這不僅加重了他們“聲明”的分量，也使事態變得複雜和嚴重了。到當天下午和晚上，報社不少人已經知道了肖力的真實身分，她身為“偉大領袖”和“偉大旗手”親生女兒的“紅色公主”，在軍報居然受到了人們的“圍攻”，這當然是“極不正常”的，人們本來就以為她所在的“突擊隊”與和副處長親率的“造反縱隊”是“一夥”的，現在他們又公開聯名站在一起，堅決反對並強烈抗議軍報多數人的立場和作法，表明這位“紅色公主”一直是支持“胡代總”與和副處長的。如果確是這樣，“胡代總”就真的成了該“保”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而反對他的軍報絕大多數人，就全都反錯了，並且居然反到了“偉大領袖”和“偉大旗手”的親人頭上，這還了得！於是，以“突擊隊”為首與“造反縱隊”聯名的“嚴正聲明”貼出後，報社內的氣氛一時格外緊張起來。

正當全社人心惶惶之時，當夜十時，以肖力為首的“突擊隊”忽然貼出了一份“強烈抗議”，一開頭就說軍報這天的辯論會“是一個革命的會，造反的會。報社革命群眾開始起來揭發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軍報》社亂了，亂的好，好得很！大會的方向是正

確的。”但是支持和副處長的幾個戰鬥隊，“卻採取極其惡劣的手法，不徵求我們的同意，在他們的所謂《嚴正聲明》上簽了我們的名。對此，我們表示強烈的抗議！並呼籲全體革命同志，擦亮眼睛，團結起來，為徹底肅清我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奮鬥！”有人回憶說，在下午辯論會上，肖力就已經表明，他們的大字報，與“造反縱隊”的大字報沒有關係，“根本是兩碼事”，和副處長等為什麼要貼那樣的大字報，她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實際上已表示了他們並不支持和副處長來奪權。我也曾參加過這次辯論會，不知為什麼卻沒有這個印象，記不得她曾說過這樣的話，也可能她並沒有那麼明確說過，或是我正被別人擠在後面，由於人聲嘈雜沒有聽到，因此直到晚上，在我心裏還是將他們與和副處長等的大字報，當成互相關聯著的一回事，當時報社許多人，也都有這個印象或錯覺。所以當“突擊隊”的《強烈抗議》一貼出，表明問題恰恰相反，形勢立刻急轉直下，人們的疑慮完全消解了，肖力及其“突擊隊”，肯定和支持了全社大多數人反對由和副處長奪權的行動，他們的大字報與所謂“造反縱隊”的大字報，本來就是兩碼事，他們並未支持更未參與和副處長來奪權。這一“旗幟鮮明”的公開表態，極大地鼓舞了各個反對奪權的“戰鬥隊”和幹部群眾，人們都奔走相告，喜出望外，與此同時，和副處長及支持他奪權的人，立刻成為眾矢之的，陷入了大家的憤怒指責揭露之中，人們認為他們是“陰謀奪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他們的活動是一起“嚴重政治事件”。

由於參與和支持和副處長奪權的人，幾乎都是“快報組”的成員，而“快報”是黨的重要機密，也是“快報組”成員的肖力，不知是接受了誰的指示，或是她自己一下意識到，不能再由這些參與搞“陰謀”活動的人，再從事“快報”這樣的機密工作，“快報”本身的機密，更是一點不能洩露，就由她發起，各個“戰鬥隊”派代表，共同監督著立即查封了“快報組”辦公室。我也被所在的“戰鬥隊”派去了，見肖力帶著人在“快報組”的材料和檔案櫃子上貼封條，一邊幹一邊說道，這裏的東西，一個紙片也不能漏出去！也就在這時，我第一次與她面對面地接觸了，只覺她說話辦事都很乾脆幹練。在查

封“快報組”以後，有人說這辦公室雖然封了，“快報組”的人還有好幾個正在釣魚臺，他們都是軍報“奪權陰謀”的參加者，現為“中央文革辦事組長”的宋副處長，更是這一“陰謀”的主要策劃人之一，這樣一些“危險人物”決不應該還留在“中央文革”這樣的重要崗位上，必須讓這些人儘快回到軍報，向大家交代各自的問題。這時肖力剛剛走開，有人就推我和一位女同志去找她說這事，並請她幫我們與“中央文革”聯繫和請示。我和那位女同志一起在樓梯拐角處追上肖力，站在那裏向她說了此事，當提出請示“中央文革”時，她說如果你們認為自己的行動是正確的，就不必再請示，“中央文革”會支持你們的。我們覺得這還是不太好，請她幫我們先聯繫一下，她說你們可以自己和他們聯繫，說著就給了一個電話號碼，我隨手記在一個活頁本子上，這個電話號碼至今還在我當時用的小本子上，是“866707”號。似乎是那女同志打了電話，我沒在場也不知道她在電話中怎麼說的，只記得自己當時去做了另一件事，約了幾個同志一起調出報社的一輛大轎車，又和那位女同志及一批同志，乘上大轎車開往“中央文革”所在的釣魚臺國賓館。

軍報的車被攔在警衛森嚴的釣魚臺東門口，我們向門口的值班人員說明了身分與來意，他們讓我們在門口外頭等著，由他在裏頭向“中央文革”報告，他怎麼報告的我沒聽到，只在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出來對我們說，到“中央文革”來揪人的，以前只有過一次，是來揪原“中央文革”成員尹達的。我知道尹達是位“左派”歷史學家，在“中央文革”最初的組員中名列第二，位居王力、關鋒和戚本禹之上，那姚文元才是最末一個，地位比他低多了。只是不知他後來出了什麼事，又被哪兒揪出去了。那個值班人員又說，你們再等一會，裏頭會把人給你們送出來。當時已是深夜，又正是寒冬臘月大冷天，我們迎著夜風站在釣魚臺院門外，雖然很冷卻誰也不在乎，反而因為自己正積極參加“文革”運動的階級和路線鬥爭，而感到全身熱血沸騰。記不得在外頭挨了多久凍，裏頭將人送出來了。由一個自稱是關鋒秘書的人，將宋副處長等一批軍報幹部，帶出來交給了我們，他交人時說，江青已有指示，讓他們回軍報參加運動，並要他們不要與群



毛澤東、江青和童年的李訥在延安

眾對立，又說他們以後不必也不能再來“中央文革”和進釣魚臺了。我們認為這是“中央文革”對軍報“革命群眾”最大的支持和信任，興奮地把以宋副處長為首的那幾個同志，“押”上了大轎車，並且讓他們都站在車上。這些同志都是軍報的老同志，與我從無個人恩怨，有的還有些個人友誼，但是他們進了“快報組”和到釣魚臺以後，一個個似乎都立即身價百倍，神氣活現起來，有一位原來在文化處的編輯還說，他到“中央文革”是“歷史把我推到了這個地位”。還有的同志一直是軍報領導特別是唐、胡二位器重的“紅人”，有一位幾乎被江青挑選去當她的秘書，我本來就對他們有點看法，現在他們都參加了報社的“奪權陰謀”，遭到了大家的反對，又被“中央文革”踢出來並被我們揪回報社，這也是“罪”有應得，所以在車上我就對他們有的人說了幾句風涼話，也不知當時被我奚落的同志聽到沒有或還記得不，我卻在以後見到他們就覺得自己幹過件虧心事，那時出於“革命義憤”實際是“個人情緒”，出語傷害了同志，但願他們能忘

了此事，如果他們看到這本書，我僅在此向他們深致歉意。

這些同志被揪回報社以後，立即在大會議室對他們進行了批鬥，追問他們是怎麼搞“陰謀奪權”的，那宋副處長一面“供認不諱”，一面又說他們離開“中央文革”時，江青說“胡代總”也要回軍報參加運動，向群眾交代問題，這表明軍報所有參加“中央文革”工作的人，都被一下子“踢”出來了。有人說這時“胡代總”正在《人民日報》社“唐代總”那兒，應該去把他揪回來。曾和我一起去釣魚臺門口的那位女同志，說她知道那個地方，約我再和她一塊去《人民日報》揪“胡代總”，我對這個策劃“陰謀”的“罪魁禍首”當然十分憤慨，馬上又跟她一起去了，同去還有“突擊隊”的一名“小將”和民兵處的一位編輯，四人分乘兩輛小車去了《人民日報》社，進院子後我說為了防止“胡代總”從別的門跑出來，我和小車司機都在辦公樓外頭等著，讓他們三人上樓去揪人。我在車裏等著時，本來是“胡代總”專車司機的小劉悄悄問我是怎麼回事，我說“胡代總”犯錯誤了，想了想又補充道：“他搞陰謀，反黨了！”其實我也說不清所謂的“陰謀”和“反黨”到底如何。過了不久，“胡代總”被他們三人從樓裏“揪”了出來，這個“揪”字我說的是動作，而不是當時流行的政治性形容詞，“胡代總”是被他的幾個部下連架帶拖地挾出來的，似乎是全身軟癱著被塞進了軍報來的小車裏，順利完成任務的我們，還是兩輛小車一前一後駛出《人民日報》院子，“滿載而歸”地回到軍報，一場新的“戰鬥”又開始了！

“揪胡”的小車在報社門口一停下，我就先下車進了辦公樓，見門廳裏有人在貼新的大字報和標語，其中有位文化處的老同志，他是“文藝評論”版和新成立的“紅一縱戰鬥隊”負責人，正爬在一個小梯子上，在高處貼上了粗大的四個黑字：“燒焦胡癡！”一下子超過了別的只提“炮轟”和“火燒”的調子。我對他們說“胡代總”已被揪回來了，人們就都擁到門口衝向小車，七手八腳將“胡代總”拖了出來，又架上樓梯推到大會議室裏，裏面鬧哄哄地全是人，只見時事處有位向來“積極”的同志，在一個竹片編的字紙簍上，臨時糊上一層紙，倒扣過來寫了打上“×”的“胡代總”大名，一下套到了他的

頭上，使這位剛剛高升為新華社代社長的軍報代總編，成了個戴著高帽子的“牛鬼蛇神”。只是這位被揪鬥者東倒西歪地站也站不住，就拉過張椅子讓他坐著交代問題，但他在人們的責問和斥罵下，卻語無倫次話不成句地什麼也說不清，口水流下老長連眼也睜不開，只聽他嗑嗑巴巴道，自己已經吃了安眠藥片，藥力發作正使人糊塗著，去揪他的同志也說，他是從“唐代總”辦公室裏的小床上被拖出來的。人們見他這副樣子，確是無法馬上交代問題了，就把他拖到隔壁一間空屋裏，讓他在那裏“清醒清醒”再說。先從釣魚臺被“揪”回來的幾個人，也同時被關押在別的空屋裏。至此，策劃和參與這場“陰謀奪權”事件的全部“人犯”，都已一一落入“革命群眾”的“法網”之中，發生在軍報的一次“奪權陰謀”，就此宣告已被大刀闊斧地完全粉碎了。

這時天已大亮，新的一天又開始了，人們從十三日早上看到肖力等的第一張大字報起，一直處於激奮之中，不眠不休又連日帶夜地鬧騰著，竟沒有誰覺得累和困。也就在此期間，由“奪權”事件還引起了一些事，有些人另外進行了若干活動，我雖然並未直接參與，但也很快知道了一些情況，並且認為這並非小事。就在“1·13”當天下午，“胡代總”與副處長等正陷入軍報群眾的怒火之中時，報社內有幾位也是或自認是“左派骨幹”並已結為“高炬”等戰鬥隊的“筆桿子”們，悄悄商討後去了釣魚臺，準備向“中央文革”報告軍報發生的問題，他們去後卻沒能進去，被擋在院門外，讓他們有事去向“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接待站這時設在天安門東邊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內，是個只接待一般群眾的公開地點，不會解決什麼問題，他們當然不想去，就改去了位於西城區毛家灣的林彪帥府，想向那裏直接報告軍報情況。哪知他們也沒能進入帥府，他們被攔在門口，急切地說軍報發生了嚴重問題，那裏的人卻說，要有什麼問題，軍報的“胡代總”會來報告，用不著他們費心。這兩個冷冷的軟釘子，並沒有碰得他們降低熱情，但也不想就此甘休回到軍報，又跑到《人民日報》社找軍報老領導“唐代總”去，一到那裏軍報就來電話給“唐代總”，說總政蕭華主任馬上在三座門軍委辦公廳，接見軍報的領導幹

部和群眾代表，要“唐代總”立刻趕去，當得知“高炬”等戰鬥隊的幾個“筆桿子”正在這裏，就說讓他們也一起去。當“唐代總”和他們趕到三座門時，見“胡代總”和軍報幾位還未“打倒”的副總編已在座，他們這幾位也就成了據說能“代表群眾”的“群眾代表”，正是他們這幾位，在蕭主任接見開始時，提出軍報剛發生的問題，是“胡代總”造成的，現在討論此事，他本人應該回避。蕭主任接受他們的意見，讓“胡代總”退出了會場，以後就先由這幾位“群眾代表”向蕭主任報告了在軍報發生的事件。蕭主任聽後作了幾點指示，一是對“胡代總”要“一燒二保”，即可以揭發批判，但不要馬上“打倒”；二是報社要穩定，不能出亂子；三是還要辦好報紙，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四是經過群眾充分醞釀，提出新的軍報領導班子名單，報總政和軍委審批。

三座門的蕭主任接見後，軍報這幾位“群眾代表”和領導幹部，一起回到報社又各回各處，剛參加接見的“高炬”等隊代表，向社內一些人通報了接見情況。這時，報社群眾已在肖力帶領下查封了“快報組”，又從釣魚臺揪回了宋副處長等人，接著連夜將“胡代總”從《人民日報》“唐代總”處揪了回來，全社正處於鬥志昂揚氣氛熱烈之時，從三座門回來的“高炬”等隊的幾個同志，適時地向社內各群眾組織傳達了蕭主任的指示，又根據蕭主任的指示，拿出了他們寫好的幾點“倡議”，其中最重要的是很快協商產生新的軍報領導班子。肖力本人代表“突擊隊”聽了對蕭主任接見的傳達，又看了“高炬”等隊提出的“倡議”，她通過日內與軍報不少人的接觸和瞭解到的情況，已經發現“高炬”等隊一些人在報社的地位、作用和某些打算，感到他們之所以積極反對由和副處長等奪權，其實是為了使他們自己能乘機上臺，也就對他們採取了戒備和警惕態度。她聽了傳達和讀了“倡議”後，試探地問那幾位“群眾代表”，你們對蕭主任指示有什麼看法，一位經驗豐富的老“筆桿子”聽了她話中有話，便機警又含糊地說，有贊成的也有不贊成的。肖力又問：“蕭主任和你們都說，軍報要儘快成立新的領導班子，現在階級陣線還不明朗，根據什麼來產生新的領導班子？……”這不僅一下把他們問住了，也使他們的

“倡議”無法再拿出來，實際上堵塞了軍報另一撥人想藉此時機自己上臺之路，而肖力所以對此如此高度警惕，與軍報近日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一樣，其核心都是一個“權”字。此事背景情況及其後來發展，且聽下章分解。

釣魚臺內密謀策劃，導演了不同的“造反”與“奪權”，各派勢力和各種人物競相登臺，形成了群雄相爭大混戰

本文前一章曾經寫到，軍報內反對“陰謀奪權”的人主要有兩大類，大多數是普通編輯、一般幹部、職工甚至戰士，這類以“古田”隊為代表；還有一小撥人以“高炬”隊為代表，他們反對別人奪權是想由自己取而代之，這就是軍報內的一向深受重用十分活躍的“筆桿子”們，他們早已自認為是“左派骨幹”，這時更已成了自以為能“代表群眾”的“群眾代表”。正是這後一類人，在發現“胡代總”並沒有將軍報的“班”交給他們，卻私下授予與他們並不完全一路的和副處長等，這才“義憤填膺”地揭竿而起，帶頭造了“胡代總”與和副處長等的反，並且自動“代表群眾”先去釣魚臺找“中央文革”，後登林帥府求見“副統帥”，再上《人民日報》社見老上級“唐代總”，又作為“群眾代表”參加了三座門的蕭華主任接見。他們這一系列的革命活動或造反行動，尤其是一種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精神氣勢，自信已經造成了很大的“群眾影響”，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甚至已經獲得了相當的“群眾威望”，正在成為軍報的“群眾領袖”，只要再經過一定的“醞釀”，就能自然地進入新的領導班子，一一上臺執掌軍報的各項權力。從而為他們多年來的效勞能幹和汗馬功勞邀功請賞，取得自己應有的報償，實現其美好的願望。十分可惜的是，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在政治角鬥場上，從來就是強中又有強中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在“黃雀”上頭還有著“大老雕”。突然出現在軍報的肖力，在打倒了“胡代總”及和、宋二副處長時，粉碎了這批人的“奪權陰謀”之後，也

使以“高炬”隊為代表的那些人的美好願望化成泡影，不能馬上取和副處長甚至“胡代總”之位而代之。只是最初他們由於不認識肖力，更不知道其能量和威力，而沒能及時意識到這一點。後來我也才逐步瞭解到，肖力在軍報的行動，其實有著更深的背景和更大的目的，而這一切都是她老娘即江青在釣魚臺導演出來的。據我陸續得知的內幕如下：

在由“中央文革”支持，又得到偉大領袖肯定鼓勵的上海“一月風暴”中，已被奪了權的《文匯報》社論鼓吹道：“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革命就是奪權。”號召造反派“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權，把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把報紙和一切輿論工具的領導權，把經濟命脈的領導權，堅定地毫不猶豫地統統從那些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手中奪過來。”又以“響噹噹的革命造反者”的豪氣，將毛澤東青年時期的幾句話稍加變動道：“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奪權，誰奪？我們不當權，誰當？”公開讚揚並鼓吹大奪權的“中央文革”，在中央改組北京市委奪了北京市的權後，又由陳伯達等奪了《人民日報》等“一切輿論工具的領導權”，軍報的唐、胡二位“代總”，先後成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代總編”、“代社長”，掌管了黨和國家主要輿論工具的大權，這使他們原來在軍報的權力位置，就暫時成了空缺。該由誰來填補這個空缺，充任這個號稱“文革先鋒”的軍報新任領導人，當然應由最忠於黨和偉大領袖的“無產階級接班人”，那麼誰是這個“接班人”呢？看來早就有人對此考慮過並準備好了，這個人就是自以為正坐在“紅都女皇”寶座上的江青。據“胡代總”事後回憶，“江青早就婉轉地讓我交權”，在他到新華社就任高位時，江青又稱讚他身體和精力都不錯，要他把新華社好好管起來，又讓他“加強一下軍報的領導班子，日常工作讓他們搞就行啦，（你）把主要精力去管新華社。”聽了這話的“胡代總”，已經意識到這實際是要他將軍報的權讓出來，並且要儘量快些早些。直到一月十二日晚上，即肖力的“突擊隊”大字報就要出籠時，江青還對也在釣魚臺的“胡代總”說：“小將們要造反，你要堅決支持他們。”當時所謂“造反”也就意味著奪權，江青這話

也就是暗示“胡代總”，應該支持“小將”即肖力來奪軍報的權。但是，一向精明機靈的“胡代總”，看來過於珍視和留戀自己在軍報的權力了，這時居然對此“權”迷心竅犯了糊塗，對於江青一而再再而三的幾次提醒，竟一直沒有領會其精神實質和要旨所在，他只考慮到自己對軍報的領導大權，必須交給最能聽命於自己的忠誠可靠“接班人”，卻沒有注意和重視自己身邊與軍報內部，已經另有了一個更為忠誠可靠的“接班人”，不過這裏的“忠誠可靠”不是指對“胡代總”，而是對她江青本人的直系血親。這個“接班人”正是在“大奪權”之時，忽然在軍報“亮相登場”的“紅色公主”肖力。

按照毛澤東的名言：“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由他老人家親自教導和“偉大旗手”直接培育出來的“紅色公主”如要接軍報的班，取得這個能調動“槍桿子”的“筆桿子”單位的領導權，也要“推翻”以前的“政權”，這就也要“先造成輿論”。但是軍報是著名“高舉紅旗”的“文革先鋒”，在黨和軍隊以至全國，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和一定的權威性，難以也不能輕易否定。恰好這時一直主管軍報的總政劉副主任出了問題，這就提供了一個最好機會，把軍報的問題都掛到了他的賬上，先簡單肯定一下軍報在“文革”初期的“先鋒”作用，再將重點放在“以後”，“特別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來，在劉志堅反動路線的直接影響下”如何如何，為攻下軍報找到了一個缺口。肖力正是這樣做的，她到軍報後是作為“快報組”成員，不斷以軍報記者身分外出“採訪”以搜集各地各單位“文革”情況，據說他們下去時聽到“許多革命群眾對軍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使他們認為軍報已經“背離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走上“歧途”了，而這“是報社黨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解放軍報的恥辱！”正是在這樣一個“嚴重的時刻”，他們也只有他們，必須登高一呼和揭竿而起，大造報社黨委的反，促成對軍報領導班子的改組、改變或江青所說的“加強一下”，使軍報“回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上來”。以肖力為首的“突擊隊”就是按照這個觀點和提法，寫出了《〈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據有關人員回憶和資料

記述，肖力拿著這個大字報稿，向正在釣魚臺的江青報告了自己的意圖，她對老娘說：“媽媽，我要造反！”她媽問：“孩子，你要造誰的反？”她答：“造解放軍報的反。”老娘馬上表示：“媽媽支持你。”這是一月十二日晚的事。

提供這一情況者又認為，以上母女對話是否真是如此，“局外人當然不得而知”。但是宋副處長等後來交代，肖力從江青那裏出來，就拿著大字報稿到他們那兒，一面“傳達”了上面那幾句對話，一面向他與也在場的軍報和副處長等“快報組”負責人，讀了大字報全文，通報和公開了自己的“造反”行動。據宋副處長等說，他馬上對肖力的“造反”表示支持，又對大字報提了一點具體意見，說大字報中指出的許多問題，其實都是“胡代總”領導下發生的，但大字報卻一字未提到他，已點名的幾個人對此都不負主要責任。肖力接受意見，加了一句說“胡代總”作為黨委書記，還是“負有嚴重責任”的。這表明肖力雖然造了報社黨委的反，並沒有也不打算反對“胡代總”本人，因為這時他正受到“中央文革”的信任和重用，現在只要將軍報的位置讓出來就行了。就在肖力和宋副處長等議她的大字報稿時，江青讓都在釣魚臺的“胡代總”和宋副處長去她那兒，江青一見他們就說：“小將們要起來造反，你要堅決支持他們。這是大勢所趨，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自己有缺點錯誤，要主動檢討。”“胡代總”聽出這話雖有威脅意味，對自己還是相信和保護的。只聽江青接著又說：“軍報同《文匯報》不一樣，《文匯報》是上海舊市委領導的，軍報是林副主席領導的，而林副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所以運動要在報社內部搞，不要像《文匯報》那樣公開在報上搞。”聽話聽音，江青這番話不只表明了肖力的“造反”，正是她支持甚至指使的，其目的就是軍報應該像《文匯報》那樣，也要來一次“奪權”以改變領導者，“胡代總”等必須很快交權讓位，只是不必和《文匯報》一樣公開進行。“胡代總”聽江青說罷立即表示，一定支持“小將”造反，自己將好好檢討。他們接受指示出來後，“胡代總”立即與宋、和二副處長及“快報組”的幾個人，商討了在肖力大字報貼出後，軍報也將奪權和必須交班的問題。也許正是這個“權”字使他們

都鬼迷心竅又死不開竅，一向機靈敏感的“胡代總”和足智多謀的宋副處長，以及從來謙和穩重的和副處長，這時一起犯下了一個致他們所有人“死命”的絕大錯誤。

他們都以為肖力的“造反”大字報，正是為“胡代總”內定的接班人和副處長及時接班上臺，作了最好的輿論準備，便一面由“快報組”的人起草大字報，“堅決支持”和“歡呼”肖力等的大字報，一面由“胡代總”親自主持著與和、宋二副處長等秘密議定了一個新的“領導小組”名單，以便在軍報進行“大奪權”的關鍵時刻，萬一發生什麼動亂，好立即出來穩定全社局勢並保證正常出報。這個“領導小組”當然以和副處長為首，宋副處長“謙虛”地說自己就不必列名其中了，其實是他這時已成為職權相當於“中辦主任”的“中央文革辦事組長”，其地位正在上升並將更為輝煌，也就不在乎軍報這個“小位置”了。這個名單中雖然也有軍報的幾位大“筆桿子”，但由於這是在釣魚臺內由“胡代總”等極少數幾個人密謀策劃出來的，沒有來得及告知正在報社內的幾位大將，結果使他們錯以為“胡代總”將權力只私授給了和副處長等人，甩開了他們這些為軍報立下汗馬功勞的重要人物，使其憤然反對和副處長等的“奪權陰謀”，其實是“大水沖倒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識自家人”。這是後話，卻說“胡代總”等擬定了這一新的軍報領導班子名單後，就興沖沖地拿著這個名單呈送給江青過目，心想她那兒一通過這事兒就成了，哪知事與願違，恰恰是此名單不只犯了“天條”更觸怒了“龍顏”，因為江青看到的根本不是這樣一個名單。

就在軍報內“突擊隊”大字報貼出時，以和副處長為首的一批人立即接過口號乘勢而上，大呼也要造反和立即奪權，並由和副處長手下的人發出“特急呼籲”，要求立即成立以和副處長“為首的新的領導班子”，這不僅使報社相當多數人都以為“突擊隊”大字報是為和副處長等的奪權上臺製造輿論的，也使以和副處長為首的那一批人，因為錯估形勢而深受鼓舞得意非凡，迫不及待地亮出了底牌，結果卻使真正在造反要奪權的肖力及其“突擊隊”，立刻驚覺到和發現了和副處長等人所以支持他們的真實意圖，他們已被別人利用來成為人家

奪權上臺的開路者。“一代天嬌”的“紅色公主”，豈能做個為別人搖旗吶喊的“馬前卒”？正是出於這一內情深因，肖力一反進軍報以來對和、宋二副處長等的尊敬友好態度及其親密“無”間關係，於一·一三當夜發出對以和副處長為首一派的“強烈抗議”，突然公開表明與他們“從來不是一回事”，並堅決與他們劃清了界限。這就使軍報內的形勢急轉直下，發生了令所有人大吃一驚的劇烈變化。

肖力貼出大字報的一·一三當天，她與釣魚臺特別是其老娘處，進行過什麼聯繫作了哪些報告請示，別人當然概不知情，只知道她立即查封了應屬“中央文革”的“快報組”，並同意軍報的人去釣魚臺揪回已在“中央文革”工作的軍報幹部，“中央文革”不僅將軍報要揪的人及時送了出來，還傳達江青的指示說，讓他們都回去參加軍報內部運動，並且連宋副處長和“胡代總”等人，都不必再來“中央文革”，實際是不准再進釣魚臺，將他們全都一腳踢出了“中央文革”。這一連串如此重大的“組織措施”，當時參加工作才幾個月，實際還不是黨員的肖力（據說她是由“中央文革”特批入黨的，並未經過任何完備組織手續的特殊黨員），她個人不可能也根本沒有這個膽識和權力，果斷下令幹這些事，所以肖力在軍報的各項行動，實際都是江青在釣魚臺內指揮、遙控和操縱下作出的。可是當時的軍報，不僅幾乎全社包括“高炬”隊特別是“古田”隊的人都被蒙在鼓裏，連曾受“中央文革”和江青、陳伯達等信任重用的“胡代總”和宋副處長等人，都成為“被人賣了還幫著數錢”的大傻瓜和糊塗蛋。在軍報成立以和副處長“為首的新的領導班子”的圖謀，遭到了全社絕大多數人的堅決反對，以肖力為首的“突擊隊”突然表態，肯定和支持了軍報的“廣大革命群眾”，從而粉碎了“胡、和、宋小集團”的“奪權陰謀”，也就在此各派蜂起山頭林立又似群龍無首之際，以“高炬”隊為代表的軍報一些“筆桿子”們，也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終於可以使他們取而代之了，就乘機提出醞釀成立將以他們為主的軍報“新的領導班子”的“倡議”，正要出籠卻又被肖力及時識破，不只將他們也一下打了回去，並且還要追查其背景和目的，號召將他們“倡議”的“背後的鬼揪出來”，致使“高炬”派中有的人

後來也被“隔離審查”和關押批鬥，成了與“胡、和、宋小集團”成員同樣的“專政對象”。這雖然又是後話，但也表明了一點，在肖力到軍報以後，報社內任何人企圖背著她或越過她在軍報奪權上臺，都將絕對不能容忍且必遭垮臺覆滅的命運！

在粉碎“胡和宋小集團”的“奪權陰謀”之中，還有個雖事出有因卻查無實據的不小疑案，就是據說他們曾策劃在軍報上拋出一個什麼“政變社論”。此說當時似乎並非無稽之談。按照一·一三早晨“金猴”隊的《特急呼籲》宣稱，“從今天起，報紙宣傳由新的領導班子和革命左派來辦”，為此自以為即將上臺主事的和副處長，當仁不讓地出面主持和指導了將於次日見報的社論文稿。向來辦事圓通的和副處長，在這個社論的起草班子裏，除了有屬於他手下的記者處的“左派骨幹”，還特意吸收了“突擊隊”中的“小將”，參加對此社論的修改和定稿。這一社論以《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為題，於一·一三當夜發排，並於一·一四公開見報。發表後並沒有人說這篇社論有什麼問題，事實上這篇社論從內容到提法，都是按照三天前得到林彪、江青批准的、由“中央文革”的關鋒、王力和原軍報的唐、胡兩位“代總”聯名上報的《關於軍報宣傳工作的請示》中的精神，加以引申發揮寫成的。其要害之處是一句話，即“在我們軍隊裏，確有那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這些人已經成為“文革”的“主要阻力”，因此必須將他們“一個一個地揪出來，把他們徹底鬥倒、鬥垮、鬥臭。”這句話後來被概括為“揪軍內一小撮”，也就成了一個“反黨亂軍”的反動口號。不過當初由於這一口號來自剛被林彪、江青批准同意的正式文件中，所以在軍報社論中公開提出以後，並未馬上被認定是什麼“陰謀”。但是顯然因為“陰謀奪權”的和副處長參與了此事，有人認為其中必有問題，說不定是為他們奪權上臺而寫的“造反宣言”和“告全軍書”之類。雖然這篇社論已經見報發表，也不知他們還搞了別的什麼未發的社論或文告沒有，一些人卻對此猜測推斷、捕風捉影，說成了“胡、和、宋小集團”的又一重要“陰謀”，以致上了經過毛澤東批示的林彪指示信中。關於林彪的

“指示信”，其來由發生於一·一三以後三天。

在一月十三日連續二十四小時以上的緊張事件後，全社上下異口同聲地對“胡、和、宋陰謀小集團”發起了全面的揭發批判，原來被認為是“高舉紅旗”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胡代總”，不僅成了“陰謀集團”的總頭頭，更成了“一貫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兩面派”等等，和、宋二位副處長作為“陰謀集團”主將，也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他們的各種劣跡醜行特別是“罪惡”，都被人們翻倒出來和公之於眾。那宋副處長在軍報似乎本來人緣不佳，對他的揭批更為兇狠尖銳，簡直成了個十惡不赦的“陰謀家、野心家”，總編室的胡副主任，原來與他同在軍報駐南京軍區記者組，胡副主任寫大字報說，宋早就是“野心家陰謀家”，他在南京時就曾“陰謀顛覆”胡的記者組長職務。我看了只覺得好笑，宋的“野心”也太小了，他那個小小的組長位置，值得人家去“陰謀顛覆”嗎？那和副處長過去算是少露鋒芒，有時給人印象不錯，這時卻被人批得“頭頂生瘡，腳底流膿——壞透了！”在我國政治生活和黨內鬥爭中，一直有個不良傳統，就是每逢運動中有誰出了問題，就馬上“牆倒眾人推”，一齊對被鬥者大潑污水甚至落井下石，其中雖有出於“革命義憤”者和不得已隨大流者，但也有借機泄私憤報私仇者。在“胡和宋小集團”中有個名列最末者，他原是文化處編輯，“文革”中忽然成了“左派”，也進了釣魚臺，在報社揭發“反動路線”問題時，我得知他曾力主狠批我的“毒草”小說和“反動”言論，並說與我的鬥爭就是“階級鬥爭”，這時他一下陷入“小集團”之中，成了人們批鬥攻擊的目標之一，我不由幸災樂禍地認為“你也有今天”，就在他交代自己問題的大字報上，貼小條子批註並稱他為“走狗”道，你說你們與我是“階級鬥爭”，那麼你是什麼階級，我又是什麼階級？表示你現在已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派”了，我卻成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其實我們誰也不是什麼“資產階級”，我們之間的“鬥爭”完全是一種同志之間的“自相殘殺”。後來這位同志也因為是“小集團”成員處理出軍報，受了很多苦，我為自己也曾傷害過他總是於心不安。

當時還發生過一件與軍報奪權事件有關的事，在“一·一三事件”前兩天重新改組的“全軍文革”中，除組長、顧問和副組長外，共九名組員中就有軍報的三個人，即唐、胡二位“代總”與和副處長，不料兩天後這三人忽然被揪出了兩個，僅剩下一個“唐代總”。這時他正在《人民日報》社，與軍報的“奪權陰謀”本無直接關係，但是眼看自己的一個老搭檔、老戰友和一個“接班人”，被一下子一齊“打倒”了，不得不設法營救以“拉兄弟一把”。就在事發後的一天，“唐代總”以“全軍文革”成員的名義，召集軍報一些人開了一個會，去的人都是他事先指定的，除了幾個原報社黨委委員和中層領導幹部外，主要是“高炬”隊的幾位“筆桿子”，全是軍報原有的一些重要或特殊的人物，包括我在內的普通編輯和一般幹部，自然不在其中，所以我和社內多數人一樣，只是聽人事後揭發和說出了此會的情況。據說“唐代總”在會上先表示是“胡代總”在軍報把事情搞壞了，但又為他作了解釋，還說他在“中央文革”中還是“思想敏銳轉得快的”，並非什麼都是錯的。可現在連“快報組”的人都不是好人了，他希望人們“不要誤會”，說在“胡代總”擬定的軍報新領導班子中，就有應召來開會的幾位，說明並沒有把他們給甩了，說自己和“胡代總”一直是重視和信任他們的，軍報以後還是要依靠他們的等等。因為這些話我只是從第二手，甚至第三、四手材料中瞭解到的，這次會上“唐代總”和蒞會者到底是怎麼說的，我也搞不清楚，只聽不少人議論和分析說，這實際上是一個“保胡”和“救胡”的會議，企圖挽回“胡代總”造成的敗局，多少保住一點唐、胡二人共有的發跡之地和後方基地。可惜這樣做已經晚了，反而暴露了“唐代總”與軍報的“奪權陰謀”並不是毫無關係，他至少也是知情者甚至是參與者之一，而且他是“盜用全軍文革名義”來保胡，實際上是為了保自己，他和“胡代總”本來就穿著“連襠褲”，一直是“狼狽為奸”密不可分。結果這次會議不只沒能保住胡，反而是他自投羅網，使自己成了軍報的又一揭批對象和攻擊目標，由於他和“胡代總”以及另一位副總編，不僅是軍報老班子的領導核心，又都是一起從西南軍區來的，就被人們攻為“唐胡呂一夥”或“唐胡呂集團”甚至“唐胡呂

死黨”，一齊陷入了軍報的“文革”烈火之中。

這樣，在軍報內就掀起了大揭發、大批判和大揪鬥的第一個高潮，其鬥爭對象不僅有“胡、和、宋集團”，還有“唐、胡、呂死黨”，又加上許多曾經追隨緊跟他們的“紅人”、“骨幹”、“走狗”及“爪牙”等等，從而形成了一場“橫掃”性空前激烈的大混戰。軍報的嚴重事態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一批又一批軍事院校、軍隊文藝單位和軍兵種機關的造反派們，不斷來到軍報探聽情況，有人指名要找或揪“胡代總”和宋副處長等，說他們在“中央文革”與中央首長一起接見造反派時，或在別的什麼問題上，也有什麼什麼錯誤甚至罪行，要來找他們算賬。這些人在軍報辦公樓和大院內到處鬧到處鑽，很可能又會引發什麼事端鬧出什麼問題來，有人就向上告急，要求總政迅速來處理，總政只得派來了一位袁副主任。這位袁副主任已是個龍鍾老人，本來就行動緩慢反應遲鈍，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他到後被軍報的人們圍著，既要聽這個情況又要答那個問題，弄得他無所適從甚至張口結舌。文化處有位不老的“常老”激動得哭著說，軍報現在亂成這樣，總政不能不管，蕭主任應該自己出來處理。也許是袁副主任回去這樣彙報了，蕭主任果然接受意見，於一月十六日晚上在三座門接見軍報群眾代表。“突擊隊”和一向“代表群眾”的“高炬”隊，都派代表去了，“古田”隊和其他一些“戰鬥”組織，也推選了參加者，不知怎麼的，我也跟著去了。我記得印象中蕭主任說，報社的運動形勢“好得很”，他表示“完全支持”，認為胡、和、宋等人確是在搞“奪權陰謀”，對胡、唐二“代總”都要“燒一燒”，說自己過去看錯了他們，歡迎大家對他批評。他講話後“高炬”隊的人慷慨激昂地說了“胡和宋”及“唐胡呂”等人的嚴重問題，有人提出，“胡和宋”等正被“隔離”在軍報院內，很可能會被外單位的造反組織劫持走，甚至引起對報社的衝擊，把軍報搞得更亂。蕭主任聽後當場表示，很快由北京衛戍區將軍報揪出的人都“監護”起來。會上還有人說了別的事，但“突擊隊”的人並沒有說什麼，似乎是一種觀望態度。蕭主任接見當夜，我們從三座門回到報社不久，就見衛戍區來了幾輛吉普車，將“胡和宋小集團”主要成員都

“驗明正身”押上車帶走了。把他們關到衛戍區去，其實是個好事，因為報社內事先並沒有準備“牛棚”，揪出的人就關在空屋裏，隨時都有人進去斥罵他們一頓，或者被人拉出來批鬥一番，進了衛戍區至少有床鋪睡覺和三頓飯吃，也不會老是挨鬥挨罵，反而被保護起來了，所以叫做“監護”。

由總政和蕭主任出面處理軍報的事，似乎是由於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因為“一·一三事件”發生後，從林彪處和“中央文革”就曾來過人，並且是我把他們領進報社的。印象是十四或十五日午，我因為報社內的緊張鬥爭，不免又累又困，就乘空溜出辦公樓，想悄悄回家休息一下，哪知一出辦公樓門，就碰上幾個剛從小車上下來的人，主要是一男一女，那男的雖然穿著一身軍衣，卻又瘦又小象個大煙鬼似的；但那個穿軍衣的女人卻很富態頗有派頭，身後還跟著警衛或秘書似的人員。一個為他們開路的人見我就問，是不是軍報的人，我答是後，他說他們是軍委來的，要看看軍報的大字報，我就把他們讓進門，指著門廳中那張“突擊隊”的巨型大字報說，這是主要的一張。他們在那兒看大字報時，我在一邊悄悄打量著，只覺那女的有點面熟，仔細看後發現她就是林彪夫人葉群，我曾在一次什麼大會上看見過她。這位夫人兼要人來到軍報，馬上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就跟著他們，在他們看完樓下的大字報後，又告訴他們上面還有別的重要的大字報，並且把他們領上了樓，將和、宋等人的“奪權”大字報指給他們看。他們正看著，我見肖力出來了。不知她是偶然出來碰上葉群他們，還是與他們早已聯繫過，才適時出來迎見的，我就搞不清楚了。他們顯然是互相認識的，一見面就相互熱烈握手，這時我又聽出，那個瘦小男人就是正走紅的“中央文革”成員、已被林彪任命為總政副主任的關鋒。只見肖力一面和葉群、關鋒二人親切交談著，一面將他們領走了，我想這本來沒我什麼事，就自己下樓回家了。據說肖力和他們一起密談了不短時間，其內容我當然一無所知，只在到家後，悄悄告訴妻子說我剛才看見誰誰了，還是我把他們領進辦公樓，甚至引導他們看大字報的，似乎為自己親見並接觸這兩個名人要人，感到十分榮幸。不過對別人我卻從未說過這次“奇遇”，

自以為我並不想藉此巴結他們或炫耀自己。不過當時沒有想到，葉群、關鋒的親臨軍報，使報社已經發生和正在進行的“偉大門爭”，又上升到一個更新更高的階段，不僅由“林副統帥”直接出面，對軍報“革命同志”的“造反行動”表示“堅決支持”，更由此獲得了偉大領袖表示“同意”和叫“好”的光輝批示。這就是林彪於一月十七日給軍報“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此處將專寫此信的內容、反應及其後果。

林彪寫信，毛主席批示，支持“小將”， 又造成了軍報的更大動亂。 衝擊報社，“接管”不成， 引發了駭人聽聞的“一·二〇反革命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是《解放軍報》社“文革”史上又一個重要而“光輝”的日子。這一天，偉大領袖親自批示了“林副統帥”親自簽署的《給解放軍報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當天晚上，軍報院內突然出現了一股少有的莊嚴凝重氣氛，不少軍人進進出出並低聲招呼著什麼，報社的全體人員都被召喚到樓上的會議室裏。我和許多人正不知又發生了什麼事，只見新任“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元帥，在“林辦”主任葉群和總政主任蕭華及關鋒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了。先由葉群宣佈說，林副主席於今天給軍報的革命同志寫了一封信，他在報送給毛主席時附言道：“主席：解放軍報的問題是否如此答復請批示。”毛主席收到後立即作了批復：“同意，這樣答復好。退林彪。”葉群宣讀林彪附言和主席批示後，接著宣讀了這封信的全文：

給解放軍報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同志們：

解放軍報社由肖力、方撫時、孫浩剛、李志高、宋玉芬、武將、

楊秉文、劉福山等八位同志組成的革命造反突擊隊，在報社內部點起了革命火焰。你們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你們的行動，好得很！我堅決地支持你們！

解放軍報，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報紙才能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為了照顧人民解放軍的威信，照顧國際影響，對於解放軍報要採取“內批外幫”的方針。在報社內部，革命烈火燒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採取《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做法，不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解放軍報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軍書之類的東西。以胡癡為首的小集團要那樣做，完全是個陰謀。對於這個陰謀必須揭穿。對胡癡等人，必須徹底揭露，徹底批判。報紙的社論、評論，責成總政蕭華同志、關鋒同志負責，重要的社論、評論，送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審閱。

解放軍報是保護單位之一。你們要耐心勸說學生和其他機關的幹部，不要到辦公大樓上去。你們可以在辦公大樓外邊設接待站，接待來訪的學生和幹部，聽取他們的意見和批評，歡迎他們送大字報。勸說他們不要到解放軍報社揪人，要相信報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林彪

葉群宣讀完此信後，全場齊聲熱烈歡呼，“最最敬愛的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彪和江青也“永遠健康”等等。我在聽宣讀時暗自想道，林彪這封信很可能出自關鋒筆下，因為兩天前正是他與葉群一起來報社看大字報，又與肖力交談過，此信顯然是他們那次來後的結果。毛主席和林彪對軍報問題反應如此之快，又採取了這種方式，可見他們對軍報的重視，像這樣能直接“通天”的單位，在全黨全軍和全國確是極為有限的。在葉群宣讀了全信，全場又連呼“萬歲萬萬

歲”以後，徐帥也講了話，他說自己是根據毛主席批示和林彪的信講的，說軍報在林彪主持軍委以來，是高舉紅旗並享有聲譽的，只是後來由於“胡癡小集團執行了劉鄧反動路線”才降下來，使報社同志起來造了反，但是軍報有國際影響，不能如《文匯報》等那麼搞，希望大家遵照毛主席和林彪的指示，把報社運動和報紙搞好，也說了把革命之火燒得越旺越好的話。徐帥過去很少出面講話，我想他現在作為“全軍文革”組長，這些話也是不得不說的。蕭華主任接著講話說，今天宣讀的信“說明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對軍報的關懷”，報社同志過去做了很多工作，後來胡癡等搞陰謀活動才出了問題。他說自己對軍報的問題“有一定責任”，原來有些情況不清楚，說錯過一些話，現在承認錯誤，表示“收回”，並堅決支持報社同志起來“造反”等等。閻鋒最後也大講了一通，他先將林彪的信吹捧解釋一番後，說自己過去不瞭解胡癡，後來通過一些事後感到他“有個人野心”和“耍兩面手法”，並且是“跟劉志堅走的”，軍報在他的主持下，“推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還“搞陰謀，開黑會，佈置假奪權”，才使肖力等“革命小將”起來造反，大家“要向小將學習，徹底揭露胡癡陰謀小集團”等等。我發現閻鋒此人特別能說，人雖十分乾瘦，話卻特多特長，什麼對軍報要“內批外幫”，沒有了胡癡的軍報會辦得更好，要“堅決地毫不含糊地支持革命左派”等“革命高論”，從他那被香煙熏黑了的牙縫裏和三寸不爛之舌下，滔滔不絕地噴吐而出。

由徐帥和葉群、閻鋒等傳達、宣講毛主席批示與林彪的信後，軍報全社掀起了“熱烈歡呼”和“堅決擁護”的熱潮，各種“表態”大字報、大標語，使辦公樓內外到處都貼滿了。不過明眼人都能看出，林彪此信所“堅決支持”的，其實僅僅是以肖力為首的“突擊隊”，是他們而不是全社的“革命同志”，“在報社內部點起了革命的火焰”，是他們也只有他們才能“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報社全體同志能夠分享到的，只是全社從此永無寧日的大亂，不過“亂不要緊，亂然後才能治”，全社同志也只有“在亂”中等著被人來“治”了。當然，當時大家也只說全社同志該如何如何，雖然所有的人包括與徐帥一起來報社的

總政主任蕭華，甚至徐帥自己，當時也不知道軍報將來到底該由誰來“治”又怎麼“治”，更不知道為什麼在以後一段時間內，軍報不僅是誰來也“治”不了，並且是誰來“治”就打倒誰，上一個就倒一個，致使軍報一直在“亂”著。所以當初人們對林彪的信，其實並未真正領會，誰也沒有摸到林彪等的“底牌”，只能“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要執行”，如果“執行”不了，只跟著“歡呼”和“擁護”也就行了。不過有的人不只是被“執行”，而是被“執刑”了。

在林彪的信中，又將“胡癡等人”不只稱為“小集團”，而且說“是個陰謀”，這就將他們正式定性成了個“陰謀小集團”。尤其嚴重的是，又說他們居然要搞什麼“革命造反宣言、告全軍書之類的東西”，這本來是捕風捉影並無實據的事，林彪信上這麼一說，其實也就是關鋒的筆頭子隨手一抹，這就成了鐵定的“罪行”，搞了這些“陰謀”的胡癡及其“小集團”，也就從此被“打翻在地”，並且“永世不得翻身”了。雖然就在這時，全社上下包括我在內的人，不止一個對此都心存疑問，但是在林彪信上所說“對胡癡等人，必須徹底揭露，徹底批判”的號召之下，一個個不得不都投入了對“胡癡陰謀小集團”的大揭大批和大鬥之中。

林彪信上的最後一段話，即說軍報“是保護單位之一”，外人不得進辦公樓去揪人，這是針對當時已出現的嚴重情況說的。“文革”以來特別是“一·一三事件”以後，軍報已成了萬眾矚目的熱點單位，不斷有各地各部隊和各單位的造反派們，來軍報探詢、串連甚至也想揪人。林彪的一·一七來信，雖然明令只在軍報內部傳達和張貼，不得轉抄和流傳出去，實際上卻是一下子就傳遍了全國上下和四海內外，這使軍報又吸引來更多的人。一月十八、十九兩日擁進軍報院內的以軍內造反派為主的人更多了，這兩天我為了“抓生產”保證出好報，自動跑到美術學院和美術出版社，找回來一批關於“文革”特別是“奪權”的宣傳畫和版畫作品，又將這些畫作了挑選和編改加工，送交各版備用發稿，所以有些“鬥爭”活動就未能參加。一月二十日上午我很晚才到辦公樓，去後見許多人都沒在，打聽後說是大都上總政看大字報去了。不久有人從總政回來說，“中央文革”將蕭

華揪出米了，陳伯達批判蕭華“是紳士不是戰士”等等，已有造反派抄了他的家，總政也貼出了打倒他的大字報和標語，報社有的人就積極地也要揭發蕭華的問題，其實人們並不知道他多少事，就將聽來的和從總政大字報上抄來的一些事拼湊了幾條，寫了一分題為《打倒篡軍反黨野心家蕭華》的大字報，讓我用大字寫了標題，由別人抄寫正文。哪知這張大字報貼出後當天，軍報社發生了一起新的重大事件，所以它貼出來幾乎沒有被人看到。不久中央又公開保護蕭華，還要抓什麼“反蕭逆流”，我不由為之慶幸，幸虧那大字報被人忘了，不然我們也都成了“反蕭”的“逆流”了。使我們逃過這一關的又一事件，是從這天中午開始發生的，此事不僅成為軍報的，更成為扯進許多軍隊院校造反派的，據說是以“綁架和暗害肖力同志”為目的，引起“江青同志無比憤怒”的“一·二〇反革命事件”。

此事其實是一個既有驚險故事和喜劇情節，又有鬧劇色彩，更有悲劇結果的“文革”醜劇。儘管我並未被直接捲入這一事件，但在事後也奉命詳盡交代了當時所見所聞特別是曾參與的一切活動，這一交代材料後來被偶然保存下來，成為我回憶此事的最重要也最具體的確切依據。據我的交代材料記述，一月二十日“中午我發現來了很多部隊院校的人，一吃完飯我就回到辦公樓來，見外來的人越來越多，後來聽說他們要接管報社”。原來當時各地包括軍事院校的造反派們，在上海“一月風暴”大奪權成功的形勢鼓舞下，也到處去奪權。一月二十日凌晨，裝甲兵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的頭頭，得到他們派駐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三司”聯絡員的報告，說北京的紅衛兵組織正在接管《人民日報》社，已經得到“中央文革”王力、關鋒等的支持。“紅造”的頭頭認為既然地方院校紅衛兵能接管《人民日報》，軍事院校的造反派也應該接管《解放軍報》，馬上就聯絡並串連了七個正在北京的造反組織，發動和糾集了一千多人，先在裝甲兵部機關大院召開了準備接管軍報的籌備和策劃會議，成立了一個“接管解放軍報社臨時指揮部”，以統一組織指揮這一行動，又議定了一些“接管”方案和行動計劃。二十日中午出現在軍報大院的外來造反派，正是在這個“接管指揮部”調動下來到的。

當時所說的北京紅衛兵接管《人民日報》並得到支持的事，雖曾有其事卻又被誤傳得走了樣，致使被煽動鼓舞起來的另一些造反者，即軍事院校的學員，也就是些男女娃娃們組成的造反組織，見風就是雨地想乘機撈一把，也到似乎神秘的報社來風光一番過把癮，就熱血沸騰實際是熱昏了頭地策劃並進行了“接管”軍報的“革命行動”。他們已經瞭解到，軍報內的主要造反組織和革命左派，是以肖力為首的“突擊隊”，要“接管”軍報必須與他們聯繫合作，專為“接管”軍報組成的“臨時指揮部”，就派出了一個“先遣組”於當天中午進入報社，以找“突擊隊”來“反映情況”為名，實際上要與他們協商談判“接管”軍報的事。這時報社內的各個群眾組織，包括“突擊隊”和“古田”、“高炬”等隊在內，成立了一個各隊聯席會議性的“聯絡站”，以協調處理社內運動中的一些事情，由於“突擊隊”的人尤其是肖力從不輕易出面活動，“高炬”隊的人本來就是一些年齡和資歷都較老的“筆桿子”，不甘做一些跑跑顛顛和出頭露面的瑣事，許多接待串連、應付外來人員和對外聯絡等事務活動，就大都推給比較年輕又職級不高的“古田”隊成員承擔。一月二十日這一天，他們又被推上第一線，當他們同那“接管指揮部”的“先遣組”接觸時，對方執意要找“突擊隊”的人，“古田”隊作為“聯絡站”的代表問他們到底有什麼事，表示自己可以負責轉告“突擊隊”。但是對方堅持不見“突擊隊”的人什麼也不說，“古田”隊正值班管接待的同志，只得找“突擊隊”說來人一定要見他們，“突擊隊”內就派出“小將”之一的李志高，作為代表出來與來人接談。李志高將他們領到軍報食堂裏，圍著飯桌交談起來。他們具體是怎麼談的，由於沒有別人在場，我更是毫不知情，只是後來聽說，來人提出“接管”軍報的問題，李志高說這樣的事應該向中央和軍委報告，他們隊不能與人協商談判此事，接著就中止了“會談”，雙方都離開了食堂。

哪知從中午一時起，由各個軍事院校聯合組成和各方糾集來的大隊人馬，已經打著各個造反組織的隊旗和大幅標語，浩浩蕩蕩又紅旗招展地開進了軍報大院，很快就把報社辦公樓密密層層地包圍起來，一些“先鋒戰士”正要往裏衝，宣稱不論報社的人同意不同意，

他們也要來“接管”軍報。正在辦公樓內的報社同志，認為這是違反中央和軍委規定，特別是林彪一·一七來信指示精神的，決不能聽任他們來“接管”，也不能讓任何外人衝進來，有人招呼大家都去堵住辦公樓大門。我在原交代材料中寫道，我便和大家堵住樓門，我在東側的玻璃門邊，我前面有王金和一個炊事員同志，只見有一個軍事院校造反戰士用拳頭一下砸碎了玻璃門，他不顧自己鮮血淋漓的拳頭，一躍爬到了我們身上，接著就踩著正密集地擠在門口的報社同志的人頭和肩膀，爬向辦公樓裏，後面又接二連三地爬上來好幾個，我們抬手連推帶擋想把他們拉下來，他們就用雙腳又踹又踢，硬是爬了進去。在大樓門口，就這樣進行著衝擊和保衛軍報的肉搏血戰。在我身前的那個炊事員同志大聲斥責那些造反者們，結果招來了大聲回罵和拳腳痛擊，我知道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了，只能在門口多少頂一會兒，就對那炊事員說，我們不要理他們，這些人誰的話也不聽。有個正往裏衝的造反者聽到，指著我喊道：“把這傢伙揪出來，不准他們煽動頑抗！”只見門外的人七手八腳，先把第一排的幾個同志，幾個人拽一個硬拖了出去，裏頭的人就用胳膊互相勾著進行阻擋，但是外頭的人太多，又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他們抓住一個齊喊“一、二、三！”幾下就拽出去一個，我也被他們象拔蘿蔔似的，從人堆裏被“拔”出門外，又被你推我搥挨了幾拳。我乘他們又在使勁往裏衝，連忙鑽出人圈“突圍”到一邊，只見報社同志，已被他們拉出了好幾個，十九歲的女打字員小劉，她是“古田”隊來保衛樓門的，領章帽徽全被人揪掉了，氣得她小鼻子和滿臉通紅。我一抬頭，看到大樓頂上也滿是人，原來造反戰士們沿著印刷廠那邊牆外的消防長梯，爬上了辦公樓頂，底下的人遞上去許多面紅旗，佔領樓頂的造反者們，就一面揮舞戰旗一面大聲呼喊著，此情此景，使我一下想起蘇聯電影《攻克柏林》中的生動鏡頭，攻佔德國國會大廈的紅軍戰士，也是這樣地揮舞紅旗並歡呼著勝利。可是眼前的景象使我覺得既可氣又可笑，這些小夥子們倒是一副英雄氣概，可惜他們“攻佔”的根本不是“法西斯據點”，反而是一直“高舉紅旗”的“無產階級輿論陣地”，他們的勁頭確實不小，只是都使錯了地方。

這時辦公樓大門已經被造反者們衝開了，他們呼喊著一齊往裏擁，我們被拽出來的人，心裏焦急地想，樓內不知會被衝成什麼樣子了。後來聽說，當造反者衝到三樓時，“中央文革”已經得到軍報被衝擊的報告，下午三時，傳來陳伯達的一個名為“緊急通知”的電話指示：“解放軍報只能由本單位革命派自己鬧革命，外單位都不得衝，違犯者，就會犯錯誤。陳伯達二十日下午三時”。但這未能阻止造反者的行動，人們還是不斷往上衝，雙方又在樓內和梯口堅持對峙了半小時，“中央文革”只得發來陳伯達的“二次緊急通知”，全文如下：

解放軍報社內部革命派前幾天已經自己鬧革命，外單位又去衝，又去鬧，這在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外單位革命派可以提意見，但要照顧大局，照顧解放軍的偉大榮譽，請衝進去的外單位同志，再三思考，深思熟慮，我的意見，以退出為好。這也是照顧你們，有問題以後再派代表商量，祝同志們好。我建議，你們退出比較妥當，不然報社不好工作，這是好意的建議，請同志們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中所告訴我們的革命方法，嚴格遵守無產階級的革命紀律！避免犯錯誤。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陳伯達

二十日下午三時半

當時身任“中央文革”組長的陳伯達，號稱中國黨的“大理學家”和主要“筆桿子”之一，然而此人實際上是個猥瑣小人，上面這兩段囉里巴嗦得語無倫次的“指示”，就可見他的本來面目及其“才華”，但是正是這種角色，“文革”中居然成為中共中央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這簡直是對中華億萬同胞和中共千萬黨員的莫大嘲諷，也暴露了“文革”運動是如何的人妖不分與倒行逆施。卻說一月二十日下午，陳伯達的兩個“緊急通知”傳到軍報後，馬上被抄寫出來，由“突擊隊”的宋玉芬，就是特地調來專門陪同和護衛肖力的那位女同志，還有“古田”隊的田曉光，這也是個

女同志，由他們二人一起，向衝擊者宣讀陳伯達的兩次“指示”，衝擊者們不相信這真是陳伯達說的，就責問這兩個“緊急通知”是怎麼來的？當時有個臨時借調來軍報的海軍同志，為了鎮住來人就喊道：“這是肖力同志拿來的！”衝擊者又問：“肖力在哪里？”那海軍同志其實並不認識肖力，就指著也是“突擊隊”的宋玉芬道：“就是她！”人們馬上圍上小宋道：“你是肖力嗎？”小宋連忙聲明：“不是，我叫宋玉芬！”她說著又拿出了貼有自己照片的記者證，人們一看果然叫宋玉芬，又責問那海軍同志，為什麼把小宋說成是肖力，那同志只得說自己認錯人了。衝擊者們更加不信所謂陳伯達的“指示”是真的，有人就硬逼著小宋和田曉光像人質似的，和他們一起找“中央文革”去核實“緊急通知”的真偽，她們倆個只得被幾個造反者拉走了。我在很久以後從一份材料中看到，“押解”小宋和田曉光的是兩個女造反戰士，一個是第四軍醫大學的學生田敏，一個是第七軍醫大學的學生劉鳳，他們押著小宋和田曉光，四人共坐一輛小車，先去了中南海西門，那裏只有國務院的接待站，又去了天安門東側勞動人民文化宮，找到設在那裏的“中央文革”接待站，但“中央文革”根本不在那裏，無法核實陳伯達的“緊急通知”問題，造反者們找不到“中央文革”更見不著陳伯達，轉了一圈只得把小宋和田曉光放回了軍報。

以上這些情況，我是以後才逐漸知道的，當時我正被堵在辦公樓外頭，雖然既耽心又著急，卻無計可施。由於我就住在辦公樓對面的宿舍樓裏，就邀了幾個人悄悄去我家，想等著看看情況將會如何發展，但大家誰也坐不住，說我們不能就這麼呆著，軍報發生這麼嚴重的問題，應該馬上向上面報告，最好找“中央文革”去。其實那時早已有人從辦公樓內向“中央文革”打了電話，陳伯達正是根據電話報告，才連續傳來兩個“緊急通知”的，但是我們在外頭的人，根本不知道這些情況。我們幾個人簡單商量後，決定有人去附近的《解放軍畫報》社打電話報告，有人直接去“中央文革”報告，因為報社院子大門全被造反者們包圍封鎖了，裏頭的人誰也出不去，正好宿舍樓後面有個專門送牛奶和出垃圾用的小門，我們就從那裏鑽了出去，

出門後見印刷廠的一輛吉普車停在那裏，就讓那吉普車將我們送到釣魚臺找“中央文革”去。我就跟著兩個同志一起去了。車到釣魚臺門口，見軍報已有一輛大轎車和住在西直門宿舍的人在那兒，其中還有呂、張兩個副總編，原來他們是在下午上班時，見軍報已被軍事院校造反派包圍佔領，他們進不去也不敢進去，就將車開到釣魚臺來，請求“中央文革”設法為軍報解圍，只是他們不知院裏的情況，我們到後，他們讓趕緊向“中央文革”在門口的值班人員作了報告，然後和他們一起等在門外，看看“中央文革”是否會有指示。當時已是下午四點多鐘了，有人說不能這麼多人都在這等著，讓大轎車還是先回西直門宿舍去，但呂、張二副總編可以留下再等等。大車走後，送我們來的吉普車還在，有人說不如回軍報看看去，看有否什麼新的情況，就讓我坐上車回報社去，到後大門還是進不去，連小門也從裏頭堵上了，轉了一圈也不得其門而入。我就找到個有電話的地方，想打電話進報社問問情況，考慮到辦公樓已被衝擊者佔領，我把電話打到了報社食堂，接電話的是管採購的邵忠，他說辦公樓裏全是外來的造反者，外頭的人進不去，裏頭的人也出不來，不知道那裏到底怎麼樣了。我只得又坐上吉普車再開去釣魚臺，向守在門口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報告了與邵忠電話通話的情況，那人讓我用他們的電話，再打進報社去問問陳伯達兩次“緊急通知”傳去後，有什麼反應和變化。我還是把電話打到了食堂裏，誰知接電話的已不是邵忠，問他是誰不僅不說，還兇狠地反問我是什麼地方的什麼人，打電話有什麼事？我一聽不對頭，正想放下電話，“中央文革”的人要我說自己是“三座門”的，看看他怎麼說。“三座門”是軍委所在地，似乎可以鎮得住對方，我正想照他說的去做，就見關鋒急急地進來問我們道：“你們是軍報的人嗎？現在都跟我回去！”

這時天已全黑了，門外停著好幾輛小車，關鋒上了一輛裝有廣播喇叭的車，關鋒的秘書讓我跟他上了關鋒自己的車，我已經見過關鋒，送我來的那輛小吉普載上軍報其他人，在關鋒坐的廣播車開路下，一起向軍報直駛而去。車隊接近軍報大院門口時，廣播車中不斷喊出：“我是關鋒，我是關鋒，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來處理軍報的問

題，請同志們讓我進報社去！”他連喊幾遍後，堵在門口的人讓出一條通道，使我們的車都開進院裏，只聽關鋒又通過廣播喊道：“我現在要進報社辦公樓，請來報社的群眾組織，派出代表與我會談，讓我瞭解情況處理問題。”這話他又重複了幾遍，只見守在辦公樓門口的造反者也讓出了路，關鋒從廣播車裏出來後，他的秘書和我也迅速下了車，跟著關鋒進了辦公樓，造反者的代表迎接了他，和我們一起到了樓上的大會議室，關鋒和他們坐下就開始會談，我們別的人都站在周圍聽著。只見關鋒一一問了那些造反組織代表的姓名、單位和組織名稱等等，我注意到為首的是裝甲兵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的一個學生，他不僅與軍報民兵處一個編輯，還與電影《小兵張嘎》中的胖翻譯官演員同名同姓都叫“王澍”，所以我一直記住了這個名字。關鋒聽他們說了自己的意圖目的與打算，又詢問了他們一些事，接著根據林彪一·一七給軍報的信，和陳伯達於下午發來的“緊急通知”，指出他們今天的行動是違反林彪及“中央文革”指示的，造反派代表們雖不服氣卻不得不聽著。

我見關鋒乘機叫過他的秘書，小聲說了一些什麼，那秘書就讓我帶他去打電話，我領他去了一個有電話的辦公室，他說要找我打保密電話的紅機子，我就將他領到總編室的機要秘書辦公室，讓他使用那裏的紅機子，自己又自覺地退到門外，讓他關上門在裏頭打電話。乘那人打電話時我又回到樓上的大會議室，見關鋒已與造反派代表們談妥，所有來報社的群眾組織，先將各自的隊伍撤出軍報回到原處，留下各個代表與關鋒繼續談判。於是，那些衝進和包圍佔領了軍報的各路人馬，在自己代表與關鋒的協議下，陸續下樓列隊全部撤出大院，停止了他們“接管”軍報的行動。這種包圍佔領的狀態一解除，關鋒就更神氣更來勁了，只聽他和留下的代表們激烈地爭論起來，主要內容是對軍報能否“接管”的問題，這時我再一次領受了關鋒那三寸不爛之舌的厲害，他氣勢十足地嚴厲指責那些代表們，說今天衝擊軍報的行為是完全錯誤的，“中央文革”和軍委以至中央決不允許發生這樣的事！他直指著那個叫王澍的造反派代表訓斥著，那王澍不由越來越洩氣，不斷為自己辯護和解釋，但整個氣氛已變得越來越不利於他

們了。

這時，下午被造反者們“挾持”走又放回來的宋玉芬、田曉光兩個女同志，也氣憤地揭發指責造反者們，就是不聽和不信陳伯達的“緊急通知”，將他們抓走去核對這個指示，這是抗拒執行“中央文革”指示的行為。在造反者們撤出軍報以後，報社的人都趕來樓上會議室，旁聽著關鋒與造反派代表們的爭論，我還看見總政文工團和解放軍藝術學院等總政所屬單位，也來了一些人，他們和報社的人一起，都是反對衝擊軍報並擁護“中央文革”指示的，也使關鋒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將他與造反派代表的會談與爭論，變成了對衝擊軍報者的批判鬥爭，人們群起而上地指責企圖“接管”軍報的王澍等人。正當人們鬧哄哄時，關鋒出去了一下，他的秘書也跟著出了會議室，我們還在裏頭憤怒地批鬥著王澍等造反者。時間已是下半夜了，關鋒忽然返回了會議室，他後面跟著的竟是新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接著是一群全副武裝的部隊戰士，關鋒將鄭維山讓到前面，只聽鄭司令莊嚴地宣佈道：奉軍委和“中央文革”之命，將今天帶頭衝擊軍報的王澍等人，立即逮捕！說著就有幾個戰士搶上前，把王澍等“代表”一一抓了起來，軍報有人上去揪掉了他們的領章帽徽，大家看著他們被戰士們押下樓去，在會場內外馬上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和此起彼伏的口號聲：“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還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等等。人們又跟著關鋒和鄭司令員等一起下了樓，見他們及時處理軍報問題後，一一上車離開了報社，從二十日中午起開始的衝擊軍報風潮，至此總算宣告平息了！然而由此造成的“一·二〇反革命事件”，不僅並未就此結束，反而從此重新開始，並且使這一所謂“反革命事件”，問題越發嚴重可怕，只是其打擊對象已轉為軍報內部的人。於是，一月二十日這天在軍報發生的，本來只是一場鬧劇，後來卻發展成了悲劇，並且是一出比《竇娥冤》還要冤的新編現代大悲劇！

在一·二〇事件”發生的當天下午，軍報“突擊隊”的宋玉芬和“古田”隊的田曉光兩個女同志，曾被軍校造反者們“劫持”地拉走了幾小時，他們後來又毫髮無傷地回來了。就是這件事後來卻成了

大問題，不知怎麼被演化出一個嚇人的故事，說是造反者們本來是要“綁架”甚至“暗害”肖力的，因為認錯了人，才把宋玉芬和田曉光兩個女同志抓了去，後來發現其中沒有肖力，只得又放了她們。但是這一衝著肖力來的重大“罪惡陰謀”，不僅被說成確有其事，並且是軍報內的“古田”隊，與來衝擊軍報的軍校造反派相互勾結後，共同策劃者進行的，因此這是一件以危害毛主席的親人肖力為目的的、有預謀有組織的“反革命事件”。儘管這個故事編造得十分離奇又漏洞百出，如宋玉芬是“突擊隊”的人，又與肖力一樣也戴著眼鏡，說她被造反派錯當成肖力抓了去，也還勉強說得過去；那田曉光雖然也戴眼鏡，但她已是個中年女性，與肖力年齡差距很大，特別是她本身就是“古田”隊成員，如果是他們“古田”隊與別人勾結著，把本隊的人給“綁架”走，等於說是田曉光本人參與策劃“綁架”了田曉光自己，並且把她自己認識的根本不是肖力的宋玉芬，也當成肖力被一起“綁架”去了……。就是這麼個十分荒唐、毫無實據卻又聳人聽聞的“驚險”故事，被幾個自稱是“無比熱愛”又“堅決擁護”肖力的人，加以編造形成文字上報給了肖力他媽，即“偉大旗手”江青處，並且在不斷深入反復追查後，連續報送了幾份關於所謂“一·二〇事件”的報告，以致很快在江青處引起了強烈反應。

據我後來看到的有關材料，在呈送江青的第一個報告中，“一·二〇事件”的故事編造者說：“我們分析認為以‘古田’隊為主的一小撮壞人，是‘一·二〇事件’的策劃者”，他們“妄圖”綁架、迫害肖力同志，帶走了兩個戴眼鏡的女同志就是鐵證”。在第二個報告中又言之鑿鑿地說：“古田隊和衝擊軍報的一些壞人是相互勾結、緊密配合的……‘一·二〇事件’決不是院校（造反派）單方面的行動，而是報社內部壞人勾結他們一塊幹的”，“更加嚴重的是，一小撮壞人藉口‘辯論’妄圖綁架我們敬愛的肖力同志，因肖力同志不在，他們把另外兩個女的當成肖力同志綁架走了”。在又一個也是第三份報告中，原“古田”隊的活躍人物，曾與肖力同為軍報“造反兵團勤務員”之一的唐建亮，被說成是“一·二〇反革命事件”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報告中明文寫道：“唐建亮同軍事院校一小撮壞人

相互勾結奪軍報的權，並妄圖綁架和暗害肖力同志”。肖力的老娘江青得到這些報告後，不由氣得“龍顏”震怒又大發雌威，說軍報“古田”隊的唐建亮等人，“他們是一夥兇惡的階級敵人”，並且把這一“事件”算到了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賬上，江青在一次大會上唾沫橫飛地幾乎涕淚雙流地“控訴”道：“五·一六分子要綁架肖力”，然後又指著正在場的軍報那幾位“一·二〇”故事編造者說：“要不是他們保衛肖力，那孩子就算完了！”江青後來與美國記者，打算為她寫傳記的美國女學者維特克談話時，說到已改名為肖力的李訥道：“李訥和你同歲，她和你一樣，也是搞歷史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在解放軍報工作，反革命的‘五·一六’要綁架她，綁錯了人，那個人同她一樣也戴眼鏡……”。正是“古田”隊特別是唐建亮、田曉光等幾個人，據說曾經“陰謀綁架、暗害肖力”，就成了已是“鐵證如山”的“滔天罪行”，使他們一一都被打入了沉沉冤獄。

還在江青發話以前，“古田”隊的人就幾乎無一漏網地全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揪了出來，唐建亮被衛戍區正式逮捕，我們眼看著他被戴上手銬押出軍報，關進了監獄，其餘的人也都被一一單獨囚禁在軍報私設的牢房裏，連一個已懷孕的女打字員和一個才十九歲的女打字員，也因為是“古田”隊成員，被打入“牛棚”和連續批鬥審訊。每個被揪者都遭到嚴刑拷打，被折磨摧殘和無窮逼供，致使有人被整得精神失常，有人被打暈後於冬夜扔到院子裏露天呆著，幾乎被凍死掉，那個懷孕的女打字員在母嬰垂危時才被送進醫院，提前剖腹產後才三天，就在病床上被審訊逼供。後來他們又被分別處理為勞改或復員，全部踢出了軍報和軍隊，製造了一出又一出人間悲劇。至於一月二十日那天來衝擊軍報的軍校造反者們，特別是曾“綁架”過軍報兩個女同志的造反戰士，他們的命運和遭遇後來怎樣，我雖然不太知道，但也不難想像出，不過他們不會比軍報的“古田”隊成員整得更慘，因為他們並不是此案的主要打擊對象。

到了“文革”後期，雖然佔據著“紅都女皇”寶座的江青更加不可一世，但在軍報內部，所謂“一·二〇反革命事件”已是一起人所共知的大冤案。但是由於在“四人幫”的壓制和把持下，這一事件

仍然不准“翻案”，一直拖到“文革”以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終遭粉碎全被揪出，這一冤案才被平反，軍報也給有關的人逐步落實了政策，入獄者和受審查者，這才被摘掉“反革命”帽子和恢復名譽，只是他們大多數人都已被迫離開了軍報和軍隊，更令人寒心的是，原“古田”隊的那些小夥子、大姑娘們，這時都已成了滿身心傷痕累累的中年漢子和落難婦女，他們的美好青春全因這一冤案在“文革”中被毀掉了！

軍報這一所謂“反革命事件”，在經過大量內查外調，根據種種確鑿事實，完全證明了這個“案件”其實是幾個人有意和惡意編造出來的。至於他們為什麼要編造出這一冤案，藉此把原“古田”隊一些年輕同志硬往死裏整，將是另一段故事，以上僅將軍報“一·一三奪權事件”和“一·一七林彪來信”後緊接著發生的“一·二〇反革命事件”，如實回述如上，以供廣大讀者和“文革”史家們，瞭解當年“高舉紅旗”又是“文革先鋒”的《解放軍報》社內，有過什麼樣的奇聞怪事，從而從中瞭解那場“政治大革命”和“階級大搏鬥”，是如何的荒謬絕論和失盡人心！

“突擊隊”連續突擊，軍報臨時黨委又犯了“路線錯誤”。肖力引而不發，與趙總編“親如一家”，卻在密謀著砸爛總政“閻王殿”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的一個多星期中，軍報經歷了一場又一場“大火越燒越旺”的火的洗禮，從“一·一三奪權事件”到“一·一七林彪來信”以及“一·二〇反革命事件”，其實都是肖力挑起、引發和以她為中心的。就在一月二十日這天，我和軍報多數人根本沒有見過她，事後也不知道在這次據稱要“綁架”和“暗害”她的“反革命事件”時，她到底在不在軍報或去了哪里，她本人對這次所謂“事件”又是什麼態度如何對待的。但是也就在這一連串突發事件中，她不僅在軍報也在全黨、全軍和全國的造反派小將中，從此嶄露頭角天下聞名，成為各方各界的注意焦點和中心人物。不過在這一

場接一場“革命烈火”中的軍報，卻被燒得散了架子亂了套，雖然林彪說“亂不要緊，亂然後才能治”，但是軍報從此就患上了“不治之症”。當時還主持總政工作的蕭華主任，曾試圖來“治”一下軍報，他為了使報社儘快正常工作，特別是能夠出好報紙，在緊張鬥爭暫告段落“火”勢稍緩時，讓報社成立了一個帶有“維持會”性質的臨時黨委會。為了體現“文革”精神，臨時黨委中特意“選”進了肖力，又加上“突擊隊”的另一個同志，儘管他們一個是才入伍、入黨幾個月的新兵，一個是到報社不久的最基層的普通編輯，都作為“革命左派”和“新生力量”充實進了這個新班子。原軍報黨委中唐、胡舊班底的人特別是“突擊隊”大字報上點了名的人，當然都被排除在外，不過那時在任用幹部和組建領導班子問題上，傳統的“論資排輩”思想仍然是主導的，軍報是軍級單位，其負責人也必須是軍職幹部，就在“矮子裏頭拔將軍”，從軍報的原領導幹部中，“拔”出了一個雖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卻並非“唐胡呂一夥”的張副總編，由他先充任臨時黨委副書記，在還沒有正式的“一把手”以前，暫時主持著報社內的日常工作，設法儘快結束軍報的嚴重混亂狀態。所以選中他出任此職，其實還有一個說不出口卻又誰都心照不宣的內因，就是這位張副總編是“中央文革”副組長、著名的“老革命左派”張春橋的親弟弟。雖然軍報的人誰也沒見他與其老哥有什麼來往，但他總是有著這麼一層關係和背景，這個班子由他先牽個頭也就有了一點“保險”係數，再則臨時黨委中又有著肖力和“突擊隊”成員等幾個“左派”名額，多少也具有了鮮明的“文革”特色。蕭華主任在這樣安排時，也真是煞費了苦心，好在肖力當時對此未持異議實際是未露聲色，軍報這個臨時班子也就這樣暫時定下了。

由於軍報的“一把手”位置還空缺著，稍過些時，蕭華主任才物色到一個適合人物，他是原在軍報和總政宣傳部擔任過領導職務，後來調到以陳伯達為院長的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當著副院長的趙易亞，由於他曾在軍報和總政工作過，又與陳伯達這個“文革紅人”和“中央要人”有著較密切的關係，也算是個“革命左派”，在征得軍委和“中央文革”同意後，就把他調回來，正式任命為軍報總編輯，同時

擔任了報社的臨時黨委書記，蕭主任希望他能來“治”一下軍報的“亂”。趙總編上任後，先抓起了報紙宣傳工作，由於剛到，許多情況不太瞭解，報社內部運動的事，就由作為臨時黨委副書記的張副總編具體負責著，臨時黨委在討論這分工時，最年輕的也是黨齡最短的肖力委員，對臨時黨委的各項任命並無異議也未露聲色。報社上上下下的人都以為，軍報這下也許就能“天下太平”了，我也理頭投入了工作，哪知這僅僅是人們的主觀願望和美好想像。

軍報從“一·一三事件”時起，為了防止“走資派”、“反動權威”和其他“壞人”，對報紙宣傳進行破壞搗亂和放毒，臨時成立了一個由“突擊隊”等各造反組織代表組成的“版面組”，以檢查監督每天出版的報紙，“突擊隊”已有一名“小將”常駐那裏，肖力自己也很注意版面組的工作，不斷去那裏“視察”和坐鎮，以便隨時發現問題。那知我和我的一幅畫，竟成了他們發現並卡住了的一個問題。當時軍報正在宣傳“積極支持革命左派”，還報導了一些地方出現的“反動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在進行破壞活動時，被黨和群眾破獲，出動軍隊予以堅決鎮壓並取締了。我奉命畫宣傳畫配合這一宣傳，記得我畫的是一個武裝戰士，一手持槍一手抓起了兩個反動分子，其中一個是禿頭瘦子，又有一個是戴眼鏡的矮胖子。這幅畫交了稿我就沒有過問，但以後一直沒有見報，因為畫稿被臨時抽掉或“槍斃”的事經常有，我也沒有把它當回事。哪知後來才聽說，我那幅畫由版面組審閱檢查時，被“階級警惕性”特高的肖力親自發現了問題，據說畫中的兩個反動分子，一個畫得像林彪，一個畫得像陳伯達，這不是對偉大領袖的“接班人”和“副統帥”以及黨和國家“文革”領袖的惡毒攻擊和刻骨仇恨嗎？這幅畫名為表現鎮壓反革命，實際上本身就是一幅反革命宣傳品！這樣反動的畫稿當然不准見報，又被立即作為一件“反革命罪證”收存起來，以便適時追查揭發和處理作者，後來這果然成了我的“滔天罪行”之一，因而受到嚴重懲處。不過最初我一點不知這事，也從無人透露我有過這件“罪證”，看來是為了暫時穩住我，看看我是否繼續“作案”，所以才沒有“打草驚蛇”，結果使我又當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革命群眾”。

說起此事，我不得不驚歎肖力雖然年輕，居然如此“深沉”和藏而不露，由於他對我的不動聲色，我不僅在“文革”中一度也受到“重用”，更曾與她個人結成過相當密切的“友誼”，因為在軍報內部運動初期，我也挨過“反動路線”的整，在反對“胡、和、宋陰謀小集團”的鬥爭中，也表現得比較積極，臨時黨委在成立一個專管運動日常事務的“文革辦公室”時，經人推薦把我也吸收進去。我受命去時，見“文革辦公室”的主任是臨時黨委委員、來自“突擊隊”的老方，出於當時全國“文革”運動正搞“大聯合”，凡是跨行業、跨單位的造反組織，都得歸口或解散，老方原是軍事處的編輯，他就脫離了由記者處的人組成的“突擊隊”，回到原來的軍事處。還有位本來就姓傅的副主任，這老傅是理論處的老編輯，但不知為什麼，與由理論處、評論處組成的“高炬”隊那些“筆桿子”們，顯得不那麼“團結一致”，至少沒有他們那麼自命不凡。我去後為了“抓革命，促生產”，還照常在美研組上班，只業餘地在那裏做些具體工作，如抄抄材料、發發通知和聯繫一點什麼事等等，有時也參加議運動中的問題。當時報社運動的重點內容，是貫徹執行林彪“一·一七”來信，對“胡、和、宋陰謀小集團”進行“徹底揭發、徹底批判”，臨時黨委讓“文革辦公室”起草了一些計劃、日程、方法和要求之類，經黨委討論後依次施行。我過去從未參加過這類工作，這次竟然被“選拔”到這一崗位上，內心不免有點“自我感覺良好”，可惜卻是好景不長，不久以後的六月中旬，報社內爆發了一顆新的“定時炸彈”，使全社人員和包括我在內的自以為是“文革”積極分子的人，一起挨了重重的一棍。這又是以肖力為首的“突擊隊”幹的。

在此以前，我和全社同志一樣，出於對偉大領袖的真誠敬愛，以及對“偉大旗手”的莫名敬畏，對於他們的親人和親自培育出來的李訥即肖力，是由衷的支持、愛護和關注的——不敢說是“關懷”，因為她總是“高”於甚至“駕凌”於我們眾人之上。她來報社時才二十多歲，報社較老的編輯、記者至少大他十多歲，從年齡到資歷上都屬她的長輩，所以她剛來時見人都叫叔叔，直接領導她的和、宋二位副處長以及“快報組”的負責人，還被她叫成了“好叔叔”，結果那幾

位“好叔叔”都因為她成了“陰謀小集團”中的“壞蛋”。不過她自己對人卻仍然保持了“平易近人”甚至“熱情可親”的態度，平時常見她與周圍的人十分隨便或隨地說說笑笑甚至開開玩笑，她進出報社總是騎著一輛舊自行車，“突擊隊”的人為了保衛她，總是派人也騎著自行車把她護送到中南海西門，看她進去了才回來。前面我曾寫到過，我見她在食堂吃飯常買“乙號”以下的菜，有時帶來點辣椒醬之類，還主動請客邀人分享，毫不“特殊”更不“享樂”。我還發現她的白襯衣領子上有個小補丁，一身從上到下也總是軍衣軍褲加解放鞋，又聽說“突擊隊”裏有幾個人還是家在農村的戰士，家中不免有些困難，她知道後就慷慨解囊，扶貧濟困支援同志。她還能唱唱京劇，時不時來幾段青衣花旦，倒也有腔有調有點韻味，看來這是她那偉大的父母雙親對她薰陶的結果。因此在人們的印象中，她在軍報的形象及其作為，既似可親可愛又覺可敬可畏，像是一個雙重甚至多元性格的複雜人物。

這時我與她也有過個人接觸，因為我曾在中央美術學院學過畫，與那裏不少人都熟悉，一九六七年四月或五月間，中央美院的幾位青年教師找到我，托我將他們的一批材料交給肖力，請她轉交給“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我受人之托後就去找她，她先問了送材料的幾位青年教師的情況，我說他們都是美院的年輕畫家，各自曾創作過哪些較有影響的作品，她一聽就說自己看過他們的畫，還說他們又曾畫過什麼畫，看來她對美術還挺喜歡和熟悉，我們就又隨口談了各自對一些美術作品和畫家的看法，似乎共同語言不少。由於談得投機，她悄悄告訴我，自己那偉大的爸爸也愛看畫，常同她一起在家翻看各種畫冊，相互議論品評某些畫家及其作品，她自己有時還去看看畫展，所以知道一些美術和美術界的事。我們交談後，她收下了請其轉交的材料，並且及時送給了“中央文革”及其老娘處，江青和康生等不僅看了這些材料，還專門接見了那些送材料的美院青年畫家，據說肯定了他們的什麼正確意見，使他們一時十分得意。我作為他們上送材料的中轉人之一，也因此受到他們的感謝，而我卻認為這是由於肖力對我的信任，才答應轉交這批材料的，因為據說曾有幾次同樣的

事，卻被她拒絕了。由於這件事和那次交談，我和肖力之間的距離似乎一下拉近了，此後她每次見到我，都要親切招呼 and 說點什麼，還曾就美術上的事又作過交談，相互的看法經常很一致，使我們因此成了有共識的朋友。有段時間內我在報社內部運動中，什麼“戰鬥隊”也不參加，有什麼觀點或意見，只用個人名義寫寫大字報，因為那時流行用毛主席著作或詩詞中的用語，作為群眾組織和個人的名稱代號，我也“活學活用”了老人家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言，借他批駁有人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為自己取代號為“紅痞子”，肖力再見到我，就只叫一聲“痞子”，使我感到分外親切。其實這時她早已把我那幅據說將林彪、陳伯達畫成“反動分子”的畫，作為我的“罪證”讓人收存起來了，只是沒到揭露和發落我的時候。而且她當時的主要活動並不限於軍報內，所交往的人也不只是包括我在內的軍報的人，她甚至已不常去為軍報把關的“版面組”，其關注的重點，已轉向並集中於軍報“文革”運動的總體情況和主要動向上。

就在我以為報社形勢相對平穩，個人也因進了“文革辦公室”又與肖力有著友好關係而安然自得時，以肖力為首的“突擊隊”，突然又貼出了一張著名的“6·19大字報”，這一新大字報將前一階段臨時黨委對報社運動的領導，來了個根本否定和全面批判，說是運動領導者們“把群眾當成了阿斗”，並沒有“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組成最猛烈的火力”，向“胡癡陰謀小集團”等“一小撮壞傢伙展開最堅決的鬥爭”，而是“劃框子，定調子”，“束縛群眾手腳”和“把群眾嚴格地控制在他們所劃的小圈子裏”，在報紙宣傳上，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報紙面貌”，而是“保守了，下降了，落後了”，其原因是“沒有很好地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因而認為軍報的新領導班子，即臨時黨委“辜負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對我們的期望，辜負了全軍同志和全國人民對我們的期望”，其結論也就是說，軍報的新班子執行了一條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由於那時趙總編兼臨時黨委書記來到不久，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報紙宣傳上，犯了上述“路線錯誤”的主要是分管報社內部運動的臨時黨委副書記張副總編，臨時黨委所屬的“文革辦公室”就成了他執行“反動路線”的工具，因此被

稱為“張氏文革”。而我正是“張氏文革”的工作人員之一，這使我這個原是挨過“反動路線”整的人，又成了一個“反動路線”的執行者。當時從我自己到所有在“張氏文革”的人，以及社內許多支持我們的人，都為此很想不通，並且對肖力自己就是臨時黨委委員，也屬領導班子成員，卻總是以“群眾”名義來為“群眾”說話，有不同意見不在黨委內部提，卻一下端到群眾面前，又似乎唯有他們代表著“廣大群眾”。這種做法使人很難理解，當然這話誰也不敢直接說出，只是在心裏有此疑惑甚至反感，覺得肖力老是站在“領導”之外和“群眾”之上，不斷指責和批判別人，不知她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儘管如此，她個人對我以及周圍一些人，仍然保持著一種十分友好和親切的關係，有一次她回中南海時，還讓我騎著自行車跟她到中南海西門的府右街，去看北京紅衛兵在那兒搞的什麼“揪劉（少奇）火線”。那時正是七月底八月初，也就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前後，“中央文革”與江青支持和挑動了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在府右街及中南海牆下“安營紮寨”，要將“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作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揪出來公開批鬥。肖力向我暗示，到時候可能真的將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這將是“文革”中的又一個重大行動。這使我感到她對我是非常信任的，連這樣的“重大機密”都向我透露了。到八月五日即毛主席寫大字報“炮打”劉少奇“司令部”的一周年紀念日晚上，我早早就趕到中南海西門外，想等著看揪鬥劉少奇，去後又聽說，今天晚上毛主席可能又將出來接見廣大革命群眾，我更是興致勃勃地守在那裏，等待著那個“偉大的時刻”。可是在那兒一直等到下半夜以後，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既沒有看到揪出劉少奇，更沒有見著偉大領袖，連“中央文革”的人都沒有出來，我白守了幾個小時後，只得十分遺憾地回了報社，後來聽說是毛主席和周總理，設法制止了江青等人策劃的這次“革命行動”，不過對於肖力早就向我透露此事，我覺得她對我還是很不錯的。

也在那前後，“文革”運動發生過一件震動全國的事，就是武漢的“七·二〇事件”。據說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一派群眾組

織，衝擊以至毆打了“中央文革”派去的王力，對正在武漢的毛主席的安全也造成了威脅，陳再道因此被說成是對抗“中央文革”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軍內走資派”和堅持“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他所支持的那一派也成了“反動組織”，因而受到“中央文革”組織發動的對陳再道及其“反動組織”的全國性聲討。其實我們根本鬧不清那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都奉命坐上大卡車，在北京全市大規模地遊行示威，並且連續出動幾次，每天一路高喊著挺順口的口號：“打打打，打倒劉鄧陶！”“打打打，打倒陳再道！”還有“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堅決支持武漢造反派”和“堅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等等。武漢的所謂“保守派反動組織”叫做“百萬雄師”，原取自毛澤東的詩句，但卻被造反派們寫成了“百碗熊屎”以示貶斥，將其也列為必須搞臭和攻垮的對象。這事不僅擾亂了武漢，又牽動了全國，迫使周恩來親自出馬，代表中央去平息了風潮，王力和另一個也在武漢的“中央大員”謝富治，才得以乘飛機返回北京，“中央文革”又在北京機場上，為他們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第二天的軍報和各大報紙，都以一版頭條作了突出報導，使王力等人一時間成了一個“英雄人物”，軍報還為此連續發表了多篇社論，依次是《武漢無產階級革命團結萬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和《新的考驗》等等，王力本人也為《紅旗》雜誌親自撰寫了社論，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文中突出地提出了要堅決揪出“軍內一小撮”，實際上對全國造反派發出了“反軍”的號召。這事被“高瞻遠矚”又“明察秋毫”的偉大領袖發現了，老人家見他居然要向自己起家 and 看家的軍隊開刀，並且也伸手抓“槍桿子”了，馬上在王力寫的那篇社論上憤然批示要“還我長城！”同時授命打倒了企圖搞亂軍隊的王力等人，這使王力剛剛風光了幾天，就因為“反軍”和挑動奪外交大權等罪行，忽然也被揪出了，接著連他的“文革”戰友和著名“左派”關鋒、戚本禹，也相繼作為“反革命小爬蟲”被打倒，又因此以“王關戚事件”載入“文革”史冊。不過就在他們被踢下政治舞臺的前夕，北京還就武漢“七·二〇事件”，於七月二五日在天安門前舉行了一次十萬人的群眾大會，不僅是江青和危在旦夕的

王、關、戚等人都去參加了，連“副統帥”林彪也親自光臨會場，在天安門城樓上“親切接見”了“革命群眾”和造反派的代表，其中就有軍報“突擊隊”的肖力。正是在這次接見中，林彪向中國頭號“革命小將”，下達了新的更大“造反”指令。

據“文革”史料揭露，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彪，在接見偉大領袖的親生女兒肖力即李訥時，對於她下一步的“革命行動”，作了進一步的指示，其核心內容其實就是一道“作戰命令”：“要戰鬥，要突擊，要徹底砸爛總政閻王殿！”林彪的這道指令，有著豐富的內涵，一是表明他對軍隊的一些高級將領特別是全軍政治工作領導機關，已經由於他們對他這個“副統帥”不那麼“堅信、緊跟、合拍”，不斷做出一些違反他意志的事，漸漸失去了對他們的信任和信心，必須將其“打倒”和“砸爛”才行。再則由一般人來挑頭衝擊總政，總是有些懸乎，只有以“紅色公主”親率其“突擊隊”來衝鋒陷陣，才能達到目的。所以他才在這次接見造反派代表時，向肖力面授了這一“機宜”。正是林彪對肖力的這一“指示”，後來不僅搞亂了全軍，更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首當其衝的就是總政機關及其“閻王殿”的“頭子”蕭華主任。

在此以前，蕭主任已被再一次打倒，我曾參觀旁聽過幾次批鬥他的大會，一次是在總政禮堂，參加批鬥的除了總政各單位的幹部，還有不少部隊文工團的男女造反者，我見空軍文工團一個女同志，在會場上直指蕭主任鼻子道：“蕭華你說你是不是個大流氓？”原來有人揭發了蕭主任“下面”出的問題，他當然無法承認對自己的責問，但那女造反者卻窮追不捨地非逼他說自己是個“大流氓”。據說那女同志是個舞蹈演員，長相和身段都相當動人，只是她當時的形象，反而使我感到她本人更象一個女流氓，並且是個長得挺可愛的女潑皮。又一次鬥蕭華是在八一製片廠的大廣場上，由於多達上萬人參加，我早就溜了號，發現蕭華的女兒就坐在人叢後面，正低頭聽著對自己父親的批判，人們呼“打倒蕭華”的口號時她也得跟著舉手。我不無同情地看看她，卻沒有將自己的發現告訴別人，不然造反派很可能會把她也拉上臺，與其老子作“面對面鬥爭”，至少要表示“劃清界

限”。幾次大會批鬥的內容我就早忘光了，僅有的印象是老揪住蕭主任“下面”的問題，雖然據林彪所說，這僅僅是“小節”問題，不必這樣“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其實在此更早以前，即一九六七年一月和三月，中央曾幾次明令保護蕭華，我也曾榮幸地去旁聽了兩次，一次是在京西賓館，“中央文革”和幾位軍委副主席以及總政幾位副主任，都出席了會議，他們都講了蕭主任不少好話，葉群代表林彪大講了一通，她說原總政主任羅榮桓元帥是反對林彪的“活學活用”運動的，蕭華卻沒有反，因此應該保他。這次會議肖力也去了，我有幸坐在她一旁，曾將她不認識的總政副主任傅鐘等，指著一一告訴她那是誰。第二次“保蕭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當著“中央文革”和江青、葉群等人的面，用手勢比劃到自己胸口說，蕭華參加紅軍時，才這麼一點高，他是個“紅小鬼”，怎麼能反對毛主席呢？其他領導人也再次講蕭主任如何一直擁護毛主席等等。他們講這些話才過了個把月，蕭主任還是被林彪指使人打倒了。像蕭華這樣一生革命的老同志與大幹部，在“文革”運動的鬥爭棋盤上，也就像一粒棋子似的，被“執棋者”扔過來又扔過去，直到被乾脆拋掉，使人看了不由不心驚肉跳。

林彪於七月二十五日親口向肖力作的“指示”，也許由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統一部署，她回來後並沒有馬上傳達執行，直到一段時間以後，他才向軍報以及總政公佈了林彪對她說過的話，開始了“砸爛總政閻王殿”的戰鬥行動。這時蕭華已是“閻王殿”的“大閻王”，各個副主任也依次成了“二閻王、三閻王、四閻王”等等，各部部长們都成了“判官”，處長和幹事們則是“牛頭，馬面”和“小鬼”之類，機關裏的一切正常工作都已停止，全部鬥門收攤進行揭發批判鬥爭，全軍的最高政治機關真的被“徹底砸爛”了。也就在這期間，我在總政鬥蕭華大會上，見過並留下印象的空軍文工團那個跳舞的女造反者，和肖力一起來過軍報，似乎關係十分親密，我不知道也沒法問他們是什麼關係，只覺得肖力怎麼能同這些人搞在一起呢？卻不知那些女造反者有著重要的來頭和背景，原來他們是受到林彪支持的，能控制和影響北京以至全軍、全國“文革”形勢的，號稱

“三軍”(即空軍、海軍和以北京軍區為代表的陸軍)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簡稱“無命派”)中的活躍人物,肖力正和他們即“三軍無命派”一起秘密策劃著一個更為重大的戰略性“革命行動”。當時的這個謎,不久就又石破天驚地突然揭開了!

只是那時別說是我這樣的人被蒙住鼓裏,連軍報新任總編輯和臨時黨委書記,也已成爲“文革”要人的趙易亞,實際也被蒙住了。說起這位趙總編,我和他的老家在同一個縣,算是一個較近的老鄉,他到軍報來後有幾件事,曾使我暗地十分佩服。一是當時正在批判劉少奇的“黑修養”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報社收到以此為內容的“大批判”文章準備發表,他審閱後說寫文章的人連“修養”都沒有讀通看懂,怎麼能批判人家呢,說是至少要研讀幾遍,才有資格寫批判文章。他這樣不僅把批判者批了一頓,也等於說只有先學好“黑修養”,才能批判“黑修養”。第二件事是軍報最早發表了“毛主席語錄歌”,並且造成一種“語錄熱”,有人又發展創造搞出一種“語錄操”,即用一個個體操動作,將“毛主席語錄”予以圖解和形象化。這種“語錄操”傳到軍報後,先組織全社幹部學著做,我也奉命去一面唸唸有詞地誦讀著“毛主席語錄”,一面或舉拳踢腿,或叉腰挺立,有時又呲牙裂嘴,作出憤怒狀或欣喜狀等等,連續以各種相應的動作和表情,達到既活動了身體,又學習和宣傳了毛澤東思想,真是一舉幾得功效巨大。“語錄操”的編創者將其圖譜和說明送到編輯部要求登報推廣,並要軍報予以評價宣揚,趙總編看後馬上打了回去,說學語錄和做體操是根本不同的兩件事,怎麼能這樣搞在一起呢!認為這簡直是一種將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胡鬧,軍報決不能登載和推廣這種東西。這其實是後來打倒趙總編時的“罪狀”,我聽了卻在心裏贊佩不已,在那個年代那個時期,敢於這麼說這麼做的人,實在太少也太難能可貴了!我這想法當時當然沒有表露出來,不僅如此,我還曾對趙總編很為不滿。

原來他在“突擊隊”貼出“六·一九大字報”以後,想乘機改變或改善一下軍報的混亂形勢,讓一些被“打倒”和“靠邊站”的幹部及“筆桿子”們,及早站出來投入工作,使軍報儘快恢復正常秩

序,以保證出好報紙。他就借著“突擊隊”批判臨時黨委新的“路線錯誤”之機,主持進行了臨時黨委的“開門整風”活動,發動大家對前階段運動中的問題作檢查和糾正,使軍報的“革命”和“生產”能順利進行。這本來是件好事,可是我和不少人那時在毛主席批示的林彪來信所說,軍報的“革命烈火燒得越旺越好”,又在肖力和“突擊隊”不斷“革命”連續“突擊”的影響下,認為趙總編是在支持“保守派”,否定報社包括我在內的“革命群眾”的“鬥爭成果”,特別是在“開門整風”中,曾經在“橫掃”時被我們“燒”到或受壓過的同志,又群起而上地對我們進行“反攻”,使有我在內的“張氏文革”及其支持者,顯得灰溜溜的十分委屈,加劇和加深了報社群眾之間的矛盾和對立。這時的肖力,在“開門整風”中不是每次都來,來了也不輕易表態,只作過一次似乎是支持對方特別是趙總編的發言,在發言中還委婉地批評了我,因為我在一次“打語錄仗”中,引用了一條關於“敵人”的語錄,她說這是不適當的。她的態度使我們的“對立面”很受鼓舞,連趙總編也很高興,似乎他和肖力之間十分一致。趙總編那時因調來不久,只住在報社院內澡堂旁邊的幾間破舊的小平房裏,夏季天熱時,他家就在門口露天地裏開飯,進出澡堂的人都能看到,有時就見到肖力也在那兒和他一起吃飯,使人感到肖力和趙總編簡直是“親如一家”。當時我以為,得到肖力支持的趙總編,將會更有持無恐地幹他要幹的事,軍報也將由他一一管起來並“治”好了。哪知我這個估計,又根本錯了!肖力的思想和行動,總是出人出乎意外,她很快又幹下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近年我在一本“文革”史書中看到這樣一段記述,一九六七年夏季要打倒蕭華時,因為中央幾次保蕭華,軍報趙總編就動員肖力與他聯名寫揭發蕭華的大字報,肖力回家對她媽說了這事,江青聽了大罵道:“我看這個趙易亞不是好東西,他要寫大字報,還要把我們家的人牽扯進去,就沒安好心!”為了查究此人,江青讓康生馬上調出了趙易亞的檔案,進行了仔細查閱,康生查後發現趙的歷史上有兩個月不明去處,他就向江青說,我看趙易亞是個特務。肖力聽到問她媽道,光憑這一點就能說他是特務嗎?江青說這是“康老”定下的,叫

她不要有什麼疑問。這使肖力後來與趙總編的交往，實際上已是在同一個“特務”至少是“特嫌”相周旋。還是上述那本“文革”史書中又寫到，因為趙易亞調來軍報，是陳伯達同意的，既然趙被江青和康生認為“不是好東西”甚至是“特務”，陳伯達就有了嚴重責任，他為了爭取主動，就趕在江青、康生揪出趙易亞以前，搶先把他定為“反黨分子”，以示與其劃清界限並對其堅決鬥爭。軍報後來發生的事，恰恰印證了以上的說法。因此就在趙總編主持“開門整風”，似乎很有成效，並且在許多人眼裏，也許在他自己心裏都認為他已經得到了肖力的“大力支持”，其實就在這時，在他的頭頂上，早就掛好了隨時將會砍下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而掛上這把利劍的人，就是看來與他“親如一家”的肖力姑娘。

肖力到底是否“支持”趙總編？這在當時看來還是一個未解開的謎，不過在當年八月下旬，即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就突然揭開了。正是從這一天起，軍報又陷入更新更大更猛烈的狂風暴雨之中……

林江勾結調動“三軍”，陳伯達拍馬抬轎，護衛肖力上臺，創建了確是由“紅色”染成的“軍報紅色政權”，人們對她不由既“敬”又“畏”

經過一年多“文革”烈火的洗禮，北京和全國各地一樣，不僅都是鬥得到處亂成一團，還不斷發生一個又一個新的“事件”。八月中旬，西單商場出了一起“爆炸(或是火燒，具體情況忘了)事件”，據說是反革命在進行破壞，已造成了很大損失。軍報近一二個月來，趙總編正主持著成批地“解放幹部”，將胡、和、宋等“陰謀小集團”成員，也從衛戍區放了回來，又通過“臨時黨委開門整風”，公開批判和開始糾正著前階段運動中的過火行為，這使一些被我們認為是“保守派”的組織和個人，都大受鼓舞活躍起來，我卻感到受了壓力，心情有些消沉，不免就“逍遙”起來。八月二十三日晚飯後，我跟著一些人，到已遭嚴重破壞的西單商場去參觀，正在看熱鬧時，有個報社的人來找到我們，說你們還不快回去，軍報又出大事了，趙易

亞被揪出來了！我聽了這話，就和人們一起趕回報社，進大院時，只見辦公樓內外又是到處兵馬紛紛，人流不斷，並且主要是“三軍”派的人。近一段時間內，肖力很少在報社露面，但常有“三軍”派的人來，我在鬥蕭華大會上見過的那個空軍文工團女造反者，就是這時到軍報來的，我只見她曾和肖力在一起，卻不知他們在一起搞什麼，沒想到肖力正是借重了“三軍”派的力量，在軍報又發起了第三個大“戰役”(第一次是“一·一三事件”揪出了“胡、和、宋陰謀小集團”，第二次是“六·一九大字報”，揭露批判了臨時黨委主要是副書記張副總編的新的“反動路線”錯誤)。這次又是肖力親自發動和領導，更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支持的軍報“文革”中的第三場“大決戰”。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我從西單商場回到軍報大院，只見辦公樓對面的宿舍樓牆上，新貼了一張大字報，正有很多人圍在那裏看，我也擠了上去，見那大字報用紙不是軍報的大張捲筒印報用紙，而是用普通的白報紙拼接起來寫成的，只是其標題卻令我大吃一驚：

“反復辟‘反保守’ 誓將革命進行到底！”
——剝開假革命、反革命趙易亞的畫皮”

大字報一開頭就寫道：“經過反復的調查和瞭解，我們認為趙易亞是個冒充革命的野心家、陰謀家，他是個打著紅旗反紅旗，在報社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破壞總政文化大革命的極其危險的人物。下面我們就幾個問題，剝開他的畫皮，看看他的反動本質。”第一個問題是說他如何“頑固地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內容是說毛澤東於當年七月初，發出“最高指示”說：“解放軍報記者不要呆在家裏，應該馬上下去。”大字報說：“而趙易亞這個危險分子，卻千方百計地抵制、對抗毛主席的偉大指示”，並且“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這一偉大指示公然進行篡改”，先“篡改為：聽說記者在報社搞整風，他們應該馬上下去”，又“變為：聽說解放軍報記者在家裏呆了很久，要他們下去，到群眾中去鍛煉。他把主席指示中最關鍵的二個字

‘馬上’（原文有重點一引者注）去掉，這是一個陰謀。”這裏且不說毛澤東作為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以至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領袖，每日每時都心懷天下和日理萬機，該不該管軍報記者什麼時候下去這一類某個單位裏部分人員的具體瑣細事務，他老人家又是怎麼“聽說”軍報記者的事的，並且連“報社搞整風”都知道，這除了聽江青說以外，就只能聽他可愛的女兒肖力說，即使是聽江青說也是她從肖力那兒“倒”來的，因為江青並未到軍報來視察或調查。這就表明，此時的軍報，因為有肖力在，已經“得天獨厚”地直接“通天”了，軍報所在的平安里，與“紅太陽”所在的中南海之間，有著一條無須任何接轉的直通熱線。這條“熱線”對軍報來說是有幸還是不幸，禍兮福兮暫且不說，只說“偉大領袖”關於軍報記者的這句“最高指示”，由於趙易亞的“對抗”和“篡改”，一下子就成了他的頭一條“死罪”。其實趙總編當時所以沒有立即執行這一“最高指示”，也是不無道理和出於無奈，那時他正在搞批判社內“反動路線”和過火行為的“開門整風”，記者們都是“整風”中的骨幹和主力，讓他們“馬上下去”，必將直接影響到“整風”的成敗，所以他想稍等幾天在“整風”告一段落時再說，又在傳達“最高指示”時丟了那個誰知原來有沒有的“馬上”二字。於是，大字報說趙總編是“妄圖用這種卑鄙的手法，把記者長期拖在家裏……使主席指示至今不能在報社貫徹，直到現在記者尚未下去，這是明目張膽地對抗毛主席，是對毛主席最大的犯罪，是可忍，孰不可忍！”“真是萬惡滔天，罪該萬死！”

大字報揭露趙總編的第二大“罪狀”是“拒不執行林副主席的指示”，說林彪在“一·一七來信”中要求軍報“文革”的“烈火燒得越旺越好”，“趙易亞竟敢違背林副主席這一重要指示，妄圖扼殺報社文化大革命”。具體的“罪行”是“打著貫徹毛主席幹部政策的幌子，幹著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勾當……把犯錯誤的幹部統統‘解放’了”。又如何“分化、瓦解和利用”報社群眾及其組織，“來為自己效勞”，“把解放軍報社變成趙家天下”，使其“實現復辟”等等，進而追問“是誰在指使你在報社進行復辟活動的！”第三大“罪狀”是“妄圖破壞總政文化大革命”，說“趙易亞……是蕭華的死

黨，他是蕭華的‘秀才班子’中的得力幹將，他去馬列主義研究院是蕭華和劉志堅推薦的，他來報社又是蕭華點名要來的，他與蕭華有著非常密切的，極不正常的關係”，所以他一面妄圖“包庇蕭華”，一面又冒充“反蕭英雄”，接著又揭露了他找肖力聯名寫攻擊蕭華大字報的“陰謀”，說“他就是想搞假革命，真包庇，葬送總政文化大革命”。最後一條說趙總編“是地地道道的大政治騙子”，如何“拉大旗、作虎皮”和“欺騙群眾”，說“某某同志怎麼樣信任他”，甚至“造中央首長的謠”來“招搖撞騙”。這裏的“某某同志”和“中央首長”，其實就是肖力自己和她媽江青，正是他們母女對趙易亞作出過“信任”的姿態，甚至裝成“親如一家”，並使他信以為真十分高興，真不知到底是誰騙了誰？大字報又揭露趙總編“還裝出一副很艱苦樸素很深入群眾的樣子，實際他搞的完全是彭德懷的那一套，是新式馮玉祥”。這幾句話看來是大字報作者不說不行的，因為趙總編恰恰在這方面給了人們很深也是很好的印象，他為人確實極為樸素隨便，生活上從不計較，就說他住在報社澡堂前的幾間舊平房裏，吃飯就在門口平地上，難怪有人在報社的大會上說，誰見過這樣的將軍？肖力等為了打倒他，必須摧毀他在人們心目中的這個形象，就像當年“批倒、批臭”彭德懷那樣，也將他說成“新式馮玉祥”和“大政治騙子”等等。

這張大字報署名為“新革命造反突擊隊”，不僅在原“突擊隊”前面加了一個“新”字，名單也由最初的八個“小將”發展擴大了的一批人，一下子“縮編”為三名，為首的自然還是肖力，其餘是姓李和姓金的二位“小將”。這說明肖力的這次“革命行動”，是除她以外只有一二個人參與或知道的絕密行動，又表明這張大字報根本不是在軍報內寫出的，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動手張貼的就是“三軍”派的人，從大字報的行文和用語等等看來，也不像是肖力親自執筆的，更不會出自李、金二“小將”之手，很可能也是“三軍”派的“秀才”在她的授意下捉刀代勞的。顯然也正因此，在大字報文末照例有的一串口號中，另有一句十分觸目的“堅決和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在我以後見到的一份材料中，證

實了我的推斷。那是八十年代初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時，林彪死黨、原空軍司令吳法憲的一段供詞，他交代說“江青和林彪、葉群互相勾結，奪了《解放軍報》的權。那是一九六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葉群打電話給我，要我馬上去江青住地一下，到了那裏後，江青說：以肖力為首的突擊隊，要奪《解放軍報》的權，要打倒趙易亞。她要我協助辦三件事情：一、協助肖力抄大字報，貼大字報；二、從海軍、空軍、北京軍區、二炮抽調三十多辦報人員，今天晚上進入《解放軍報》社，協助(肖力)辦報；三、全力支持肖力奪權。这三件事情，我全部照辦了。”吳法憲又說：“我替江青辦了事，犯下反革命罪行，江青是罪魁禍首，我當了江青的幫兇。”其實正是這樣，肖力揪出趙總編，完全是江青勾結林彪、葉群，調動“三軍”派的人馬，支持和幫助肖力“打倒”軍報領導人，實現由肖力奪權並控制《解放軍報》全部權力的目的。也正是在這天晚上，肖力才在江青的直接操縱和林彪等的大力支持下，正式登基上臺，成了軍報獨一無二的“第一把手”。肖力這一新大字報下署的時間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晚8點左右)”，我看到的時間約在9點多，當時院子裏特別是中字報前擠滿了人，我聽到人說辦公樓上正在揪鬥趙易亞，馬上也去了樓內的大會議室，果然見到狼狽不堪的趙總編，正被人們圍著狠狠斥罵責問，只是其主鬥者都不是報社的人，而是我們不認識、被鬥者當然更不認識的“三軍”造反派，其中就有我曾見過幾次的那位空軍文工團舞蹈演員，不過這時她已由藝術舞臺跳到了政治舞臺上，並且跳得更高更歡，又用那副女潑皮的架勢和語言，痛批臭罵著這個“蕭華的死黨”和“走狗”。主持批鬥會的人似乎有點身分，並且不像軍事幹部，後來知道他們就是由“三軍”派到軍報來的“辦報人員”，為首的原是《空軍報》的幹部，聽說姓朱；為副的來自《海軍報》，據以後介紹姓杜，他們各自帶來一批人，但主要是從空軍來的。這馬上給了我一個十分有趣又可悲的聯想，一年多以前，曾由軍報接管了從《人民日報》到新華社等中央主要宣傳機關，現在這個最大的“接管者”又被別人接管了，而接管它的卻是原來也算是其“下屬”、但卻更受“林副統帥”支持信任的《空軍報》等的“左

派”。這不由使我想起列寧說的“剝奪剝奪者”名言，感到今天你“剝奪”或“接管”我，明天你又會被別人“剝奪”或“接管”的循環怪圈，又使我發現自以為是“高舉紅旗”的“文革先鋒”，十分“革命”的軍報，原來還有比它更更更更加“革命”的，致使自己成了原“下屬”的“下屬”。其實這時誰“革命”誰“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全憑林彪、葉群和江青、陳伯達之流一句話，就看他們今天用得著、靠得上誰，誰就是“御賜”、“官封”的“革命左派”。本來最“革命”的老“左派”軍報，今天也落到了這步田地，既是個悲劇，也是個報應，誰叫你們原來那麼“左”的？我正在樓上參觀旁聽揪鬥趙總編時，只聽樓下又亂哄哄地傳上話來，說陳伯達來了。原來在“三軍”出動控制了軍報局勢後，“中央文革”頭頭陳伯達也親自上陣拍馬而來。這倒“救”了趙總編，樓上正進行的鬥趙大會只得中止，我原以為陳伯達也會上樓來，卻聽說他不上來了，不知是因為他人胖肚子大，爬不到五樓上的大會議室，還是因為現在聚集的人太多，除了來支持“革命”和“接管”軍報的“三軍”派大隊人馬，還有軍報本身的工作人員及印刷廠的職工，再加上住在本院的家屬以及別的單位聞風而來的人，總共約有好幾千人，樓內根本擠不下，就在辦公樓前院子裏，臨時搬來幾張桌子椅子，又安上了“麥克風”和喇叭，形成了一個半自發的群眾大會，由陳伯達親臨指導並發表講話。在他開講以前，先宣佈了軍委和“中央文革”的最新決定，說在軍報成立“臨時總編組”，任命肖力為“總編組組長”，其“組員”是軍報內幾個與唐、胡二“代總”和趙總編的問題沒有什麼牽連，看來比較“乾淨”的業務幹部。這就宣告了以肖力為首的軍報新領導班子的光榮誕生。又宣佈了由“三軍”派來的以“協作組”為名的，即以《空軍報》為主的那一批人也進駐軍報並正式開始工作，由他們組成了一個“輔佐”肖力“執政”的辦報工作班子。在宣告這些新班子成立和新領導人任命後，陳伯達以他那不像中國話的“中國話”開講了，誰為他當的“翻譯”我已忘了，只在後來見到的一分講話記錄稿上看到，他首先“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到《解放軍報》(來)支持新革命造反突擊隊肖力同志”等三人的大字報，他說“這是一個很

好的大字報。在《解放軍報》開始揭露了隱藏在我們黨內的一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趙易亞。這個卑鄙的資產階級政客，到處投機取巧，投機倒把，招搖撞騙。他的作風是很惡劣的，是拉一派，打一派，主要的是要包庇那些很壞的人。他原來的歷史就是很可疑的。他在研究院就做了很多罪惡的事……這些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沒有及時地向黨揭發這件事，我是感覺到很慚愧的，現在我們的革命小將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就把他給揭露出來了。我們的幾位革命小將和肖力同志風格比我高，他們做了我遲遲沒有做的事。我覺得我應當向他們學習”。他又說“《解放軍報》是一個很重要的報紙……這個報紙辦得好還是不好，關係到我們黨的榮譽，關係到解放軍的榮譽，所以大家都要關心，一定要把報紙辦好。現在已經(半夜)12點鐘過了10分，因為大家要趕快編報，所以我就不多講了。”但是這個已經宣佈“不多講了”的“中央首長”，沒等放下話筒卻又接著說道：“我完全支持剛才宣讀的以肖力同志為主的主持《解放軍報》臨時總編輯組。這一年多以來，《解放軍報》是起了許多變化。推翻胡癡的領導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現在接著推翻趙易亞的領導這是一次偉大的勝利。就是蕭華、劉志堅、胡癡、趙易亞這些人作怪，使我們《解放軍報》受到很大的阻力。現在把他們推翻了，還要繼續揭露……讓大家更進一步的曉得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真面目。因為趙易亞到你們這裏來他還有許多偽裝，有很多內幕，大家可能還不清楚”，因此他號召人們“來大量的揭露他，公開揭露他。”最後他又說：“希望你們緊緊地團結在以肖力同志為首的臨時總編輯組的周圍。我再說一下，這個報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非常關心的，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非常關心的，你們一定要用很大的力量來做工作，不辜負毛主席對《解放軍報》的希望，不辜負林彪同志對《解放軍報》的希望。慶祝你們的勝利又勝利！”

直到這時，人們才看到了一個事實，雖然當時誰也沒有這麼說，甚至沒敢這麼想，至少我自己就是這樣，即陳伯達所說的“勝利又勝利”，就是肖力終於打下了別人，由自己上去取而代之。從今年一月起的大半年時間內，以肖力為首的“突擊隊”及其“新突擊隊”，連

續搞垮了軍報的幾套領導班子，即原唐、胡二“代總”的班子，正準備上臺的“一·一三奪權”班子，臨時黨委中的內部運動領導，和趙總編主持的領導班子，還有加上“一·一三事件”以後也躍躍欲試地“倡議”組成的那個“新領導班子”，一共是五個班子和四屆主要領導人，平均一個多月摧毀一個，這才使她從勝利走向勝利，並且取得了未必是最後的卻是當時最大的勝利，其勝利的標誌就是肖力登基上臺，成為軍報有職有權的“第一把手”。說白了，她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揪出”那個，今天不准那個奪權，明天反對這個領導，其實都是為了使她自己上臺掌權，而她的“一·一三”、“六·一九”和“八·二三”等大字報，都是正如其偉大父親所言，是為了推翻各個“政權”而進行的“輿論準備”。當初被肖力第一個“打倒”的軍報“胡代總”，直到“文革”以後，才以自己工作幾十年時間和十幾年磨難的經歷，悟出來“真理”似的感歎地說，在肖力進軍報以後“江青早就婉轉地讓我交權，可我始終沒能領會”，江青又“讓我‘加強一下軍報領導班子’……實際上是要我讓權，但是我當時一點也沒有領會”，直到一月十二日晚上，即肖力的“一·一三”大字報貼出前夕，江青直接“逼我交權，我仍然沒能領會”其真正目的，與和、宋等人一起擬了一個領導班子名單，竟送交江青過目，江青一看這“名單中沒有提肖力，這下可觸怒了江青，於是(她)夥同林彪捏造了莫須有的罪名，對我下了毒手。”曾被陳伯達稱為“不癡”的“胡代總”，在這一點上真是太“癡”了，他居然一直“沒有領會”江青一再要他交權讓權的真意，到底是交和讓給誰，更“沒有領會”江青讓肖力到軍報到底是幹什麼來的，又在多次提醒後仍不覺悟，最後還將沒有肖力的新班子名單請江青審批！這麼“癡”的人怎能不挨江青的“毒手”呢？話說回來，如果他那時真的“不癡”，在他擬定的新班子中有肖力，甚至是“第一把手”，即把自己在軍報的位置迅速讓給肖力，江青當然就會“龍顏大悅”，不僅不會打倒他，反會賜他高官厚祿直上升到“中央”以作回報。雖然後來也會跟著林彪“四人幫”一起垮臺，但是至少能夠風光一段時間。所以“胡代總”曾經深感悔悟地說：“當然，我被打倒是遲早的事，無論對他們，還是對

我，都是越早越好！”

再以此類推，如果蕭華讓軍報搞的那個“臨時黨委”，不是只“選”肖力當一個空頭的委員閑差，至少給他一個領導運動的副書記位置，後來那段運動決不會又犯“反動路線”錯誤。此後將趙易亞調任為軍報總編輯兼黨委書記，更是直接擋了肖力的路佔了她的位，江青當然容不得這個趙易亞，這才又出現了“八、二三”的“反復辟”直至剝了“趙易亞的畫皮”。實際上這也“剝”了江青等自己的畫皮，她所以一直“關心”和無比“關懷”軍報，以致高度“信任”地將自己的女兒派來軍報，在她一再提醒告誡“交權”、“讓權”和“加強軍報領導班子”時，有關的人總是不能“領會”其“指示精神”，就是不安排肖力“接班”上臺，迫使肖方親自發動和組織了一次又一次“突擊”，帶頭“推翻”了軍報一個又一個領導人，最後在江青與林彪、葉群的合謀下，調動“三軍”武裝開路拱衛，又由陳伯達赤膊上陣拍馬抬轎，直至將“龍女”肖力推上軍報“第一把手”的寶座，這才實現了江青奪軍報大權的最終目的。

江青夥同林彪使肖力在軍報掛帥受印之後，報社內的各個群眾組織，呼拉一聲全都歸順到了肖力麾下，——成為以“新突擊隊”為核心的外圍組織，為了體現當時中央號召的“大聯合”精神，在軍報成立了一個“新革命造反兵團”，又以“兵團”為主吸收除曾追隨唐、胡和趙易亞等“右派”以外的各個組織及人員，建立了一個範圍更擴大的“八、二三公社”，這就在軍報內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政權”體系及其機構。其“領導核心”是肖力及其“新突擊隊”，一切方針政令皆由那裏發出；全社除“突擊隊”以外的群眾組織，都按中央和軍委關於“歸口大聯合”的規定，在各個處成立了名為“紅色連隊”的基層組織，如記者處叫“紅記連”，通聯處叫“紅通連”，我們美術組所在的總編室，則叫做“紅(色)直(屬)連”，各連有一個“勤務組”，其職權類似過去的支委會，我和老組長曹振峰因為是反對胡和趙的(主要因為他們整和壓過我們)，也被選為紅直連的“勤務員”之一，由於老曹是被肖力等稱為“三八式”的老同志，他被推為“連長”，這使我們都成了肖力領導的“紅色政權”的“基層幹部”。主

持報社日常工作的“臨時總編組”和“三軍協作組”，相當於中央和國務院的最高執政機關，“造反兵團”相當於全國人大，“八、二三公社”則是全國政協似的統戰組織，由此就堂而皇之地創建了一個“以肖力同志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

這個“政權”確是“紅色”的，除了是由中央、軍委特別是“中央文革”的“紅色大旗”直接護衛和包裝下建立起來的，本身就是“自來紅”的肖力，當然更是“高舉紅旗”的，手下有着作為“紅色核心”的“突擊隊”，又有一批“紅色連隊”拱衛著，就使這個“政權”從上到下、從裏到外都是一片“紅色”。此外，它又是被軍報的許多幹部群眾，尤其是一些領導同志及其下屬、親屬們的血淚染紅的。按照陳伯達講話及肖力大字報重申的“林彪一·一七來信”的精神，八月二十三日當夜不僅將趙易亞及他從馬列主義研究院帶來的杜副總編，立即揪出關了起來，並且將已從衛戍區放回來的“胡、和、宋陰謀小集團”主要成員重新擒拿歸案抓了起來，又把首犯“胡代總”二進宮後，再和趙總編他們一起，都由衛戍區押走進行看管“監護”。就在趙總編被揪出時，他的妻子林靜大約也聽到了陳伯達的講話，於八、二三當夜寫成了一張大字報，說陳伯達誣指趙易亞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其實他自己才是個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據說她為此列舉了一些例證，無情揭露了陳伯達的劣跡醜史。林靜也是位老同志，人如其名地十分文靜內秀，她在那時拍案而起公開痛斥陳伯達，決不是一時衝動之事。但是她的大字報貼出之後，立即被人為防止擴散將其撕掉銷毀，所以許多人只聽說卻沒見過這張大字報，寫此大字報的林靜同志，馬上就被拉出批鬥，然後作為“攻擊中央首長”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監禁，直至後來被摧殘折磨得死在獄中……這類慘事還有很多，這裏僅先帶過。

以肖力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建立以後，她不僅取得了全社的絕對權力，還獲得了一呼百應的強大“威”望，雖然這時她仍然還是個才二十多歲的出校門不久的女學生似的“新兵蛋子”，卻一下受到了幾乎所有人的敬重實際是敬畏，人們都用一種明為贊佩暗是恐懼的心態和目光注視著她。我後來由此想起一個民間故事：說有個人自稱



本書作者（左）與李訥，2000年代攝

不怕鬼，與人打賭在夜裏到一處滿是破棺材的墳地裏，在每一個墳頭或破棺上放一個饅頭，當夜他去放時，在一個破棺上剛放了一個，裏頭卻又伸出一隻手來說：再給我一個。嚇得那人拔腿就跑，破棺中卻跳出一人笑著叫他別跑，原來就是與他打賭的人，特意來試試他是否真膽大。哪知前面那人雖然認出了他，卻跑得更快了，打賭者在後面叫他道：“是我，跑什麼？”那人卻指著打賭者後面說：“我不是怕你，是怕你後頭那個！”打賭者回頭一看，自己後面果然撲上來一個極其可怕的惡鬼，原來他們打賭被別人聽到了，第三個人就在打賭者後面又裝成惡鬼來嚇他，驚得他大叫一聲氣絕而亡。我曾暗自想道，其實所有的人怕的都不是肖力本人，而是怕她“後頭的那個”，那才是真正可怕並且誰也逃脫不了的魔鬼。我這個“罪惡”的念頭剛一閃出，立刻就被自己連皮帶毛咽了回去，在所有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和“向黨交心”時，都沒敢交代曾有過這種可怕想法，特別是這一“萬惡”的比喻，反而總是竭力從正面來認識和對待當時已被人們尊稱為“敬愛的肖力同志”。

也是在“八·二三”以後，肖力在自己的“紅色政權”已經建立並基本鞏固時，她才正式傳達了林彪於七月二十五日向她面授的密令：“要戰鬥，要突擊，要砸爛總政閻王殿！”不僅在軍報傳達，還傳達到總政等各大單位，這使總政的造反派“聯絡站”，馬上將肖力推舉為“第一”或“總勤務員”，於是她就又成了全總政的“革命領袖”。這一時期內，肖力還傳達了林彪對她的又一指示，說她有一次見林彪時，“副統帥”叫他大膽地幹，說自己在二十多歲時就當軍團長了，年紀很輕也能幹大事，林彪說：“要大膽地工作，我在你這個年齡，就已經帶兵了。現在你們應該接班了。你雖然年輕，但是總比趙易亞、胡癡好，起碼在政治上是可靠的。你們要有一個比較強的領導班子。”肖力在傳達林彪這些話時，確有一副“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豪邁氣概。據她的“突擊隊”戰友透露，當年有一天她坐在總編輯辦公室的大皮椅子上說：“這把椅子我坐定了，誰想攔我也不行！”以後又被傳出據說她講的是“無產階級打下了天下，就是要坐天下。”這樣，軍報“第一把手”的“交椅”和“無產階級的天下”，從此就得由肖力這樣天生的“紅色接班人”永遠坐下去了，我們也都“幸福”地成了以她為首的“紅色政權”治下的臣民。

不過肖力當時畢竟還是一個年輕姑娘，她同時又向我們展示了自己的另一面。有次我和幾個人與她在一起時，說起紅衛兵見毛主席的事，我說有的人一輩子就見過一次毛主席，更多的人一輩子也見不著，你卻天天都能見到他老人家，你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聽了卻感歎地搖搖頭說，不，我現在也不是天天都能見到，有時候個把月才能見到一次。後來我知道她說的是真話，那時江青要見毛主席，也要事先得到他的批准，並不是什麼時候想見就能見到的。可是我聽了卻以為，這是她為了“保密”或“謙虛”才這麼說的。在報社內外以至全國上下人們都知道了她的真實身分以後，並對她表示出極大的敬佩、敬重或敬畏時，她有次在報社的全體大會上，莊重而嚴肅地向大家說，我爸爸讓我告訴大家，我唸了十幾年書，其實中了十幾年毒，剛出學校門，什麼也不懂，還很年輕，很幼稚，也很蠢，是個娃娃，你們都是我的叔叔和阿姨，我要向你們學習，各方面都要請你們多多

幫助指教和批評，我沒有經驗，如果有了錯誤，怎麼批評都行。她還用了當年“文革”時的流行語言不無諷刺地說，大家對她“炮打”、“火燒”都可以。又將她在五樓上住的房間號碼告訴人們，說誰有事就隨時找她去。直到現在，我還認為肖力轉達的那位老人家的話，是真實而正確的，並且為偉大領袖如此嚴格地教育和要求自己的孩子，而深受感動和格外崇敬。只是對她說的歡迎批評的話，一方面認為她是真誠的，一方面又想，現在的肖力已不僅是“突擊隊”的那個她了，她現在成了我們的領導，得時時維護她的威信和形象，又要注意她的態度和情緒。所以我本來在一些會議上，常愛發發言甚至放放炮，又常個人署名寫大字報、小字報，發表一些一家之言，有時曾引起她的注意，對我的意見表示讚賞和同意。在“八、二三”她上臺“執政”以後，我有時就不再那麼放肆地有意見就提和有話就說了，生怕說岔或提錯了什麼。我這個變化也被她注意到了，有次她主持一個會議時，竟指名要聽聽我的意見，我說自己過去說得太多太衝，容易走火，還是少說些好。會後她對我說，你本來是個有棱有角的人，這是你的優點，不是缺點，你應該保持，該說什麼就說什麼，不要和有的人那樣，像是沒吃“鈣片”似的。意即不要又軟又圓。我聽了竟非常感動，覺得她對我確是瞭解甚至讚賞的。我還看到她對別的同志，也常是這樣坦誠和熱情的，如果有什麼事做好辦對了，她就高興地說，來，給你個獎勵，說著就送對方一本新版的“小紅書”什麼的，或是一枚別致的毛主席像章，還要親手如授勳似的為人戴上。這時的肖力不僅很可敬，還是可親甚至可愛的。

但是她卻不是所有時候對所有的人都這樣，對於有的“當權派”，儘管並非“走資派”，只是報社的中層領導幹部，有的還是以她為首的“臨時總編組”成員，她對他們卻厲害甚至粗暴得很。有一次我見她向幾個中層幹部交代什麼任務，說完以後忽然板起面孔道，這個工作你們必須做好，如果完不成任務，就以黨紀國法論處！嚇得那幾個老同志戰戰兢兢，連著小聲應諾“是，是！”又一次有幾個中層幹部，其中還有個“臨時總編組”副組長，等於是她的主要業務助手，不知什麼事情沒有做好，肖力把他們叫過去，自己靠在沙發

上，卻讓那幾個人在她面前站著，又厲聲對他們下令道，你們全給我站好，立正！當那幾個從年齡到資歷都屬她的前輩的老同志，滿面惶恐又滿頭大汗地，緊張得抖抖索索地在她面前立正站著時，她又咬牙切齒地直指他們的鼻子道，我恨不得一槍斃了你們！當時我正好就在門外，意外地看到了這一幕，嚇得我趕緊跑開了，心想這時肖力手裏要真有槍，她真會把人給“斃”了的！這使我對她不由又從敬愛轉為敬畏，與她接觸時就更加小心翼翼了。不過有次我還是失誤甚至失職了，印象中是宣傳保衛“文革”英雄人物李文忠時，我受領任務連夜趕出一幅畫，配合宣傳，交稿後她審查時卻沒有通過，說畫中有什麼問題，重畫和修改都來不及了，版面上就缺了這一幅畫。天亮前我見到正等著出報的肖力，十分不安地對她說，今天我沒有完成任務，你批評和處分我吧！心裏準備著至少也得像那次幾個中層幹部那樣，在她面前立正站好，挨她一頓責罵狠克，誰知她聽了卻拍拍我的肩膀道，這沒有什麼，你已經努力了，還是回去休息吧！又說，你和他們（指幾個中層幹部）不一樣，我們都是自己同志嘛，有點事沒做好也是難免的。說著就將我推出辦公室，要我回去早點休息，當時我只覺“一股暖流湧心頭”，幾乎是含著淚回到家裏，忙將這事對妻子說了，使她也很感動甚至激動，說看來肖力同志對你真不錯，能有這樣的好領導，也太不容易了！當時卻沒有想到，正是這位對我“真不錯”，把我當“自己同志”的“好領導”，幾個月後就因為據說我“反對”了她，一下子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不僅使我遭受反復批鬥和長期關押勞改，還搞得我一家妻離子散……不僅“可敬”而且“可親可愛”的肖力同志，在我一家特別是我此生歷程中，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而且像我這樣的人，在軍報內還有一大批，據統計後來全社有九成以上的同志，都因為被認為“反對”過肖力，而受到過不同程度的懲處、批判至少是認罪作檢查。這些辛酸與慘痛的往事，已被“紀錄在案”。

除舊革新，改朝換代，軍報走向“新生”，
卻辦成了“大字報”；
鬥這個，批那個，心中有愧，
“戰略部署”發生分歧，肖力“因病休息”

以肖力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結、利用和合謀製造出來的，他們“活學活用”了毛澤東“槍桿子裏出政權”思想，由作為“槍桿子”的“三軍”派護衛支持著，又由陳伯達為其“輿論先行”開了路，才創建了這個確是“紅色”的“政權”。它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所說的“文革”是“大破大立”、“破舊立新”和“政治大革命”，甚至是“共產黨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等等論述。肖力來到軍報後，為什麼在短短的大半年內，連續打倒了幾屆軍報領導人，搞垮了幾套領導班子，直到最後由她自己擔任了軍報“第一把手”，她的“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這才解開了這個謎。她所以必須如此，是出於這樣一個思想觀點，即軍報雖然能夠“高舉紅旗”成為“文革先鋒”，主要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結果，而它後來所以“保守了，降低了，落後了”，其原因正如林彪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所說：“報社原來的人馬有些是落後了，有些要爭取”，肖力等更把報社本身的工作人員，當作是一種“舊思想、舊勢力、舊班底”，他們許多人特別是領導幹部，都是彭德懷、羅瑞卿、譚政和蕭華等的“幾朝元老”，從思想上、政治上到組織上，和一些“黑幫分子”、“反動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存在著一條“又粗又深的黑線”，總政是“閻王殿”，軍報則是“閻王殿的縮影”，是個“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的“藏污納垢”之處。我自己就在一次會議上，聽肖力不滿地指責報社的一些老同志說，你們都是沒有吃過“鈣片”的人，意即是軟弱無能、沒有骨氣和勁頭者。在她眼裏的軍報老同志，僅僅是些可以“團結、利用、改造”的“統戰對象”，決不能成為“革命”的主力軍特別是領導者，不然必將會“大權旁落”，因而出現“江山”易幟“政權”變色的局面。

也正因此，以她為首的“革命造反突擊隊”，第一批八個人除個別是出身較好，並且到軍報時間不長，“中毒”不深的人，其餘基本上是“文革”初期才調來軍報的，大都是來自部隊的年輕戰士，有的只是愛打打鬧鬧的“小不點”，但卻被肖力看作是單純清白的“新生力量”。到後來她於“八·二三”發起打倒趙易亞時，經改組後的“新革命造反突擊隊”，只剩下純而又純的三個人，成為“紅色政權”僅有的“核心力量”。不過，無論是當初的八個人，還是後來的三個人，只是登高一呼帶頭造反還行，要靠這麼幾個人“抓革命，促生產”和“促工作”即辦報紙，僅僅是人力也遠遠不夠，肖力不得不親自主持著，大力充實軍報的“新鮮血液”和“健康力量”，以改善甚至改變報社的人員成分，實現在軍報“改朝換代”的目的。林彪對此表示了直接的支持，他指示軍報新班子：“辦報紙主要是要有思想，要思想正確。有思想，思想正確就可以辦起來，不要講資格。毛主席當年辦報紙就是二十歲左右，馬克思、恩格斯也是二、三十歲開始辦報”，為此他批評原來的“幹部路線就是有些保守，太注意按資格，壓抑了新生力量，提不起來。”毛澤東老人家對於重視“新生力量”和學習“革命小將”更是有過不少“最高指示”。

肖力根據這些指示，決定從軍報以外調進“有思想”和“思想正確”的人，來“加強”實際是取代軍報原來的幹部，最早調來的是全軍以至全國“活學活用”的“頭號標兵”廖初江，接著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模範紅九連”指導員陳金元，這兩個人原來都在瀋陽軍區所屬部隊，是肖力本人直接找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叔叔”，點名將他們要來的，又在林彪的批准贊同下，從全軍各部隊選拔既優秀又年輕並稍有文化的人才，主要是當時正走紅的“活學活用積極分子”們，許多都是基層連隊的戰士，也有少數連、營甚至團的幹部，於一九六七年底以前，先後分幾批陸續調來軍報，隨後將他們分別派進或打入以致控制了報社的各個重要部門，使軍報各方面的實權一一掌握在這批“革命左派”手上，由此形成了“紅色政權”的基幹力量。他們這批人來到後，成立了一個叫“紅新兵”的戰鬥組織，組成一支在“突擊隊”帶領下對軍報實行“徹底革命”的“協同作戰

部隊”。新調來報社的這批部隊同志，特別是廖初江、陳金元等人，本身就是軍報多年來“吹”出來的，不僅關於他們的許多報導、通訊和評論，都是軍報“筆桿子”們的“智慧結晶”，連他們自己的文章、日記和講用報告稿子，不少也是由報社的編輯、記者們捉刀代筆的成果，他們的名揚全軍內外和全國上下，主要是靠軍報為他們作的“政治廣告”。現在他們都成了充實、加強甚至領導軍報的“新生力量”，由被軍報“吹”出來的人反過來“治”軍報，這也真是“還治其人之身”，讓“恩師”領教領教自己“學生”的厲害了。

“紅新兵戰鬥隊”中的很多人，在部隊時大都是活躍人物，一個個能說會道並擅長做“講用報告”，其中有一位“根紅苗正”並“苦大仇深”者，來報社不久就給大家作了一次“憶苦報告”，我當然是“受教育者”之一，只見那位同志憶起“萬惡的舊社會”時，不由聲淚俱下，在長著疤痕的眼睛裏，真的流下了滾滾熱淚，但他接著講到“幸福的新社會”時，竟立即眉開眼笑起來，音調也一下提高了七、八度，其變化速度之快和“新舊”對比之強烈，簡直像電影中的“切換”鏡頭。不久我偶然又趕上他給另一撥人再作“憶苦報告”，竟和我上次見過的一成不變又一絲不苟地完全“重演”了一遍，這使我忽然領悟到，他其實是個訓練有素功夫不凡的“政治演員”，他每做一次“報告”，也就是又作一次“表演”，他們的“活學活用”也就是這樣專門“表演”給別人看的。雖然軍報有的人，本來就是他們過去“演戲”的“編劇”甚至“導演”，現在卻不得不反過來接受這些“演員”們的“教育”和“領導”了。我閃過此念時，不由覺得既是心裏好笑又是身上發顫，天知道軍報由這樣一些人來“領導”，會是個什麼樣子？果然，不久就好戲連台了！

從“一·一三”到“八·二三”，軍報雖然換了幾屆領導，最後終於由肖力等“有思想”和“思想正確”的“革命左派”掌握了領導大權，但是報社是個“宣傳陣地”和“輿論工具”，編報紙寫文章的事單靠“突擊隊”加上“紅新兵”那夥人總是太懸乎，一向視“筆桿子”加“槍桿子”為命根子的林彪，也一再說“辦好《解放軍報》不僅關係到軍隊，而且影響到地方”，能“對全國的革命化起重大作

用”，所以對“報社原來的人馬……有些要爭取”。好在軍報的一些“筆桿子”們，早已在“革命烈火”中被錘煉成“黨的馴服工具”，他們可以在任何情況和任何領導下，為任何政治方針路線服務，儘管在陳伯達和“唐代總”等接管了《人民日報》，使其恢復了應有的地位影響，軍報開始退居第二位，不再顯得那麼突出和冒尖了，但是它在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仍然是不遺餘力更不甘落後的。僅在“八·二三”前夕，軍報就為武漢“七·二〇事件”，既作了突出的和反復的報導，又連發了幾篇社論，有時甚至一天兩篇，如當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你們》，七月二十七日的《乘勝前進——祝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奪取更大新勝利》，七月二十八日的《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無敵——再祝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奪取更大新勝利》、《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七月二十九日的《堅決同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戰鬥在一起》，七月三十日又是一天兩篇，《新的考驗》和《再論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八月二日還是關於“武漢事件”的《軍民團結共同對敵》，八月三日又是《堅持生產崗位，嚴防敵人破壞》等等，文中所指的“敵人”並不是“帝修反”或國民黨之類，而是反對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黨內”和“軍內一小撮”特別是其“反動組織”。這些文章都是趙總編主政時，主要由軍報的老“筆桿子”們寫出的。其實這時肖力已經從林彪那兒接受了“砸爛總政閻王殿”的指令，定下了砸爛軍報這一“閻王殿縮影”的作戰計劃，正在密謀策劃揪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趙易亞。所以他當時即使如此“緊跟”著“以毛主席為首，以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略部署”也會跟不上形勢，不僅總是跟不上，結果還是被叫他“叔叔”甚至“親如一家”的，“二十多歲”就來辦報的肖力，一腳踢下了軍報的“寶座”。

在肖力就任軍報“一把手”之後，報紙宣傳和版面工作，主要由“臨時總編組”和“三軍協作組”分工合作負責。也許肖力為了感謝“三軍”派人對自己的護衛支持，或是“三軍協作組”借機突出自己所在的一派，那一段時期的軍報上，就大量出現了關於“三軍”派的報導和他們提供的文章，其署名為空軍的“紅哨兵”、“紅尖

兵”、“紅愚公”、“紅群文”等等，海軍的“紅聯總”、“井岡山革命造反團”等，北京軍區、總後和二炮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等等，林彪“寵兒”般的空軍司令吳法憲，以個人署名連發了幾篇文章，每次都佔了重要地位和不少版面，海軍內追隨林彪的李作鵬及其“戰友”，也在軍報上登出了照片和發表了文章，有時還整版整版地還登了“三軍”派的大字報和“大批判專欄”文章，特地附發評論讚揚其“好得很”。這時的軍報算是“跟上形勢”和“進步”了，只是其質量實際上卻真正降低了，將一個堂堂大報降到了牆頭大字報的水準，常常打開報紙雖都排滿了大小鉛字，卻沒有多少值得一讀的好稿子，每天各版上充滿了狂熱地“歌頌偉大領袖”的內容，有時在一版頭條以通欄大字標題報導，林彪、江青或別的什麼“中央首長”在某次會議上，“報告最最振奮人心的特大喜訊：毛主席身體非常非常健康”，當毛澤東參加什麼活動或接見什麼人時，只以大標題宣揚他如何“精神煥發，神采奕奕”，或稱頌他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等等，卻又沒有什麼具體內容，有時只有佔一版上部三分之一至少四分之一位置，精心裝飾過的大號美術字，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或是林彪手寫體的“四個偉大”，有時連著幾行大標題竟全是各種“萬歲！”就在肖力於“八·二三”上臺後第一天，即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的軍報一版頭條，就出現了後來遭到毛澤東嚴厲批判的“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以同一口號為標題又多次出現在軍報各版，直到老人家批評以後，這個提法才在報上消失不見了。在中央發佈毛澤東視察各地的“最新最高指示”時，軍報又和各報一起，為此發動了新的宣傳高潮，不只在每天報上發表全國軍民如何“歡呼”、“學習”和“擁護”等等消息，又在一版上方加框或套紅突出刊登毛澤東說“文革”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並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的新語錄。不過，稍稍細看一下，所有這些報導、文章和評論等等，顛來倒去就是那麼幾句話和一連串口號，幾乎什麼新鮮內容和具體材料也沒有，作為新聞媒體的報紙，雖然還擺著軍委機關報的架子，實際上卻成了一種每天都出又是千篇一律的大傳單。

軍報對偉大領袖的頌揚是這樣，對“副統帥”林彪的吹捧也是不遺餘力，林彪要是講了什麼話，全都是“極其重要”的“指示”，他的題詞手跡更是在一版用通欄和套紅加花框突出發表，然後又是說“全國軍民”如何為之“歡呼”等等，在一條關於空軍黨委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報導標題上，卻突出了“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如何如何，至於以林彪的話和語錄作為標題的評論、文章和報導，更是一篇接一篇地登，從而使“副統帥”的“次高指示”也日益“深入人心”。在全國到處武鬥成風時，江青對一些外地來京的造反派說“誰要跟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還擊！”並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反動口號，就是江青這麼一個流毒全國造成極大危害的講話，軍報也全力加以鼓吹和大肆發揮，號召全國軍民對其“認真學習”，結果是煽起了更大規模的武鬥。自稱“小小老百姓”的“大大野心家”陳伯達還常自謙為“最小最小的小學生”，於是在軍報文章標題或社論中，不斷出現了要做“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小學生”、“工農兵的小學生”或“群眾的小學生”等等。對於所有來自“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精神”和“戰略部署”，軍報總是連篇累牘又千方百計、花樣翻新地，竭力為其傳播、鼓吹和推銷，也就在“八·二三”以後的一個多月，適逢國慶十八周年，軍報與《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聯名發表了國慶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在“文革”初期，軍報常是單獨甚至首家發表什麼重要言論，在後來才稍稍讓位給了《人民日報》，現在正式以中央二報一刊名義聯合發表社論，不僅是進一步確認了軍報在“文革”中的“權威”地位，也將軍報正式列為中央主要發言機關之一，從而鞏固、加強和提高了“以肖力同志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的政治地位。在此期間，我及我們美術組也曾迅速貫徹和堅決執行了肖力和“臨時總編組”的各項指示要求，也為這些宣傳畫了一些畫或組來一些稿，雖然這類作品大都是公式概念和極其粗糙的，但怎麼說我們也是為之效勞過，也參與鼓吹了這些錯誤和反動的東西。

在“文革”這場“階級大搏鬥”中，人們的“政治警惕”被空前地激發起來，軍報的“革命左派”們在編報紙寫文章上水準有限，

但是對於“防止階級敵人破壞”，卻是嗅覺特別靈敏，簡直到了具有“特異功能”的地步，在許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上，傾注了極大注意，下了很大功夫。例如排字轉行時，凡遇到“毛主席”三字及其名字，都不得轉行拆開，必須三字連排，不准發生“砍頭”或“腰斬”現象。其高度警惕更擴展到在“毛主席”及其名字特別是其照片的報紙背面，都不得有任何貶意詞，以免在透過報紙看時，形成“惡毒攻擊”。所以那時的軍報夜班辦公室，專門設置了一個燈光拷貝箱，每天的報紙大樣出來後，就將正反兩面迭在一起透視檢查，如果發現問題，立即改版重排。至於在有毛主席形象的照片周圍，更加不得出現有正對著其形象的刺刀、槍口、炮口和其他劍、箭之類的“兇器”，這樣來檢查報紙，已成了每天必經的例程序，所以把編輯和排版工人們都折騰得夠嗆。那時報上不斷出現“萬壽無疆”四字，人們在抄稿或排字時，常常誤為“無壽無疆”，一經查出，有關的人立即當成“現行反革命”被批鬥，至少也是一起“嚴重政治錯誤”，這使當時許多同志在上班時，一直有著“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危險感，生怕自己不知怎麼就犯下了“滔天罪行”。遵照偉大領袖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最高指示”，肖力在抓“促生產”即出報工作的同時，又以很大甚至主要精力來“抓革命”即報社的內部運動。當時具體負責這方面工作的是以新“突擊隊”為核心的“兵團勤務組”，這個“勤務組”的職能有點類似黨委會或“文革”領導小組，肖力當然是這個“黨委”或“領導小組”的“一號人物”。勤務組根據她的指示與意圖組織全社“革命群眾”，對已被揪出來的社內“一小撮”，進行“徹底揭露，徹底批判”，頭號鬥爭目標就是趙總編。我當時以個人身分用“紅‘痞子’戰鬥兵”名義參加了“兵團”，又是“大聯合”組織“八·二三公社”下屬的“紅直連”基層幹部之一，所以也算是個“鬥爭積極分子”，由於我確實很想當個“左派”，好跟著毛主席和肖力幹革命，在批鬥趙總編時，也曾幹過和參與了一些至少是過火行動的蠢事、錯事，以致傷害過幾位老領導和若干好同志。雖然在我後來也作為“現行反革命”被揪鬥時，遭報應地受到了更狠的懲罰，但是自己對此卻永遠感到愧疚，但願有關的同志能予恕罪和諒

解。

我當時幹過這樣幾件事，其一，由於我家同那時許多人家一樣，也創造了一個“文革”中的“副產品”，妻子為我生了一個兒子，家裏請不起保姆，只能回老家把我老母親接來照顧產婦和嬰兒。但是在“革命鬥爭”的緊張階段，我要外出辦私事也要有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再則還想由公家為我報銷路費，就利用趙總編與我是同縣老鄉的機會，“主動請戰”到趙總編的老家，去調查他的“反動出身”及其“醜惡歷史”。這一“外調”計劃得到批准後，我就作為“出差”回到了家鄉，先去趙總編老家所在的本縣刁家鋪作調查，他家當然不是貧下中農，但也並不如何“反動”，他的歷史不僅不“醜惡”，而是三十年代後期就投身革命，是當地很有影響的進步青年。當我帶著自己搜集到的材料，更主要的是領著我的老母親回到北京後，領導上聽取我“外調”的情況彙報後，竟叫我到趙總編原在的馬列主義研究院，在那裏的鬥趙大會上，作一個揭露他“醜史”的發言。我為了不辜負“組織”上對我的信任和支持，給了我這次“外調”機會，更要對得起公家為我報銷的幾十元來回路費，只得採取了“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辦法，將在鄉下聽到的趙總編老父親的一個不雅外號，加以誇張渲染，以此來醜化趙家和貶低趙總編本人，當時在場的趙總編對我的“揭發”當然無可奈何，卻引起了批鬥者的很大興趣，使我那次發言贏得了不少掌聲，不過卻深深地傷害和攻擊了趙總編與其老父親。這使我此後一直愧對趙總編及其“父老鄉親”，深感不該對這位老鄉心上捅了這一刀。也許是“惡有惡報”，我這次回鄉倒是如願以償，順利地借機接來了老母親，後來卻因為回鄉時接觸過一些親友特別是我妹夫，使他們為此受到審查和衝擊，吃了許多苦受了不少冤。此事也將另行敘述。

我幹過的又一件錯事是，當時報社的“文革”運動，在“兵團勤務組”的主持下，對一些“鬥爭積極分子”的作用重視和發揮不夠，有幾位與我一派的年輕同志，就策劃著來一次行動，一是給當時的鬥爭“加加溫”，二是顯示一下自己的“戰鬥力”，我也自認是“積極分子”之一，應邀參加了策劃及其行動。那時軍報內除了

參與辦報的“三軍協作組”，還有不少“三軍”派的人駐在報社，不斷參加和指導著社內的“文革”運動，據說他們與林彪控制的“軍委辦事組”特別是吳法憲有直通熱線，還聽說吳法憲本人就曾秘密來過軍報，通過他們瞭解這裏的各種情況。我們在行動以前曾派專人去“請示”過他們，據傳達說，“三軍”派中的空軍來人說，他們那裏每層辦公樓都有鬥爭會，到處都是“戰場”，軍報的運動是應該增加“溫度”。這使我們很受鼓舞，就在批鬥趙總編的中間，突然將四個中層領導幹部揪了出來，認為他們既是唐、胡的“舊班底”、“黑幹將”，又是趙總編搞“復辟”的骨幹力量，衝他們一下將可以打擊報社的“頑固勢力”，就鬥了他們一頓，搞得這四位老同志狼狽不堪和十分委屈，我自己雖然是積極批鬥者之一，後來也認為這事做得太過份了。不過當時倒是長了我們一些人的“威風”，但不久反而成了這批主鬥者的一條“罪狀”，原因是在行動前並未得到“突擊隊”的明確支持和批准，而那時在軍報內凡是不由他們發起和帶領的行動，都是“非法”和不能允許的，這次帶頭搞此行動的正是原來“古田”隊的人，這時他們已解散回到各處，卻被認為是原“古田”隊為了與“突擊隊”來“爭中心，搶旗幟”，而“背著肖力同志”來“干擾”她“所貫徹的毛主席革命路線和運動部署”，因此是向以她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奪權”的反動行為，儘管我不是這次行動的主要發起者，但曾積極支持參加了這一事件，也是罪責難逃。“善惡到頭終有報”，我後來也挨了狠整，正是對我這一惡行的報應。鬥了一陣趙總編，又將“胡代總”從衛戍區拉回來批鬥，我當然也積極參加了，之所以如此，除了表示堅決執行毛主席批示的林彪的指示外，還有一種個人情緒，在對唐、胡二“代總”上，我一直對唐有好感，對胡卻不然，覺得他既不可敬更不可親，“文革”時知道他曾因我一幅畫的問題，上報到總政由保衛部對我秘密審查，好在我被查明並非“蓄意破壞”，才沒怎麼著我，但我知道此事後不由汗毛直豎，心想胡副總編竟企圖暗害我，也太可怕了。“文革”初期我又受壓，也是出於他的指示授意，所以他在“一·一三事件”中翻了船，我就認為“你也有今天”，出於一種報復心理，參加了對他的“堅決鬥爭”並“踏上一

隻腳”，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而我這樣對他其實是不對，胡副總編不僅是我軍新聞戰線的一位老戰士和領導人，更是被林彪、江青、陳伯達及肖力直接誣陷攻擊和迫害的一個老同志，就在當時，我也曾暗地為他感到冤屈，林彪有次竟無中生有地說他又是一個“叛徒”甚至“漢奸”，報社的“兵團勤務組”所屬“專案組”，多次派人對胡進行內查外調，找不到一點根據能證實林彪之言，完全是一種莫須有的枉加罪名，企圖將他置於死地。不過在林彪的“九·一三事件”與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後，我反而為他慶幸，要不是“一·一三”將他揪出，如果由著他跟林彪、江青一夥幹下去，及時將自己的軍報“寶座”，“明智”地讓給肖力，以換取江青對自己的褒獎，混個中央委員甚至政治局委員當當。真要那樣，他即使不成為林彪“死黨”，也逃不脫“四人幫”一夥的命運，到時將被當成一個真正的篡軍反黨陰謀集團成員，這才會真的“永世不得翻身”了。幸而從林彪、江青到肖力，早早就將他踢下了政治舞臺，實際上使他因禍得福了。不過他在才四十多歲正當壯年時，就被迫中斷了一直從事的新聞事業，埋沒以至糟蹋了一個人才和幹才，確也令人惋惜。但在政治角鬥場中，他這點“犧牲”，不也正是“小菜一碟”嗎？

軍報的內部運動，按照肖力指示和“兵團勤務組”的具體安排，鬥一陣趙總編，又批一頓“胡代總”，在“革命烈火”中匆匆地過去了幾個月，當年十月下旬，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對全國“文革”運動提出了新的方針和部署。肖力也在軍報提出了一個內部運動的計劃，但她沒有自己出面，只讓“兵團勤務組”的人將這個計劃拿出來，組織大家討論和準備實行。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從一九六八年初起“一月批鬥趙易亞，二月批鬥胡癡，三月批鬥華楠，四、五月進入整改，以新的面貌迎接九大”。勤務組的那位外號“×老二”的“二號勤務員”，宣稱這是軍報運動的“戰略部署”，似乎只要大家一致通過照章執行就萬事大吉了。當時也確有不少人，完全肯定和堅決支持這一“戰略部署”，甚至宣誓地說：“頭可斷，血可流，也要把這一戰略部署，把肖力同志交給我們的戰鬥任務拿下來！”偏偏我這人積

習難改，總是不會也不願吹捧討好什麼人，又遵循偉大領袖教導，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麼，不肯隨聲附和與盲從，這時竟認為這個所謂“戰略部署”，既是讓大家討論的，就可以發表不同意見，其實我這時也是自作聰明和自討沒趣，竟根據當時反復宣傳和不斷強調的“最新最高指示”說，毛主席指示“要鬥私批修”，才是“文革”的根本方針和偉大綱領，軍報的這個“戰略部署”卻一字不提怎麼“鬥私批修”，似乎整個“文革”運動就是只批鬥幾個人，我認為這個“戰略部署”有問題，與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不一樣。我這個意見是在肖力不久前“語重心長”地說我“有棱有角”是“優點”，應該“保持”以後說的，偏巧這次討論會她本人也參加了，我以為他會表揚我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哪知這次我卻逆了“龍鱗”，她聽後竟很不愉快地站起來，先講了一下那個計劃或部署的意義和必要，接著把那個說“頭可斷，血可流”的同志，大大表揚了一頓，說就應該有這樣的鬥爭決心和信心，而不能在這樣的重大問題上“唱反調”和“動搖軍心”。她說這話雖然並未提到我的發言，也未點我的名，甚至沒有朝我看一眼，我卻一下意識到，他的話主要是衝著我來的，只好不再開口，但在心裏卻以為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因為是維護“最高指示”和執行毛主席“戰略部署”的，相信他老人家親自教導出來的肖力，會和我們一起來“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此外還有一個“善良”的願望，即這個“戰略部署”並不是她“親自制定”的，而是她手下特別是“勤務組”的“X老二”那樣的人搞出來的。因為在她身份公開以後，身邊和周圍確曾有過一些人，對她作出巴結支持的樣子，企圖來討好和影響她，我很耽心才二十多歲出校門不久經驗不足的肖力，被什麼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或慫恿她幹些不要的事，說些不當的話，所以應該及時對肖力適當提醒一下，哪里知道我又犯了個極大的錯誤，真是想拍馬屁卻拍到馬蹄子上去了。

在我國“第一家庭”中培育成長起來的肖力，雖然在年齡資歷上與我們比相差不小，但其“政治敏銳”和“階級警覺”卻遠遠地超過了我們。我在“天真”地想提醒或幫助人家，對方卻並不領情。據一位一直在她身邊的自稱能“代表”她的某“小將”後來透露，肖力曾

佈置他將我的一言一行記下來，她要看我“怎麼表演”。肖力到底有否這麼交待過，外人不得而知，但在我聽說此事後，確實非常震驚，心想她怎麼能這樣做呢？她當面對我和許多人可從來不是這樣的。也就在她上臺以後，她感到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主要是曾在臨時黨委所屬的“文革辦公室”呆過一陣，又被稱為“張氏文革”的幾個人，對她手下特別是“勤務組”的某些人不大服氣，常對他們提出批評和表示不滿。肖力有次把我們這些人找到一起，似乎十分坦誠親切地要我們也能支持和幫助她，使大家團結一致共同對“敵”，即對趙、胡、華等“走資派”及其“反動勢力”。有人說她當時還曾對我們說過，她的那個班子即“兵團勤務組”，不如我們這個班子，希望我們不要拆臺，而要補台即幫助他們。我們有人就聲明，現在並不存在我們這個“班子”。也許我那時沒有在意，她是否說過這話，總是印象不深。誰知正是根據據說是她說過的這話，以及別的什麼話，如她說：“你們奪權可以，我們就再奪回來”等等，我和不少同志因此被打成了“陰謀顛覆以肖力同志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的“反革命小集團”，此事這裏就此帶過。

對於肖力與我們的這次談話，我一直以為她與我們都是相互信任並無惡意的，並且對她說的“我們都是自己同志”甚至是“好同志”這句話印象很深，卻未想到如後來有人認為，她當時事實上已把我們劃到了自己的“反對者”一邊。也就在那以後，即一九六七年年尾和一九六八年年初，軍報的情況又發生了一個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正是在這次變化後，我和當時比較接近和氣味相投的一些同志，取代了一直被揭批鬥著的趙總編與“胡癡陰謀小集團”的地位，成為“軍報紅色政權”的又一批重點打擊對象。

就在軍報走向“新生”，“紅色政權”正在鞏固之時，肖力卻突然離開了報社，這是一九六八年元旦時發生的事。在一九六七年的最後幾個月，看得出來肖力確實十分辛苦，除了不斷去釣魚臺和中南海（這時她已不騎自行車，有專車接送她了），許多時間都在軍報內，白天忙於“抓革命”即運動上的事，每天晚上還得“促生產”，在夜班坐鎮監督報紙宣傳上的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要發

“中央二報一刊”的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論，她為了堅守崗位親自把關，以保證這期報紙不出一點問題。這天夜裏我也一直在辦公樓裏，見她一夜未睡，正在看剛剛印出的當天報紙，我不無感動地對她說，你天天這樣熬夜不行，也該好好休息了。她說，我和你不一樣，任務不同，休息不下來呀！說著反催我快回家睡覺去。這時我心想將以加倍努力的工作，來回答她對我的關懷愛護。卻沒想到，正是從這個元旦開始，我就進入厄運，到下一年即一九六九年元旦，我早已成了軍報“牛棚”中的“牛鬼蛇神”即“現行反革命分子”，再下一個即一九七〇年元旦，更成了在農村被“監督勞改”的“專政對象”。也就從一九六八年元旦被肖力攆出辦公室後，“文革”中我就沒有再見到她，但是我的全部生活特別是問題，卻從未離開過她及她的影響。

元旦那天夜班後她就沒有再來，元月二日社內傳達軍委一項指示說，肖力因健康關係，暫不來軍報上班，軍委決定她去休息養病。以後我聽說，她在元旦早晨檢查完當天出的報紙，到食堂吃早飯時，累得一下暈倒了，一直在她身邊的幾個“突擊隊”的“老”同志，立即找人對她進行救治，她蘇醒後向人交代了幾件事，就被用專車送回了中南海。我聽了這事，也異常感動，心想她這是忘我工作而累倒的。雖然元旦早上我也曾見過她，並未發現她有什麼異常跡象。不過正是從那一天起，她就再也沒有在軍報出現過，又過了一段時間，聽說她已是“中央文革”的辦事組長。整整一年以前，這個職務是她的“好叔叔”即軍報記者處宋副處長擔任的，宋副處長被作為“胡癡陰謀小集團”主要成員被揪出以後，這個位置上又連續上來下去好幾個人，幾乎都是椅子還沒坐熱就被“揪出”或踢下去了，只有到了肖力上任，才算穩定下來，實際由她擔當了相當於中辦主任的重任。我後來意識到，她的忽然“因病休息”，其實是按已定“戰略部署”進行的，她在離開軍報以前，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此事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軍報組“軍管”軍報，不准“干擾”肖力， 她卻另有“熱線”遙控； 正閉門“鬥私批修”，卻“樹欲靜而風不止”， 又擂起“第五次戰役”戰鼓

篡改一句當年的“最新最高指示”，“文革”期間從全國到軍報，到處都是“形勢大變，不是小變，整個形勢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其變化快得使人適應不了以致手足無措，那時有不少人被稱為“頭上插根草，隨風兩邊倒”，或是“軸承脖子彈簧腰，見風就轉隨風倒”等等。我從未受過這方面的訓練，缺少這等功夫，又自認“頭上沒辮子，屁股上沒尾巴”，不只出身於“紅五類”，又是有“紅小鬼”經歷的年輕“老”革命，歷次政治運動都表現積極並屬“左派”，更有點傻裏瓜嘰認死理，雖然也在認真學習並想堅決執行“最高指示”，更真心誠意地想“緊跟”毛主席及其愛女肖力，可是不僅總是跟不上，反而事與願違適得其反，我竟在“文革”的第三年即一九六八年中，忽然成了“瘋狂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其革命路線和以他老人家為首、以林彪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尤其是“瘋狂反對敬愛的肖力同志”，甚至“陰謀顛覆以肖力同志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犯有“五反對一陰謀”等“滔天罪行”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此事由來如下：

在肖力於一九六八年初忽然“因病暫離軍報休養”前，她實際上已對軍報的工作作好了安排，其中最重大的一項，是在軍報已有的“臨時總編組”、“三軍協作組”和“兵團勤務組”之上，其實是在以她為首的“突擊隊”和這些組織之間，新加進了一個名為“軍報組”的機構。這個軍報組是根據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指示，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中央軍委下令組成的，同時成立的還有以軍隊幹部為主的一個“軍委政工組”，負責接管和處理已被“砸爛”的“總政閻王殿”的事情，又有一個“文藝組”，負責接管處理更早就被“砸爛”的另一“閻王殿”——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事。十二月八日，林彪與周恩來、楊成武以及江青、陳伯達、姚文元和謝富治

等，一起鄭重地接見了“軍委政工組”、“文藝組”和“軍報組”。林彪在接見中除了又大講一通“突出政治”等高論外，說這三個組都是搞政治工作的，其具體任務一是抓思想，即負責將人們的思想都統一到毛主席、黨中央及“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上來。二是抓幹部，即解決好上述各單位的“組織革命化”問題。林彪對軍報組特別關照：“軍報要多找伯達同志，姚文元同志”。他講話後楊成武以軍委辦事組負責人的身份，對軍委的命令作了說明，強調了各自的任務和作用，江青、姚文元等也講了話，周恩來表示了贊同。

組成軍報組的是三個部隊政工幹部，一是駐山西某軍的政委，二是舟山守備區政治部主任，三是駐福建某炮兵師的政委，他們似乎都沒有什麼從事宣傳工作特別是報紙新聞工作的經歷和經驗，也許主要只是政治可靠和略有文化而已。“文革”中常有這種事，一些本來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忽然一步登天成了名人要人，只是有的沒有風光幾天，又一下倒了台，各種人物都“走馬燈”似的陸續出現又迅速消失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軍報組的這幾位幹部其實也是這樣，不過我當初並未想到，他們來到軍報和進行活動，竟直接影響到我的命運。十二月十二日，肖力主持全社大會，歡迎了軍報組的三個同志，肖力介紹他們說，“這是新調來報社工作的三位領導幹部”，三人中為首的一位趕緊聲明，他們將“在肖力同志領導下進行工作”。在此前後，中央軍委又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和十二月二十三日連續下達命令，從各部隊選拔來二十多“活學活用積極分子”和十多名營團一級政工幹部，一起調到軍報工作。於是，在一九六七年年終以前，軍報辦公樓內又出現了一大批新面孔。軍報組到軍報的十幾天後，肖力就說是“暫離”卻再也沒有出現在軍報。人們開始並未意識到其中有什麼問題，但在事實上，軍報卻從此又進入一個新的“歷史轉折時期”。

我事後認為，“中央文革”即江青早已內定由真正是江青“心腹”的肖力，來擔當“辦事組長”的重任，以免這個要害位置再落入外人甚至“壞人”之手，但是肖力已經奪取並控制了軍報領導權，決不能輕易丟掉，就用“因病暫離”的辦法使自己先從軍報脫身，但仍把持著她在軍報的各項權力。鑒於軍報內的“臨時總編組”，實際

上只是可以利用來辦報的“留用人員”甚至是“監管對象”，“三軍協作組”又只是為了支持護衛肖力上臺而臨時湊起來的一些人，“兵團勤務組”更非主持主管軍報的工作班子，處於這些組織“核心”地位的“突擊隊”，既不是辦報的材料，又不能陷入報社的日常事務之中，就需要一個能執行肖力指示，並為她具體管理報社，又有一定地位和較高水準的領導班子。顯然又是由江青與林彪合謀，才成立了這麼一個“軍報組”。不過老謀深算的林彪，卻乘機打起了別的算盤，他和江青雖然都一心篡權和狼狽為奸，卻又是互相利用和各懷鬼胎的兩丘之“貉”，軍報本是軍隊即林彪的領地，現在卻由江青“心腹”抓去了，不能不影響他對軍報的直接控制，他對此當然不會甘心，正想把軍報從江青手中再抓回來，成立“軍報組”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機會，也可以利用時機設法將肖力慢慢擠出軍報，使其成為自己的獨佔地盤，所以他才對“軍報組”格外重視，與“軍報組”同時成立的“政工組”、“文藝組”，都是全軍、全國性的工作班子，“軍報組”只是專管一個具體單位的三人小組，他卻將其放到了同樣重要的位置上，與另兩個組一起被他接見和聽取指示。所以“軍報組”在進入軍報後，實際成了被林彪一方和江青一方互相“拔河”的對象，只是因為他們都是軍隊的人，當然地被林彪“拔”了過去，這就違反了江青和肖力最初的意圖，兩者之間也就發生了角逐與爭鬥，後來的情況發展，證實了我的這一推斷。

由軍委正式通知軍報說肖力“暫離休養”的當天晚上，軍委辦事組負責人楊成武代總長，接見了軍報組三個人及“臨時總編組”、“三軍協作組”和“兵團勤務組”的負責人，聽取了他們對軍報情況的彙報，並對軍報下一步的工作，作了一些具體指示，又要求將報社一些正“靠邊站”著的幹部分批“解放”出來，還特地批給軍報二輛“上海”牌小轎車，最後又留下軍報的這些幹部，與他共進夜餐以示親切並給予鼓勵。正是在這次接見中，楊成武對已成為軍報主要領導班子的“軍報組”交待說：“肖力同志病了，讓她好好休息，你們要做好工作，使她安心休養，不再心掛兩頭，這就是對她最大的尊敬與愛護。”談話中曾幾次要軍報組等報社各個組織，“你們都不要打

擾肖力同志”。另有材料說，楊成武還具體規定報社各組織對肖力都“不准送材料，不准送文件，不准打電話，不准寫信”等等，說這是為了不“干擾”肖力。當時有一件事開始被人疏忽了，後來卻被認為是個極大的問題，這就是楊成武此次接見軍報各個組織的人，並未通知應是這些組織的“核心”的“突擊隊”，因此可以說，這一事關軍報問題的重要活動，是背著“突擊隊”以及在他們後面的肖力的，楊成武要人們都不要去“打擾”和“干擾”肖力，是直接與肖力自己的要求及想法相反的，實際是與其指示的對抗。據透露，肖力在離開軍報後，“曾明確指示”，在她“休養”期間，必須將軍報情況及時向她報告，平時可以每週向她作一次綜合報告，重要問題則隨時報告，但不必等她拍板決定，只是向她備案，以便掌握情況動向，應發給她的各種文件，也每週一次集中送給她。她的這些要求是向只聽命於她的“突擊隊”專門交待的，“軍報組”等各個組織也是知道的。這一指示表明，即使肖力不在報社，她也要繼續瞭解、過問和遙控著軍報的一切活動，而楊成武卻要求人們讓肖力“安心休養，不再心掛兩頭”，即讓她別再管軍報的事。

正是從那時開始，軍報組三個人加上在他們前後調來軍報的幾十個部隊幹部和“活學活用積極分子”，分別進入或主持了報社原有的各個組織，以分兵把守和控制全局，由於他們都不會也不懂編輯出版工作，除有人坐鎮夜班和版面組以示“監督”外，大部分人放在“專案”、“審幹”和辦“學習班”等內部運動的領導機構內，連行政部門也派去專人，本屬軍報內部“群眾組織”的“兵團勤務組”，也被派進了兩個人“抓全面”，至此，軍報組已“統一領導”了軍報的各項工作，而這是按照楊成武的指示進行的。在楊成武上次接見“軍報組”等人的一、二天后，他又召去“軍報組”和“臨時總編組”的人，說他已將軍報的情況向林彪作了報告，林彪十分關心和重視軍報的問題，還曾表示，“報社的設想我看基本上可行”，表明“軍報組”的工作方針方案已得到林彪的肯定和支持。楊成武據此又指示軍報說，在肖力已不在報社時，要另有一個“確實得力的、能解決問題的人，作為代理肖力同志的人手”，在軍報“管全面”，將報社的

“油鹽醬醋，政治工作，編輯工作，行政工作，都要管起來。”接著他一個一個點著“軍報組”的三個人道：“實際上是社長，副社長，副社長……”，並指定其中一人“抓總”。問題也就出在這裏，這時雖然肖力在名義上還是軍報的“一把手”，卻又由軍委辦事組按照林彪的意圖，另派了在報社“抓總”和“管全面”的一、二、三把手，也就是“軍報組”那三個人。在此期間，“軍報組”又向一個“文革”初期調來軍報，但卻總是避開“文革”風浪的原某大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悄悄說他們來軍報，實際上是“軍管”性質的，只是對外不好宣佈而已。這時已有不少高級軍事機關，包括已被“砸爛”的“總政閻王殿”，都已專門派出部隊人員，由下級單位向領導機關實行了“軍管”。但是後來人們追問此說時，“軍報組”三人又矢口否認他們曾這樣說過。這些跡象似乎表明，“軍報組”來軍報到底是幹什麼的，別說別人搞不清楚，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軍報組”，對報社內部運動作了新的計劃安排，其主要內容雖然還是肖力通過“兵團勤務組”提出的那個“戰略部署”，只是採取了一些新的方式方法，並且大大提高了進程速度，要點是將全社人員分為兩大攤，以四分之三的人正常進行報紙工作，另以四分之一的人分期辦學習班，一面“鬥私批修”，一面批鬥原定的幾個“走資派”，其鬥爭方法是“先專案，後大會，五到七天鬥完”一個，同時將一度主持“臨時黨委”，犯了“反動路線”錯誤的張副總編，及一批原中層幹部和“筆桿子”們，很快一批一批地“解放”出來正常工作。“軍報組”的人宣稱，這也是軍報“文革”的“戰略部署”，並且已經得到了“軍委辦事組首長”們即楊成武等的支持，據說還經過了林彪的批准，讓大家對此“照章執行”。平心而論，對於已經折騰鬧騰了近二年，搞得全社上下都亂了套的軍報，這不失為一個試圖撥亂反正，力圖使工作和生活漸歸正常的良好願望，但是在當時的全國大形勢下，這實際是很不現實也不可能的事。在剛發表的“中央二報一刊”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論中就說：

“在新的一年中，全黨、全軍、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全國人民，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為綱，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再接再厲，從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又說從黨內“走資派”到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等一切“階級敵人”，“絕不會甘心自己的滅亡”，必將“繼續進行破壞和搗亂”，因此仍然“要充分發動群眾”，對這些“階級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正是在這種“黨的號召”和輿論導向下，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頭腦裏還“高燒未退”，認為按照“軍報組”擬定的方針部署，全社四分之三的人都去搞業務了，只留下少數的四分之一人參加內部運動，並且完全遵照“軍報組”的計劃限時限期地加速進行，這不僅使軍報的“文革”運動一下“冷冷清清”，更根本違反了中央一再號召的“要充分發動群眾”的精神，不由對“軍報組”的上述做法，表示懷疑甚至開始抵制起來，接著又幹下了許多蠢事。

正好這時發現了“軍報組”一個嚴重問題，當年二月中旬，由軍委辦事組報林彪批准將“八·二三”時進駐軍報的“三軍協作組”撤出，按說這也是使軍報儘快恢復正常秩序的一項必要措施，報社已有了“臨時總編組”，又設了“抓總”的“軍報組”，中間再夾個“三軍協作組”就不太合適了。經林彪批准的軍委辦事組批示說，原來派“三軍協作組”是必要和正確的，現在撤出也是必要和正確的，“協作組”在軍報的工作是有成績的，相信報社的同志自己能把軍報辦好。這一決定又說，“協作組”撤離時，軍報不要組織歡送。所以他們到底是什麼時候怎麼走的，我竟一點沒有注意，只知他們是轟轟烈烈而來，冷冷清清而去，卻不知其中到底有何內幕，更不料這事進行中間卻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軍報組”根據軍委辦事組批示將撤出“協作組”的問題，與“臨時總編組”聯名向林彪寫了個報告，在報告寫成後按規定先送肖力審閱，肖力收到後立即回話，對“軍報組”提出了幾個問題要他們在當夜〇點以前就作出答復，他們遵囑寫了一封回答問題的信，因為他們當時就在軍委辦事組，便請那裏代他們及時發出此信，這事被楊成武知道了，立即要出原信，看後嚴厲責問“軍報組”負責人，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寫？說著就自己動手作了修改，加上了一些話，說他是如何交辦此事的等等。軍報組在重

抄發出前，沒有再請他過目，他為此又發了一頓火。後來“軍報組”將這一報告打印出來送交軍委辦事組時，據說揚成武第三次“大發雷霆”，責問他們為什麼不經過軍委辦事組就直接向林彪送報告，說“這就是干擾！”他們趕緊聲明，這一報告除了曾送一份給肖力外，並沒有直接報給林彪，楊成武聽了他們的解釋，才慢慢消了氣地說，他所以發火並無別的意思，而是對他們的愛護，要為他們把好關，又要求他們今後不論有什麼事，都必須先報送軍委辦事組，然後由他們轉報給林彪。這事我是後來才知道的，起先不明白楊成武到底為什麼為此大動肝火，想來是這位楊代總長，當時正夾在林彪和江青、肖力以及“軍報組”之間，不免有許多難言之隱。

與此同時在同一問題上又生發出另一事件，在“軍報組”因撤“協作組”報告的事受到楊成武的訓斥時，軍報內有個也是“突擊隊”成員，正與肖力有著“熱線”聯繫的人，利用自己是機要員的條件，將“軍報組”關於撤“協作組”問題的報告，另行單送了一份給肖力，同時還附了一封關於此事的信，肖力收到報告及他的信後，第二天就陪同她老娘江青，傳“旨”召見了軍報“突擊隊”中的兩位“小將”，因為這次召見是臨時通知的，原擬同時被召見的另一“小將”，當時外出沒有找到，結果將他漏掉了，但後來使他反而“因禍得福”，在“四人幫”垮後“清查”時少了這一條“罪行”。江青和肖力向兩個“小將”詢問了軍報一些事，他們一一作了稟報，使江青母女都感滿意。“偉大旗手”對“小將”之一，降“旨”給了個敢於造反的“刺兒頭”封號，不過又使他“因福得禍”地在“清查”中對此一直難以“說清楚”。

江青和肖力突然接見軍報“突擊隊”的人，這當然立即引起了“軍報組”的警覺，他們沒敢找那兩個被召見者查問此事，先對那個單獨給肖力送報告和寫信的“熱線”人物，進行連續的詢問追查，又要他將此事及附信情況寫成書面材料，哪知這位與肖力有著“熱線”的人物也不是好惹的，他反過來責問軍報組為此“三番五次地逼人”和要書面材料是何目的，並且極其強硬地說：“這個書面材料，除肖力同志要我寫外，其他人叫我寫，我不寫！”讓“軍報組”有什麼問

題自己去查。“軍報組”一面在這個只是機要員的“小將”面前碰了硬釘子，一面又在軍委辦事組遭到了楊代總長的批評責怪，說他們這事搞得使他“對不起林副主席”，要大家都“兢兢業業，少睡點覺，少干擾一點林副主席！”從這些事後透露出的情況中，我感到撤出“三軍協作組”的事，不僅直接驚動了江青和肖力，引起了她們的密切注意，又可能直接關係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不過這事也提醒甚至警告了楊成武和“軍報組”，任何人在軍報的任何行動，必須借重和特請他們原先也許是故意忽略了、以肖力為首的軍報真正的領導“核心”即“突擊隊”的出面和參與，不然不僅什麼事也搞不成，甚至可能成為“陰謀”！

楊代總長把“軍報組”、“臨時總編組”和“兵團勤務組”的人，特別是剛剛受到江青、肖力召見的“突擊隊”的“小將”之一，一起請到軍委辦事組。楊代總長見到這位“小將”後，拿著軍委辦事組的一份關於軍報撤出“三軍協作組”的報告對他說，這一報告將送給林彪，因為林彪知道軍報的“突擊隊”，他們要將此報告以“軍報組”、“臨時總編組”和“突擊隊”三家聯名的名義報送。那位“小將”聽了卻說，這一報告不能署上“突擊隊”的名字，因為他們隊的人不知道此事，也沒看過這報告，他一個人不能代表全隊，對此不能表示可否，實際上拒絕聯名上送此報告。這使楊代總長也碰了一個軟釘子，原想拉攏甚至巴結一下這個自有後臺、能夠通“天”的“突擊隊”，卻是拉不住也巴結不上，只得放棄原來打算，將“軍報組”以外的組織名稱，陪著“突擊隊”一起不在報告上列名，就以“軍報組”一家名義，向林彪呈送了這個報告。楊代總長對於沒能拉上“突擊隊”心猶不甘，他又責成那位“小將”回報社時，由他向全社傳達撤出“三軍協作組”的決定，不料那個“小將”確是一位難刺的“刺兒頭”，他先將傳達的任務推給“兵團勤務組”，不成又推給“軍報組”負責人，說“他是領導，我來傳達算個什麼？”急得楊代總長下了“死命令”，說這事非要他去傳達，那“小將”這才接受了這一任務，他事後寫大字報揭發此事道：“楊賊（即楊成武）讓我傳達，可能是表示對我們‘突擊隊’的‘重視’。”他在大字報上將“重視”二

字加上了引號，表明這種重視其實是假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軍報組”主持下，由“突擊隊”那位“小將”，在全社大會上正式宣佈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將在軍報的“三軍協作組”撤走的決定，還傳達了楊代總長關於軍報工作的指示，如要充實“臨時總編組”，調整社內的幾個機構和要“解放”的幹部等等，又說楊代總長強調在報社要“放手發動群眾做好工作”。在傳達大會上，“軍報組”負責人說：“撤出‘三軍協作組’，是對軍報革命群眾、革命幹部的最大信任，最大鼓舞，最大關懷”，報社“原來的同志潛力很大，一定能將軍報辦好”。這些話後面還有些什麼“潛臺詞”，不少人當時都不明底細，但是實際情況卻已表露出，那時同時有著兩條線直接通到軍報，一是“軍報組”——軍委辦事組和楊成武——林彪，這一條似是公事公辦性的；另一條則是“突擊隊”——肖力——江青，這就是半明不白又時隱時顯並且能量極大的一條暗線，除非個中人露底，誰也不知其中到底有何奧秘，至於這兩條線之間又有著什麼糾葛交纏和警扭，外人凡人就更加搞不清了，但是有一點卻已使人看出，對於軍報這一重要宣傳工具，各個方面都伸手來抓，誰都想直接控制利用和掌握它，於是各派力量就在軍報演開了文武鬧劇，這一場又一場明爭暗鬥的結果，不只又拋出了幾隻“替罪羊”犧牲品，更引發了軍報內的又一場大風大浪大混戰。

對於上層和官場內的一些矛盾鬥爭，由於與我並無直接利害關係，我常常不那麼敏感，這次也是這樣，上述那些事大都是事後才知道並發現問題的，當時竟沒有怎麼留意，更未往深處多想，只是按照上頭佈置的事一一執行照辦罷了。從一九六八年初起，報社人員就由“軍報組”分為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兩大攤，絕大多數人去搞業務工作，再分期分批抽少數人辦學習班，繼續進行“文革”中的一些活動。我被分派去學習班，還被任命為總編室小組的負責者，我這個小組的“成分”相當複雜，其中有被認為是“走資派”和“唐、胡、呂集團”第三號人物的呂副總編，有曾是唐、胡的“紅人”，原為軍報黨委秘書的老唐，還有一個一貫緊跟唐、胡、呂的老支部委員，另有

幾位一是名為“逍遙派”實是“保守派”、平時很少說話的夜班老編輯，另一是常似“牆頭一根草，風吹兩邊倒”的老組長，再有一位是個老實人，就是有嚴重的口吃，話都說不清楚，因而不大“積極參加鬥爭”的老同志，真正算是能“積極”參加運動的“革命群眾”，除我以外還有一個“文革”初期才來軍報的新同志，和一個在資料組作臨時工的女同志。從這個當時我對本組的人員“成分”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自己那時“頭腦發熱”甚至“發燒”到什麼程度，我不僅自認是個“左派”，更是一個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天然擁護者和當然執行者，因此對於我負責的這個小組，確是費了不少心思，總想遵照“最高指示”，做好這些人的“轉化”和“團結教育”工作。由於我天天和他們在一起，看來他們也在按照“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要求，說了不少心裏話，呂副總編說讓他參加學習班，簡直是“喜出望外”，因為自“一·一三”以來，他一直在等著挨批鬥，現在竟“跨進革命群眾的懷抱”，不由使他感動不已，自己一定好好交代檢查曾是唐、胡和趙的“幫兇”的罪行，進學習班一期不夠，至少得學二期、三期，還說自己以後也不想當“官”了，能做個“資料員”就行。我本來對他並沒有什麼惡感，見他這麼“可憐兮兮”的，也就常常對他開導勸慰。原報社黨委秘書老唐，是我一個部隊來的老戰友，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時，確曾在一條戰壕裏戰鬥過，在報社他也照應過我，有次我發表過一些“右傾”言論，他在上頭為我周旋，才使我沒有挨批，這次我就“利用職權”，處處對他幫助照顧，儘量使他早日過關。那位“逍遙派”老編輯，在小組會上公開把毛主席的“語錄”比為孔夫子的“論語”，把毛澤東思想和反動儒學相提並論，我也為了“團結”和給對方留點“面子”，沒有當場批駁更沒有公開揭發。我自己也認真對照“最高指示”，檢查批判了“文革”以來的若干錯誤和失誤，被人認為還是能夠“觸及靈魂”的。這其實反映了我性格的另一面，也許是比較好的具有“人性”的一面，不過在強調“階級性”、“鬥爭性”的“文革”中，我這些表現後來竟被認為是“右傾投降主義”，並且將我批為“反革命兩面派”，雖然我其實是“一心為革命”的，並且總想當個“左派”，但

卻仍然“革”和“左”得很不夠。

按照人們的本來願望，大都是嚮往安全、安定和安安靜靜地過日子，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文革”那場“政治大革命”和“階級大搏鬥”時，誰也別想安靜得了。我正在學習班中“閉門修養”似的“鬥私批修”時，外頭的“革命風暴”卻一浪高一浪地從未平息，相比之下，軍報內的“文革”運動就顯得冷冷清清，頗有“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和平”氣氛。一向“關心國家大事”的我，當然要響應偉大領袖號召：“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和學習班內外的一些“文革”中的“積極分子”，交換了對當前形勢特別是軍報情況的看法，擺了運動中的若干問題，概括出了一些順口溜式的話：“四大不大”，即大字報明顯減少了，大鳴大放和大辯論更已幾乎不見；“兵團不團”，即原“造反兵團”已被分為許多攤攤，已經“團”不起來了；“服務組不服務”，即“兵團”和“八·二三公社”服務組（也稱勤務組）只顧執行上面指示，不再聽取大家意見和為大家服務了；“戰鬥隊不戰鬥”，即各群眾組織實際上已停止活動，不是回去上班工作，就是關在學習班裏，不再向“走資派”和“小集團”等等進行“戰鬥”了；“群眾運動，群眾不動”，全社只有少數人在搞運動中的事，“廣大群眾”卻呆在一邊沒事幹了；此外還有“以突擊隊為核心不見核心，以肖力同志為首不見首……”，即這段時間不僅不見“突擊隊”的活動和作用，肖力本人更是根本看不見了。我們認為所有這些“不正常”現象，都是“軍報組”造成的，於是就在一些會議上，或是寫出大字報，對“軍報組”的工作方針及其做法，提出了責問和批評。但是“軍報組”對此不僅毫不理會，反而有持無恐地說，軍報的運動是軍委辦事組和楊代總長親自抓的，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執行軍委辦事組和楊代總長的指示的，又聲稱他們“一直是按林副主席指示工作的”。在報社內對“軍報組”的議論和反對越來越多時，直接分管“軍報組”工作的“軍委政工組”負責人，原空軍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親自出面支持和保護“軍報組”說，“軍報組”是林副主席批准成立的，其大方向是正確的，要軍報的群眾不要誤會。“軍報組”在傳達劉錦平講話時，又特

地加了一句據說也是劉錦平的“指示”：“越是接近勝利，越要提高警惕，防止壞人和走資派挑動，破壞無產階級的內部關係。”同樣的“防止階級敵人破壞”和“挑撥”的話，“軍報組”自己也說過幾次，這明顯是要壓制對他們的批評。

“軍報組”這樣做和據稱劉錦平這麼說，恰恰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反而激起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對他們更大的不滿，我在學習班再也呆不住了，因為學習班設在西直門大街的軍報宿舍大院（現為總政招待所）內，我不斷回到還在平安裏的軍報辦公大樓，看看新出的大字報，和人們一起議論，還常常跑到西單、王府井和府右街等熱鬧處，看來自全國各地各單位的大字報，又收羅購買了大批紅衛兵小報和傳抄材料，報社內也有不少同志，向我提供和交換這些“文革”資料資訊，使我也時時處在全國“文革”的“鬥爭熱潮”之中。正在這時，中央實際是林彪、江青一夥又發起了一個據稱是全國“文革”的“第五次戰役”。所謂“五次戰役”依時間排列是這麼分的：“文革”前夕和初期，先打倒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算是“第一次戰役”，接著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為“第二次戰役”，“第三次戰役”是粉碎所謂的“二月逆流”，隨後揪出了原“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列為“第四次戰役”。這“第五次戰役”將要出現新的也許是更大的攻擊目標和打倒對象，我和許多人一樣，在這新的戰鬥號召面前，理所當然地再次熱血沸騰以致頭腦發昏，不僅為已有的對“軍報組”的懷疑和不滿，一下找到了攻擊點和突破口，更自己“跳出來”，當上了一個“罪惡滔天”的“現行反革命”！此事始末，且見下章。

“中央”忽然揪出楊、余、傅，康生說楊成武要奪軍報大權，報社內奮起追問軍報組，我卻被視為“反對”肖力，在“清隊”中一下成了“現行反革命”

“文革”中的中國政治舞臺，很像是個巨大的“走馬燈”，各種

人物輪番交替著一會兒出現，又一會兒消失；還像川劇中的“變臉”絕技，同一個人物剛剛還是紅臉，轉眼就成了藍臉，一會兒是個白面書生，一會兒又當上黑煞惡魔，不僅使人目不暇接，更把“觀眾”的頭都攪暈了。“文革”中的“第五次戰役”正是這樣，昨天還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特別是軍委辦事組發出各種指示，被軍報組當成“金科玉律”來奉行的，軍委辦事組組長楊成武代總長，今天竟忽然被打倒了。與他同時被揪出的還有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這就是震驚一時的“楊、余、傅事件”。

這個“事件”來得非常突然，不僅是包括我在內的“廣大革命群眾”事先毫無覺察，就是幾乎天天同他們打交道的高級“革命領導幹部”，如軍報組的幾位首長，在事發後既感萬分震驚，又覺天旋地轉地無所適從了。就在我們正議論和反對軍報組一些問題時，當年三月二十四日夜，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駐京部隊、機關及院校十四級以上黨員幹部的大會，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和軍隊系統的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都親自出席並講話，會議由林彪親自主持，從晚上九時卅分開始，到次日凌晨一時卅分就要結束時，偉大領袖毛主席忽然親臨會場，接見了全體蒞會者。表明這是毛主席親自批准支持的一次大會。不過軍報內雖有一大批十四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榮幸地參加這次大會的卻只有原來不是報社幹部的軍報組三個人。所以這次大會的內容只能聽他們的傳達。不過這次傳達不再像以前他們傳達“林副主席”或“楊代總長”指示那樣神氣了，而是有點惶惶不安甚至吞吞吐吐。我們只聽到說林彪親自宣佈了中央剛作出的一個最新重要決定，撤銷大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的個人野心家楊成武的代總參謀長職務；蔣勻結楊成武奪空軍大權又有“叛徒”等嚴重問題的空軍政委余立金，撤職並逮捕法辦；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因帶兵衝擊“中央文革”駐地釣魚臺，也被撤銷職務。同時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又由副總長溫玉成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林彪說中央這一決定，是在毛主席接連開了四次會，經過慎重研究後才作出的。

繼三月二十四日由林彪在人民大會堂親自宣佈“揪出”楊、余、

傅後，三月二十七日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一個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十萬人大會，這次大會林彪沒有親自光臨，由陳伯達主持，請周恩來宣讀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聯合簽署的命令，一是撤銷楊、余、傅二人的職務，二是對黃永勝、溫玉成等的新任命。在這次大會上，陳伯達、江青等又把楊、余、傅主要是楊成武臭罵了一頓。在這兩次大會上的康生兩次講話中，他說楊成武的“篡奪領導權”的“罪行”時，每次都提到《解放軍報》，一次說楊成武想“奪取《解放軍報》的權”，一次在列舉要奪權的單位中，也有軍報這一家。軍報組在報社傳達這兩次大會講話時，把康生這兩句話都含糊地一帶而過，然而就這一共十來個字的兩句話，卻被我們注意到了。我們設法很快找到這兩次大會講話的傳抄材料，又去總政聽了大會的講話錄音，發現康生確曾說過，楊成武也曾要奪軍報的權，雖然沒說他通過誰又怎樣來奪權，我們卻一下想到了軍報組，不由喜出望外地認為，這下可給我們逮著軍報組的要害問題了！

正是軍報組一再聲稱，他們是根據軍委辦事組和“楊代總長”指示在報社工作的，他們在軍報的各項活動，都是執行的軍委辦事組特別是“楊代總長”的指示，又一再說“楊代總長”是如何關心軍報工作和具體指導他們。這不都說明楊成武已經“插手”軍報，並且力圖“控制”軍報嗎？而忠實執行他指示的軍報組，不就是他伸向軍報的“黑手”嗎？我和報社許多同志都在議論這件事，又把我們平時對軍報組的懷疑和不滿，“豁然開朗”地把他們的問題，一起都掛到了楊成武的賬上，都和楊成武要奪軍報大權的“陰謀”聯繫起來。我們認為，去年“八·二三”以後，軍報一直是由肖力“親自領導”的，正是在軍報組進來後，她奉命“休養”去了，說是“暫時離開”軍報，卻從此沒再來過，軍報組又正是根據楊成武的指示，對肖力“不送材料，不送文件，不打電話，不寫信”，以“不要干擾”她，使她“安心休養”和不“心掛兩頭”為名，實際上對她進行了“封鎖”和“排擠”。這一系列事實，不就是在奪取肖力對軍報的領導權嗎？我們為自己的分析和發現興奮不已，就在“無產階級司令部”對“第五次戰役”的戰鬥號令下，為了徹底揭露楊成武的“陰謀”和“罪行”，向

正在我們面前已被認為是楊成武“黑手”的軍報組，發出了連續的追問和猛烈的進攻，第一個貼出大字報責問軍報組，提出一連串“為什麼”的是原理論處編輯，一度與我同在“張氏文革”的老傅。這位老傅到軍報時間雖然不長，其年齡和資歷卻比我老，又是從事理論工作的，看問題比較敏銳深刻，並且是個敢說敢幹敢放炮的山東漢子，我對他一直比較信服。見他向軍報組開了頭一炮，我也不甘落後，就接二連三貼出一批大字報，對軍報組進行無情的揭發批判。全社同志也群起而上，使他們陷入“文革”烈火之中。

其實話說回來，軍報組的三個幹部，都是剛從部隊抽調來的，都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軍人，習慣於下級服從上級，他們到京後當然什麼都得聽軍委辦事組及其負責人楊成武的，而楊成武又得聽從頂頭上司林彪的，林彪心裏打了什麼主意，別說是軍報組就連楊成武也摸不透。在揭露楊成武問題時，只有康生一個人說楊成武要奪軍報的權，他說這話的“根據”也只能來自江青和肖力那兒。可以推斷，楊成武正是按照林彪的意圖，利用軍報組來逐步擠走和取代肖力，將對軍報的控制權從江青那兒奪回到林彪手上，楊成武和軍報組實際是為林彪“火中取栗”者。在江青覺察到這一點時，林彪為了維持與她的“團結”，便來了個翻雲覆雨誘過於人，反手一巴掌將楊成武打下踢出來，結果使軍報組也陷入說不清道不明的難堪境地，並且由於上頭的林彪與江青互相鬥法，在軍報也攪起了軒然大波。憑心而論，軍報組的幾位同志都不是政客，更不是個人野心家，他們只是被林彪等人抓到他們政治棋盤上來的幾粒“兵”、“卒”一類的棋子，他們在軍報受到的衝擊和攻擊，其實是大大的冤枉，我在這中間一度十分積極，更是“大傻冒”一個，為那個與我毫不相干的“權”字，不僅白費勁兒瞎操心，後來反而將自己 and 一批“戰友”全部“賠”了進去，也真是自作自受自造惡果！軍報組一撤走，我和軍報許多同志很快就都自吞了“苦果”。

在軍報組正式撤走前後，軍委辦事組曾對軍報下達指示說：“報社肯定污泥濁水是不不少的，隊伍是不純的，需要借文化大革命沖它一傢伙，沖得乾乾淨淨，把壞人都搞掉！”新任總長黃永勝也說，“軍

報很複雜，壞人比較多。”當時全國又正按照“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各地各單位都展開了“清理階級隊伍”，軍報也就遵照“最高指示”和軍委辦事組的具體指示，開始把報社的“壞人都搞掉”。先陸續揪出了軍報的一批“走資派”和“歷史反革命”、“漏網右派”等等，又把打擊的重點轉向在“文革”中沒有追隨緊跟他們的普通幹部群眾。“文革”初期中央曾發佈了一個“公安六條”，其重要內容之一是，凡“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以後追加了反對“中央文革”和陳伯達、康生特別是江青的，也都是“現行反革命”，黃、吳、李、邱一夥又擴大範圍加碼地指示報社說，在軍報“誰反對肖力同志，誰就是反革命！”就是這麼一句話，報社的“清隊”惡浪中，立即又掀起了揪鬥“現行反革命”的更高狂濤，第一個“現行犯”就是軍委辦事組直接點名抓的。林彪在空軍的“草包司令”、新任副總長吳法憲，不知怎麼知道報社記者處的一個名叫“武將”的新記者，指名把武將揪了出來，揪鬥他時，我怎麼也聽不出他到底有什麼“罪行”，只聽揪鬥他在斥罵他是“瘋狂反對”肖力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武將是一九六六年初才從部隊調到軍報駐北京軍區記者組的，“文革”初期又奉命到報社，我本來不認識他，只是在肖力的“一·一三大字報”上，第一次見到他這個名字，後來又知道他名為“武將”，卻是個既不“武”更非“將”的年輕記者，由於歷史清白和政治單純，也被選調進“快報組”，就幸運地與肖力成了同事，不知怎麼又被肖力看中，使他成為在軍報“造反”的“突擊隊”最早的八名成員之一，後來不知為什麼又不在“突擊隊”了，更不知他又怎麼成了“瘋狂反對”肖力的“現行反革命”，他先被關在軍報院內的“牛棚”裏，不久又被突然宣佈逮捕，由衛戍區來人將他戴上手銬押走了大獄。但是直到這時，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麼“罪”，只知他是因為“反對”肖力才當上“反革命”的。這一行動等於公開宣告，從抓武將開始，要向軍報內的“反對肖力”者開刀了，然而我竟沒有意識到，這就是對我的嚴重警告！

記者處剛揪出武將，就在我們美術組緊隔壁的資料組，一下出了

兩個“現行反革命”，他們被揪，我開始不安並有了壓力，不由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表現，作了一些回顧和反省，認為自己確曾幹過或參與過一些錯事、蠢事和不該幹的事，說過不少過頭話和錯話、蠢話，也誤傷甚至傷害過一些同志，此外，幾乎在我所有的“鑒定”中，都有過“驕傲自滿”這條，到“文革”中有人反映我常常“唯我獨革”或獨“左”，我承認這確是自己的缺點甚至錯誤。不過我又堅信自己確是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和自覺遵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對於他老人家的親人肖力，也是由衷地尊重、支持和愛護的，對自己一貫來特別是“文革”以來的表現，基本是問心無愧的。直到軍報的“突擊隊”等等“左派”，已經根據軍委辦事組說的，軍報有人把矛頭指向了林彪和“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了肖力，就要對我下手時，我還曾在一篇日記中寫道：

我過去有錯誤，現在有錯誤，將來還會有錯誤，但是不怕，我們聽毛主席的話，隨時準備修正錯誤，知錯必改有錯就改。但任何人企圖利用我們的錯誤，把我們說成是“把矛頭指向肖力同志”的，我們不能忍受！

我從心底裏對肖力同志最尊敬，最熱愛，最佩服，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好同志，好戰友，好領導，因為她最聽毛主席的話。我最討厭那些打著肖力同志招牌到處嚇人的人，這些人有的是騙子，是兩面派，有的是糊塗蟲，跟他們鬥，決沒有錯，向他們進攻，決不是“把矛頭指向肖力同志”，就是攻錯了，肖力同志也是會瞭解我們的。

我又以自己的“紅五類”出身和“紅小鬼”經歷、不僅在歷來的檔案和登記表上，“受何處分犯何錯誤”一欄中，一直是空白的，戰爭期間還立過幾次小功，就在軍報也當過幾次“先進工作者”。我以為衝著這一些，別人不會也沒辦法把我怎麼樣。我的“盲目自信”和“盲目樂觀”，真使自己成了一個大昏球。“文革”中凡是需要搞倒什麼人，誰還管他這些呢？即使什麼問題也沒有，也能隨時編造出各

種“罪行”來。當我正自我陶醉地安慰、鎮定和欺騙著自己時，對於已砍向自己的屠刀，竟渾然不覺地毫末防範。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我的生命歷程上已深深地鐫刻下了這個日子：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一直還在“抓革命，促生產”的我，這天晚上照例又到辦公樓加班，我正在辦公室幹著什麼，那位與肖力有著“熱線”的“小將”，帶著一些人突然衝了進來，厲聲對我喝道：“現行反革命分子××聽著，清算你反革命罪行的時候到了，革命群眾這就對你批判鬥爭！”說著就七手八腳將我揪出了辦公室，幸好那時我沒穿軍衣也沒戴軍帽，就減免了扯我領章、帽徽等“工序”。我們的辦公室在一樓，揪鬥我的會場卻在五樓，我被揪上樓梯時就被絆倒了，就在樓梯上從一樓一直拖到了五樓，一路不知是樓梯的磕碰，還是有人在對我拳打腳踢，混身疼得幾乎失去了知覺，到五樓後照例作“噴氣式”狀拖進會場，由於我正以九十度以上俯角彎著腰，腦袋正被按得抵在胸口，根本看不見會場是什麼樣子，也聽不清揭發批判，只聽到此起彼落的口號聲，“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誰反對肖力同志就打倒誰！”“誰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毛主席的親人肖力同志！”“誓死保衛以肖力同志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

我就這樣，作為“反對肖力”和“陰謀顛覆以肖力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揪了出來！接著被揭發出大量“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和“反對以毛主席為首、以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等等“滔天罪行”，並將我一大批戰友、同事甚至僅僅接觸過的同志，都一一揪出，打成了“反對肖力”的“反革命小集團”。由於我“態度頑固”，為“抗拒從嚴”，被開除黨籍軍籍，戴上反革命“帽子”，在被多次批鬥長期關押後，並與妻子離婚，押回原籍監督勞改。與此同時，全報社達到70%以上的同志，都因“反對肖力”，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處理……

這就是肖力——即“紅色公主”李訥，來軍報造成的“偉大成果”之一。

高處不勝寒

——巧遇李訥、略聞李敏隨記

作者附言：

此文是我一九九二年六月寫的。當時我正與李敏、李訥交往，知道他們不願被媒體“曝光”，拒絕所有來訪記者，李訥與我曾口頭約定不寫她。我不能違約以致影響與她的交往，但不斷有人向我瞭解她們的情況並且向我正式約稿，我只得以筆名借別人口氣以第三人稱寫了此文。發表後曾被國內外多家報刊轉載或摘發。考慮到對此文會有不同看法，我以“游雨霽”為筆名，即“有餘悸”之意。文末的原“作者附言”，也是為此寫的。

【引子】對當年“光輝業績”不堪回首以至羞於承認的人，正隱名埋姓避居一隅，默默地舔著自己身心上的累累傷痕。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亂了全黨全國，整苦了各級幹部，也坑害或糟蹋了為數眾多的過於年輕不免幼稚非常熱情更愛激動的青年後生，特別是天真學生。他們極其真誠滿懷深情和理直氣壯地幹下了一系列蠢事、錯事甚至壞事，結果為自己留下了永遠治不愈的精神創傷和從此抹不掉的政治疵點或者污點。

曾記否？那赫赫有名的北京紅衛兵造反司令、清華學生蒯大富，那寫出膾炙人口的三論《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中學小將彭小蒙以及那人工“培植”和精心炮製出的“微型”反潮流全國典型、奶腔奶氣



李訥（前右）、張玉鳳（前左，毛澤東機要秘書）、王景清（後中，李訥丈夫），1992年攝

的小學娃娃黃帥……如今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願回顧甚至羞於承認自己當年那些“光輝業績”，因而都遠離政治舞臺避開人間熱點，有的還改名換姓或隱名埋姓地蝸居一隅默默地舔著自己心上的累累傷痕。

在這些人中不幸地也包括了發動和領導那場後來被稱為“十年浩劫”的當時卻是波瀾壯闊宏偉豪邁驚天動地和空前偉大的政治運動的、“人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天才領袖毛澤東自己的骨肉親人，其中之一是他年近半百才有的、曾經給他以很大欣慰樂趣且視為掌上明珠的小女兒，也就是他和那位正是在“史無前例”中才史有前例（漢代呂后、唐代武則天和清代慈禧太后等等）地“偶爾露崢嶸”的江氏藍蘋即山東諸城李氏雲鶴亦即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從一代天“嬌”式的“紅都女皇”一下淪為被判處“死緩”又改“無期徒刑”的反革命集團首犯江青唯一的親生女兒——李訥。

此外，還有一位與江青本屬冤家對頭，與若干黨內“走資派”卻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同為偉大領袖嫡傳親生的應是李訥姐姐的李敏。

我意外地極為榮幸地見到了有人一輩子也見不到的李訥及其丈夫

李訥其母人稱“紅都女皇”，其父則是萬民齊呼“萬壽無疆”的至高無上的“當今皇上”，因而她也可以當之無愧地列為“紅都公主”。

關於這位“公主”，曾有過大量、多樣和各種傳聞、軼聞或秘聞，早就是人們極有興趣非常注意和力求探悉的、雖非新聞主角卻是熱點名角的充滿神秘色彩的重要人物。只是我們身處在這個“透明度”有限、“公開性”犯忌的凡政界尤其是高層活動常籠罩著“日照香爐生紫煙”般的廬山迷霧中的環境與氛圍裏，她始終令人只聞其名不聞其聲更不謀其面地“難見廬山真面目”。

出於某種逆反的、反常的甚至是病態或變態心理，人們越是禁書越想看，越不瞭解越想知道，越要保密越易公開，對於李訥其人其事及其生活瑣事等，都爭相打聽、傳告和透露，結果在四海內外的大刊小報和大書小冊中，頻頻出現了有關李訥的各種消息、資訊和故事、軼事等等。只是其中有真有假似是而非捕風捉影以訛傳訛，許多事仍含糊糊，始終令人“難見廬山真面目”。

然而老天有眼本人有幸，壬申五月的一場瀟瀟春雨中，我在北京遠郊一座度假別墅區裏的一次非官方主辦的文化性集會上，意外地見到了一些知名度很高、吸引力很大的名人要人和特殊人物，例如近年以專寫毛澤東軼事、家事及其心事的而名噪一時的走紅作家權延赤，當年曾朝夕守護、伺候和服務於偉大領袖身邊直至為其送終守靈以致江氏“女皇”也得讓她三分的毛澤東的機要和生活秘書張玉鳳女士，尤其意外地我極為榮幸地見到或碰上了有人一輩子也見不著連樣子都想不出的本文主角之一、昔日“紅都公主”李訥及其人們也已漸知其名卻少知其事更未見其人的李訥的丈夫王景清。

當時場景我早已銘記在心了。是日我到集會地點報到並在一指定的冊頁上簽名時，順便掃了一眼前面剛簽上的名字，看看有否熟人朋

友先到了，忽然發現前一頁上有兩個人名如急推的電影或熒屏字幕似的一下蹦了出來。他們是——李訥 王景清。

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勁瞄了瞄並重新注視時才知果然不錯，正是他們。

我一邊伸手去接會務小姐遞過來的簽名毛筆，卻一邊回頭想看看已簽上大名的那位久仰的人物是否就在近旁。

啊！不用發問，不用指點，也不用介紹，我一眼就看見並認出了他們，雖然我從未見過他們。

我為自己的意外發現和幸運巧遇興奮得幾乎全身“熱血沸騰”，只覺右手被什麼一碰，忙收回目光扭過頭，原來是會務小姐已把簽名毛筆遞到我手上，同時笑容可掬彬彬有禮地輕聲說：

“請簽名。”

我只得遵囑在指定的地方即那兩個引人矚目的名字的後面一頁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對於自己的簽名一向十分重視，特別是第一個字的落筆處和末一個字的收筆時，總是格外認真和全力以赴，以圖顯示自己的不凡筆力和特有氣質。可是今天卻心不在焉甚至心急火燎地匆匆一揮而就，扔下筆就又扭過身來，尋找剛才發現和已經捕捉到的重要目標。只是事違人願，那兒已經人去“樓”空、杳無人跡——全是正紛紛攘攘的別的人，而我想看到的人已經不在！

就在我俯身簽名的這一會兒，他們離開了剛才站立的地方。我懷著沉重的失落感對著那人去“樓”空的“樓”處愣怔著，身子卻又被什麼人輕輕地觸碰了一下。扭頭一看，原來是後一位簽名者禮請我為他騰開位置。我當即為自己的一時失神失態而頗感歉意地及時讓開，並不失時機地連身子都扭了過來，第三次把目光探向“樓”那兒，暗自祈禱著但願剛才那個“失落感”是自己的疏忽或錯覺造成的。可惜又願望落空，那兒仍是“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他們確已突然出現又遽然消失了。

然而，我發現並認出他們的時間雖然不會超過照相機的快門速度，得按若干分之一秒的速度來計算，他們的形象卻已收入並儲存在我的也許僅次於電腦的人腦軟盤上，或者說是已經“定格”在我的記

憶屏幕上。且待我把它重新映現出來。且慢，我得先理出一個自己的“主觀鏡頭”。

剛才我所以不必提問、不須指點和不用介紹就能一眼看見並認出他們，只因他們太顯眼太突出和太與眾不同了。這幾個“太”是他們自己的服飾、舉止和神態所造成的，只是與常說的“光彩照人”、“招人眼目”和“嘩眾取寵”等等恰恰相反。也正因此我才能在一瞬間看到就認出並記住他們。如果說我親眼見到他們是極其意外的，他們的形象及其給予我的印象，則更使我感到極其意外。他們是怎麼樣的呢？

昔日“公主”的今日“風采”從我那清晰的一瞥中已經“咔嚓”一聲牢牢地印刻在我記憶的底片中：

上身一件深灰色中式對襟舊褂子，下著近似黑色的寬大布褲，腳穿一雙俗稱“懶漢鞋”的平底黑色布鞋，身材總在一米六八上下。她媽媽是以修長細高著稱的，其父更是高出眾人一頭以上，她顯然繼承了父母的身高優勢，只是其體型只有其父的壯闊或曰肥胖的遺傳，絲毫不見其母的苗條婀娜。其面部的第一印象同樣只似其父的發福富態，不見其母的清秀俊俏，但若精確比照便發現其眉眼口鼻以至面型仍有其母的基因。只是臉上架了一副五十年代常見的現已很不入時的棕色邊框的老式眼鏡，遠不如其母當年即使在特別法庭受審時更不要說是在黨代大會主席臺前排就座時一直戴著的精工製作又俏又亮的“秀郎架”眼鏡。單就這點說，女兒比其母親落後了至少二十年，比起當今新潮人物常戴的那種帶色的或變色變形的超大“蛤蟆鏡”之類，其差距已達半個多世紀，她那式樣的眼鏡正將成為“文物”，主要在一些近現代歷史題材影視劇中經常出現了。

她的髮型（對不起，我感到自己委屈了這個人們常用的新式生活用詞）簡直令人震驚，稍長的頭髮隨便地束成一把拖在腦後，用來束髮的不是布條便是毛線（後來發現竟是如今從小學女生到山村女娃都不屑再用的俗稱猴皮筋的橡皮筋，其消費水準和豪華程度連《白毛女》中還擁三尺紅頭繩的喜兒都不如），她的所謂髮型別說與當今各式新潮髮型根本不能相比，即使與其老母相比，都趕不上她最後亮



李訥、王景清與任修權（前右）及其夫人（前左），1992年攝

相時即在特別法庭宣判為死刑前那麼溜光水滑和精神俐落。

單就上述衣著打扮面相體態而言，說她是個街道大雜院的張家大媽或王家二孀，至多是某個機關食堂的收收飯票菜票的老辦事員或是哪個小學的行將退休的給孩子們講過語文或歷史的老教師，誰也不會不信。可是她卻偏偏是名聞遐邇甚至使人如雷貫耳的本共和國僅有的前“紅都公主”。

她那位“駙馬爺”同樣令人驚異地難以置信。上身一件五十年代部隊發的呢質軍服，下身卻是條不僅沒有褲線之類，兩膝蓋處還鼓著兩個大包的灰色布褲子，腳蹬一雙也是過去部隊發的幹部黑皮鞋。方正平和的面部常常漾出謙遜的微笑，頭髮已開始花白，和他的樣子色調上下相映成“灰”。他手裏提著與“公主”共同使用的一個老式黑色人造革提包。似乎正在等候會務工作人員對他們的引導和安排……

集會組織者讓大家體諒和愛護“公主”，
不要包圍和突出宣傳他們的招呼似乎也白打了。

可惜等我簽好名，他們卻離開了，僅給我留下了如上的一瞥印象以至永恆形象。我正悵然若失地隨意張望時，眼睛不由又忽然一亮，原來他們並未走遠，正由工作人員領著走出了大廳步向另一座小樓。我慶幸自己終於又見到他們，還慶幸自己能夠與他們共同參加這次集會，以致還有接觸的機會。只是見他們不與包括我在內的其他蒞會者同住一樓，勢必減少甚至失去就近觀察瞭解他們的機會，頓感十分遺憾也頗為失望。當會務小姐也來領我去自己的房間時，我忽然醒悟地想道，人家是非同小可的金枝玉葉般的“公主”及其“駙馬”，豈能與我等草民百姓共住一樓？在我們這個最講尊卑貴賤上下等級的禮儀之邦內，讓他們享受一點特殊待遇有何不可？

我釋然地想著並安頓好自己後，按通知提前來到會場，只聽集會組織者向我們招呼道：“由於我們會議的主題與毛主席有關，就特地邀請了幾位毛主席的親屬和生前的身邊工作人員，如已經到會的李訥夫婦和張玉鳳同志等。對於他們，人們一向比較注意，並且傳說很多，所以我受委託向諸位作家和新聞界朋友先招呼一聲，請大家不要把注意力過分集中在他們身上，不在會議期間向他們採訪和提問，以免形成對他們的包圍使他們為難。特別是李訥同志，她的身體和精神都不太好，本來從不參加任何社會活動，連毛主席每年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日，她去紀念堂總是提前或推後單獨前往，從不在新聞界和公眾面前出現，也不願接受任何記者作家的訪問。所以她能來參加我們這次會議，已經很不容易了。如果造成她的不安或難堪，對她本人和我們會議都不太好，這就請大家多多體諒愛護他們和支持我們。會務組還給李訥夫婦另外安排了住處，好讓他們更清靜些，也請大家給予諒解。對這次活動的宣傳報導，發新聞和上電視時，也請不要過分突出他們，避免給已經是熱點人物的他們再加熱……”

這個招呼好像是衝著我來的，因為我確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如此良



伍修權（右1）、李訥、王景清與作家權延赤（左1），1992年攝

機，聞聞禁區突擊訪問一下他們，好來篇具有轟動效應的報導或其他作品。這麼一招呼等於對我下了“戒嚴令”，迫使我只得放棄自己的計劃了。繼而一想，我又釋然了，這本來就不是我計劃中的事嘛！如此，也就安心並專心參加會議了。

儘管如此，我的以及全體蒞會人員的視覺焦點，仍然不由自主地時時落在李訥他們身上。會議開始前，我早早地就佔據了首長和貴賓席（李訥他們也被安排在那裏）以外的前排位置，以便就近仔細觀察他們。

當蒞會代表們談笑風生又呼朋喚友地進入會場時，李訥夫婦也默默地跟在別人後面慢慢來到並在指定位置坐下。是時只見拍電視的碘鎢燈和照相機的閃光燈一齊閃亮，幾乎所有的鏡頭都朝向了李訥他們。我掠了一眼會議的組織者，心想他的招呼算是白打了，此時此刻誰不想多搶幾個稀罕鏡頭，像我這樣沒帶相機的人哪個不伸長脖子瞪大眼睛在盯視著他們呢！

我的位置正在李訥他們身後，看不到他們的表情，只見她略低著頭，一動也不動，沒有任何表示。也就在這時，我不僅看清了她腦後

的辮繩不是辮繩而是一根橡皮筋，還發現王景清的上衣後領是用不同色調的舊料補接起來的。事後我從朋友處看到當時拍下的照片，李訥的表情果然不太自然和不太愉快。不過她也有表現出愉快的時候，那是幾位老革命家入場並落座後，她曾叫上王景清同志一起上前，叫著“叔叔”並握手問候，使持照相機、攝相機者又抓了不少好鏡頭。

會議開始後，各就各位各吃其稿和各講其要講的，李訥始終是默然不響甚至木然不動地聽著人們的發言。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時，她直到別人大都離開了會場才慢慢起身走向門口。哪知人們全在門廳內外，一見李訥出來，就紛紛上前與其問候和握手，她雖然多數並不相識，也只得謙和地還禮答謝，不由又引來了攝影和攝像者，她不由自主不分說地剛被這幾位拉住合了影，又被那幾位夾住照了相。我本想也上前湊個熱鬧好為自己攝下有幸與“公主”合影的極為珍貴的留念，但見她臉上似乎已流露出些許不自在不樂意之色，並且相互根本不認識，無人也無由將我們作個介紹，也就知趣地並且裝作清高地退出人圈。看著多機拍攝的“攝製組”和一群“演員”們作歡樂和興奮狀圍著“女主角”留下了一個又一個歷史性鏡頭。

此時，會議組織者“殺”了進去，一面不斷與四周的人打著招呼，一面護衛著“公主”將其救出重圍，保駕護送走了，這裏才終於“停機”。我雖然不無幸災樂禍之感，卻又不無失去與“公主”合影的殊榮之憾。

分組小會時沒見他們參加，第二次大會發言和閉幕會議時也沒見他們。一打聽，他們在會議第二天晚上就先行離開了。這使我暗自預謀試圖接觸並接近“公主”直至使其接受我的採訪的種種圖謀全部風吹雲散。

但我畢竟已吃了十多年新聞飯，加之腿勤嘴勤筆頭勤和不恥下問，仍然打探和獲知了不少“公主”此行以及有關她的各種情況資訊與軼聞，其中有的雖非第一手材料，卻也算是“據可靠人士透露”，自信比若干小報野刊雜書中寫的要“查有實據”得多。現在容我慢慢道來。

她為什麼叫李訥？又怎麼叫了肖力？ 在這個名字下她又幹了些什麼和造成了什麼？

先說說她姓名的來歷及其正誤。她不姓“國姓”似的“毛”，但也並非隨其母姓。她和她的同父異母姐姐都姓“李”，乃因其父當年在陝北時曾用“李德勝”為化名，就將他們姐妹隨“化”姓了李。我曾見許多人尤其是若干小報野刊雜書上常把她的名字寫成了“李訥”，其實是大錯而特錯了。據查，確有“李訥”其人，而且也是女性，只是該李訥是我國一位女作家，不僅出生於邊省雲南，且比她年長約二十歲，已著有長短篇小說若干。作為“公主”的這位叫的卻是“言”字旁的“訥”，而非絞絲旁的“納”。而言旁之“訥”頗有來頭自有出處。據知情者透露，我本人也作了考證，竟有了一舉兩得的重大發現，李訥及其姐李敏的名字，皆源自孔老夫子《論語卷二·里仁第四》篇末的一句，原文為：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於言”即少說話也，“敏於行”即多幹事並且幹快些也，不如此便不是“君子”也。據說李訥小時話較多，其父則下達“最高指示”命其“訥”一“訥”；其姐李敏行動較遲緩，其父則諄諄囑其“敏”一“敏”。皆針對二人的性格或弱點各取其中一字為名以示提醒和告誡。其實這不僅反映了偉大領袖對國學古籍的博聞廣記和能活學活用，也反映了這位老人家對後人的要求和希望以及他本人的處世守則。

不過，據我所知，李訥大名的正式見諸報章書刊並不很早。“文革”中廣為散發的許多傳抄材料式的偉大領袖內部講話未發文稿的各種文集中，曾出現過她的名字，只是這都是非正式的甚至是非法的印刷品，不足為憑為據為證。真正首次以其大號正式見報時是她已過而立將近不惑之年的難忘的一九七六年，即沉痛宣告全國各族人民偉大領袖逝世的訃聞公報後面的治喪委員會名單中。這實際上意味著“公主”公開亮相之日，隨著毛澤東逝世也成了她從此“退位”之時。尤

其不幸的是其父仙逝才二十八天，其母又作為“四人幫”之首領而遭“粉碎”並身陷囹圄，致使她的芳名剛剛閃現旋即熄滅，並且幾乎從此湮沒，至少是很長一個時期內不被人提出。儘管如此，她的另一個名字卻常常出現在一些內部文件、交代材料、清查檔案和揭發批判稿上。這就是她在當年那“崢嶸歲月”時用過的化名或代號——肖力。

據悉，此名啟用於“文革”初期，當時她才二十多歲，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不久，與當時的紅衛兵小將從年齡、學歷到派頭都極近似，也一股熱情地遵從其父偉大領袖的莊嚴號召和最高指示，奮勇投身到轟轟烈烈鋪天蓋地以致席捲全國的“文革”怒潮烈火之中。據說其父曾授意她和紅衛兵小將們一起外出串聯巡遊各地，四處搜集尋獲關於“文革”的第一手材料徑直向他稟報，但是其母恐其年輕嬌嫩外出不便，將她領到偉大領袖親密戰友林副統帥麾下亦即全國“左派”喉舌的二報一刊之一的《解放軍報》，要那裏的負責人員負責對其幫助、指導、提攜和保護。於是她就成了該報一名青年女記者，並且成為“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紅旗掛兩邊”加一身軍綠的我軍幹部。由於許多人都已獲悉偉大領袖有個叫李訥的女兒，此名於保密、安全和活動甚為不便不利，便按國人對人稱謂的俗例，依其李姓呼為“小李”，又據此諧音取名為“肖力”。至此，當時的中國政治舞臺上就閃起了一顆名為“肖力”的新星。

她到軍報以後，不知寫作或發表過什麼消息報導或通訊之類沒有，只知她不久就寫出了一篇震動全軍全黨以至全國的革命大字報，據說其標題就叫《解放軍向何處去？》（也許是《解放軍報向何處去？》）因我沒見過大字報原文，只是當時聽說，可能被誤傳記錯）又據說該大字報署名共八人，為首一位就是肖力。此大字報一出，真是石破天驚，林副統帥聞報，即派林辦主任兼其妻葉群親自前往觀看，他據葉群彙報後立即親署一信回答和支持“解放軍報的革命同志”即肖力等，此信報偉大領袖審閱時，老人家又親自指示贊同林彪答復並肯定他的女兒李訥即肖力等小將的革命行動。於是肖力的名字就是隨其父兼偉大領袖的光輝指示及林副統帥的極其重要的“次”高指示而傳遍全國。我也是在那時初知肖力其名並悉她與李訥實為一人。

據說肖力等人一張大字報不僅一舉掀翻了全黨全國首要革命輿論陣地的軍委機關報《解放軍報》社，還一下搞亂了全軍，引發了全國造反派競相效尤衝擊軍隊大抓“軍內一小撮”（我不幸也曾跟在同學後邊喊過口號起過哄）。她所在的軍報社當然首當其衝，陸續“揪出”“打倒”了一批又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牛鬼蛇神”“小爬蟲”等等，直到她本人任軍報“第一把手”兼總政治部“造反聯絡站”的特號“勤務員”等職，才宣告已獲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云云。

說來也巧，參加這次五月集會的老同志中有一位就是當年軍報的負責人之一，他和肖力即李訥“文革”以後從未再見過，此次忽然重逢後，那位老同志問李訥即肖力道：

“你還記得我嗎？”

李訥忙說：“記得，記得，您是我在軍報時的老領導，老上級。”

那“老領導”卻說：“我是什麼領導，是你的打倒對象走資派，只配挨你們批鬥！”

這一下不僅使李訥也使在場的人都面呈尷尬之色以致在輕鬆愉快的旋律中出現了一節不諧和音。還是李訥很快回過神來，依然含笑地向那位老同志深表歉意道：

“是的，我接受批評，這是我的錯誤，我現在就向您賠禮道歉。”

說著還向對方淺淺一躬，又真誠地說：

“我實在對不起您！”

在場的別的老同志對那老同志道：

“老×，你也得姿態高些，李訥同志向你賠禮道歉了，你也得有所表示，可不能還糾纏歷史老賬啊！”

有的說：“這都是過去了幾十年的事，還說了幹什麼呢？”

李訥又上前親切地握住那位老同志的手，繼續含笑說：“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老首長，您能原諒我嗎？”

周圍的人們說：“原諒，原諒，當然原諒……”

那老同志這才也與她握手言和，表示不咎既往了。

可惜我當時未能在場，只是事後才得知此事，並知人們對李訥都很讚賞。

李訥怎樣和因為“反對”她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重逢並相互諒解結為好友的？

我有幸探悉，這次活動的組織者中有一位不僅也曾在軍報工作過，還曾因為“反對肖力”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被開除了黨籍軍籍，押回原籍勞動改造了好幾年，直到粉碎“四人幫”即她媽垮了台才平反歸隊。由於他和李訥的這段“戰鬥友誼”，他們至今還常來往，李訥能來參加這次活動也是他去請來的。

我馬上找到了他。由於他就是會前向我們打招呼，要我們不要包圍和突出李訥的人，我見他就說：

“我聽從你的招呼，不僅沒有訪問李訥，連合影都沒和她照一張。但是聽說你和她是老交道，並且保持來往，我訪問一下你總可以吧？我們這一行的職業習慣，你會理解和支持的吧！”

他笑道：“可以，不過已經過去的事，最好別再翻它，因為它畢竟不是愉快的事，對李訥尤其是這樣。她在這方面受到的傷害留下的隱痛，不比別人更少更輕，並且，不是所有的人都瞭解和理解。她的身體和精神一直不太好，所以不能拿這些事來刺激她，以免再給她造成傷害。”

我說：“你真是高姿態。不過，我還想知道，你當時到底是怎麼反對她的，又是怎麼被她打成反革命的？”

他想了想，卻答非所問地說：“其實，我並沒有反對她，不僅沒有那個水準，也沒有那個膽量反對她。我明知是她的話，還怎麼能又敢反她呢？不過不是怕她本人，是怕她後邊的那個巨大的影子。我當時的真實思想是，他是偉大領袖加偉大旗手親自培養教育和派來的人，對她當然只能堅信不移。我們在實際接觸中，感到她確實平易近人，她又比較喜歡文藝，所以相互還能說到一塊，所以我確實沒有也不會反對她。”

“那為什麼把你打成了反革命？”我問。

他淡淡一笑道：“我當時幹了個蠢事，感到她身邊有的人不怎麼地道，可能給她出餽主意甚至壞點子。她那時才二十多歲，剛來時見我們許多人都叫叔叔，加之她曾對我們說過，她爸爸讓她告訴大家，她只上過幾年學，還很年輕，很幼稚，也很蠢，希望大家多多幫助教育她，隨時批評指教她。如果有了錯誤，怎麼批評都行。選用當時的流行語言來開玩笑地說，炮打、火燒都可以。我是相信她的話的。就想從旁盡可能提醒提醒她，使她避免不小心被人利用，說錯話辦錯事，影響到她和偉大領袖的形象與聲望。所以常常在一些會議上對她領導下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議或意見。結果我有的意見觸犯了她身邊的人，也和她某些想法不太一致，有人就給我上綱上線並告密上去，說軍報有一股反對肖力的反動勢力，我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正與江青一夥狼狽為奸互相利用的林彪死黨黃吳李邱得知這一‘階級鬥爭新動向’忙下達指示說，‘在全國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是現行反革命，在軍報反對肖力同志的也是現行反革命！’於是我就被揪了出來。由於我一直聲辯自己並未反對肖力，又成了態度不好、拒不認罪的典型，被‘抗拒從嚴’地定性戴帽雙開勞改去了。其實這時肖力早已不在軍報，許多事她都不知道，主要是林彪手下一夥想利用這事討好江青，裝得非常效忠毛主席好再往上爬，就拿我作了墊腳石。肖力本人並沒有直接責任，所以我在林彪一夥垮臺後就平反了，不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

“可是你的主要罪狀就是反對肖力，聽說整得你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你怎麼能這麼達觀和超脫呢？”我又問。

他又笑著點點頭道：“是的，不過這都過來了。人不能老往後看算舊賬啊，再說後來我重見肖力時，她一知道這事就向我表示賠罪了。”

我忙追問道：“是什麼時候怎麼賠罪的？”

他卻搖搖頭道：“這也過去了。我常感到自己在‘文革’中稀裏糊塗地挨了整，她李訥呢？也未必比我們清醒多少。我看她其實也是當時上層政治鬥爭棋盤上的一粒棋子，任人家把她擺來弄去，挪東撥西。她的身份和地位，更處在全國全黨鬥爭的風尖浪口上，時時刻

刻比我們更緊張更危險，因此她的日子絲毫不比我們好過。她父母在世時是如此，老人家一去世，老娘又倒了台，她的處境就更難了，她受到的精神打擊和政治壓力肯定比所有的人都更大更沉重，而這一點偏偏又不為人知，有口難言，有苦也說不出。我們這些人挨了整還有人同情支持打抱不平，連她都要來向我賠禮道歉，可是她自己呢？誰會同情理解和支持她呢？她的苦衷和難處又有誰知道呢？老人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和她媽媽幹下的事，她怎麼能承擔責任和獨吞苦果呢？所以，李訥應該受到我們的體諒、關心和愛護，應該讓她從歷史的沉重負擔下解脫出來。這也就是我這次把她請出來的出發點。”

他用緩慢沉重的語氣說完，我竟半晌沒再開口。本來還有不少關於李訥的問題，例如她的婚戀和個人生活，她和江青的聯繫接觸特別是江青到底是怎麼死的，是不是如傳說的是死在李訥家裏的等等。但是經他這麼一說，我感到自己似乎成了專為低俗報刊採寫奇聞趣事打聽秘聞隱私的小報記者，覺得再也問不出口了。正好有人來找他有事，我便嚥回了沒出口的話，說下回再來請教他，趁機退了出來。但是我對於李訥的間接訪問和追蹤探詢並未終止，不僅陸續獲知李訥的若干重要情況，還聽說了一些關於李敏的事。下面再分別道來。

李訥的婚戀、家事及其悲歡

李訥有過一次不成功的婚戀，那是七十年代初期發生的事。她奉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離開了北京，去中央機關在江西的“五·七幹校”進行勞動鍛煉。當時她已至而立之年，進入了“老大難”式的待嫁超齡姑娘的行列。由於其特殊地位和極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她無機會也不可能享有常人一樣的情愛生活。也許是幹校所在的山鄉村野，暫時遠離了充滿刀光劍影的政治舞臺，花前月下小河邊也比北京的深宮高牆內更宜於開動啟發人情人性與人的本能，她與同一幹校同一連隊的一位年輕人相戀了，有人說他們結婚不久就懷孕了，也有人說他們是先嘗了禁果，總之是他們有了個孩子，並且是個兒子。只是在兒

子出生以後兩人又分手離異了。其原因又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出於其母江青的干涉，她不願讓那個門不當戶不對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當她的乘龍“慢”婿，甚至說她想把自己的“公主”嫁給寵兒般的姚文元或是喪妻不久的外交名人兼黨內才子喬冠華，其實他們一個早有配偶一個另有佳偶，此說似屬無稽之談，不可置信。據能接近李訥的人士透露，她自己曾說是由於雙方性格不合志趣有異越來越無共同語言才決心各奔東西的。

不論怎麼說，這次婚姻以失敗散夥而告終。兒子留給了李訥，不久其父逝世，其母被揪，李訥忽然成了無父無母無夫和無家之人。據說由於感情受到重大打擊，精神受到嚴重刺激，她一度發了精神性疾病，不得不長期住院治療。這下就苦了她的兒子，那孩子只得存放在中直機關的幼兒園裏。每到週末假日別的孩子都被父母雙親或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或姑姑姨姨或叔伯嬸娘等等接回家享受天倫之樂，但只有李訥的兒子孤苦伶仃無人接送無人疼愛無人管束。不僅如此，有人得知這“崽子”是江青的親外孫又代外婆受過地無端承受了不少歧視羞辱甚至咒罵，作為人母的李訥如果知道這些情況，其心情是可想而知。

八十年代初她病情漸緩，雖因服藥吃了過多激素致使身體過度地膨脹，精神上卻逐步轉入正常。她出院後就與兒子相依為命地共同生活了，但因她實際從未過過家庭生活，“孤兒寡母”般的日子過得十分艱難。這引起了當年老人家的衛士長及其妻即李訥小時的保姆的注意和關切，他們對李訥的處境遭遇十分心疼，便想了個最積極有效的解決辦法：為她再成個家，好有個生活伴侶或幫手作依靠。恰好他們有位也曾在中央警衛團工作並作過中央領導人警衛員的老戰友單身在京，經他們向李訥推薦勸說和撮合促進，她也就接受其建議，於一九八四年“下嫁”給了這位同志，這就是正在她身邊的王景清。

就此我將有關王景清同志的情況插敘如下：

他是陝北參軍的老同志，在中央和中海工作時與李訥也相識，只不過一個是“叔叔”一個是“小公主”。五十年代後期他被選去軍事學院學習深造，畢業後被分配到昆明軍區任警衛團長，後又調任某

分區司令部參謀長。一九八三年在參謀長任上離休去職，此前他已與其妻辦了離婚，後應老戰友之邀隻身來到北京，由老單位接受並在北京安家，隨後就有老戰友向他提出了與李訥結合之事。他出於對已故偉大領袖的敬愛懷念和對於領袖骨肉親情往事的關切同情和憐愛，接受了戰友的建議與李訥作了接觸交談和相互瞭解商討後，於一九八四年登記結婚成了家。李訥的孩子終於又有了父親，李訥自己也終於有了個“編制”基本齊全的小家庭。

這裏我想起一件舊事，大約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九八五或一九八六年，有一本香港雜誌上登了這樣一段北京軼聞，大意是李訥和王景清結婚後，在依法探監看望正服刑的生身母親、反革命犯江青時，循例向其老母報告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大事。江氏聽罷問道：

“他和你結婚前，知道你的真實身份嗎？”

李訥說：“知道，我什麼都對他說了。”

江氏欣然道：“好！他敢跟你這個大反革命的女兒結婚，說明這個人不錯。我同意了！”

這段話雖然頗像江氏語言及其性格，但不知有何依據，只能錄以備考和僅作參考。

卻說這位王景清同志此次與李訥同來，只見他始終不離其妻周圍，雖然少言寡語，卻是十分默契，雖是婦唱夫隨，卻也合拍和諧。

有位參加集會的比我更年輕的朋友指著他悄悄問我道：

“你看他對她（即李訥）的感情，到底是出於夫妻之間的互愛親情，還是出於革命同志間的階級友情，或是封建意識的忠於先主的義僕之情？”

我想了想道：“說不上，說不清，也許都有，是多種感情交匯融合的結果。不過你說的最後一點，太貶低以至會傷害那位老王同志。”

他說：“所以我只能悄悄對你說，並且是請教你。”

不過我還是在此公開了他的“私房話”。儘管我對此公此論頗有保留，但卻不失一家之言，也錄下立此存照。

寫到這裏我又想起集會期間有人對李訥的又一段議論或爭論。

有人對另一人說：“你注意到嗎？李訥兩口子的毛衣袖子上，各有一塊大補丁，老王的衣服後領還是接補的。‘公主’和‘駙馬’居然穿著帶補丁的衣服，不親眼看見，真不敢相信。”

“是啊！不過，這到底是他們在堅持革命傳統，保持艱苦作風；還是他們確實收入有限和生活困難，買不起新衣服呢？”有人不由讚歎地問道。

“我看後一原因不存在。有人說：‘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王景清曾經送了一千塊錢給進京的戒嚴部隊，並且不留姓名，丟下錢就走。幸而有人記下了他騎去的自行車車牌號，才據此查出是他。這是當時中國老年報登的。這事說明，他們不是沒錢用。’”

“那麼這就是他們勤儉節約的一種習慣，完全自覺和自然地不事鋪張不圖享受，生活上一貫保持低標準。”

“可是現在還有幾個人這麼幹呢？堅持革命傳統未必非穿破衣服不可，假如讓外人看到我們連毛主席家的人都穿不起新衣服，中國人還過著這種生活，這不影響到黨和國家的形象了嗎？”

只要李訥需要和接受，我們就盡全力幫助和資助她，因為她是我們毛主席的女兒

李訥夫婦的過於簡樸不僅引出了以上一段議論，還引起一些目擊者的深切關懷，據說有人竟要用拉贊助的辦法，為李訥發動一次募捐，目的是湊些錢，助其改善生活。如果真有此舉，我當然很樂意並有條件慷慨解囊，不過我估計李訥他們根本不會接受，並將根本反對別人這樣做，弄不好還會傷害他們的自尊心，認為別人太不瞭解和不理解他們，其結果是反而給他們增添煩惱幫了倒忙。

此議雖未落實兌現，李訥他們在時卻引起了另外一件事。

就在他們離開這裏前的那個下午，李訥正在自己房間裏，突然闖進了兩個不速之客。他們是正在同一院內參加另一會議的代表，一個是女的，另一個也是女的。他們聽說並發現了李訥在這裏，就斷然和貿然地自己找上了門。李訥面對這兩個陌生人驚異地問她們來找自己

有什麼事時，她們才說：

“沒有什麼事，就是想來看看你。”一個說。

“看看你的真人，是不是像人家說的那樣。”另一個說。

據說（很遺憾，當時我又不在場，此事還是聽別人說的）李訥不無難堪略有責怪地說：

“我有什麼看頭呢。不就是這樣嗎？”

那兩位忙解釋說，他們是出於對已故領袖毛主席的感情及對其後人的關心掛念才來看她的。

據說李訥又苦笑道：“你們有這感情就去好好看看《毛選》嘛，看我幹什麼呢？”

……

我一得知此事立刻打聽並找到兩位不免冒失的女同胞，原來她們一個是上海人，一個是天津人，都是來參加這裏召開的一個經濟性的會議的。她們承認並證實了自己製造的這一“新聞”，那位年已半百不僅風姿猶存並且熱情不減的上海經濟師十分認真地回答我的訪問道：

“可能有人認為我們這個行動很可笑，不，我們是真情實意，確實出於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感情。當然了，李訥同志又是江青的女兒。但是江青的女兒又怎麼樣，她總歸不是江青吧，大家恨江青為什麼要恨她女兒呢？女兒怎麼能為她媽媽承擔責任呢？我覺得李訥真夠苦的，父親剛才去世，母親又落得那個下場，聽說她自己還拖著個孩子，不只是無依無靠的，還要被清查批判，太使人同情了。人心都是肉長的，我能猜想到她的苦處和難處，所以就決心去看她一下，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

她擦了擦由於激情生發而溢出的淚花，繼續用她那吳儂軟語式的江南普通話急切地說：

“老實說，他們要還住在深宮大院裏，還那麼出人頭地，父母親還那麼大權在手，我才不去看她呢——當然，也看不到她。現在不同了，我想她可能很受冷落挨歧視，會感到孤獨寂寞，因此，這種時候，她就特別需要朋友，需要人關心，需要人幫助。我就是為了



李訥(左)、周秉德(右,周思來侄女) 2000年代攝

這個，才去找她的。決不像有人以為的，是出於一種好奇或者一時衝動，不是的。老實說，我看到她那樣子，當時就要哭出來，她和她愛人，怎麼穿得那麼破舊，過得那麼艱苦呢？她可是毛主席的親生女兒啊！現在全國人民的生活都開始好過了，她怎麼能還過得這個樣子呢……”

只見她那雖已多皺卻不失秀氣的兩眼裏又溢出了淚水，我忙打斷她並反過來安慰地道：

“我理解你的感情，就是別人對你有誤解也沒關係，你對毛主席和李訥的感情，的確是純真和誠摯的，這是你們這代人共有的一種很可貴的感情。”

“是嗎，謝謝你。”她剛擦去淚水的眼睛裏又漾出了欣喜，接著對我說道：“老實說，只要李訥同志真需要和肯接受，我願意盡全力去幫助和資助她。我相信大家都會這麼做。她的父母不在了，我們老百姓可以來照顧她，供養她，保證不讓她吃苦受委屈。就因為，她是我們毛主席的女兒。”

我問她對李訥這樣說了沒有。

她說：“沒有。我沒有當她面說，不敢說，怕她傷心。但這個意思我向她表示了，只要她有要求，隨時可以找我們任何人，我們都可以做她的好朋友……”

我覺得自己的感情也受到這位女經濟師的強烈感染以致淨化和昇華了，暗自再次放棄了原先設想的對有關李訥的各個問題及其細節的追蹤訪問和繼續打探，感到那樣確實太低俗了！

不過，我已經瞭解到的可能為人們普遍關心的事，還是在這裏補敘一下。

李訥的家境、孩子，特別是有關江青的情況

一、李訥本人早已不在《解放軍報》社了，也不在曾經列名其間的北京市委，而是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一個服務機構裏，只是因為身體不好，基本不去坐班，但工資福利等等照發。加上王景清的離休待遇收入，兩人的生活還可以，除了尚缺空調、錄相機等高檔家用電器，彩電、冰箱等都已有了。中央曾從積存的《毛選》稿費中按遺產繼承法給包括李訥在內的幾位毛氏直系遺屬各撥了八千元人民幣。

二、李訥的兒子已長大成人並獨立工作了。他是初中畢業後自己考取一所旅遊行業的職業高中，一九九〇年亞運會時他曾在亞運村實習鍛煉和義務服務。中專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外資飯店裏當服務員。這也許又是一條花邊新聞，中國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的嫡親外孫，受雇於外國資產階級並且去“伺候人”了。

三、江青被判刑後，李訥依法按例在探監時去看望過她。外界盛傳，小報登載甚至官辦《參考消息》上也公開報導說，江青曾假釋出獄與李訥住在一起，此事純屬謠傳。江青從未住進也從未到過李訥家，她服刑期間主要住在一個帶小院的小屋裏，可以在院內“自由”活動，日夜有一位女看守員兼服務員“陪伴”著她。她屋裏不僅有彩電，還有各種報紙雜誌，因此她雖然“秀才”不出門，也知天下事。據公安部一份內部材料透露，她有次得到一本在延安相識的“朋



李敏（左）、劉愛琴（中，劉少奇長女）、周秉德（右），2000年代攝

友”、老革命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寫的《女皇夢·江青外傳》（這本書很可能是李訥帶給她的），她看後大罵朱仲麗道：

“這人真會胡說八道，過去她拚命拍我馬屁，我都不想理她。現在卻這麼編排我，我要出去非找她辯論辯論！”

我雖未親見這份材料，卻認為基本可信，江青是說得出這種話的。

至於江青的死，更不是在李訥的家裏。據說是在北京郊區一個療養院裏的隔離區內。其死因確是自殺，主要是由於病痛難忍和精神空虛以致絕望了。由於她是依法保外就醫假釋出獄，夜裏就沒有人“陪”她住了，她就在床頭橫杠上系了根扯下的布帶，一頭勒住自己脖子，然後往床下一滾，致使氣絕而亡。

江青死訊公佈後，許多知道李訥住址電話的人，紛紛去找她或打電話詢問她以圖探知具體情況，弄得李訥極其煩惱，身體和精神都已

承受不了，就在一個時期內概不接待來客也不接任何電話，並且更堅決地拒見所有記者之類。

此前她曾被迫接受過採訪。一九八九年初某一天她正在家中閑坐，忽然闖進了一位持有某報記者證的年輕女性，一面向她提出各種問題，一面四處觀望，李訥不樂意又不失禮地應付了一下。哪知她又來了第二次，這次李訥就沒出面，只由老王代她作了簡單接待。那女記者卻第三次又來，李訥和老王都回避了，由孩子將客人打發走了。就這麼三闖家門，那位女記者居然洋洋灑灑寫出了一篇幾萬字的《近期三訪李訥》，在某一地方刊物發表後竟引起“轟動效應”，海內外各報刊紛紛轉載摘發，使李訥一下又成了“熱點人物”。據說她知道後十分生氣，對新聞界人士從此更加敬而遠之和避之唯恐不及。

行了，關於李訥我已說得寫得透露得夠多的了，再寫下去也將引起她的不滿，造成她的不安，就會對不起她了。只得就此打住，再調轉筆頭，向讀者報導一點她姐姐李敏的事。



毛澤東、李敏在北京1950年初攝

“皇族”中一個最悲劇式的人物——李敏

也許可以這麼說，李敏這輩子凡是幸福和歡樂都是偶然和短暫的，凡是痛苦和煩惱卻都是綿長和持續的。

不是這樣嗎？

李敏在陝北窯洞裏出生不久，當年的井岡山女傑、母親賀子珍與即將成為偉大領袖的父親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磨擦以及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以致難以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當時叫做“嬌嬌”的李敏才一歲多，母親就離夫別女遠赴異邦去了蘇聯。日理萬機且開始握有全黨全



毛澤東、李敏在北京1950年後期攝

軍大權的父親自然顧不上也管不了她這個小嬌嬌了。她就過了幾年沒有母親和等於沒有父親的孤兒般的生活，有時不僅衣衫襤褸，頭上還生了蝨子。四歲時被送到蘇聯去找媽媽，剛剛找到了媽媽，蘇聯就因為希特勒軍隊進攻打開了偉大的衛國戰爭。一打打了近五年，戰亂動亂和混亂加上生活上的艱難，使本來多病的媽媽病態病情更重了，其惡劣心境加個強脾氣使她與所在之處的蘇聯官僚搞僵了關係，由於她既不太懂又不想聽大舌頭發音似的俄國話，自己唧唧的又使人莫名其妙，竟被人當作“瘋子”強行送進了精神病院。嬌嬌又成了父母雖雙全卻一個也見不著的“孤兒”。

直到戰後第三年的一九四七，媽媽的老戰友王稼祥去蘇聯，經過多方打聽反復交涉才找到了這對離散已久的母女，已是十多歲小姑娘正處“花季”的嬌嬌和剛從瘋人院找出的才三十七八歲的媽媽，竟分別都被剃成同樣的“光禿瓢”。可見在那些年間他們各自享受了什麼樣的“待遇”。王稼祥叔叔把嬌嬌和她媽媽接回了祖國，但是他們回得了祖國卻回不了家。他們原先的那個家裏除了仍有已是中國人民偉大領袖的父親以外，又有了一個不是母親的“母親”加一個不叫嬌嬌的“嬌嬌”，後者就是李訥。嬌嬌的媽媽反而成了“第三者”，她自己也成了“外人”甚至是“外國人”，因為她已不會說中國話和不認得中國字。思夫心切但又不宜“插足”的媽媽，讓嬌嬌用俄文給她爸爸寫了一封信並取得了聯繫。全國解放後萬民歡騰時，爸爸終於還是記起自己還有個叫嬌嬌的女兒，讓人把她帶到成為首都的北京，見到了已是中國共產黨兼人民共和國主席的爸爸。只是嬌嬌雖然有了爸爸，媽媽卻永遠失去了曾長期同甘共苦並肩戰鬥和一起走出二萬五千里艱險長征路的丈夫，並且不能進入北京，只能隱名埋姓地獨自避居外地。已被偉大領袖兼親愛爸爸賜名為“李敏”的嬌嬌，便利用假期去探望孤身獨居的媽媽，也算給了她一點僅有的慰藉與溫暖。

李敏在媽媽面前是她唯一的親人，在爸爸面前卻只能算“之一”，因為偉大的爸爸身邊還有著一個不是她媽媽的媽媽和也叫妹妹的妹妹，這兩位還顯然比自己跟爸爸更近更親。她平時也不住在中南海深宮似的家裏，而是寄宿在軍隊子弟學校的八一小學裏，因為她要

從頭學習中文。從“八一”畢業出來又進了“紅色貴族學院”式的北師大女附中，以後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畢業後與八一小學的大個子同學、原西北軍將領孔從洲之子孔令華完婚成親，隨後又有了嬌嬌的“嬌嬌”，只是她自己成家之時也是她離開爸爸家之日，她不僅奉命搬出了中南海，還被吊銷“執照”收走了出入證。從此她想見爸爸也得經過申請、報告、請示、審核、批准和候“旨”見“駕”，享有了“上訪人員”或等待接見的“外賓”的待遇。好在他們過上了小夫小妻小娃兒，小鍋小灶小家庭式的日子，每年定期時地晉見一下爸爸他老人家，再去外地和不算老的老媽媽補過一點天倫之樂，她也就知足了。

哪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他們家平凡如全國億萬人普通的小日子，都過不了了！

李敏在革命熱潮和造反狂瀾和派性旋渦中 及其後果近事

千里雷聲萬里閃，紅色風暴襲人間。東西南北中的工農商學兵，被一齊捲入“文革”火海之中。李敏正在解放軍的國防科委工作。當時全黨全軍全國和全民都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李敏不僅不能例外，作為偉大領袖兼父親毛主席的親人之一，還應該更堅決更勇敢更不怕犧牲和排除萬難地去響應老人家的偉大號召和執行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並且理解不理解的都要執行，也就毫不遲疑和義無反顧地投入正席捲中華大地掀翻所有單位的革命熱潮、造反狂瀾和派性旋渦之中。儘管她未必比別人離毛主席更近更親，她的傾向、動向和去向，卻成了人們的目標甚至指路標，一些造反組織的造反頭頭們就努力跟著她圍著她和捧著她，抬舉著擁護著或者挾持利用著她去幹這個說那個。

自認心中自有紅太陽的李敏，也就當仁不讓身先士卒地走在衝在最前甚至殺在革命群眾最前頭。“紅司令”下令“炮打司令部”，她就去開炮拉火栓；老人家號召揪出“走資派”，她也決不對那些人（許多



李敏（左）、伍一曼（伍修權長女）在李敏家中，1980年代攝

都是她叔叔）“請客吃飯”；以她爸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動批判“資反路線”，她當然不能“溫良恭謙讓”。她確如偉大的父親當初給她命名時對她所期望和要求的那樣，果然“敏於行”了，雖然她名字本身就出自“反動透頂”的孔老二的“黑話”。當時她確也熱熱鬧鬧風風火火和轟轟烈烈地大革了一場命。

不料一九七六年國產的“十月革命”一陣鞭炮響，以她那不是母親的母親為首的“四人幫”被一舉粉碎，自己正忘乎所以深陷其間的大革文化命至此宣告停火收場之時，曾與她“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的革命造反戰友們，有的紛紛作鳥獸散，有的在清查交代說清楚時，痛快供認他們的“黑後臺”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人李敏同志”，說是她向他們傳達了“最高指示”才幹下了那麼多“暴烈行動”。於是別的單位揭批查的目標是“四人幫”的王、張、江、姚，她所在單位的批判對象卻是王、張、江、姚、李。“李”即她李敏也！好在所在單位領導看在已故偉大領袖她父親老人家分上，對她特殊照顧。讓她享受“背靠背鬥爭”的優惠待遇，即可

以不出席批判會，不去看大字報甚至不去上班，囑其呆在家裏自我檢查“每日三省吾身”。

可是她不“省”還好，三“省”兩“省”竟“省”出了他媽媽那股單性子衝勁氣，她眼見當年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戰友特別是其骨幹們，一個個被揪的揪、查的查和批的批，特別是其親叔叔毛澤民之子，爸爸臨終前唯一為其整理傳達“最高指示”曾任中央政治局“聯絡員”的堂弟毛遠新，也被作為“反革命集團要犯”被正式逮捕了，加之那雖然不是自己母親卻是父親的夫人的江青早作為“反革命集團首犯”落入法網，連每一滴血液甚至每一個毛孔都屬於和忠於偉大領袖兼爸爸的自己，也成了揭批查的目標和“背靠背鬥爭”對象，更不能容忍的是有人居然敢懷疑甚至否定絕對正確的、空前偉大的爸爸兼毛主席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她生氣並且發火了：

“翻了天了，我們毛家沒好人啦？我們聽我爸爸的，就是什麼錯誤也沒有！”

有關領導又為了照顧她，將其調出原單位，讓她做個自我批評，然後另行分配工作，但是她還是那兩句話：

“我聽我爸的，有什麼錯？”

由於她拒作自我批評，工作也就分配不了。於是從一九七六年起，她就一直呆在家裏。不過她雖然從不上班，卻年年月月天天是一身軍衣，當然都是老式的。她幾乎從不出門，似乎連報紙也不看，廣播也不聽，以致有人去看她對，常常脫口而出的是“反動路線”“派性鬥爭”等“文革”語言。其健康狀況更不樂觀，給人的印象常是一副病態一臉病容和一口病話。

據到過她家的人透露，她家正屋至今還保留著她爸爸去世時佈置的靈堂，仍然掛著“繼承爸爸的遺志把革命進行到底”之類的標語口號。只是她正值“花季”的女兒就在老人家遺像的旁邊和對面，貼上了不少中外影視明星和歌星的彩印畫片，還有各式外國風光人物的時新掛曆。改革開放之風也刮到老人家身邊了，“資本主義”的東西在和無產階級領袖“對著幹”了，但是這一切怎麼也刮不進觸不動李敏的心扉。她一直像那玻璃櫃裏的偉大的父親一樣，始終保持著沉默，

並和周圍的一切“和平共處”各不相擾。

據說李敏的家住在北京景山後街，又據說這些年她最遠只去過不到一站地的地安門，看來她的思路歷程若干年來也沒有走出“一站地”，她從思想到生活似乎都在為她爸爸“守靈”，她對其老人家的忠誠堅信和寸步不離，似可成為“三忠於”“四無限”最後的、也是唯一最高的典範。

只是有一點她好像忘了，老人家給她取名時對她寄予的希望和提出的要求，她似乎並未“落實在行動上”，更未“溶化在血液裏”。這些年來她不僅不“敏”並且幾乎寸步不“行”了。至少在這一點上她並未真正活學活用老人家對她的“最高指示”。不知她這樣將如何告慰正與馬克思為伴的爸爸老人家，怎樣向已故偉大領袖毛主席作“早請示晚彙報”……

我們這次集會的組織者透露，他們也曾邀請李敏和李訥他們一起來參加這次活動，好讓她出來散散心，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和接觸一下外部世界，至少也讓她們異母姐妹們見見面談談話。但是去的人和她的丈夫孔令華同志（據說他在深圳辦一個科技開發公司，也步入改革開放行列中了）一起怎麼動員她也不肯出來。她就這樣背著一身精神重負甚至懷著一腔哀怨憤懣，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地自我禁閉和封閉著……

【尾聲】 偉大領袖為人民謀幸福，他自己的親人卻被折騰得“呼兒咳啣”！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我國唱得最多最響和流傳最廣的革命名歌《東方紅》，其中唱道：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啣，
他是人民大救星

是的，他曾為人民謀幸福。可是他自己家的人呢？且不說已經犧牲病逝的那些，就是他的妻子（不止一個）兒女（更不止一個），有幾個是幸福的呢？特別是他老人家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大革文化命”，搞亂了全國整苦了人，不是把他自己一家人也折騰得都“呼兒咳喲”並且至今還解脫不了嗎？他當了人民的大救星，誰又來當他自己家裏人的“救星”呢？

如果安臥在紀念堂中的老人家有知，您能回答我：這是怎麼回事呢？到底該怎麼認識和評價這個現象呢？

也許一切都由於您老人家太偉大太崇高了，而“高處不勝寒”，結果是您自己的親人，全沾了您的光，首當其衝地被“寒”得一個個都“呼兒咳喲”了！

是不是這樣呢？

【原作者附言】由於本文素材不是出自一個來源，來自一條渠道，更不是某一個人提供的，也就不能都是第一手的權威性的和正確無誤的，難免也有失實、有誤、不全面和不準確之處。敬請知情人予以批評、指正和補充。我寫作和發表此文並未征得本文主角李訥和李敏等同意，一是不願和不便打擾他們，二是不想使他們因此文感到為難，三是深怕他們將此文壓下不同意發表，使我這段時間的心血勞累付之東流，所以就文責自負和“獨斷專行”了。

不過我相信文中所寫的是廣大讀者所很想知道和需要瞭解的。即使此文有的地方可能觸及甚至傷及李訥、李敏等同志的某個“創疤”，但是也請你們和廣大讀者相信，我是滿心想表示自己對你們的關切、尊重和愛護之情的，很想代你們抒發一下心中的苦衷隱痛。我的初衷能否如願，只得靜待廣大讀者、各位知情人尤其是李訥、李敏等同志的檢驗或判決了。

一九九二．六．五改畢並附言

“紅色公主”軼聞

作者附言：

此文是應友人之約，以他自己名義寫的，曾在江南某報發表。文中全部事實，卻都是我親歷的。

友人H自京回到江蘇故鄉，與我相逢暢敘。他在“文革”中曾作為“現行反革命”被林彪、“四人幫”一夥遣送回鄉監督勞改幾年，其頭條罪狀竟是什麼“反對肖力”。所謂“肖力”，即毛澤東及江青之女李訥。當年李訥的雙親，一是偉大領袖，一稱“偉大旗手”，她也隨之被人捧得誰也反不得了。H不知怎麼冒犯了她，落得被逐出京都，回鄉勞改，後來才被落實政策，平反回京復職了。他與李訥有過這段恩怨，我想二人自會成為冤家對頭，不想此次重逢說起往事，H卻說情況恰恰相反，他在“文革”後又見李訥時，都因各自“歷盡劫難”而“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李訥對H因自己蒙冤遭難而深深致歉，H則認為是歷史時代使然，不應怪罪記恨某一個人。由於雙方以誠相待，反而又成了朋友，不僅時常接觸往來，還曾幾次相約外出，因而又生發了一些故事。其中之一是——

一九九五京都第一要案：李訥夫婦鉅款被騙

此文我已從《參考消息》和幾種文摘小報上得知一二，誰知H竟

是此事的見證人和參與者，使我有幸獲得了這一“名人軼事”的第一手材料。

H在我提問後說，這事實是由他引起的。有位原籍廣東汕頭地區的泰籍華裔蕭建波先生，捐贈五百萬人民幣在家鄉普寧建成一座華僑學校，定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舉行落成典禮，特地邀請北京若干名人前往參加以壯聲色。H便約李訥夫婦同去南方一走，李訥的丈夫王景清卻提出了一個願望：老王原是抗戰時期參軍的陝北老同志，他的家鄉位於陝西最北部的神木縣，由於經濟生產一直落後，直接影響了教育事業，造成文化偏低，資訊不靈，難以摘掉貧困帽子。老王決心為改變家鄉面貌，助一臂之力，近年內他多方奔走，籌集到十幾萬元，先為本村一座小學修建校舍，哪知開工以後由於物價已漲，那筆錢砌了牆就蓋不上頂，他把自己和李訥多年積下的五千元存款捐出墊上，還是補不上窟窿，他們正在為此發愁。

H瞭解到這一情況後，更鼓動他們與自己同去廣東，說沿海僑鄉是全國數得著的富裕地區，出面邀請者又是腰纏萬貫的富商，老王家鄉所需缺額又很有限，到那裏去一趟，很可能拉到一筆捐款，以救“燃眉”之急。李訥夫婦一聽言之有理，正好也想去南方走走，對蕭建波慷慨捐資興建學校的善舉更是欽佩，便欣然應邀前往，來到了汕頭普寧，蕭建波見中華偉人毛澤東主席之女李訥夫婦，光臨參加他捐建學校的落成典禮，也是喜出望外，十分高興，他見李訥夫婦一個一身青灰老式褂褲，一個身穿已開線破損的舊軍衣，生活如此儉樸艱苦，更是感動不已，與他同行歸國的一些僑胞看到，正動議捐資為他們改善生活添置衣服。H得知此議後忙向他們透露道，僑胞們的好心，李訥夫婦未必能接受，但他們也在為家鄉集資建學校，正缺少一筆錢，如果能在這方面支援他們一下，他們肯定樂於接受並感謝大家的。蕭建波聽到後，立即根據老王所需實際數字，獨家為他們拿出十五萬元港幣現款，當面交給老王，他們一面連聲表示感謝，老王還代表家鄉為蕭建波親筆寫下了捐款收據，說將來再由家鄉補上正式的收據。至此，李訥夫婦實現了他們此行的最大願望，也為蕭建波的捐款善舉增添了又一佳話。

老王將蕭建波的贈款帶回北京後，馬上與家鄉聯繫，說很快就將這筆錢送回陝北，當地回話說，港幣在那裏沒法花，要求都換成人民幣帶去。老王一想也對，老家的鄉親對港幣見都沒見過，還是帶回人民幣最省事，好在北京換外幣很方便，就在一九九四年的最後一天，到就近的銀行去兌換。由於他從沒換過外幣，還小心地先帶上五萬港幣，如果順利就再去全部換了。他哪知道現在不僅有許多非法倒換外幣的人，更有不少見財起意的傢伙，他身懷鉅款還沒去到銀行門口，就被一對青年男女盯上了。其中那個女的先叫了老王一聲“大爺”，問他是不是有外幣要換。老王見她挺有禮貌，不像壞人，就說了實話，那女的忙上來懇切地用哀求語氣道：“大爺，我家有點急事，正需要一筆港幣，您能不能換給我，救救我的急，我們一家老小，這輩子都會感謝您！”說著還露出了哭聲，旁邊那個男的忙上來為她幫腔證實。一直在部隊工作，並長期生活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老王（他原在中央警衛團，後來又是雲南怒江軍分區參謀長），竟被那二人說動了心，好心地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那二人連忙把老王連請帶推地上了路邊一輛小汽車，女的還說自己姓王名虹，又將BP機號告訴了老王，以示自己的誠意，並急切地從老王手中接過了成疊的五萬元港幣。當老王向對方要人民幣時，那女的竟似十分關切地說：“這麼多錢你拿著不安全，現在壞人多，可別被人搶了。”建議由她幫老王先在銀行存上，說這樣會保險些。老王仍沒多想，就和那二人先後下車來，哪知他正等那二人時，他們卻一下鑽進另一輛車裏，沒等老王回過神來，那車就開跑了，老王連車牌號也沒看清，他要換的人民幣沒到手，帶來的港幣卻全沒了！

當天正是一九九四年的最後一日，老王在晚上將這個倒楣的事在電話上告訴了H，說自己這個新年過不好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救急錢，竟一下被人騙去了。H忙問他報案沒有，他說自己當時就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報了案，哪知那裏不僅不管他，反而把他教訓了一頓，指責他不該私自與個人換外幣，出了事只能自己負責，自作自受。H又問他報案時說明自己的身份沒有，老王說沒有。H說應該向公安機關表明自己是毛主席的親屬，這筆錢是怎麼來和幹什麼用的，這會有

助於追回失款，甚至可以批評對方，問他們治安工作怎麼做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搶錢騙人居然搶到毛主席家來了，這還像話嗎？老王為人一向謙和謹慎，從不張揚自己是毛主席親屬的身份。這次為了要追回失款，只得破一回例，但自己仍不好意思出面，便轉請一位與公安部門有關係的同志幫忙，那位同志馬上為他聯繫了，一下子驚動了北京市局和所在分局的負責人，立即親自出馬辦案，並向老王道歉，結果不到十五個小時，就將那個自稱叫“王虹”的女人抓到了，並且追回了贓款，只是已將港幣換成了人民幣，那個同案共謀的男人卻跑掉了。破案並捕獲原名張素珍的“王虹”時，是一九九五年元月三日清晨，此事就成了“九五京都第一案”，並且被人很快捅到了報紙上，又傳到了海內外，一向只想清靜淡泊的李訥夫婦，作為這一事件的主角，一下子又成了新聞人物，並且還不止是這一“新聞”，其二是——

廣東之行又一“新聞”：與劉少奇之女喜相逢

也是汕頭普寧那座華僑學校落成典禮時，已故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長女劉愛琴和丈夫沃寶田，同被主人邀請前來，竟在當地與李訥夫婦不期而遇。

李訥和劉愛琴兩家，雖然都住在北京，但卻分居東、西市郊，並且從未互相往來，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各自的經歷、遭遇和處境，曾經懸殊極大又互換位置。劉愛琴的生父劉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直至慘死，包括劉愛琴在內的全家親屬，也一一被株連受害，她的親哥哥劉允斌，劉少奇最鍾愛的長子，也被迫臥軌自殺，劉愛琴自己也曾被長期監禁和勞動改造。而造成這一切的，就是李訥的生母“四人幫”之首江青。由於江青的一系列罪行，她在黨和人民的一致呼聲下，被判處了死刑（緩期執行，後改為無期徒刑，1991年五月自殺）。劉少奇一家至此終獲徹底翻身解放，他們一家受到了人民的關懷、愛護和尊敬。與此相反的是，作為江青唯一女兒的李訥，不僅在精神和生活上，從此蒙上了沉重陰影，地位也似一落千丈甚至成



李訥（前右2）、王景清（前右1）與劉愛琴（前左1），沃寶田（前左2，劉愛琴丈夫）等，1994年攝

了代母受過的洩恨對象，自己和孩子都曾受到人們的白眼和嘲罵。按照常情，李訥和劉愛琴兩家，應屬有著幾條人命血案的世代冤仇，他們間如果有著某種隔閡甚至怨恨，也是可以理解的。

當李訥夫婦和劉愛琴夫婦不期而遇地同時在廣東汕頭出現時，分別邀請他們來的活動組織者，不由心裏打起鼓來，他們“冤家路窄”地偶然相逢，會不會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呢？一些知情者也密切注意著他們的態度和反應。不過人們很快發現，自己顯然多慮了。他們一見面，馬上毫無芥蒂地相互握手問好，並向對方介紹了各自的愛人，又一一詢問了雙方從個人身體到家庭生活等方面的種種情況，相互關切親密得好似一對姐妹重逢。劉愛琴比李訥年長十多歲，當然地成了姐姐，在此後的各種活動中，他們都是並肩同行，不斷相互交談，連吃飯時都要湊到一起。李訥先進餐廳時，總要給劉愛琴夫婦留好位子，見他們進來忙招呼過去同桌坐下。有時李訥晚到，進門後先找劉愛琴他們，然後馬上趕過去同坐。兩位偉人之後的同時出現，當然地引起了人們的莫大興趣，許多攝影和錄相的鏡頭，不斷對準了他

們，每到這時，李訥總是把劉愛琴拉到一起，讓人們留下了兩人和兩家的親密合影，一些老人見了李訥，不無激動地說：“我們都很想念敬愛的毛主席，永遠懷念他老人家。”李訥忙說：“還有敬愛的劉少奇主席！”並且把劉愛琴請過來，共同接受人們的問候與祝願。王景清和沃寶田，作為他們的丈夫，也成了一見如故的好朋友。

李訥和劉愛琴兩對夫婦的友好相處，不僅使原先的疑慮者都放了心，又贏得了人們的敬重，他們畢竟都是偉人之後，各自都擁有一個偉大的父親，父親的胸懷氣度特別是思想品德，也體現到了他們身上，他們沒有有些人那樣的“小家子”氣，更不存在所謂的“世仇”，他們以自己的真誠化解了可能有的隔閡與怨恨。“文革”以來，李訥每次見到曾受迫害衝擊特別是其受害原因與江青有關的同志，她總是向對方致歉賠禮和深切慰問，對於自己在“文革”中的某些言行後果，也都坦誠地認錯自責，一再表示對不起有關者，她對劉愛琴也正是這種態度。劉愛琴對李訥也給予充分的諒解，她認為已經發生的一切，都是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的，當時人們都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許多事都不能由個人負責，尤其不能將歷史舊賬延續下來，再推給後人來糾纏還賬，大家都是過來人，各自都有不同的經驗教訓，應該更客觀地看待歷史，決不能搞什麼冤冤相報。她的這種大姐風度和寬容精神，不僅贏得了李訥的欽佩，也贏得了周圍人們的格外贊佩。

我的朋友H，正好又親見親聞了這件事，他在敘述了此事始末後，不由感慨道：我國常把某種人際關係稱為“冤家”，這既可作“仇人”、“對頭”解，又含有“難捨難分”甚至“至親至愛”之意。常言道“不是冤家不碰頭”，李訥和劉愛琴這對“冤家”，在外地偶然地“碰了頭”，他們卻以行動化解著歷史之“結”，表明他們完全可以成為雙重意義特別是後一層意思上的“冤家”。他們所以能夠如此，除了出自各自父輩對自己的教育和影響，也體現出我們民族寬容善良的美德，對人對事及自己家事，才能這樣超脫、瀟灑地不咎既往。H說他也從中深受啟示。

就在李訥他們廣東之行就要結束時，H偶爾說起他在下一年初，

即一九九五年一月的行動打算，竟又引起李訥的興趣，這就在一個來月時間內，出現了關於李訥的第三條“新聞”——

遵義會議六十週年 李訥應邀初訪山城

李訥等即將離開廣東時，H說起自己下月打算去貴州參加遵義會議六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五十周年紀念時他曾去過，活動內容十分豐富，這次正在同貴州方面聯繫再去。李訥聽了不由心動，說她從未去過貴州，早想去看看父輩革命歷程中轉折之地的遵義，她問H能否也幫她聯繫一下，讓她也去參加這次活動。H說你想去就更好辦了，回京後就與貴州省駐京辦事處通了電話，轉達了李訥的願望，請他們向省裏有關方面報告，說李訥夫婦想來貴州參加當地的遵義會議紀念活動。這次活動的組織者得訊卻喜出望外，他們原曾邀請北京幾位老革命家和領導同志來參加活動，因為他們有的年高體弱，有的另有活動都來不了，正希望北京另有人來，現在李訥他們主動要求來，豈不正好，由李訥作為遵義會議中心人物——毛澤東的後人，來出席這次紀



李訥（中）、王景清（左2）、本書作者（右2）等在黃果樹瀑布，1995年攝

念活動，當然是很有意義的事。省裏馬上答復北京，歡迎李訥等到貴州來，並由省委負責接待。H原來只想自己甚至自費來參加活動，也都由省裏統一安排了。H得到貴州辦事處轉達省裏的回話後，馬上告訴了李訥，他們也很高興，希望此行能看到與韶山、井岡山和延安等革命聖地齊名的名城遵義，特別是扭轉了中國革命以至父親個人歷史命運的遵義會議會址，也親自走走留下父輩光榮足跡的婁山關、赤水河等長征名地，還希望能趁此機會欣賞一下久已聞名的貴州名勝風光。雖然這時他們家剛剛發生了善款被騙走的事，還是被即將實現的貴州之行的美好願望，鼓舞得興奮不已。

一月中旬，李訥夫婦和H等在貴州省委的安排下，自京啟程飛往貴陽。順利到達後，貴州的領導同志和活動組織者，熱情歡迎了來自北京的毛主席的親人，在會見和交談中李訥一直興致勃勃，不斷地向當地同志問這問那，對她首次來到的地方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人們發現，她提出的不僅有當地革命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還有許多是這裏的歷代名人和文化遺址方面的事，省裏安排她先去著名的黃果樹瀑布時，她卻在路過安順市時，特地瞻仰了老革命家王若飛的故居紀念館，對父親當年的戰友表示了深深的敬意與懷念。看了瀑布後她又問安順有一座古老的孔廟現在怎樣了，並且說了那裏出過的人和事，當地的幹部忙找到文管部門的同志，臨時趕來打開了長期封閉的廟門，請李訥他們進去參觀了，滿足了她的“訪古”願望。後來到遵義她又和人們談開了明代哲學家、教育家陽明先生王守仁，詢問王陽明貶來貴州時是否就在這一帶，有否留下什麼遺跡……她對中國歷史有如此深入和廣博的瞭解，使人驚歎不已。H說這一方面是其父親的影響，一方面又是她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多年的結果，她正是利用外出的機會，進行與歷史有關的走訪考察，以不斷補充豐富自己的歷史知識。上月在廣東時，她就曾特地從汕頭趕到潮州，去看一處唐代名人韓愈的古跡。這次來貴州對她來說，實際又是一次“歷史旅遊”。

一月十五日正式舉行遵義會議六十週年紀念大會，李訥作為毛澤東主席的親人和專程前來的北京客人，與省裏及各方領導人，一起出現在主席臺上。當會議主持者向人們介紹她時，全場響起了分外熱烈



李訥（左5）在遵義市遵義會議60周年紀念會上，
與當地領導人在一起，1995年攝

的掌聲，一個又一個攝影、攝像機和聚光燈，都對準了她，連會場中的人也忍不住站起來，用自帶的各種相機，抓拍這位難得一見的著名人物。會後參觀遵義會議會址和毛主席當年住處時，她和老王一再深情凝望著父親的照片，細看並撫摸著父親留下的文物。她又特地去瞻仰了當地的紅軍烈士陵園，在紀念碑和烈士墓前，幾次肅立行禮，只是她出現在哪里，哪里就形成了“熱點”，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的人，從領導幹部到普通群眾，都爭著同她合影甚至僅僅抵近看她一眼，致使她不斷需要有人特別是其老伴王景清為其開路解圍。有時老王被人照相和擁擠得不免心煩時，她卻始終謙和微笑著，充分地理解並接受了人們的好意。

一天下來她累得幾乎連飯都不想吃了，只要了一碗麵條到房間去吃。活動組織者擔心她身體頂不住，徵詢她第二天活動怎麼安排時，她要求按原定計劃去婁山關，要親自感受一下父親著名詩詞中“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的特有意境。當地幹部為了避免人們再形成對她的包圍緊跟，對此行作了保密和佈置，哪知車到婁山關時，一些耳尖腿快的記者早已在山上等著她。她一面婉拒著記者們的



李訥、王景清在婁山關，1995年攝

採訪提問，一面對H作出無可奈何的表示，馬上去尋訪婁山關古碑和刻有父親詩詞的新立巨碑，又從狹窄山路上走到刻著老革命家兼書法家舒同手書“婁山關”的大字石壁下，興致勃勃地攝影留念，並且分別同緊隨而來的記者和公安人員，一一合影，免得他們白跟了一場。

貴州以“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著稱於世，H說他們上婁山關時正是如此，當天氣候特冷，不僅刮著刺骨寒風，還時時飄落著雪花，地面上已結起薄冰，使山路更加滑溜難走。只是李訥還興致不減，她還想爬上婁山關主峰，多少領略一下“蒼山如海”的壯麗景色。當地同志既希望她去，又為她的身體擔心，怕她萬一有個閃失，一直護衛在她身邊的老王，忙勸阻她還是不要“冒險”，她才不無遺憾地聽從了老伴的意見，下山回到遵義。當時接待單位為了“優待”他們，安排李訥夫婦住在遵義最好賓館的最大套房裏，哪知房間越大供暖越不足，他們自己又不說，使李訥連勞累加受寒患了感冒發了燒。他們原打算接著就近去赤水河，走訪一下被稱為毛主席軍事上“得意之筆”的長征名地。人們見她身體不適，勸她別去了，她卻說來一趟不容易，應該到父親當年走過的地方去，好好體會一下父親在當時當地的處境、心情和思想，希望人們也能體會她的這一心願。當地幹部正想答應她的要求，老王卻忍不住地向主人透露，李訥已經病了，這次出訪必須中止，不然將對主人增加麻煩，李訥這才放棄了原來的要求，只是為此感到十分遺憾。當地的同志說，等到將來天暖氣候好時，請他們重來貴州專程走訪赤水河沿線，李訥才說那就以後再講吧，在主人安排下，改變日程回了貴陽。

到貴陽後他們看到了當天報紙，李訥悄悄問H看到今天來的《參考消息》沒有，說那上面又把他們的事給“曝光”了。H忙找來一看，原來報上轉載了香港報紙關於他們“鉅款被騙”的報導。這使李訥很不愉快，老王對那些挑事起哄的記者、報紙大為不滿。加之當時李訥病情不見減輕，老王決定還是早日回京，李訥至此也“遊興”大減，就向主人提出，與H等登上了返京之路。一路上她幾次對H說，這次來的時間太短了，還有不少地方沒有去，該看的東西還沒看到，以後一定要補上，要H爭取和他們一起再來，流露出她對貴州、尤其是

父親曾經戰鬥過的地方，以及對同行朋友的一片真情。

H說他們在貴州期間當地的電視、電臺和報紙，都報導了李訥夫婦來參加紀念活動的消息，這可算是對他們的一次正面“曝光”，上月在廣東，他們也曾在當地被“曝光”過，有的報刊還把他們和劉愛琴夫婦相逢的事作了報導，加上被海內外報刊“炒”過的“鉅款被騙”等軼聞，使他們在約一個月內，被連續多次“曝光”，正如他們以往的許多事，都是不以他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總是安靜不了，淡泊不成。



李訥、王景清與邵華（右），1995年攝

欺世盜名 滿紙謊言

——毛岸青、邵華“生平”批註

毛岸青是毛澤東、楊開慧的次子，於二〇〇七年三月去世，享年八十四歲；邵華是毛岸青之妻，於二〇〇八年六月病故，終年六十九歲。按照中共慣例，先後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並分別編印了精美的“生平”，記述和評價了他們的一生業績。只是其中與中共歷來的文件、文章等等一樣，許多都不符合史實，甚至只是虛構的謊言，藉此來盜名欺世。筆者根據有關史料和所知情況，對其一一加以“批註”，供人們鑒別比較，也為後世留下一份如實的歷史資料。

《毛岸青同志生平》原文（見楷體字，下同）：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批註，見宋體字，下同）：這是兩句套話，但用在此人身上未必合適，因為他此生幾乎沒有做過什麼工作，說不上有否“優秀”表現；除童年、少年時期外，也未再經歷過什麼鬥爭，說不上是“久經考驗”；至於“忠誠”，是對“共產主義”，還是限於中國黨及其領袖即毛澤東個人，待考。

（原文）：我黨馬列著作優秀俄文翻譯家，著名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專家毛岸青同志，（批註）：這兩句話就是謊言。據考，他十三歲



毛岸青，1990年代攝

(一九三六年)到蘇聯前，在中國並未上過學，基本沒有學過中文，二十四歲(一九四七年)回到中國前，在蘇聯十一年，只學過俄文，並無任何中文學歷，可能連中國話都快忘了，他僅能閱讀俄文的“馬列著作”，不知他是如何“翻譯”，又能“翻譯”成什麼文字，如果是中文，他的中文學識是怎麼來的，難道是不學就會或無師自通嗎？一個基本不通甚至不識中文的人，怎麼能成為“翻譯家”，至於其“著名”，是因為他的研究成果，還僅僅是由於他這個人及其名字。這個頭銜應該被認為是空的和假的，是沒有任何依據的。

(原文)：因病醫治無效，於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四時二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四歲。(批註)：未必有何病症，主要由於衰老，他比其父還多活了一年，應是壽終而逝，屬於自然死亡。

(原文)：毛岸青是毛澤東主席和楊開慧烈士的次子，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於湖南長沙。一九二七年黨的“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同志赴湘贛邊界組織秋收起義，楊開慧同志帶著年幼的毛岸青與哥哥毛岸英，弟弟毛岸龍在長沙板倉堅持秘密鬥爭。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四日，楊開慧同志被國民黨軍閥逮捕，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長沙英勇就義。(批註)毛澤東別妻拋子，赴湘贛進行武裝鬥爭，致使楊開慧和三個孩子陷入敵手。早在其妻被捕和犧牲前，毛就迫不及待地與賀子珍悄悄同居了。這表明他對楊的無情無義。近從別的史料中看到，毛澤東於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間，與楊開慧及其孩子分開，“組織秋收起義”後上了井岡山，並創建了中央蘇區。此間湖南國民黨軍閥何鍵，對仍在家鄉的楊開慧和孩子，一直沒有觸動，直到一九三〇年九月，毛澤東親率紅一方面軍第二次攻打長沙未果又撤出，才惹惱了何鍵，於當年十月逮捕了楊開慧及其長子毛岸英(岸青、岸龍因年幼並未入獄)，又於十一月殺害了她。在毛澤東已創建了相對安定的中央蘇區，並親自領兵攻打長沙時，完全可以接出楊與孩子，但卻置他們於不顧。因為這時毛已拋棄了妻兒，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實際上就與賀子珍“結婚”了。史實表明了毛在這方面的品德，後來在板倉發現的楊開慧當年遺稿，也證實了毛對她的“恩斷義絕”。賀與毛相處只八年，卻為毛懷孕近十次，到延安後毛又有外

遇，迫使賀出走蘇聯，江青才乘虛而入，楊、賀及其子女的悲劇，都是毛一手造成的。

（原文）：國民黨反動派試圖以毛岸青兄弟三人為誘餌，捕獲毛澤東。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他們兄弟三人被秘密轉移至我黨開辦的上海大同幼稚園。在此期間，弟弟毛岸龍不幸病故。（批註）：其時毛岸英兄弟三人分別約為九歲、七歲和五歲，由舅媽李崇德將他們從長沙送到上海，經其叔父毛澤民聯繫安排，交給地下黨員董健吾，董將他們三兄弟送進“大同幼稚園”，這是由中共外圍組織“互濟會”辦的，但他們在此時間並不長。其三弟毛岸龍的去向，曾有多種說法，有的說他未死，直到“文革”中還有人自稱或被認為是“毛岸龍”，但毛澤東一律拒認。上世紀八十年代，杭州一部隊離休幹部，自認自己就是“毛岸龍”，為此曾由內蒙古出過一書，但都不足為據，傳此人精神有精神病。後來經過調查，才確認毛岸龍已夭亡。

（原文）：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大同幼稚園解散，毛岸青同志和哥哥毛岸英一起，被安排到一位地下黨員家中撫養，後又轉至其前妻家中。（批註）：這位“地下黨員”，即中共重要情報、交通和聯絡人員董健吾，他以“王牧師”身分作掩護，曾護送“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等從上海去中央蘇區，又護送美國記者斯諾等經西安進入陝北紅區，還與宋慶齡、張學良等上層人物有聯繫，是黨內著名的活動家，他和自己全家都在為革命服務。

（原文）：由於不堪受虐待，他和哥哥毛岸英被迫流落街頭，靠賣報推車艱難度日，受盡了軍警、特務、洋人以及地痞流氓的欺壓和毒打，過著艱辛的流浪生活。（批註）：董健吾的前妻分擔了他的困難，收養毛氏兄弟，應該受到肯定，只是當時經濟來源中斷，家庭生活十分艱難，其前妻家已有孩子，加上岸英兄弟，都正是能吃會鬧時，不免發過脾氣打罵過，但不是有意“虐待”。邵華過去這麼說，引起了董健吾後人的抗議，認為此說是“誣陷”，曾經提出訴訟，後在庭外處理了。不知為何“生平”中又這麼說。這一段“流浪生活”的敘述，似是受了《三毛流浪記》的啟發，未必有多少確切依據，無以為證，不足為憑。

（原文）：當他得知叔叔毛澤東遇難的消息後，在街頭憤激寫下“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被外國巡捕打傷，幼小身心受到很大摧殘。（批註）：此說值得推敲，似在為毛岸青的“腦病”，提供一個合理的也是光榮的解釋。如果說他們已“流落街頭”，又能從哪兒得知這個“消息”呢？如果他們仍與董健吾等有聯繫，就不完全是“流浪兒”，很可能仍在地下黨的照顧之下，僅僅曾以賣報、推車等掙點吃的，此段此說“僅供參考”而已。據有關史料，原“大同幼稚園”是一九三二年解散的，不是上述的一九三一年，毛氏兄弟一直與董健吾的子女生活在一起，並未過上什麼“流浪生活”。至於是否“被外國巡捕打傷”，似也無據可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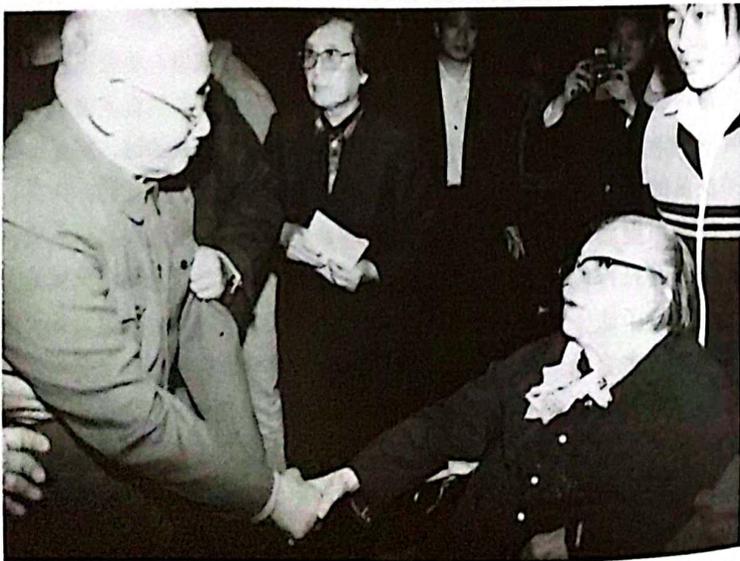
（原文）：一九三六年，地下黨組織在上海的破廟中找到流浪了五年之久的毛岸青同志和哥哥毛岸英，由張學良的部下輾轉送往蘇聯，毛岸青同志化名“楊永壽”，並取俄文名字“郭良”。（批註）：此段不合史實。“大同幼稚園”一九三二年才解散，毛氏兄弟被安排在董健吾家中，由其妻黃慧光負責照料，並與董、黃的子女生活在一起，後又一度轉至董的前妻家，他們並未住在“上海的破廟中”，也沒有“流浪五年之久”。這樣說完全否定了董健吾全家對毛氏兄弟的照顧幫助，誇張了他們在上海的艱難處境，違反了歷史的真實。一九三六年董健吾向黨組織報告了毛氏兄弟的情況，請示了安置辦法，經組織批准找張學良商談後，由張出資十萬法郎，將毛氏兄弟及董的小兒子董壽琪共三個孩子，交由東北軍將領李杜等，作為其家屬帶出境到達法國。原擬同赴蘇聯，但蘇方只同意毛氏兄弟入境，董壽琪等只得仍回中國。一九五〇年中，董壽琪曾收到過毛氏兄弟的信，證實了這一史實（這段“批註”依據的是董壽琪的回憶，載上海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一九八〇年第二輯第四至八頁）

（原文）：到達蘇聯後，先進入莫斯科市郊的共產國際第二兒童院，後轉入伊萬諾夫市的共產國際第一兒童院。在前蘇聯十年制學校學習期間，毛岸青同志俄文等學業成績突出，連續跳級。一九四三年加入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四五年九月考入莫斯科東方語言學院深造。（批註）：以上是毛岸青的全部學歷，即九年的“蘇聯十

• “紅太陽”的影子——毛澤東及其身邊人的故事

年制學校”（相當於我國小學至中學）和兩年的“語言學院”（相當於大學），但只“深造”了兩年就中止學業回國，此後再未上過學，也一直未從大學畢業。在上列所有“學歷”中，都未表明他學過中文，因此他的中文知識至多才是中學甚至小學（可能還不到）水準。至於說他俄文“成績突出”，似無其證，“連續跳級”很有可能，因為他讀“中學”時，年齡已超過二十歲，不得不提前結業。

（原文）：前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在“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下，哥哥毛岸英主動要求參軍上前線，毛岸青同志和在蘇的中國青少年一起，積極投身支前活動，挖戰壕、運物資、砍木材、運送照顧傷病員等。二〇〇五年四月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之際，毛岸青同志和其他二十餘位參加蘇聯衛國戰爭的中國老戰士，被俄羅斯政府授予“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批註）：這主要是毛岸英的事，毛岸青只參與了青少年們一般的活動，別人也都是這麼過來的。後來他被授予俄羅斯衛國戰爭“紀念章”，並不是“勳章”，僅僅是“紀念”而已，事實上他也無任何戰功。



毛岸青與康克清等，1980年代攝

（原文）：一九四七年九月，毛岸青同志經滿洲里回國，在哈爾濱由李富春、蔡暢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五月，毛岸青同志遵照父願，到黑龍江省克山縣參加土改試點。當地條件十分艱苦，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組織互助組和農民夜校。期間他充分發揮自己精通珠算和他演奏多種樂器等特長，想方設法活躍農村文化生活，深受群眾歡迎。（批註）：他回國時已二十四歲，先到了東北解放區。一九四六年毛岸英回國到延安後，也遵父囑去了勞動模範吳滿有家。讓他參加土改，這是毛的“家風”，但時間只約大半年。由於他一直甚至一生只愛吃俄式飯菜，始終保持著蘇聯生活習慣，又是剛剛回到中國，不知如何“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他的中文漢語又不熟練，如何去“調查研究”作“宣傳”等等，看來都是問題。他會打算盤，是否“精通”也是問題。他彈過鋼琴、拉過小提琴等洋樂器，會不會中國樂器並是“多種”，都是問題。以他的特殊身份，偶爾當眾演奏一下，當然會受到“歡迎”，只是未必是在土改時，說不上是“活躍農村文化生活”云云。

（原文）：一九四九年七月，毛岸青同志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馬列著作編譯室從事俄文翻譯工作。（批註）：他一九四八年五月就離開土改地點，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才到北京，期間至少閒居了一年另兩個月，如果這時做了或學了什麼，肯定要大書特書一番，這裏一字不提完全空白，表明他當時什麼事也沒幹，只享受“太子”待遇了。等他進入北京時，已是二十六歲，顯然因為他什麼工作都沒做過，也什麼都幹不了，只在蘇聯學過俄文，會讀俄文書籍，就去了“馬列著作編譯室”（後改為編譯局）。據說他去後不久，就很不適應並與人關係緊張，同另一俄文翻譯家曹葆華發生爭吵，又傳毛澤東為此責令他作出檢討，他不願意就被氣病了，發作了精神病，從此他就長期治病療養，無法進行正常工作。幾十年後林彪之子林立果說毛“把自己兒子逼瘋了”，即指此事。他在編譯室工作的時間其實不長，以他的中文水準、工作能力、健康狀況和特殊身份地位與生活習慣等等，到底幹了什麼甚至幹沒幹過什麼工作，都很難說。然而“生

• “紅太陽”的影子——毛澤東及其身邊人的故事

平”中竟這樣寫道：（當時）他刻苦努力，勤奮工作，參與了《列寧全集》的翻譯工作，並參與了《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俄國工人報刊的歷史》、《論批評與自我批評》、《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等列寧和斯大林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還參與了《斯大林發展了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斯大林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巨匠》和《聯共（布）關於青年工作的兩個決議》等十幾部政治理論書籍和重要歷史文獻的翻譯工作。（批註）：上列書目稿目，都是當年“編譯室”的工作成績，在這裏都成了他“參與”的成果，只是他是怎麼“參與”的，“參與”到什麼程度，他到底“編譯”過其中哪幾篇，哪一部“馬列經典”的譯作中，確有他的勞動……全都是些糊塗賬，這實際是把集體的、大家的和別人的勞動成果，都算是他一個人的“成就”。

（原文）：同時，他還翻譯和介紹了多部俄羅斯文學和理論作品，在《人民日報》等刊物（應為“報刊”——批註者）發表各種文章幾十篇。這些，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黨的理論建設和新中國文化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批註）：這裏沒有列出一篇“文章”的題目，更沒有列出到底是哪報哪刊，又“發表”在哪年哪月哪日哪版或哪期哪頁上面，什麼都沒說出很可能是說不出。只要一說明就能查出有否這些“文章”，是否是他寫的，連同他所“翻譯和介紹”的“俄羅斯文學和理論作品”，別說是“多部”，連一部作品的題目也未列出，這似乎表明並不存在此事，不然不會如此埋沒他的這些重要業績。既然本來什麼也沒有，他在這方面的“貢獻”，也就什麼都不存在了。

（原文）：一九五三年，毛岸青同志因病赴蘇聯治療。（批註）：從一九四九年他到北京，到一九五三年他赴蘇治病，這幾年是他一生中僅有的工作時間。他在此期間的全部“貢獻”，就是上列的那些，不僅幾乎是空的，並且到此為止，從一九五三年起，他就沒有再做過什麼工作，而是別人都在為他工作了。

（原文）：一九五九年回國到大連療養。一九六一年回到北京。

（批註）：他在蘇聯又呆了六年多，一回國內就繼續療養，說明他的病在國外並未治癒，事實上只是一個缺乏自主意識自理能力的病人，甚至是一個什麼事也幹不了的“廢人”，由國家從此養起來了。這本來情有可原，然而正是他的這一狀況，卻被人充分利用了，他後來的所有活動及其結果，其實都是別人“導演”出來的，這個“導演”主要就是邵華。“生平”中的這一段，漏掉了一個重要情節，這是毛岸青一生中一個關鍵事件，即一九六〇年在大連與邵華結婚，邵華從此作為“毛主席的兒媳”呼嘯出山，毛岸青成了由她掌控的一個有生命的活“道具”，使他完成了下列許多“偉大事業”。

（原文）：長期以來，毛岸青同志牢記黨和人民的囑託，牢記親人的希望，始終保持樂觀向上的人生追求，並以高度的責任感，自覺學習、研究和宣傳黨和人民軍隊的光榮歷史、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業績。他無比熱愛祖國，心繫祖國的繁榮與進步，同邵華同志一道……（批註）：前面幾句全是虛構的，重要的是最後半句，這才是“主題”。一九六〇年他們結婚時，邵華才二十二歲，毛岸青已三十七歲，又是個病人甚至“廢人”，邵華所以要嫁他為妻，“醉翁”之意不在其人，全在他身外的一切。她就是為了能和“太子”一道，才能實現自己的遠大目標，她果然如願了。

（原文）：……先後編著了《我們愛韶山的紅杜鵑》（紀念文集）、《少年毛澤東》、二十七卷本大型叢書《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詩人毛澤東》等書籍、撰寫發表了《重讀〈遠望〉志更堅》、《爸爸希望我們壯健和進步》、《回憶爸爸勤奮讀書和練習書法》、《滾燙的回憶》、《站在媽媽的塑像前》、《秋思》、《又是秋風秋雨時》、《彩雲長在有新天》等文章。其中，《我們愛韶山的紅杜鵑》被編入中學語文課本。他還參加籌畫攝製了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楊開慧》、《尋覓驕陽》、《毛岸英在抗美援朝》和音樂電視《最美的霞光》，創作並組織錄製了歌曲專集《永遠的懷念》。

（批註）：上列這些作品，據說都是毛岸青“同邵華同志一道”，實際是邵華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借用甚至盜用了毛岸青之名，他自己未必知道更未參與，才“編著”了這麼多作品。這些文章及其“大型叢



王慶權（右2）、毛岸青、邵華等，1980年代攝

書”和“影視作品”等等，正因為有了他們的大名，才能公開發行以致暢銷獲利。所有這類“編著”活動，使邵華不僅大撈其名，更大得其利，而這全是她當初“以身相許”給當今“太子”為“妃”，付出了重大“血本”後的“利潤回收”。他們的“編著”業績，其實是一筆筆既有政治和文化，更有經濟效益的大買賣，雖然毛岸青自己什麼也沒幹甚至不知道，邵華卻以此撈足了賺肥了！

（原文）：他生前共編著出版文學作品和學術專著八十餘部、二千五百餘萬字，許多作品獲得國家重要獎項，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批註）：即使是位專業的作家學者，一生能有如此豐碩成果，也是極其可觀令人驚歎的，何況他是個病人甚至“廢人”。只是這一“編著”成果，其中不知他到底付出了多少勞動，以至有沒有他的勞動，可能都是個大問號。別的且不說，他只要能把握說是他“主編”的“二十七卷本大型叢書”的目錄，用漢語一本一本的讀出來，甚或僅僅將以上所列這些篇目讀出來，就算他“及格”了，可惜在他生前，從無人這樣去“考”過他，現在更不可能了，他的如此“輝煌

業績”，到底算不算他的，也就成了歷史之謎。至於有的作品獲得了“國家重要獎項”，與他的關係也許僅僅因為借用了他的大名“在國內外”的“廣泛影響”，但願不是由此引起的“政治笑話”。

（原文）：毛岸青同志信念堅定，關心國家大事，關注國家統一，擁護改革開放，支援老少邊窮地區和災區的建設。多次和邵華同志一起攜兒子毛新宇重走長征路，走訪革命老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堅持到工礦、農村、部隊和學校調查研究，以多種形式幫助失學兒童，關心青少年一代的成長進步，支持創辦了多個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批註）：上文已經表明，毛岸青自一九五三年起，就已不再有任何工作單位，只是個什麼也不幹也幹不了的廢人，全部由國家養活的一個閒人。他的生活由總參管理局負責，除在北京西郊佔有帶花園的洋房套院外，據說享有了軍隊“中將”待遇。只是這時他除了誰也看不見的“信念”等等，其主要“業績”就是“和邵華同志一起攜兒子毛新宇”等去了全國各地，雖然都是觀光旅遊，卻被賦予了重大政治意義，還成了他的“政績”，如“重走長征路”等等。他們可能到過長征路線的某個地方某個點，並不是也不可能是二萬五千里全程，更不可能會去“長征”，並且一路都有專車和車隊“保駕護航”著，其所到之處，不論是“革命老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工礦、農村、部隊和學校”等等，都因為那裏更是著名風光名勝景區，他們除了遊覽享受，拍了一些風光照片外，能拿出一份“調查報告”或“研究成果”嗎？至於“幫助失學兒童”，“創辦教育基地”之類，也僅僅是其“精神”上的“關心”，同樣拿不出一點具體事實來。

（原文）：毛岸青同志愛好廣泛，多才多藝，精神生活豐富，俄文功底深厚，熟悉英文，善彈鋼琴和拉小提琴，擅長棋類，精通珠算。直到晚年，還喜愛棋類活動，堅持讀書、作詞、譜曲、鑽研外文，始終保持革命的樂觀主義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批註）：這裏又只剩了“精神”。他的所有活動其實都是在“半醉半醒”狀態中進行的，是曾做和摸過什麼，不等於他真的“熟悉”、“擅長”和“精通”什麼，說他“善彈鋼琴”，卻只彈過幾句《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語錄歌”，再就是幾句俄羅斯歌曲：他是“擅長



毛岸青、邵華、毛新宇（後中），1990年代攝

棋類”，不過只是國際象棋，還是在蘇聯學的，反正別人都不太懂，就由他自己想怎麼下就怎麼下，也從來不論勝負；說他曾“作詞、譜曲”，不僅誰也沒聽到過，還誰都沒見過他的“詞”和“曲”，而他“讀”過的書，也只有俄文的，卻不知曾翻過幾頁……所有這些“愛好廣泛”甚至“多才多藝”的活動，僅僅是為了讓他打發自己幾十年來的漫長時間，他就是在這樣的“豐富精神生活”和“革命樂觀主義”中，度過了自已“革命的一生”。

（原文）：毛澤東同志生前對毛岸青關愛備至，父子情深。在父親逝世的三十年裏，他和毛澤東的其他親屬一起承擔著祭奠親人、教養子孫、弘揚傳統、續寫家風的歷史責任，籌畫並組織了楊開慧等多位烈士的陵園整修工作。（批註）：毛澤東與毛岸青父子的親密關係，只體現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限的幾次接觸，直到毛澤東去世前的十幾年，他們就沒再見過面，連毛的孫子毛新宇，也從未“接見”過。因為他被黨內外的“階級鬥爭”，搞得一直自顧不暇，根本不顧不上自己的兒孫等等。毛澤東逝世後，毛岸青作為毛子女中唯一男

性，自然負責有祭奠等“歷史責任”，只是由於健康等原因，他極少出頭露面，卻到處都能看到其妻邵華，後來又有了其子毛新宇。隨後又以毛岸青、邵華名義，在長沙板倉籌建了楊開慧的烈士陵園，這既是一項大工程，又是邵華利用毛岸青和她的身份，使自己從中撈名得利的大好機會。她曾以此為藉口，拉得大量贊助，籌到巨額資金，只是外人不知怎麼花的。

（原文）：毛岸青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愛國奉獻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對革命事業矢志不渝，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崇高的政治品德；（批註）：他的一生只是因為父親鬧了革命，才使他先經受（童年、少年）後享受（青年、中年直到老年、晚年）了“革命”的一切：說他“愛國奉獻”，卻誰也不知到底“奉獻”了什麼；說他“為人民服務”還是“全心全意”的，卻只見別人都在為他服務，他身邊始終有幾個服務人員，日夜不離地伺候著他，那才真是“全心全意”，到他外出時更是前呼後擁，調動和驚動了各地更多的人來為他服務：“黨和人民”對他倒是“無限忠誠”了。他才如此“矢志不渝”地依靠和依賴著，並且“堅信”著“共產主義”。在全國人民經歷艱難時，他早就過上了“共產主義”的生活；這使他的“政治品德”不僅“崇高”，並且“高”得誰也看不見摸不著，因為他一直生活在並非人間的“皇族”和“皇宮”之中。而這似已沒有一點“共產主義”意味，只剩了十足的封建主義，當然，應該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原文）：他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決擁護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高尚的思想品質和道德情操；（批註）：這是幾句套話，用在他身上卻有點滑稽。他這一生八十四歲，是有幾年學習過“馬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只是後來的幾十年，即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起，也就是他發病以後，到底“學習”過什麼，又是怎麼“學習”的，都很難說。他知道什麼叫“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嗎？知道什麼叫“科學發展觀”等等嗎？這裏只是將這

些套話強加於他，以使他在全黨全軍全國都“保持高度一致”，實際根本不是這樣。他的“思想品質和道德情操”，就“高尚”在可以任人擺弄和裝扮，把他說成什麼人們都無所謂也不知道，因為他一直是個沒有自主意識和自理能力的病人甚至廢人。

（原文）：他始終牢記父親毛澤東同志的諄諄教導，發揚革命先輩的優良傳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風樸實、克己奉公、艱苦樸素、家風嚴格，深受廣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愛戴。（批註）：這一套又來了，真如老和尚唸經似的，沒完沒了不厭其煩。其實在共產黨內，包括毛岸青在內，有幾個人還記得毛澤東的“諄諄教導”？再從毛岸青算起，有幾個人值得受到“廣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愛戴”？還有下列什麼“共產主義”、“愛國主義”和“國家建設”、“統一大業”，直到“改革開放”等等，為他套上這麼多冠冕堂皇的“帽子”，不全是些空話、假話和謊話嗎？

（原文）：毛岸青同志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和熱忱的愛國主義者，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國家建設和發展，無時無刻不在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積極擁護改革開放。他無愧是毛澤東和楊開慧同志的好兒子，無愧是黨和人民的忠誠戰士。他的崇高品德和樸實形象，將永遠銘刻在人們心中。（批註）：他是無愧於自己的父親，享有一個“太子”可以得到的一切。不過，他未必無愧於楊開慧烈士。他媽媽因為丈夫去領導革命，自己受盡磨難直至獻出生命！雖然不知她對革命到底有多少和多大貢獻，她卻為毛澤東生過三個兒子。毛岸青作為他們三個兒子中唯一“善終”的一個，卻又一生一事無成，除了享受“榮華富貴”外，等於白白虛度了自己的一生。也許他正是以此來補償了自己母親的“損失”，他一生的無言以及無能，正表現了“他的崇高品德和樸實形象”，人們是不會忘了他，並且應該從他身上，反思、深思和思考點什麼。從這一意義上，他是可以“永垂不朽”的。

也許“人算不如天算”，他的“王妃”為其獻身幾乎奮鬥經營了一生，卻在他去世一年多以後，也一命嗚呼追他而去，於是就出現了第二個精製的謊言。

且看《邵華同志生平》，原文及其批註如下：

（原文）：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原軍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長邵華同志（正軍職待遇），因病醫治無效，於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十八時二十八分在北京逝世。終年六十九歲。（批註）：她是黨員，這沒錯。是不是“優秀”，卻難說。她是一九七九年才入黨的，當時已四十一歲，說明她四十歲以前表現未必好，所以才未成為黨員；如是她自己沒有申請，就更是“政治覺悟”問題了。也不能說她是“久經考驗”，一九七九年以後算是太平盛世，時至今日也不算“久”，能有什麼“考驗”？她對共產主義是否“忠誠”？尚待證明。這兩句雖然是套話，對她卻不適用。她的頭銜即職務也是假的，那只是以此來拿錢享受待遇用的，因為她並未“研究”過任何“軍事百科”。括弧內的五字（正軍職待遇），才是這一段的重點，也是她的“標價”，其來由大有“文章”。據傳一九八八年全軍第二次授銜時，幾位元帥和大將之後人也成了將軍，邵華既眼紅又不服氣，就向新任軍委主席抱怨，說老帥大將家都有了將軍，領導他們的毛主席家，反而一個也沒有，這對頭嗎？那位主席一想也似不對頭，但已故“偉大領袖”家，只留下一子二女，一子即毛岸青是個並無自主意識和自理能力的病人或廢人，自然不能擔此重任，兩個女兒李敏、李訥又甘願退出軍政舞臺，不再摻乎這些活動，於是這件好事就落到毛家唯一兒媳——邵華的頭上，她一下就成了位少將，並且是“正軍職”。可惜她享受才十幾年，竟一命歸天，如今“八九十不稀奇，七十才是小弟弟”，她還不到“小弟弟”之齡，就撒手西去，似乎老天爺也不容她，因為她這輩子，過得太虧心也太缺德了，這有她的“生平”為證。

（原文）：邵華（原名張少華），一九三八年十月出生於陝西延安，父親陳振亞、母親張文秋是大革命時期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同志。一九三九年，邵華同志隨父母前往蘇聯，途經新疆時被反動軍閥扣留，軟禁在迪化（今烏魯木齊）。一九四二年，邵華同志全家及其它中共黨員被反動軍閥關進了監獄，開始了饑寒交迫的牢門鐵窗生活。在獄中，父親和其他革命先輩的犧牲，使年幼的邵華愛恨

分明，她不畏敵人的毒打，為大人傳遞文件，積極參加絕食等鬥爭。
（批註）：她的童年很值得同情，但卻因此成了她的“資本”甚至“資歷”，被吹成了從小就如何親歷革命鬥爭，其實當時許多同志及其親屬，都是這麼過來的，他們一家就有父母姐妹共五人，她也並非吃苦最多和表現最突出，這段敘述似參考了小說《紅岩》中的故事。她的父親陳振亞也不是犧牲在獄中，而是一九四一年，新疆軍閥尚未與中共公開決裂，他因意外事故受了傷，由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送到當地醫院，被一白俄醫生“治”死了。直到一九四三年（不是上述一九四二年）才將新疆“八辦”全體人員包括家屬小孩都關入監獄，其中還有蘇聯人。到一九四六年出獄時，邵華應是五至八歲。

（原文）：一九四六年，經黨組織營救出獄，邵華同志和大家一起回到了延安。從此，她跟隨革命隊伍輾轉奔波於陝北根據地、太行山區和華北平原，在馬背上和硝煙中跨入少年時代。年紀雖小，但她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成為貼標語、扭秧歌、演活報劇的小骨幹，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貢獻了力量。（批註）：又吹牛了！當年人們大都有此經歷，她僅是其中之一，這裏卻成了她獨有的“資格”、“資本”和“資歷”。

（原文）：新中國成立後，邵華同志在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下，進入中直機關育英小學學習。一九五三年六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九月進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學習。一九五六年九月考入北京第一女子中學高中部學習。一九五九年九月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後轉入大連師範學校學習。（批註）：她入學較晚，十五歲才上中學，二十一歲上了大學，是否真是“考入”的，待考。很可能也是由於誰的“親切關懷”才入校的。

（原文）：一九六〇年，邵華同志與毛澤東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同志結婚。一九六一年回到北京大學就讀。（批註）：這才是邵華“生平”的關鍵以至核心內容，一九六〇年她二十二歲，與已三十七歲的“太子”，也就是一個並無自主意識和自理能力的病人結了婚，從此成了“太子妃”或“王妃”。她以此特殊身份先轉學來大連，又回京重入北大，不知她到底上了幾天學，讀了多少書，在大學共“學”了



李鈞（左6）、邵華（左7）、王景清（左8）在遵義會議會址與當地領導人，1995年攝

八年，按正常學歷這該是博士生至少是碩士生了，可是她什麼也不是，甚至不知她到底畢業沒有，這就是她的全部學歷。

（原文）：在學校期間邵華同志刻苦學習、勤於思考、品學兼優，擔任過班長和團支部書記。她酷愛文學，閱讀了大量中外文藝作品，在《少年文藝》上發表了《黃繼光》、《節日的夜晚》等作品。她關心時事政治，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朝鮮戰爭爆發後，她和同學們一道給朝鮮小朋友寫信，經常到陸軍醫院、協和醫院等地慰問志願軍傷病員。（批註）：當年這些學習活動，都成了她的“光輝業績”，當時她是否真的“品學兼優”等等，也都待考。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身份已不再是一個普通的學生，而是已經躋身“皇族”開始享受“皇家”待遇了。只是與此同時，她也成了“皇族”內部鬥爭的對象或目標之一。

“文革”初期，從傳抄材料及“紅衛兵”小報上，看到江青在北大的一次講話，她說：階級鬥爭到我家裏來了，張邵華（應為“張少華”，這是邵華的原名——批註者）的媽媽張文秋是個政治騙子，她

• “紅太陽”的影子——毛澤東及其身邊人的故事

把大女兒嫁給岸英，又趁岸青發病，把二女兒嫁給岸青，岸青根本不需要他們照顧，我們根本不承認邵華是我們的兒媳婦。此說並非毫無根據，據考，一九五九年毛岸青自蘇回國，因為他的病尚未治癒，只得留在大連療養。其父毛澤東派工作人員陪同毛岸英遺孀，即邵華的姐姐思齊（又名劉松林）前去看望。張文秋就乘機讓邵華也隨同前往，原來她早有此念，毛岸英犧牲了，大女兒就不再是“皇媳”，她也非毛澤東的親家了，這一憾事應該補上，就讓二女兒也嫁給“二太子”，這就奪回了自己的“皇親”身份。邵華就是這樣奉母命去大連“相親”的，在人們的推動和撮合下，她和“二太子”也就順水推舟，一九六〇年在大連結婚，從此成了“王妃”。江青所說的就是這個情況，不過她不該將張文秋攻擊為“政治騙子”，毛、張兩家結為親家，是雙方家長和子女都同意的，並不存在誰“騙”誰的事，雖然這時“王妃”是很清醒，“太子”卻全在“半醉半醒”中，等於是“做夢娶了個媳婦”。後來有人為他們編出了一些“愛情”故事，其實有的出自邵華自己的“回憶”中，外人誰也沒有參與其事，是真是假無從查考。不過邵華獻身於“王子”，將自身及一生作為“血本”，投入了一場最大的“賭注”，卻是如假包換的史實。

她們的“愛情”生活是怎麼過的，外人當然不得而知，只知他們結婚十年，“王妃”一直沒有身孕。這表明一點，二人間可能沒有正常的夫妻生活，或是二人中有一個缺少生殖能力。顯然他們經過不懈努力，從看名醫吃補藥到採用各種新科技手段，才於一九七〇年終於有了生育，產下一個極其珍貴的“龍孫”。這不由鞏固和提高了“王妃”的地位。不過這一“龍孫”到底是怎麼取得的，尤其是其“品種”，是否真是“皇家”正宗，一直有幾種不同說法。由於這不僅涉及個人和家庭隱私，更事關“黨和國家”特別是“高層機密”，任何人也不得洩漏並將其傳播擴散，此處也不能細說。只據“太子”身邊人透露，他並未與“王妃”同牀，甚至也未同居，他們間並無任何男女之事，“太子”屬於病態，“王妃”卻甘願放棄一生“需求”，應該說她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她的“賭注”也就在此，不惜葬送了自己一生的家庭幸福至少是人之常情，只為換取一個無實際內

容的“王妃”身份。從這一點上說，她確是作了“無私”和“徹底”的“奉獻”。她的損失似乎太大了，不過她卻“堤外損失堤內補”，力求從別的方面來補償自己的損失，失的越大，補償就越多，從此以“王妃”身份到處伸手，猛撈廣收，無窮的貪欲，無盡的索取，除了臉以外，什麼都想要，這裏面有各種物質利益，包括她的級別待遇等等，她以追求和得到這些，作為自己生活和生命中的唯一樂趣。

（原文）：邵華同志一九六七年九月參加工作。一九七〇年四月任軍事科學院政治部宣傳處幹事。一九七九年六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先後任總參謀部管理局第一服務處副師職駐地幹事、營房處副師職助理，軍事科學院計劃組織部對外學術聯絡處正師職研究員等職。（批註）：這裏值得注意，她一九五九年九月就“考入北大”，沒說她何時畢業，卻直到一九六七年才“參加工作”，又直到一九七〇年才有第一個職務，很可能只是給了她一個發錢的單位。只是同年她就懷上並生下了“龍孫”毛新宇，表明她只是“參加”了孕育“革命後代”的“工作”，別的什麼正事也沒幹。也許因為此前從無某個單位某組織管過她，而“中共”本來就是他們家——即毛家的，所以一直未辦入黨手續，這可能影響到對她的提級加薪，才想到也應入黨，故於一九七九年辦了手續。她的第二職務，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以後的事，這表明她從一九六七年九月至此的十八年內，並未做過任何正事。而她的又一職務也是什麼正事也不幹，所謂“駐地幹事”，就是根本不用去哪兒上班，年年月月天天守在自己家裏，忙自家和自己的事，這就是她的“工作”。雖然她“參加工作”以來，從未做過任何真正的工作，她卻照常得到提拔升職，早已成為“副師職”和“正師職”的高級軍官，而她這個“師”的全部人馬，只是自己的丈夫、兒子和伺候“太子”、“龍孫”等的一批服務人員。可是她的“生平”中卻又寫道：

（原文）：期間，她認真開展調查研究，參加組織籌畫了一系列部隊政治教育活動和服務保障工作。在工作中，她勤於思考，勇於實踐，辦事認真細緻，作風扎實深入，出色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深受領導和同志們的好評。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邵華同志任軍事

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長。她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團結帶領全部同志、開拓進取、勇於創新、積極探索研究高技術條件下軍隊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積極探索軍事百科研究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推出了一系列軍事理論研究成果，表現出了很強的全局觀念、很高的組織領導能力和很深厚的理論素養，為軍事科研事業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貢獻。（批註）：且不說她到底“調查研究”和“組織籌畫”了什麼，“完成”了什麼“任務”，又“深受”到什麼“好評”，只要查一下她作為“軍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長”，到底研究“過”“軍事百科”中的哪一科哪一項，或編寫審閱過哪個條目中的哪一頁哪一句，恐怕她除了白卷什麼也交不出。至於她的“研究成果”及由此表現的“全局觀念”、“組織能力”和“理論素養”等等，還有她“為軍事研究事業”作出的“貢獻”，看來除了在這一“生平”中，別的哪兒也不見。所有這些論述評價，全是“空對空”的吹牛撒謊。

（原文）：邵華同志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八、九、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六、七屆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第二、三屆中國女攝影家協會主席、中國軍事科學學會第一屆理事會副秘書長、全國婦聯執委、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花卉協會名譽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九八八年被授予上校軍銜，一九九〇年晉升為大校軍銜，一九九五年晉升為少將軍銜。二〇〇二年二月，邵華同志退出軍隊一線領導崗位。（批註）：她當年“賣身投資”為了什麼？不就是換取到名、利、位等等嗎。她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五年七年中，從上校、大校到少將，全軍上下可能僅此一例。她這個將軍，居然從未當過一天兵，從未上過一天班，從未做過一天軍隊工作，當然更是從未帶過一天兵，打過一次仗。僅僅憑她是個“王妃”，才死乞巴賴討到這個“將軍”高銜，更得到了“正軍職”的實際待遇。她同時又撈到了許多政治地位和名譽以至榮譽頭銜，連當了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又成了什麼中國攝影家協會和女攝影家協會的“主席”。其實她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搞不清什麼光圈、快門和速度等等，九十年代竟忽然不僅成了“攝影家”，還成為他們的最高領導，這簡直是“天方

夜譚”。她除了全國婦聯、文聯和什麼花卉協會“會長”之類榮譽職務外，還是什麼學院的“院長”和大學的“校長”等等。毛家多數後人都已淡出政治舞臺，只有她卻迎風而上，乘機而出，爭名得位又奪利，真是貪得無厭無恥之尤。她已於二〇〇二年初因超齡退出“一線”了，卻又衝上各條“戰線”繼續拼搏，一直到她臨死前的最後一口氣！

（原文）：長期以來，邵華同志自覺把學習、研究、宣傳毛澤東思想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豐功偉績，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她獨立或與丈夫毛岸青、兒子毛新宇等同志一道，撰寫主編了《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之路》、《少年毛澤東》、《詩人毛澤東》、《我們的父輩》、《我們愛韶山的紅杜鵑》、《永遠懷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輯錄》、《我的媽媽——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劉謙初傳》、《陳振亞傳》等著作。其中，二十七卷本大型叢書《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國家重點圖書；《我們的父輩》獲第八屆中國圖書獎、“首屆青年優秀圖書獎”；《我們愛韶山的紅杜鵑》還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她在多家報刊發表了《重讀〈遠望〉志更堅》、《爸爸希望我們壯健和進步》、《回憶爸爸勤奮讀書和練習書法》、《浪漫的回憶》、《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站在媽媽的塑像前》、《親愛的媽媽，您好年輕啊》、《秋思》、《無盡的思念》、《又是秋風秋雨時》、《又見韶山杜鵑》等多篇文章。她還參與策劃攝製了《風雨情》、《楊開慧》、《尋覓驕楊》、《女紅軍女將軍風采錄》、《最美的霞光》、《毛岸英在抗美援朝》等多部革命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批註）：這些“輝煌業績”已出現在毛岸青的“生平”中，這裏又成了她的，還有他們兒子的。在這方面她也創造了“巧取豪奪”之最，企圖壟斷毛家和許多老輩革命家的歷史題材和傳記創作，連本來與她無關，她也根本不懂的事，她也都抓到自己名下，將其名利攫為己有，她的貪婪不擇手段，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原文）：多年來，她共編著出版了文學作品和學術專著八十餘部，二千五百餘萬字。這些著作、文章和影視作品，融思想性、真實

性、藝術性為一體，感情真摯、激人奮進，教育感染了無數讀者、觀眾，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是我國思想理論和文學藝術園地中的奇葩。（批註）：上列統計數字，又從毛岸青那兒“偷”過來了。其實這八十餘部書和二千五百餘萬字，除了掛著他們的名字，沒有一本一篇甚至一句一字出自他們筆下，全部都是別人的勞動心血，卻都成為了她的“創作成就”。這真是我國理論和文藝的“奇葩”，奇就奇在她對此根本不以為恥，不覺其臭，反以為榮為香。值得注意的是，她已將這筆“財富”及其盜竊手段，遺傳和轉交給自己的兒子甚至孫子，對此將在下面細說，人們且先拭目以待。

（原文）：邵華同志作為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和中國女攝影家協會主席，組織開展了中國攝影界的許多重要活動，為中國攝影事業的繁榮和發展、中國攝影家隊伍的建設、推動中外攝影的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她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和超乎尋常的毅力，完成了人物專訪、革命舊址、紀念活動等十幾個攝影專題，作品多次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攝影報》、《中國攝影家》、《綿繡中華》、《舞蹈》等報刊上發表，出版了《我的祖國》、《驕楊》、《偉人亮額》、《海之南》、《荷》、《菊影九九》、《百花爭妍》、《邵華將軍舞蹈攝影作品集》、《平凡而偉大——黨和人民的忠誠戰士毛岸青》等大型畫冊和攝影集。邵華同志的許多攝影作品獲得國家重要獎項，有的作品還在國內多個城市巡迴展覽。（批註）：這一切其實都是她以“王妃”身份撈到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內總有“馬屁人士”來“抬轎子”、“捧臭腳”，爭相發表、出版和展出她的“作品”，只是其中多為文化垃圾。她死後就不會再有人為其吹捧，其“傑作”也將成為真正的垃圾了。

（原文）：邵華同志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認真履行參政議政職責、積極參加調研、考察活動，瞭解群眾疾苦，傾聽人民心聲，向全國政協寫了《應重視西部地區經濟開發》、《甘肅會寧縣扶貧開發工作亟待支持》、《思茅地區教育、衛生方面存在著特殊困難》等數十個提案，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她熱心社會公益事業，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巨大的人格力量，支持“老、少、邊、窮”地區的建設，

發展婦女兒童事業，支持創辦了多個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批註）：不要忽視她的積極“參政議政”，其中藏有她的政治目的，她豈甘於只“參”和“議”，而是更想直接“執”政，她很想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然她不會如此“削尖腦袋往上鑽”，正是為此她才四處奔走，收買和籠絡人心，以圖一展“鴻圖”。

（原文）：她先後出訪了朝鮮、澳大利亞、美國、日本、越南、柬埔寨、比利時、瑞典等國，促進了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友好往來。

（批註）：她“出訪”了那麼多國家，其實都是公費旅遊，不僅不用自掏一分錢，還藉此大獲名利，大撈外快，“促進”的是她無盡的貪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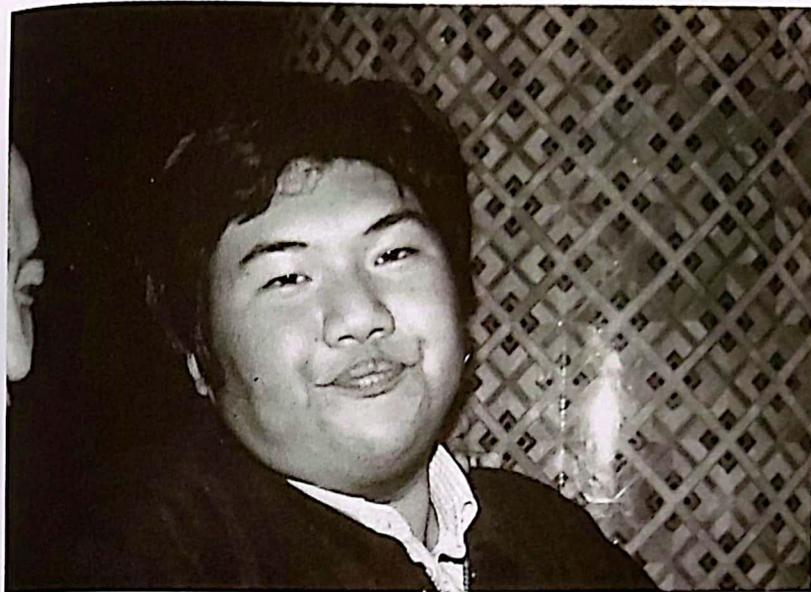
（原文）：邵華同志作為毛澤東主席的兒媳、毛岸青同志的夫人，牢記親人的希望，與毛岸青及毛澤東主席的其他親屬一起，承擔著祭奠親人、延續家風、教養子孫、弘揚傳統的歷史責任，籌劃並組織了楊開慧等烈士的陵園整修工作。組織了軍民重走長征路、毛澤東詩詞交響合唱音樂會等活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批註）：她正是這樣一生“奮鬥”著，她的“歷史責任”就是“延續（毛氏）家風”，力圖使其“皇族”延綿不斷，甚至發揚光大。她所有修建陵園、重走長征路和組織演唱會等等活動，都是為了保住自己以及世代的“皇族”地位。這也就是她給人們的深刻印象和引起的“強烈反響”。

（原文）：邵華同志從小就在革命隊伍中成長，長期受到黨的培養和教育，受到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鍛煉和熏陶。她無限忠於黨、忠於人民，對革命事業矢志不渝，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批註）：其實，她是中共和軍隊及其制度培育出一個以剝削、掠奪勞動人民為生的寄生階級（即特權階級）的“怪胎”或“孽種”。她的全部思想行動，沒有一絲一毫是“共產主義”的，恰恰相反，是徹頭徹尾的、企圖世代代享受“榮華富貴”的封建主義和有著紅色包裝的、以利己主義為核心的、只圖不勞而獲的反動階級剝削思想。這段話用在她身上，既是對她本人的諷刺，也是對“培養和教育”出她這種人的“黨”的揭露和批判。

（原文）：她長期從事毛澤東思想與生平研究，善於學習、勇於實踐、治學嚴謹、學術水準高、成果豐碩，為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宣傳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和歷史，作出了突出貢獻。她恪盡職守，兢兢業業，身體力行，勤奮工作，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了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事業。她謙虛謹慎，胸懷坦蕩，克己奉公，艱苦樸素，為人正直，顧全大局。（批註）：哦唷唷，“酸”得牙都倒了！如果要評“馬屁”或“吹牛文學”獎，這篇“生平”可以入選。它把好話幾乎說盡，只是邵華所行所為，恰恰與其相反，這些吹牛拍馬之詞，讀來實在使人噁心！

（原文）：她深懷愛民之心，關心群眾疾苦，在病重期間，還經常關注受災地區，多次率全家捐款救災。在與病魔進行頑強鬥爭中，她始終保持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批註）：直到臨死，還在“演戲”。她愛的是“民”嗎？不，是他們和她自己。“民”只是為他們服務、供他們驅使、受他們剝削、掠奪的對象。幸而老天有眼，人民管不了她，病魔卻治得了她，由她抱著她們的什麼“主義”或是“精神”，都見自己的“先皇”去吧！

（原文）：邵華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無私奉獻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她無愧是黨的好兒女，毛澤東主席的好兒媳，黨和人民的忠誠戰士。她的高尚品德、革命情操和優良作風，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批註）：本段只有一句寫對了，她確實是“毛澤東主席的好兒媳”，她以畢生的努力，企圖“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著“先皇”留給他們的“事業”以及“產業”，可惜老天爺給她的壽命太短，雖然“奮鬥”終生，不僅未能將其事業“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連維持原狀也做不到。這是由於，時代發展了，歷史前進了，社會也進步了，封建主義的那一套，吃不開了！但是，儘管她的“品德”、“情操”和“作風”，並不“高尚”，也非“革命”，更不“優良”，她所做過和說過的一切，卻應該“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但願她作為我國幾千年歷代王朝最後一個“王妃”，和她留給我們思考和總結的歷史教訓，其作用



毛新宇，1990年代攝

和精神，真的“永垂不朽”！為此確應沉重地叨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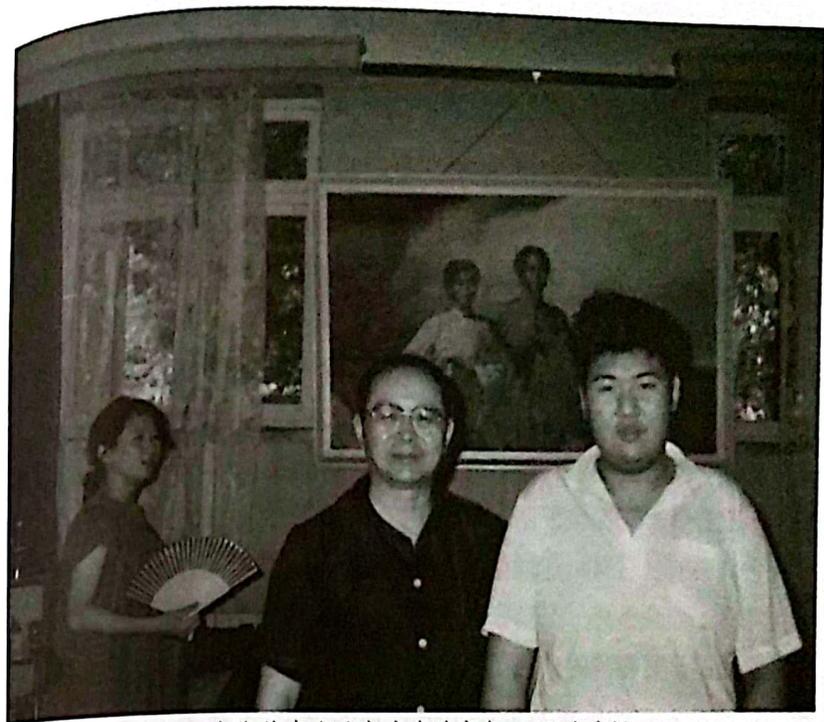
“毛岸青同志永垂不朽！”“邵華同志永垂不朽！”

到此，關於兩位“龍的傳人”的兩份“歷史文獻”，對其批註似已結束，只是話題未盡。雖然，他們只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留下的“幽靈”，但卻不僅曾在中華大地上長期“徘徊”，在最後還興師動眾以致大張旗鼓地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告別儀式”。正如“偉大領袖教導我們”所言：“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邵華作為“王妃”是壽命較短，她在死前卻已安排好了“皇室”的“接班人”，雖然那位“龍孫”可能不大爭氣，從生理到心理上都難當大任，她卻物色並培養了又一個“好兒媳”，即毛新宇的妻子（這是第二任了，據傳其第一任因為不滿不正常的家庭生活，洩露了“黨和國家機密”即其夫的生理缺陷，不只立即被踢出“皇室”，還被投入監獄，聽說已死在牢中，被邵華殘忍地滅了口！）現在的這一位，在邵華的培養教育之下，“全面地繼承和發展了”邵華的“王妃”事業和“獻身”精神，

自願放棄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專職來為“皇族”傳宗接代，在邵華精心策劃和“導演”下，於“先皇”誕辰一百一十週年紀念日當天，誕生了又一代“龍的傳人”，使“皇太祖”和“龍重孫”在同月同日出生，也為我國增加了一個多重意義的“聖誕節”。在這一方面，邵華還真是煞費苦心了。她在“龍重孫”出世時，就向正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毛澤東紀念大會“報喜”，又在“龍重孫”一周歲時，居然為其發行了“個性郵票”，開始將其推出公眾視線，企圖逐步將其推上政治舞臺。當年宣統皇帝登基時已三歲，這位叫“毛東東”的“龍重孫”，比溥儀出臺更早，可見他們是“迫不急待”了。現任毛新宇的第二任夫人已懷上了第二胎，可望毛氏“皇族”，正將繁衍茂盛，子子孫孫世代代，使其祖業更為發揚光大！如真能如此，“太子”和“王妃”及其“先皇”，都會“含笑於九泉”了。

按說，在此新世紀、新時代和我國的新社會中，竟還有著邵華這種人，不僅是中共黨員，據說還是“優秀”的，更是軍隊的一位高級將領，這不是對我黨我軍和我國的自我羞辱、褻瀆和敗壞嗎？其實不然，正如一首歌所唱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如果沒有我們這個黨及其軍隊，也就不會有邵華這種人，他們的出現、發展和登上高位，都有賴於中共與軍隊，二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又相得益彰的。正是有這個黨這支軍隊，才產生、培養和造就出了邵華這種人，因為他們都植根於幾千年“文明古國”的土地上，其中極其豐富的封建主義“養分”，加上黨國和軍國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化肥”，保證了邵華一類“奇葩”的“茁壯成長”，更使中共及其軍隊，得以發展壯大，這都已有史為證。

這裏再說一下毛岸青，他作為正宗的“皇族”和僅存的“太子”，雖然他的一生至少是大半生，都沒有自主意識和自理能力，他後來的一切，全是邵華利用和強加於他的，也是我們的國家與社會賦予他的。他的童年確很不幸，因為父親領導革命，致使其母被捕坐牢直至喪命，也使他三兄弟吃盡了苦，從小就失去家庭溫暖和父母之愛，這是值得同情的。邵華最初也是這樣，但她後來卻根本改變了自己的處境，卻以自身作為“血本”，投入了一場政治性“賭注”，



本書作者與毛新宇在其家中，1980年代攝

放棄了一個女人的正常生活和追求，犧牲了自己應有的家庭幸福，有目的有計劃地爭得了一個“王妃”的名分及其位置，與其“太子”之夫同享高級待遇以至榮華富貴。只是她雖有所得，更有所失，並且“失”得令人同情。不過這是她自己造成的，是自作自受自造孽的結果，她的所作所為更令人不齒。她也許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留下的一個餘孽、幽靈或僵屍，但卻不是最後一個，因為在她死前，已做了“傳宗接代”的工作，她已“傳位”給了自己的兒媳，即“龍孫”毛新宇之妻，還有那位幼年的“龍重孫”，他們的“事業”可望還將延續下去。“王妃”個人雖然死了，她作為封建主義的幽靈，卻是“火化”不了，也“埋葬”不掉的，他們的那一套，很可能真的會“永垂不朽”！

最後不妨再留一個“實驗課題”：因為毛岸青是“太子”，曾享有“中將”待遇，“王妃”邵華也成了“少將”，他們的兒子毛新

宇，現在已是大校高官，又是全國政協委員，是否也會升為將軍，並進一步走上政治舞臺，人們將拭目以待，看看我國的封建遺風，是否還會一代一代往下傳。

辛亥革命至今已近一百週年，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被推翻也將滿一世紀，只是封建階級的遺老遺少，卻一直沒有死絕，他們依然活在我們中間，有的還過得很滋潤。不過他們畢竟越來越少，去年死了一個，今年又死一個。雖然由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他們“走”得都很體面，甚至相當風光。例如專為他們編印了歌功頌德的“生平”，儘管其中充滿了謊言，卻為人們留下了兩份濃重封建主義色彩的“歷史文獻”。為不辜負製作者們的辛勞，特將其全文及批註，奉獻給廣大讀者。

(二〇〇八年八月一日建軍八十一年期間草)

作者附注：此文寫到的“龍子”、“龍孫”，最近又有了新的消息。其一，毛岸英、毛岸青兄弟1936年赴蘇聯前，是左翼作家、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馮雪峰，派地下黨員楊承芳，專職護送毛氏兄弟，與東北軍將領李杜同去巴黎，將毛氏兄弟交給從莫斯科來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康生，並由他帶去蘇聯。此情況見《百年潮》雜誌，2010年第二期64-65頁《馮雪峰憶1936年毛岸英兄弟赴蘇經過》一文。其二，“龍孫”毛新宇於2009年已升至副軍級，2010年內即可獲得少將軍銜。又訊：他的妻子已於2010年2月生了第二胎“龍重孫（女）”。

紅色佳人淚

——記李氏姐妹

我的比較密切的戰友中，有兩位李姓姐妹。她們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個兄弟，因為他們三個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藝戰友，其餘幾位我也認識，只是交往相對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們的母親是一位革命烈士，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隊伍中成長的，因此也與我結下了友誼，並且是不太一般的關係。

1、二姐和我們軍長及其家事

先說二姐，我與她相識最早，那是一九四六年蘇中七戰七捷之後，部隊轉移到蘇北地區，華中軍區文工團與我們一師文工團到了一起，我們團請軍區文工團一位女同志，來輔導不同的秧歌舞，來的就是二姐。我當時才是個十四、五歲小鬼，竟被其“驚豔”，為她罕有的美麗而吸引了，她扭的秧歌更令人叫絕！我至今還記得甚至會學她那特有的舞姿：用腳尖點地並使全身輕顫著，兩眼隨著雙手“飄”向四方……令人看得簡直神魂顛倒！顯然因為她的品貌出眾，不久就被一位首長“佔有”並成了他的妻子。幾十年後我的另一位文藝戰友，在我家遇到二姐的兒子，竟當我的面對她兒子道：你媽是先被你爸強姦了，然後才跟他結婚的，也才有了你們。此說是否有據，我難以考證，卻知這位首長，在此之前已結過婚，不知是因為“感情不和”，

還是由於有了她這“新歡”，又離了婚並再結婚。我再見到她時，那位首長已調到我們軍，她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我們的軍長夫人。

這時我已長大，對於她的美仍是驚歎不已，她的丈夫即我們軍長，平時與我們這些“小兵驢子”，有點沒大沒小，常在一起說笑，並且對我似乎格外關顧，一九五五年我借調到總政工作時，想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軍長正在北京，準備在此安家，我去請示了軍長，他對我全力支持。我進了美院之後，他竟親自來學校看我，來時不帶警衛員，又穿著便服，入門時被門房老頭攔住填會客條，他不知怎麼填，被門房訓了幾句，他見到我時笑道：你們學校門口那老頭比我還厲害，為我不會填會客條，狠狠教育了我一頓。我送他出門時問門房老頭道：你知道他是誰嗎？這是我們軍長，一個真正的將軍，你卻把他給教訓了！那老頭這才歉意地說：對不起，我眼濁，沒看出是位將軍，也難怪，填會客條是衛士和秘書的事，您哪會呢？要是你穿軍衣帶肩章來，學校就會敞開大門歡迎視察了。

還是在總政工作時，無意中參與並攪進了軍長夫婦間的一次內部矛盾。二姐作為軍長夫人與我重逢時，因為我正在軍中文化部門，認識一些部隊作家、藝術家，她托我打聽自己一位已是作家的戰友地址，我很快完成任務告訴了她。當時我不知道，她與這位戰友，抗戰期間曾同在新四軍四師“拂曉劇團”，並且早就是一對戀人，可是她的美，戰友喜歡，首長也喜歡，她那戰友“胳膊扭不過大腿”，她只得被迫痛別戀人，成了首長的老婆。卻又對老情人，一直心懷愧疚又念念不忘，終於通過我重新搭上了關係，他們當時都在北京，據說曾多次幽會過。這事被其丈夫即我們軍長發現了，兩人吵了一架，幸虧二姐沒有“咬”出我來，不然我肯定逃不過軍長大人之手。她後來告訴我這事時，說自己也對其丈夫反唇相譏，甚至發起反攻，原來軍長也曾多次與其前妻重逢約會，並且不止一次地對妻子不忠，例如她有一次偶然臨時回家竟進不了門，好容易打開後，看到她丈夫和一女文工團員在裏頭，正驚慌不安又衣衫不整著，他們肯定沒幹好事。因此她也有權對其丈夫進行“報復”。

2、軍長夫婦共同對我的美意

二姐和軍長二人吵歸吵，有一點卻完全一致，即把她三妹介紹給我。她那三妹原是一個部隊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這時正住在自己姐姐、姐夫家。這位三妹美貌雖不如二姐，卻正處青春期並“待字閨中”。顯然因為二姐想彌補自己未能與文藝戰友結為一家之憾，我與其三妹年齡相當，似也般配，她那當軍長的丈夫，又有些偏愛我這“多才多藝”、正上美院頗有前途的部下，兩人一拍即合一致主張讓我與其三妹結識交往，於是我就成了他們家的常客，並且每回都款待我一番。有一次他們為我沏了杯好茶，軍長問我這茶怎麼樣，我說還可以。其實我只喝過大碗茶，根本不會品味。軍長聽了罵我道，你這傢伙口氣不小，我這茶葉幾十萬元（舊幣）一斤，你只說是“可以”，真是白給你喝了！又有一次吃飯時，軍長指著一道菜問我，你知道這是什麼嗎？我說是粉條，他又笑著罵道，他媽的，我又白招待你了，這是魚翅，誰家有這“粉條”啊？我只得也笑道，我是吃炊事班飯長大的，別說吃過，見都沒見過這種美味，難怪它又鮮又好吃，可惜把它當“粉條”了。我們吃喝說笑時，三妹當然陪同在座。

當時三妹其實正閒居甚至困守在他們家，她是辭了原文工團的工作，到北京來報考蘇聯舞蹈家執教的“中央舞訓班”的，由於全國報考競爭者太多，更由於三妹本來基礎較差，特別是文化不高，自然被涮下了，她不好意思再回原單位，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幹的姐姐姐夫家，每天不免無聊和困頓。恰巧我那時正熱衷於油畫人像寫生，她們姐妹就成了我的最佳“模特兒”，不僅為她們一人畫了一幅半身肖像，還根據她們已逝母親的照片，另畫了一幅油畫像，和一幅粉彩像，使這位烈上也“音容宛在”了。應該說她們的媽媽確是一位美人，可惜她們姐妹幾個只有二姐獨得其母真傳，美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大姐不必說了，這位三妹卻是青出於藍反而遜於藍，僅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整體及其氣質大有差別，尤其是她那略帶沙啞的嗓音，幸虧跳舞用不著開口出聲，不然就會露怯了。

當我知道軍長夫婦對我的這番美意後，一面不免“受寵若驚”，一面又感到遲疑甚至為難，因為這位三妹有時並不可愛，且不說其文化修養不足，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尤其是倚仗其姐夫、姐姐的“高幹子弟”派頭和勁頭，與我這“小兵臘子”特別是平民百姓出身，常常很不合拍。但我沒有也不能拂軍長夫婦的好意，還是甘願甚至樂意與她們不斷交往著，說穿了是因為二姐太美，與三妹也多少有點“情分”，我們互相都有興趣和需要，就常去看望她們，陪三妹聊聊天，看看演出和展覽，暫時充當了她的“候補情人”角色。後來她的工作問題，由軍裏的陳政委通過老上級老戰友的關係，調去了鐵道兵文工團，使她終於又有了“歸宿”單位，她二姐和姐夫家後來又遷出北京，我和她也失去了見面地點，離開美院上班後，就減少甚至中止了與她的交往。若干年後，我有了自己的愛人，與三妹的這段“情緣”宣告完全結束，但是我們間的故事卻沒有完。

其實我與三妹也是老相識了，早在一九四八年春，我們部隊正在黃河北面休整，著名的“新旅歌舞團”來慰問演出，我們文工團派我和幾個同志去他們那學習，我主要跟王德威、肖鋒等學畫幻燈片，同時也學學打腰鼓和一些歌舞節目。我們在“新旅”呆了一、二個月，與許多同志都熟悉了，曾常見一個很小的丫頭，穿著齊膝的過大軍衣，下面還打著鬆鬆垮垮的綁腿，一頭黃毛亂髮上，撮著兩根很少梳理的小辮，雖是單眼皮，膚色卻特白，只是有時拖著兩條鼻涕，常在流過嘴唇時，或是使勁吸回，或是用袖口擦去，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總是油乎乎髒兮兮的。她很少上臺演出，只是跟著團裏行動，自己學著打打腰鼓什麼的，她有個哥哥也在“新旅”，但由一些較大的女同志帶著她。後來知道，她和哥哥都是烈士子女，一九四五年就來到新四軍，她當時才八、九歲，等於是“寄存”在部隊文工團裏。幾年以後在我們軍長家又見到他們，才知他們與二姐原是一家，又知其兄弟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編導，主要作品有舞劇《寶蓮燈》、《小刀會》等，我們都為在戰爭年代相識，現在又重逢而高興。他們的三妹後來也出息了，不只當了不小的“官”，更成了個通“天”的人物，最後竟與我共過一段事。但我和她相處時，總是忍不住揭她的“老

底”，說她當年撮著黃毛小辮，拖著鼻涕的“光輝形象”。只是我每次說此舊事，她都不答理我，似乎怨我毫不顧及她的面子和現在身分。但是她當年形象對我印象太深了，與她後來的尊容又相差極大，使我憋不住不提往事，雖然這可能惹她不大痛快。

三妹到鐵道兵文工團後，我只在大歌舞《東方紅》中見過她，偶爾遇到也只打打招呼寒暄幾句而已，這時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她卻還是“單幹戶”，我知道她心氣很高，不是門當戶對的“白馬王子”決不出閣。不料她後來的老公竟是我的一個“鐵哥們”，他是我早已相識相熟的部隊知名畫家，當我得知他們二人正談“戀愛”時，我曾警告我那“鐵哥們”道：那“小姑奶奶”可惹不起，你千萬別找她！哪知他不聽“老人”言，還是與“小姑奶奶”結了婚。因為我曾企圖破壞這門婚姻，他們的婚禮請了我，自己卻不敢去，怕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為他們牽線搭橋促成良緣的人我也認識，事成後得意地問我道：這兩口子真是門當戶對，十分般配吧？我心想就等著瞧吧！沒想到真被我料中了，在他們都有了一兒一女兩個孩了後，竟打離婚徹底分手了。這是後話，以後再說。卻說她在鐵道兵文工團時，團裏有項額外的特殊任務，即在週末到中南海去，給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伴舞，她是部隊文工團舞蹈隊的，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幹子弟。不僅業務熟練，政治尤為可靠，就常常去執行這一光榮任務，結果為此不僅改寫了她自己後半生的歷史，還影響到了她周圍的人，此事由來及後情如下：

3、三妹闖“宮”享受恩寵

有一次鐵道兵文工團又奉命進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趕上跟偉大領袖跳。她本來就會“來事”，如此天賜良機，當然乘機大顯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興趣，由於她是單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楊開慧也是單眼皮，老人家竟說她有點像楊開慧，楊的小名叫“霞姑”，偉大領袖就賜她以御名為“李霞”。他們在舞中間聊時，老人家問她明天是星期天，你們都去哪兒玩哪？她說沒有什麼地

方可去。老人家順口道，到我這兒來嘛！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衛室不讓她進，她說是主席讓我來的。警衛室打電話報告請示，又一直捅到偉大領袖處，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說過這話，既然來了就讓她進來吧！於是龍顏芳心一齊大悅，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見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們一老一少相談甚歡時，中南海警衛室一個電話打到鐵道兵文工團，批評他們怎麼沒管好自己的團員，居然讓她闖到偉大領袖身邊來了。警衛室讓文工團團長、政委馬上趕到中南海來，準備等“私闖後宮”的，已成為老人家身邊的“李霞”團員，等她出來時帶回團去，給予必要的批評教育。

幾個小時以後，也許“日理萬機”正“為國操勞”的偉大領袖確實另有公務，三妹這才戀戀不捨地“退朝出宮”，一到中南海門口，就由自己的團長、政委帶了回去。不過團裏誰也不敢怎麼著她，因為她已有了“尚方寶劍”，說是毛主席讓她以後隨時可以再去，並且留了相互聯繫的辦法，使她從此享受了“聖上恩寵”，並且是誰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後，她就被調出鐵道兵，“奉旨”安插到離老人家更近的北京衛戍區，又進了什麼公安學校，據說老人家非常關心她，讓她“脫產”學習特別是學外語，說要將她培養為貼身秘書，並且不論何時，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進“宮”伺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時，她也得陪“駕”護“輦”，一時成了偉大領袖身邊不可或缺的人，至於是“寵臣”還是“寵妃”就說不清了。

也就在此期間，即一九六五年秋，我那“鐵哥們”畫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電，如給岳飛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務。他一頭霧水地趕回京城，卻見已為他佈置好了新房，立即“奉旨”與三妹完婚大吉，並且籌辦喜事全部用費，皆由偉大領袖處支付。為他們操持一應婚禮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這是執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這一“重大任務”的。這使我那“鐵哥們”畫家，又驚又喜又難以置信，沒做夢就娶上了媳婦。他們婚後，相繼有了一兒一女，越長越大後竟沒一個像他們的爸，即我那“鐵哥們”畫家，好在當爹的並不計較，當時也沒DNA檢查，也就

由它去了。

到“文革”時期，三妹和畫家夫婦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婦二人各走一極，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會的文教組副組長，其官職和權力至少相當於省市的文化廳局長，當時她經常出頭露面，對下屬的各個文化單位和文藝團體等等，到處下命令作指示，還曾領著樣板戲女演員，隨她進“宮”參見人們夢寐以求的偉大領袖，既使她們親耳聆聽了凡人未聞的“最高指示”，又為當今“聖上”當面恭唱了“堂會”折子戲，都使女演員們獲得了此生的最高榮譽。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左”派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廣大革命群眾，原是文工團員的三妹，竟手抱語錄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統帥”和“偉大旗手”之間，簡直也成了他們的“親密戰友”，不只豪氣衝天，並且牛氣逼人！只是這時她那老公，即我那“鐵哥們”畫家，不僅沒有如此風光，反而成了所在單位掌權造反派的對立面和階下囚，因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奪權者的忌恨，他們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氣，使那畫家受了很多罪。在兩派鬥爭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不過是反面的，“堅決打倒”和“歡呼揪出”他的大標語，刷到了天安門城牆上，比他作為畫家的名氣，大得怎麼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當年的三妹，有時運用權力和關係，拉他或幫他一把，卻又常常顧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對立面批鬥關押和刑訊逼供，因此我那畫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頭，與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個如登天堂，一個下地獄的強烈對比。他們夫婦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時分時合，鬧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

好在不論別人怎麼折騰，三妹身後自有最大後臺，使她“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照當她的市革委文教組副組長。可別小看這個“副組長”，其能量和威風卻大得令人目眩，許多上層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曾與三妹同行的劉慶棠（也就是人稱“長征兩萬五，不如跳個芭蕾舞”的那個舞蹈演員），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門前老是停著作為高級幹部標誌的紅旗轎車，原是我們軍長的二姐她丈夫，對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

起來，時時來討教和請示她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條，即她能通“天”，全國八億人口，她是少有的能直接而見偉大領袖的人之一。連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辦公廳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即現在王府井南口北京飯店西側“貴賓樓”的原址。不只如此，家裏還接了部搖把電話機，那頭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隨時傳喚她進“宮”，電話鈴響後，紅旗轎車就到門口，馬上將她接進“宮”去。可憐我那“鐵哥們”畫家，雖是她的老公，卻成了她家男僕，吳德、吳忠和劉慶棠等一到，因為都是夫人的高官貴賓，他就得在一邊遞茶倒水伺候客人，夫人儼然是黨國要人，老公只剩了喊“喳”應“諾”的份兒了，他們家只有“母雞”會“打鳴”了……

4、黨和國家的“絕對機密”

前蘇聯有部關於彼得大帝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個頗有姿色的使女，其實是他養的小情婦，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歡，卻被使女迎面給了一耳光，原來她已被皇上“寵幸”過了，身份已由原來的使女變為未來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將自己的小情婦拱手讓給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這樣，三妹由一個普通的文工團員，突然成為一個權傾一時的高官，其原因只是她不僅成為偉大領袖身邊的人，更已受到當今“皇上”的“恩寵”，她的身份地位已是一位“寵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語了。不過此事絕對不能亂說，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隱私，更事關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追究起來將罪責難逃。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事早已成為公開的機密，我不僅逐漸得知一些真情實況，又已有書為證。

“文革”以後若干年，國內秘傳著一部禁書，即在國外寫作並在境外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錄，我早已風聞此書，但沒有特殊關係的人，是很難看到的。有回我們老軍長和二姐的兒子來我家，說到此書時，他說他已看過，並且不無炫耀地說，那書裏寫了我三姨，連我媽都寫進去了。後來我終於找到此書，讀後發現其中

果然多處寫到三妹，也寫到了二姐。原來三妹自從進“宮”，被老人家欽定她像楊開慧後，真的繼承了“烈士遺志”，並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職責，不斷被偉大領袖“寵幸”。她發現老人家雖然“日理萬機”，卻又有此一好，實為日理萬“姬”，她就以身相許，努力為其服務，更為求其歡心，再為老人家引進別人，好讓他換換口味。她陪“駕”伴“君”到上海時，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領來朝拜“聖上”，哪知“龍心”不為所動，因為她嫂子雖也有幾分姿色，卻沒有被老人家看中，當天就將其打發走了。後來她又跟老人家到了無錫，當時仍當軍長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無錫，她就領著二姐夫婦一起來參拜“皇上”。這時二姐雖然已近中年，卻仍姿色出眾，尤其是那雍容華貴的氣質，老人家一見立即龍心大悅，先留他們夫婦二人與偉大領袖共進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飯後卻讓當軍長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將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幾天“龍恩”，雖然三妹這時已當了“拉皮條”的角色，他們姐妹二人共享了“皇上”恩澤，凡人哪有這等福氣呢？當時正隨“駕”的中辦副主任汪東興和李志綏醫生，指著三妹悄悄說，她媽媽要在的話，她也會領來孝敬“皇上”的。書中又寫到，李志綏醫生發現偉大領袖沾上了“滴蟲病”，這是從別的有此病的女性處得的，但對男性無妨，只是在他再與另一女性幹那事時，又會將病菌傳給下一個。李醫生稟告“皇上”說，這病會傳給江青的。偉大領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沒那事了，要有的話正好在她那裏頭“洗一洗”。後來我知道，那滴蟲病就是三妹“獻”給偉大領袖的，因為我那“鐵哥們”畫家，也沾過三妹這光。

李志綏的這部回憶錄，雖然在國外境外公開發行廣為流傳，在我國大陸卻是“黨和國家絕對機密”，嚴禁任何人洩露更不得傳播，但是其中寫到三妹的事，卻由我那“鐵哥們”畫家證實了，他說自己在“文革”中因為受迫害，關押揪鬥又上過刑，放出來後身體很虛弱，回家後夜裏與三妹幹那事時，那玩兒怎麼也硬不起來，好容易勃起了，卻一進去就“疲軟”了，使三妹有近水卻解不了近渴，氣得她罵道，你都不如個七、八十歲老頭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後他們夫婦

分手的“種子”。我得知此事後對我那畫家朋友說，你老兄也夠“幸福”了，居然與偉大領袖“共飲一江水”，他惱火得把頭上的軍帽一摔道，我這頂“綠帽子”算是戴定了！不過這話是在“文革”結束多年後才說的，當年我還未見上述那部“醫生回憶錄”，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聖上寵妃”（嚴格地說應是“之一”，因為“宮”中“寵妃”不止她一個）。所以在“文革”後期，我為了“躲風”，藉口學習領會毛主席革命路線，去紅軍長征路線訪問寫生，正趕上我的“鐵哥們”和三妹在鬧離婚，因為我與他們二人都有多年友誼，更不知他們要離的主要原因，曾去勸說他們“和為貴”，由於離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訪了她的大姐，讓她也幫助勸說三妹。那大姐卻小聲對我說，你不知道，他（即我那畫家朋友）那東西不行了，我三妹正來勁，他卻罷了工，夫妻生活沒法過，再加上別的事，他們是非離不可了。我想這其實是種病，可以治好的，還打聽到一種藥，叫“肉蓯蓉”，專治“陽萎”，曾托人去買，以為只要治好這病，能夠滿足三妹所需，他們就可以不離婚了。但是當時三妹他們正劍拔弩張地較著勁，我“鐵哥們”的病也不能馬上治好，不如暫避鋒芒，先退避三舍，讓他和和我一起到長征路線寫生去，他欣然答應馬上與我同去“長征”了。我們在貴州和雲南等地一下轉了三個來月，我因為家裏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卻又去了西雙版納，住進傣族村寨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著要和他離婚。等他馬上回來辦手續，可就是怎麼也找不到他。三妹著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著著急，他們知道即將成為“前”三妹夫的畫家，是由我領著“逃跑”出去的，就氣不打一處來，對於我這“忘恩負義”之舉，非常生氣發起火來，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5、我怎麼對他們“忘恩負義”了？

關於我的“忘恩負義”，另有一段我與他們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氣活現時，我在本單位因為得罪了“副

統帥”和“江女皇”一夥的人，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並被開除黨籍軍籍，押回原籍勞動改造。兩年後發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台，當初定案處理我的正是林彪死黨黃吳李邱等，我在勞改中聽到此事後，就蠢蠢欲動想回京翻案，但是因為久居鄉下，不瞭解外頭情況，就寫信給我那“鐵哥們”夫婦，請教他們怎麼辦好，他們很快覆信支持我回京參加反對“林陳反黨集團”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我還是沒有把握，正好我那老軍長已調任為江蘇省軍區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鎮江，我就從江北鄉下偷跑到鎮江，找到他們家見到了二姐，老軍長沒在，說是外出開會了，也許因為我還戴著“帽子”，他為了避嫌故意不見我。二姐聽了我的陳述，她說已從三妹夫婦處知道了我的事，給我講了林彪一夥垮臺和“文革”中的許多事，認為我的問題完全可以平反，根據我的出身歷史和一貫表現，不會有什麼問題，支持我回京找原單位去，也可以直接找總政甚至軍委上告。二姐說我可以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費，我說還不行，這次我是從生產隊偷跑出來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還有個老母親，也得安頓一下才能走，又說路費可以自己籌，回鄉時曾給我幾百元安家費，借給生產隊買牛了，現在能夠還我一些，正好用它當路費，到時我將從鄉下直接回北京。二姐說這樣也好，就拿出一批關於“文革”和林彪問題的文件材料，讓我瞭解外頭形勢和上頭精神。當天晚了，我不敢到外頭住旅館，因為沒有任何證件，萬一被“文攻武衛”查出我是潛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脫層皮。二姐毅然決定“窩藏”我這“反革命”，讓我住在她家，這裏是省軍區政委家，誰也不能隨便進來，躲在這裏最保險，就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來最為安穩和舒適的一覺，從白天到夜裏，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裏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別二姐回到鄉下，臨走前她囑我到京後就去找三妹夫婦，讓他們把北京的鬥爭情況告訴我，還要我有什麼事就隨時與她聯繫，最後又說：“一聽說你也當了反革命，我從來就不相信，我們看著你和三妹一樣，在革命隊伍中長大，忠心耿耿為黨為國，怎麼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們都支持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著你的好消息！”

我回到北京以後，馬上去找我那“鐵哥們”家，他們當時還住在“中辦”為三妹安排的住處，即後來的貴賓樓原址。我去時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規律，仍按鄉下習慣早上六、七點就敲開他家的門，他們夫婦睡意朦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過談話我瞭解了當時北京和各地的情况，聽了他們對形勢的分析估計，和對我怎樣進行鬥爭的建議，這使我與他們夫婦之間，除了原有的個人友誼，又增加了一層革命和戰鬥以及路線鬥爭的非常友誼。由於我已被開除黨籍，這時正是沒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經過曲折鬥爭之後，終於恢復了政治生命，而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持幫助下實現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鐵哥們”畫家，都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後來我竟背著二姐、三妹，和我那“鐵哥們”相約結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離婚離不了。當時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於離婚，是想再嫁一個大官。原來有位年紀不老的政治局委員，剛剛死了妻子，正在虛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虛而入，改嫁給那位政治局委員，以使夫婦二人都可在政治舞臺上徜徉，不似這個畫家老公，只配在家裏為她及其貴賓端茶倒水。可是這個畫家卻被我拉走並且抓不回來，這使二姐、三妹對我都恨火。

在此期間我原來所在文工團的老團長，去看望老軍長和二姐夫婦，二姐一見老團長，竟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道，你們團的那個××很不象話，我和三妹當年那麼關心支持他，幫他從林彪迫害下解放出來，但是他忘恩負義，與他的“鐵哥們”，合夥欺侮我們三妹，使我們找也找不到他。這事與我們老團長完全無關，他被說得莫明其妙，只得說他與我多年不聯繫，我幹過什麼他一點也不知道。二姐仍氣呼呼的要他負責向我轉達她對我的強烈不滿。也在這時，我的妻子在出國援外時不幸犧牲了，三妹出於我們多年友誼也來慰問我，對我表示了一通關切之情，哪知在離開我時竟說，我想還是罵你，你把你那“鐵哥們”藏到哪里去了，你得馬上把人還給我！我訴苦道，他年齡比我大，資格比我老，級別和名聲也比我高，他的行動是他自己做主，我怎麼能背著你們帶他走又藏起來呢？其實我那畫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於與他離婚，就故意呆在邊疆地區，拖著不回來“乾耗”著

她，而我實際上是支持他這麼幹的。

6、主動洩露“機密”炫耀自己的醜事

就在我與“鐵哥們”並肩轉戰於長征路線時，他向我漸漸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寵妃”的事，一九六五年三妹所以急如星火地與他結婚，也是由於“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偉大領袖都以為她已懷上了“龍種”，但她卻是個未婚“處女”，如不結婚就會露“餡”穿幫，三妹失節事小，領袖形象事大，所以讓三妹趕緊嫁人，以使其腹中“龍種”有人認領，好代偉大領袖當個“替罪羊”，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將我那畫家朋友從西藏緊急召回，不由分說先與三妹入洞房，當了個又驚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塗新郎。也是在這期間，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蟲病和罵他“都不如個七、八十歲老頭子”等等床上秘聞。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別的醜聞，如三妹不只同“聖上”有染，還與衛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帶一個司機來與三妹幽會，有回帶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車去什麼地方，讓當老公的坐在前排司機邊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後座上，那老公從車前後視鏡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摸又親著，看得他火冒三丈卻又不能發作。那司令又常半公開地去找一個中年寡婦，並聲稱自己這是“助人為樂”，又說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閑著，誰想去去就是了，只要她樂意，他卻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這些情況後，馬上意識到自己勸他們別離婚是根本錯了，當即表示，他應立即離婚，並且與三妹離得越遠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邊也太危險了，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人找個藉口搞掉了，不論是“聖上”還是“司令”，會像撚死一隻螞蟻似的滅掉你，死了也不知是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白死掉。我那“鐵哥們”後來果然回來，迅速與三妹辦了離婚。只是已經耽誤了三妹的好事，那個喪妻的政治局委員，已經另有新歡，等三妹辦妥離婚，黃瓜菜都涼了。已高攀不成了！

他們離婚以前，我“鐵哥們”有次苦惱地對我說，他們家竟曾

同時擺下三個“戰場”，他妻子即三妹同衛戍司令幹；而三妹一個來幫她帶孩子的異母小妹，則同衛戍司令的司機幹；正好三妹那當舞劇編導的哥哥來，又在他們家同一個首長千金幹。這第三對的“戰場”就在畫家的畫室裏，畫家回家來時，見每個床上都被衾狼藉，床單褥墊上還留下了種種“地圖”，他只得忍氣吞聲地自己收拾換洗一番。二姐到北京來，知道此事後罵道，這南河沿一二四號，簡直成了個大妓院了！好在這時偉大領袖已經病入膏肓，不需三妹常常進“宮”，而且老人家身邊已經另有“寵妃”，三妹已生過一子一女，不必再為領袖服務，就在這時衛戍司令才插進一腿補了此空。這些秘聞趣事不僅事關三妹名節，涉及我朋友的隱私，更會影響到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應屬黨和國家的“絕對機密”，所以我和我那“鐵哥們”，一直也一齊為此嚴格保密著。直到他們離婚以後，我終於逐漸知道了他們家，主要是三妹的這些事。說起來這當然是些醜事，可是三妹不僅不以為醜，反而有意無意地故意透露一點兩點甚至幾點，並且不無得意之色。這也難怪，中華八億同胞（當時人口統計數字），女性打個對折有四億，成熟女性再打個對折算是二億，全國二億正當年的女同胞，有幾人有此“幸福”，親身享受、也給“聖上”享受到兩性之間零距離的“親密接觸”，這等“皇恩浩蕩”的超級“榮譽”，當今世上幾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為榮，以致主動洩露了黨和國家的“絕對機密”。

遺憾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吾皇駕崩”，停靈於人民大會堂，接受人們瞻仰遺容和沉痛悼念。這時三妹趕去，撲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聲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麼活啊！……據說“第一夫人”江青聞訊大發雷霆道，這個李××，膽大包天，居然大鬧人民大會堂，看我怎麼收拾她！可喜的是當年十月六日，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江青首當其衝成為階下囚，再也發不了雌威整不了人，這才使三妹逃過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紅色女皇”手裏，很可能會同漢高祖的呂后一樣，把先皇劉邦的一個寵妃，不只打入死牢，還砍去胳膊和雙腿，更“去眼，燬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見《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三妹倖免當

“人彘”之難，所以她和我們一樣，都歡慶“四人幫”的垮臺，為我們都獲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興奮。

7、極其珍貴的國寶級革命文物

前已說過，三妹總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偉大領袖的特殊關係。還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中央決定建立“毛主席紀念堂”，並在全國徵集關於毛主席的文物，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詩詞、書信等等手跡，都必須上交中央入檔，不得流散在民間和個人手中。見此中央通令後，三妹來找我去，讓我看了她藏著的一批領袖文物，此前我已在那兒見過幾件，這次讓我全部一一過目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她手頭竟擁有大批價值連城的特級文物似的國家珍寶！這些寶貝平時鎖在一個小皮箱中，那裏面全是偉大領袖的親筆墨寶，其中不少是老人家特地題贈給她的，例如有一幅名詞《蝶戀花·答李淑一》，現在國內發表並流傳的同一詩詞，並不是老人家專門題寫的，其實是從他給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不僅沒有前言小引之類，詞中也有筆誤和修改處。但三妹的這一幀，卻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紙上精心題寫的，前有關於此詞的“小引”，後有特意御筆親書的“跋”和“題贈李霞同志”一行大字，前文已寫到，“李霞”是偉大領袖為三妹起的“御名”，將懷念“霞姑”（即楊開慧）的詞，書贈給“李霞”，其意義自然深遠，詞後老人家那龍飛鳳舞的狂草署名，更是令人驚歎。整幅詩詞手跡的筆下功夫，不只是老人家在書法藝術上的巔峰之作，在當今“書壇”上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一件無價珍寶。我欣賞後對三妹說，僅這一幅字，你下半輩子就是什麼也不幹，也吃喝不愁了，因為你已擁有如此巨大的“財富”。她得意地說，你再看，我這還有呢。接著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詩詞手跡手稿，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書的，有的是古詩或名詞的重新題寫，還有一些題字題詞，有幾件是“向雷鋒學習”和“向雷鋒同志學習”等不同題字（關於雷鋒的題字，後來引發了另一個故事，此處暫略，下面專寫）。最使我感動

的是老人家給三妹的一批親筆私人信件，有的是在八開白紙上用鉛筆寫的（這是中央領導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時專用的），有一信竟長達五、六頁，其中對“李霞”充滿了無微不至的關懷愛護與諄諄教誨，如囑她好好學習，戒驕戒躁等等，有幾處對她的批評，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看來偉大領袖對她似已動了真情，並且是用了真心的。我一面欣賞這批文物，一面止不住為三妹驚歎，為她驕傲更為她擔心，她個人私藏著這批特級文物，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變成一顆顆“定時炸彈”，它太珍貴也太危險了，她不能就這麼留在身邊！

三妹說找我來並讓我看這批文物，就是為了商討一個怎麼處理的辦法。這時她已與畫家離婚，身邊暫無別的親人，所以臨時召喚我來商量如此大事，我一面為她對我的信任而感動，一面為見到這批文物而高興，就說按照中央規定，這些文物應當上交，但是這是毛主席寫給你個人的，上交後自己就沒有了，這很可惜。她說自己正是這麼想的，但不知怎麼辦才好。我想了想道，最好能複製一套下來，上交一份，自己保存一份。她說到哪兒複製呢？最好能“拷貝”下來一點不走樣。我為她動開了腦筋，想到我的老上級華楠，這時正任總政秘書長，手下肯定有新型文件檔案複製設備（那時還不知道那叫複印機），我說可以去找他商量，請他幫助複製一套下來。三妹說也好，你替我去找他看。我受命去見了華秘書長，他思考後說，這批需要複製的東西，應該先全部拿給他看看，然後決定是否複製和怎樣複製。我回去告訴了三妹，她皺起眉頭道，都讓他看了，不就又擴散了嗎？加上複製的人，還保得了密嗎？她躊躇一陣後說，不行不行，不能讓更多人看了，還是等等再說吧。於是這批關於偉大領袖的國家特級文物，一直還在三妹手中。到她去世以後，又作為遺產傳給了她女兒。她女兒的老爸即我那“鐵哥們”，也曾同我商量，那批文物確實等於一種“定時炸彈”，放在誰身邊也將是個“禍害”，應該勸其女兒寄存到銀行保險櫃中。但是他早已與三妹離婚，女兒也不太聽他的，他只有建議權，卻無決定權，不知他們女兒照他說的辦了沒有。這使三妹雖已去世，卻留下了一個“國寶懸案”。

8、三妹再婚，找了個“屁股冒煙”的

三妹與我那“鐵哥們”離婚後，就搬出了中辦分給她的住處，搬進了北京市革委會撥的一套住房，她就是在那兒向我展示這批文物的。由於當時我正中年喪妻，她又已離了婚，兩人都是單身，並且她的二姐夫早有撮合我們之意，加之我們多年的交往，如今又對我很信任，有好事者就鼓動我再與她好。我卻毫不猶豫地表示不予考慮，心想就算她沒有後來那些事，與偉大領袖和衛戍司令等等都沒有關係，這個“小姑奶奶”我還是不敢惹，並且她頭上沒有“帽沿”，一直都在朝上看著，當初我那“鐵哥們”，不聽我的警告，與她結了婚都有了兒女，卻落得了雞飛蛋打離婚散夥的嚴重後果，這都是不聽“老人”言的結果。我便對慫恿者說，她哪能瞧得上我，我還是找個能安生過日子的人吧。不過雖然如此，我和三妹還是友誼長存並交往不斷，又瞭解到，她在她家同她哥幹那事的那位首長千金，一起商討如何重新安排她們的終身大事，就都把各自原來的老公給“休”了，相約各找一個能“屁股冒煙”的，即有專用小車的大幹部，好補過一把當首長夫人的癮。可惜三妹原來瞄準的那位政治局委員，已經“名花有主”，她因離婚耽誤坐失了良機，只得另選目標了。

就在這時，有位超齡“白馬王子”闖上門來，不過此公當時，“屁股”並不“冒煙”，但是這位自薦“毛遂”的“屁股”，不僅曾經而且仍將“冒煙”，有著相當的保險係數和發展前途。據三妹後來說，這位是拼命追求她來的，此人本來是位高幹，我也早就認識他，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總政宣傳部長，是全軍最年輕的一位將軍，只是後來隨譚政主任一起下了台，到“文革”中又錯投到林彪麾下，一度成為“副統帥”的智囊和筆桿子之一，哪知林彪又倒了台，被審查了一陣後，認為陷得不算太深，解放出來正靠邊站著，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此前他已喪妻，聽說三妹正找對象，忙來報名應徵。這時三妹也正上不上天下不著地，已屆中年卻身邊無夫，當這位前任部長將軍對她猛攻窮追時，只得盤算衡量予以考慮了，又與大姐、二姐再三商討斟酌後，認為此公雖然暫時落魄，但是從當年到將來，仍然大有可

為，其資歷和原級別都明擺著，必可東山再起，並且他雖比三妹年長二十多歲，卻比偉大領袖和衛戍司令等年輕多了，也就沒有拒絕。這位前將軍部長為了追她，不惜拋棄架子和斯文，不斷到三妹家來，為她燒菜做飯忙家務，殷勤伺候這位“娘娘”，在他軟磨硬泡之後，果然稱其心願，成了三妹的雖不完全滿意，卻也門當戶對的又一“郎君”。後來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猛追三妹，其中有個重要緣由，原來他發現三妹“朝中有人”，與中央及軍委若干領導人，都較熟悉大有關係，與她婚後將取得一條直通上層的快捷熱線，保證將來能重任高官。三妹確也不負所望，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與魅力，保舉這位郎君終於又升了上去，重新成為軍中一位高級幹部，並且享有了中將軍銜。由於我和三妹的友誼，這位前部長大人，竟也成了我的朋友，日後我們曾多次交往，而且演繹過一段故事，這也是後話。待下面再說。

9、三妹新任老公，下令不准洩密

三妹手上那批未出手的“特級文物”，常常“燒”得她不大安生，有次她又把我找去，看了一份她保存的毛主席談話筆記。這是老人家幾次關於文藝的談話，她聽後回來馬上追記下來的，其中特別是關於京劇的一部分，不僅都是聞所未聞的，並且看出老人家對此確是情有獨鍾，對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堪稱內行，對京劇的改革發展，有許多獨到的見解。我看後對她說，這番談話如果整理公開發表，必將引起各方注意，甚至可能引起轟動。她說自己也這麼看，所以找我商量怎麼拿出來。我考慮後說，整理發表當然很好，不過據我所知，凡是毛主席未發表的講話或文章，個人都無權隨便拿出來，也沒有哪家敢擅自發表，都應當交由中央文獻研究室或“毛選”編委會統一處理，到了他們那裏，怎麼發，何時發和發不發，就由不得自己了，反正不會允許個人發表這類文章，說不定還會引起別的什麼問題，看來這事比較複雜甚至麻煩。原來三妹所以想發表這些談話，是

企圖藉此宣揚和突出自己，顯示自己與偉大領袖的特殊關係，表明她如何領會並掌握了毛澤東文藝思想，已經深得其“精髓”，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權勢的籌碼，這不僅可以大出一番風頭，而且還可以成為世所矚目的人物，但是看來難以如願，鬧不好會事與願違搞出別的事。她皺著眉頭想了又想後，才洩氣地說，那就算了吧。我也遺憾地說，以後看情況再說。此事就此擱下，那批領袖談話筆記，至今還在她那兒保著密，可惜又都成了遺物，談話者和紀錄者都已辭世。不過當年三妹欲借偉大領袖標榜顯示自己之心一直未死，不久她又找我商談了一事。

我國每到逢三的年頭，都要紀念毛主席為雷鋒題字的幾十週年，掀起又一次學習雷鋒的高潮。記得是在一九八三年，三妹又悄悄讓我看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跡墨寶，那是關於學習雷鋒的不同題詞。她說一九六三年《中國青年》雜誌請偉大領袖為雷鋒題詞，她就在主席身邊，那天老人家興緻很好，一邊應約題詞，一邊對她說了不少對學習雷鋒運動的看法，特別是他對雷鋒本人，以及關於如何宣傳雷鋒等問題，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我聽了感到十分新鮮和重要，認為應該整理出來發表。她說我找你來就是這個意思，你幫我整理吧。她又拿出幾件不同的領袖題字，說配合文章同時發表。原來那天老人家題寫時，一口氣連寫了好幾幅，只選出一張給了《中國青年》，其餘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這些題字別說都拿出來，就是只發其中一件，也會引起轟動的。但我深知這位“小姑奶奶”的用心及其目的，不想被她拖進這類事中，就對她說，發表這類文章特別是主席題字，不能是個人行為，最好有個宣傳單位出面，由組織和領導來處理此事，例如讓報刊記者來訪問你，你向他們介紹主席的談話，再出示不同題字，這就名正言順並不由個人負責了。她說這樣也好，又說你是《解放軍報》的人，就由軍報來訪問我吧，我說回去找報社同志說說，一位軍報名記者得知此事，大喜地說就由他去採訪三妹，她也很高興。其實我是將此事推了出去，無意為她去張揚招搖和招惹是非，不料後來還是牽扯到我。我為三妹辦了此事後，正好去南京出差，老軍長和二姐家就在南京，我就去拜望他們，哪知我剛進他們家，突然有我的電

話，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從北京給我打來的。

這位新任三妹夫，已經就任高級領導職務，後來又當上了中將，他為什麼要找我，又怎麼找到我的呢？原來我離京前曾告訴三妹，我將去南京並看望她二姐和姐夫，問她有什麼事不，她說沒有，但讓我到二姐家後，可以用軍線和她電話聯繫，我也沒什麼事要和她聯繫，她的新任老公卻用電話追蹤到我，說是有急事找我，從三妹處知道我來了南京又來到二姐家，恰好“逮”住了我。他找我什麼事呢？那位原首長大人在電話中急乎乎又氣乎乎地說我，你怎麼把三妹提供的，毛主席關於雷鋒的談話和題字插出去了？我忙說自己並未參與這事，是軍報記者聽說有此談話和題字，他們直接找了三妹，可能為此寫了訪問記，也可能準備發表，不過這是軍報領導決定的，與我沒有關係。那位首長嚴肅地說，這個訪問記決不能發表，我堅決不同意發表此文。我說這事你得給軍報領導說，跟我發火沒有用。他又講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嚴肅性等等，說是事關黨和國家領袖，決不能這樣隨便馬虎。我說反正這事與我無關，將其一推六二五，他只得把電話給掛了。

接此電話後，我一直納悶，在宣傳學雷鋒時，發表這個談話和題字，不是正好嗎，為什麼惹得那位首長如此惱火，要堅決反對和嚴格制止呢？並且把電話追到南京對我興師問罪地大發肝火，這到底因為什麼呢？我回北京以後問了三妹，她說自己新任老公已經通過軍報領導，將那記者寫好的訪問記，連原稿帶清樣，統統收走並且藏在他的保險櫃中，嚴令一字也不准外泄。我問三妹這是何苦呢？她苦笑著反問我，你說是為什麼呢？我這才猛然驚覺，如果訪問記發表，就等於將三妹與偉大領袖的特殊關係，從此大白於天下，她那“寵妃”身份也從此公之於眾，並且從此給那位首長，在將軍帽之外，再補戴上一頂“綠帽子”，他吃了偉大領袖的“剩飯”，以後還怎麼當官和做人？所以才氣急敗壞地嚴禁此文發表，並且堅決堵住包括我在內的可能洩露這一“機密”的各種渠道。只是這麼一來，也堵住了三妹藉此炫耀自己和揚名作秀的機會。好在我對此早有防範，估計到可能節外生枝，沒有被三妹拖進此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的新任老公卡住了

此事，幸虧我已脫身，不然我不僅將白費力氣，更將得罪那位首長，使我“吃不了兜著走”！

10、大首長也官迷心竅，找錯人又白費了勁

說起這位首長，以後與我還是發生了一些故事。他原是總政宣傳部長，我曾是他手下又手下的一個小幹部，記得我第一次見他時，竟鬧了一個小誤會，那是一九五八年底，我剛到總政宣傳部所屬的《解放軍戰士》社，有一回部裏開全體會議，我到晚了，坐到前排空著的位置上，旁邊已坐了一個“大尉”，我以為是部裏的幹事什麼的，就同他隨口說了什麼，一會兒會議開始，主持者說，現在請×部長講話，我身邊那“大尉”走了上去，並且講起話來，我大吃一驚地發現，自己少看了他領章上的一條杠，他是雙杠加四星，我卻把大校看成了“糖葫蘆”似的大尉，幸虧剛才沒同他說別的，不然必然冒犯這位頂頭上司。不久他又升為少將，我就對他更敬而遠之，在總政幾年幾乎從未與他再搭過話，他也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到我。想不到由於三妹的關係，我們又“狹路相逢”，走到了一起，並且似乎也成了朋友，於是就有了了後來的事。他當總政宣傳部長時，因為上層一些矛盾鬥爭，一度打了下去，他手下有個處長，卻乘機爬了上去，不僅成為宣傳部的副部長，到“文革”後竟與他成為同一單位的同級高級幹部。那位後來居上者，在一九八三年整黨時，被派到《解放軍報》來當代社長兼黨委書記，負責主持軍報的整黨工作。其實此人在“文革”中劣跡斑斑，跟林彪、江青和陳伯達之流幹過不少壞事，由這種人來領導軍報整黨，其結果可想而知，我就是他的“持不同政見者”之一，但是人們意見再多也奈何他不得，人家有權就有理，正圖借機爬上總政副主任高位。三妹的新任老公，當時正與他“競選”此職，知道我對此公不滿後，竟把我視為借用力量甚至同盟軍，特地找我去，向我提供了一批材料，說這位“代社長”怎麼怎麼壞，讓我們一起把他給拉下馬來。這批材料雖也過硬，但是此公自有後臺，我們

怎麼也攻不倒他，僅僅使他未能爬上總政高位，軍報整黨結束後，仍回原單位擔任原職，打破了他的黃粱美夢。一九八八年又和三妹她老公一起，同時晉升為中將，只是此公大概缺德太多，致使壽命不長，剛扛上新牌牌就因癌症一命嗚呼，三妹老公為此十分高興，因為閻王爺幫他清除一個競爭對手。這是我與這位首長的一段新的“戰鬥友誼”，接著又有了新的發展。

黨的“十三大”前夕即一九八七年夏，三妹和她的新任老公突然對我格外關心起來，我住在軍報院內一座六層樓上，他們夫婦二人竟乘機同來看我，使我受寵若驚感動不已；又有一次他們為我專程送來一些葡萄，說是剛從宣化帶回的，送點給我品嚐。我對此並未多往別處想，只以為是老首長看在我與三妹的老關係上，對我表示親切關懷而已，哪知其中卻大有文章。有一回這首長將我用專車接到他家，三妹那天不在家，家裏也沒有別人，就他和我二人在，我入座品茶時，他就對我說開了自己的“過五關斬六將”，特別說到他和某某中央領導人，原是平級戰友，某軍委領導還低於他，又表明自己對我軍政治工作如何有建樹、有創見、有雄心大志等等。當天和我共進午餐時，不僅菜肴豐盛並且規格頗高，簡直像招待國賓，使我大過了一通嘴癮，晚上又用專車把我送回家。我回來後，一直納悶，他與我如此深談並熱情接待，到底為了什麼？我只是一個小兵臘子，除了手裏一枝筆，別無所長和所能，他不曾是要我為他寫回憶錄，因為他們單位和自己手下，就有出色的筆桿子，用不著捨近求遠地找我，怎麼也想不透他為什麼和我談那番心。過了一段時間，有回又見到他，連忙同他招呼，他竟不答理我，我以為他是首長，也許正考慮大事，就沒往心裏去。在碰到三妹後，我請她替我問候那首長，她卻說你還是離他遠點兒，他對你十分不滿。我說自己從未得罪過他，他的不滿從何而來，三妹笑道，你以後就知道了。

可我直到很久以後才知道，那位首長所以對我“親切關懷”和“熱誠友好”，是為了討好和巴結我。他官比我大得多得多，巴結我這小巴臘子幹什麼，原來此公別有用心又用心良苦。當時我正為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已逝夫人編文集和寫傳記，有時就在楊

府上班，能夠面見楊副主席。三妹她老公又獲悉，我的老丈人正任“十三大”的“人事小組”成員，這個“組”雖“小”，聲望影響卻極大，負責對全國全黨包括全軍的高級幹部進行審核物色，擇優推薦為“十三大”的新中央領導班子，並為隨後召開的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提出人大、政協特別是國務院和軍委的領導名單，他們的提名由“十三大”通過後，新一代黨和國家以及軍隊領導人，就將一一就任登臺了。所以許多企圖高升的上層人士都力圖接近甚至打入這個“小組”。又有一小道消息說，我那老丈人將主持軍委工作，這將直接影響到包括三妹她老公在內的一批軍中高幹。這位首長正夢寐以求地謀求總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的高位，他以為只要先買通了我，就既可以向楊尚昆遞上話，更可以在我老丈人面前為他美言造勢，由我幾處給他打內堂做“托兒”，他這個總政主任或副主任的位置，就能如願到手了。他把我當成了政治賭盤中的一隻“骰子”，所以才對我“關愛有加”，不惜“禮賢下士”，對我又送葡萄又探望，又擺筵席又談心，特別對我大吹自己的“豐功偉績”，就是要我為他做個“傳聲筒”。哪知我這人極不開竅，白吃了，白喝了，又白聽了他一番又一番美食美言，卻如豬八戒吃人參果似的，食而不知其味，我在楊面前，除了文稿的事別的什麼也沒說過，我那老丈人回家，又絕口不提“人事小組”的事，我也根本不知有這麼個“小組”，至於說他將主持軍委工作，更是決不可能，並且我若真有什麼能量，自己不早就爬上去了，何苦只去為別人說什麼話“為人作嫁衣”呢？所以那首長想求我辦的事，我是什麼忙也沒幫，什麼話也沒說，使他對我的期望，特別是他自己的升官美夢，完全落空成為泡影，直到“十三大”早已結束，他也沒分到半杯殘羹，這才造成這位首長對我的嚴重不滿，因為我叫他瞎子點燈白費蠟了。

不過我弄清此事以後，對那位首長卻由原來的敬重改為不屑了，他幾十年前就是總政宣傳部長，是個專門教育別人、指導全軍、又專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幹部，然而其人格竟如此低劣卑下，為了謀求高位，竟不顧體面又不擇手段到如此地步，堂堂一個中將，居然拜倒也敗倒在我這小兵臘子面前！以前他是為借助三妹之力，不惜為她下廚

忙家務，借與她結婚達到自己目的，實際是向她賣身，後來又向我賣笑，等於是個毫無廉恥的娼妓，雖然他原是個一米七、八以上的漢子。這種人成為我黨我軍的高級幹部，並且是政工幹部，不只是黨的悲劇，更是軍隊的恥辱，黨和軍隊怎麼能用這種小人到臺上去呼么喝六呢？

11、三妹也好夢不長，面臨又一次婚變

那位首長之追求三妹，其實根本不是出於愛情，這種人心中可能從無所謂愛情，他當初看中的首先是三妹在上層的門路多與關係深，正好為他服務幫他升官。只是三妹哪是為別人效勞的人，她之所以與那首長結婚，也是以身作一賭注，預計他可能爬上去，後來雖然並未完全如願，卻也“屁股冒煙”有專車了，三妹總算也當上了高幹夫人。只是她這時官位也已不小，其胃口或野心也更大，就在她那第二任老公來巴結討好我時，她自己對我也格外親熱，一再對我柔情蜜意地，動員我也到她那一起去工作，希望與我並肩作戰。原來她也看中更看重了我為編《李伯釗文集》和寫作《李伯釗傳》，正與楊尚昆家“親密接觸”，就向我掏出了她心中的宏圖大略，這時她已是總參政治部的文化部長，卻正覬覦總政文化部長的高位，很想使自己“更上一層樓”。他說最好我能和她一塊幹，助她當上總政文化部長，我可以當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由我們兩個把全軍文藝工作管起來。我聞聽此言心中一驚，卻又未動聲色，她有如此官癮，我卻不屑相陪，但是當時我正被總參二部、三部所吸引，很想去開發那裏從未開發的創作“富礦”，並打算在總參創建一個創作室，就順水推舟地去了總參。去後才發現我想的太簡單了，由於種種原因，我的願望難以實現，就不太積極了。在與三妹直接相處共事中，我發現她其實志大才疏，她的幻想也是空中樓閣，絕無實現的可能，並且她根本不是這塊料，這些年她已不是當年的三妹，也已人老珠黃接近晚年了，本來我就無意與她合作，在總參呆了一陣，就悄悄退了下來。三妹本比我

小，卻比我早離休，五十五歲當年就下了台，她的官運也到此劃上了不圓的句號，一生的追求、奮鬥和拼搏，全都竹籃打水一場空！

就在三妹官場失利時，“後院”也起了火，她與她新任老公之間，又發生了嚴重問題。我開始不知道，有回在電話中偶爾問起那位首長，她竟立即破口大罵那“老傢伙”、“老混蛋”、“老流氓”等等。前已說過，她那第二任老公，對她其實並無真情，由於三妹自有公務，不常回那首長家住，有人就乘虛而入，為她老公送來了“溫暖”，那首長當然正中下懷。一來二去，三妹也風聞“第三者”插了足，有天她去那首長處，那個“第三者”知道她在家，又知道首長家電話聯機，竟打電話來找那首長，明知三妹正在“竊聽”，故意與法律上仍是三妹老公的首長，說了許多肉麻情話來氣她，等於公開向她的夫人地位提出了挑戰。三妹是何等之人，哪能嚥得下這口氣，對我在電話中臭罵那女的是“騷狐狸”、“臭婊子”、“臭不要臉”等等後，又向我嚴正宣佈，要堅決與那“老傢伙”離婚。他這一個電話打了至少一個小時，也痛罵了那對“狗男女”一個多小時，聽得我耳朵都木了，連握電話耳機的手都酸了，我只得勸她先消消氣，不要著急，不能生氣，等我們見面再細說。也就從那時起，我每次再見到三妹，她都只有一個話題，就是痛斥臭罵那“老流氓”、“臭婊子”和“狗男女”，並且是循環反復、無窮重複，使我耳朵都聽出了“繭子”，以致不敢再見到她。

三妹對其第二任老公，其實也無真情，他們這對夫妻只是在相互利用各下賭注而已，她對前任老公即我那“鐵哥們”畫家，倒是多少還有點舊情，加之共同扶養了一兒一女，各自總是有些“幸福的回憶”。他們離婚後兒子隨父、女兒隨母，父母又隨兒女經常一起會面重逢，這時不僅兒女高興，兩個大人也很愉快。這裏得補說一事，我那畫家朋友在三妹以前，有過一次婚史，女方是他在“新旅”時的戰友，後來是上海的著名舞蹈家，曾主演過舞劇及其影片，後來因為男在北京、女在上海，又都不能離開各自的“根據地”，兩地分居天長日久不免發生問題，兩人就好見好散分了手。三妹也是“新旅”戰友，她才與畫家結了婚。有一年畫家前妻來京演出，邀請了畫家

及其三妹各帶兒女出席觀看，看後還一起相聚交談，形成了以畫家為一方，前妻為一方，三妹為一方，加上其兒女，共為“三國四方”式的友好會見。三妹的哥哥也與前妻分了手，又在京成了個家，逢年過節三妹和女兒，畫家和兒子就相約都去孩子舅舅家會合，全家相見依然和美歡樂。由於我與他們的友誼，他們就都帶著兒女一齊到我家相聚，使我家成為這對離婚不斷情的前任夫婦幽會之處。只是所有這些話題，都對三妹那新任老公嚴格保密。不過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那位首長還是偵知了三妹的不軌行為，後來他們打離婚時，這也成了男方控告女方的一條罪狀。

那位首長見三妹的利用或使用價值已盡，特別是自己又有了新歡，加之三妹為此一鬧，他們就打開了離婚戰，這確是一場帶打的“大戰”，還是“你死我活”的“持久戰”，使三妹打得極其狼狽。男方畢竟是有豐富戰鬥經驗的大首長，他很快掌握了這場“戰爭”的主動權，使三妹一直處於不利地位。在他的離婚起訴書中，反而抓住了女方一個把柄，除了說她與其前夫經常私通幽會外，又說她在某年某月某日曾在家留宿了一個中年男性氣功師，並且為此提供了人證，即那首長的秘書、公務員、炊事員等等，三妹反訴男方也有“第三者”時，卻拿不出任何證據，男方因此總是佔著上風，氣得三妹暴跳如雷卻又無計可施。提到那個氣功師，我也稍知一、二，三妹和她二姐有一段時間竟都迷上了氣功，就在我上次去南京二姐家時，一見她只覺面目一新，已大大減了肥，變得更年輕了，她說這是學氣功的結果，還讓我看了她練氣功、特別是其師傅發功時的照片和錄相帶。還真有點神奇，那氣功師頭上居然有著閃亮的“聖光”，他用手一劃拉，又留下一個如虹光圈，還在背景天幕上映現出他的高大形象，二姐更以自己的減肥奇效，證實了這位氣功大師的神功。這位師傅就是三妹引薦給她的，三妹自己早已從他那兒學得了不少功夫，據說她在洛陽隨師傅練“辟谷”，曾連續兩、三個星期粒米不進，根本不吃飯還照常活動。這位氣功大師她不僅向二姐推薦了，還讓他對老首長楊得志將軍發過功，我也看了二妹和楊將軍練氣功的照片，那老將軍頭上果然也有一個光圈，使我驚歎不已。三妹說她還練了種“香功”，

說是發功後能發出桂花或茉莉等的香味，有回她用雙手揉搓一通後讓我聞，問我聞到了什麼味。可我這人一向“頑固”，從來不信鬼不信神也不信什麼氣功，吸起鼻子聞了又聞，除了她自己的味道，別的什麼也聞不出，氣得三妹罵我真是個木頭。不過她們姐妹二人都練過氣功，三妹幾乎已成“半仙之體”，她的氣功師傅確曾在她家住過，這些都是事實。

三妹向我說起這事時，臭罵那個“老混蛋”首長，夥同自己手下的人共同對她栽贓陷害，誣蔑她與氣功師有什麼不正當關係。她說那氣功師與二姐和她隔著一個輩分，他才三、四十歲，二姐和她已五、六十歲了，那師傅平時都叫她們阿姨，兩輩人怎麼能有什麼事？我聽了卻在心裏想道，當今社會上什麼事都有，不是一輩人甚至是同宗者，一起胡來和上床的事不少，隔輩並非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不是同姓同宗的人就更難說了。當然這話我只能暗自想著，絕對不能說出口，更不能幫著三妹的“敵人”說話。三妹這場官司打得很久，搞得她筋疲力盡又幾乎“身敗名裂”，她二姐和我們對此都愛莫能助，只能從旁給予感情支持，也痛罵那“老混蛋”幾句。也就在此期間，她才向我說出了那位首長突然巴結討好我的真相，還給我看那首長當時給她的一封信，其中囑她一定要同我搞好關係，不斷緊密聯繫，爭取我能幫他在楊尚昆和我老丈人面前說話，為他在上層活動，使其能當上總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我看了只覺可笑，原來自己還有這麼大的利用價值，可惜我卻什麼作用也沒起到，那位首長不揣對我卑恭屈節，卻什麼也沒撈到，白白費了許多勁。三妹又告訴我，她“競選”總政文化部長之事，也是被那“老傢伙”搞黃的，他說自己正“競選”總政主任或副主任，三妹如也當上總政文化部長，夫婦二人就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上頭肯定通不過，只能確保一方，要三妹服從“大局”，犧牲自己讓他先上。所以三妹說，不是那“老混蛋”搗亂，她完全可以“更上一層樓”，可惜大好機會白白斷送了，不過那個首長的目的也未達到。我聽了在心裏暗道，常言道“一山難容二虎”，他們一家怎能同時出一男一女兩個野心家呢？其結果自然要發生火併導致兩敗俱傷。命中註定，他們這對“政治夫妻”，肯定不能白頭偕

老，卻沒想到最後竟是這樣互相撕破臉皮，以致鬧得不共戴天！好在這時我只一旁觀戰，並未被捲入其中。不過我在另一件事上卻為三妹出了大力，只是最後也沒成功，就如她想當總政文化部長一樣，也落得個黃粱美夢一場空，反而為人留下了笑柄。這事發生在一九八八年，全軍第二次評銜授銜前後。

12、美夢難圓，又一好事也功虧一簣

按照當年的評銜條例，凡是抗戰時期參軍的師職幹部，都可以授予將軍軍銜，三妹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即抗戰勝利前個把月時到部隊的，現在又是正師職務，完全合乎當少將的條件。只是她當時年紀太小，不知咋搞的將參軍時間一直填為一九四七年，這就過了槓槓，會失去當將軍的機會。她就特地找我商量，怎麼把她的參軍時間改正過來，我根據以往經驗，說只要能找到她何年何月參軍的證明人，證實她確是一個“抗戰幹部”，還是可以當上將軍的。她當初是母親犧牲以後，於一九四五年七月被人送到新四軍四師，因為才八、九歲，就被放在師部拂曉劇團，她二姐也正在團裏，可以照顧她這三妹。一九四七年初他們被併入華東軍區文工團，她卻把那時當成了入伍時間。到八十年代原新四軍四師的老同志還有不少人在，她就去找了一些同志為她寫了證明，我又為她找到原四師宣傳部長，後來的《解放軍報》總編輯趙易亞，作為當年拂曉劇團的直屬領導，為她作了更有份量的證明。各種證明湊齊以後，她說還可以找一個更權威的證明，就是原新四軍四師張愛萍師長，老師長也真的為她作了親筆批示，哪知這位老領導對其老部下關心過度，反而為她幫了個倒忙。原來他批示道：我記得你到部隊的時間更早，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和父母一起到四師來了，因此你的參軍時間應該從一九三九年算起。張老將軍的記憶一點不錯，三妹的父母確於一九三九年到部隊，當時確曾帶著三妹，只是那時她才兩歲，是由父母抱著來的，後來父母又奉命回地方，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卻不幸暴露，母親犧牲了，當年即一九四五

年七月，她作為烈士遺孤被送來部隊，老師長一直記得這事。但是張老將軍把她的參軍時間提到更早的一九三九年，反而造成了一個軍中笑話，某某人才兩歲，還抱在大人手裏就算作革命歷史了！於是這位只有兩歲的“將軍”，也就吹了！三妹白折騰了一番，最後又是雞飛蛋打一場空，反而為人提供了一個笑柄。其實這事不能怪她，她確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參軍的，當時她已九歲，雖然只跟在劇團後頭，卻是個真正的紅小鬼出身的抗日幹部，可惜這一切最後因為她又去找老師長，反而把此好事給攪黃了，連我都為她深深感到遺憾。

從三妹與我的交往看來，她對我還是不錯的，她個人凡有大事要事，必來找我商討策劃，我也幫她出過不少主意，甚至捉刀代筆為她起草過文稿信函之類，不過我心裏一直很有數，我在她眼裏只是個可以利用或使用者之一，甚至是她的臨時候補親信之一，所以她需要你時似乎十分親密，反之則扔在一邊，你要也有什麼事，她是不會也不想管的，凡是與她相處過的人，對此似乎都深有體會，所以我從不找她為我辦什麼事，雖然她確有相當能量以至“魅力”，以致不少大官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是出於我與她一家特別是與其二姐的長期友誼，我還是樂意為她們效勞的，不過有時我也有反抗。例如後來我也到了總參，與她共事辦公時，要討論什麼文件，她懶得自己一字字看，就嗲兮兮又嬌滴滴地對我說，你給我唸唸吧！我卻把文件朝她一推道，憑什麼讓我給你唸？我年齡比你大，資格也比你老，不是你手下的小幹事，你更不是偉大領袖，要別人為你唸文件，還是自己去看吧，她只得橫我一眼，笑笑拉倒。有時我們一起參加什麼活動，每逢集體合影留念，她當仁不讓和一些高級首長在前排中間就座，從來不招呼我也應該坐過去，我就無所謂地站到後排，又常故意避開不參加照相，不想與她平起平坐，更不想跟她爭點什麼，只是在辦事時是認真的，真心實意地願助她一臂之力。

其實我一直很明白。儘管三妹似乎很得意很風光，雄心（更是野性）也很大，她曾大言不慚地對我說，別人能上，我為什麼不能，老娘(!)不比別人差！又沾沾自喜地說，有人說我是“柴契爾夫人”，我就是個“鐵娘子”。但我心裏卻認為，你算了吧，別“癩竇爬秤盤，

自稱自”了，你有多大能耐，多高水準，別人不知道，我還不知底嗎？你為爭這麼點功名利祿，天天勾心鬥角，使出渾身解數，活得累不累呀？而且我也早已看出，她從仕途上到個人生活中，其實也都不順，凡事都不稱心，且不說她結了婚又離婚，離了又再結，現在又要離，並且在法庭上當眾“大打出手”，誰受得了這個呢？她最後的最高職務，也就是個總參文化部長，與我同級的正師幹部，可我是論資排輩自然到手的，她卻是拼拼殺殺擠擠撞撞爭來的，又眼看著別的資歷不如她，年齡也比她小的人，呼呼地跑到她前頭，爬到她上頭，她怎麼也於心不甘，吃不著葡萄從不說葡萄是酸的，但從心裏到眼裏無不充滿了醋意。我常常見她眼圈總是泛黑，面色也較蒼白，雖然她不缺營養，也不少化妝，但卻過於勞累特別是心理負擔太重了，她爭來的這個官，還有什麼“女子軍樂團名譽團長”之類虛名，付出的卻是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力以及生活的樂趣，別人是有失有得，她卻是得不償失，甚至賠了老本，直到老了也一無所得。所以和她在一起時，常聽人吹捧她說她好話，我卻總是暗暗地同情、惋惜並體諒著她，誰叫我是她們姐妹的多年老友呢？

13、美麗多情的二姐，晚景淒涼的命運

說起她們姐妹，三妹那二姐更是個悲劇人物。她因有出眾之美，就成了首長夫人，不幸也就由此開始，先失去了自己多才也多情的戀人，也失去了可貴的青春，得到的卻是無情無愛的虛浮生活及其虛名。上文已說過，她和自己的早年戀人幽會過，又被偉大領袖“寵幸”過，在丈夫即我那老軍長眼裏，早已是個自身對他不忠不潔之人，加之看透玩膩又人老珠黃，已經對她失去了興趣。而且這位首長，為人一直很“花”，經常拈花惹草，六十年代已經升到上海警備區副司令，有一回緊張備戰時，竟找不到這位首長，後來查出他出去找女人跳舞了，為此他丟了到手的副兵團級待遇，被貶到安徽省軍區當了個第幾政委，他在解放初期就是軍長，同級的幹部以及自己的下

級，都已一一升了上去，他不僅原地不動，實際上還下降了，他是為了美人丟了“江山”。可能正是為此，他常毆打已不再是美人的老婆出氣，家庭生活長期不和，後來從安徽平調到江蘇，又當了幾年的省軍區第幾政委，最後又從南京軍區顧問虛位上退了下來，無官一身輕了，他索性自由自在地連家也不回，不斷在各地遊蕩，回到南京也住進軍區醫院，就是不回自家，把他老婆即二姐晾在一邊，甚至把自己的警衛員、公務員和炊事員等等，都弄出來只為他服務，不管不顧也根本不理自己夫人的生活以至生死，從精神上孤立以至折磨妻子。這使二姐極其苦惱，有一年她到北京來，向我哭訴了我那老首長對她多年的摧殘虐待，她說自己早已無法忍受了，打定主意也要離婚。

我認真聽取了她的控訴，努力安慰了她，又和別的熟悉她的戰友商量的，一致認為她如真的離婚，可能反而得不償失，她幾十年過慣了首長夫人生活，一旦退出豪門，失去優厚待遇，生活將一落千丈，她已進入晚年，這日子過得下去嗎？別人也勸她還是別離婚，真離了你什麼都沒有了，不離至少還有個名分，該什麼待遇有什麼待遇，除了老頭子，別人也不能怎麼著她，她就是不離婚，又可以乾耗著老頭子，不然說不定等於她自己給別人主動讓位，老頭子馬上名正言順地再娶個比她更年輕的，自己是白白地幫別人忙了。我們不少人都這樣勸她，她聽聽也覺有理，默默地接受了。我記不得因為什麼，二姐這次來京沒有住在三妹家，卻住到一個戰友家裏，我那時正因後妻很少到我這來，家裏就我一人，就請她住到我這來，她看了看我那光棍漢似的家，遲疑地說，孤男寡女的，就我們兩個，住在一起行嗎？我這才想起，自己一直真把她當姐姐了，其實她比我大不多點，並且風姿猶存，我又一貫很欣賞她，是應該避避嫌，不然就說不清楚了。

二姐自家說來真是不幸，還在安徽時，家裏沒有暖氣，冬天洗澡時，在浴室生了個木炭火盆，一個女兒洗著洗著，就被煤氣熏死了，當時才十多歲，使二姐十分傷心。有個兒子長大了，老軍長走後門讓他參了軍，還是坦克兵，那小子不知為什麼忽然攜槍逃跑了，據說偷越國界時被抓住，作為“帶槍叛逃者”，被判了徒刑，老軍長再走後門，將他提前釋放，因為是個刑期未滿的犯人，哪里也不肯接收他，

只得長期東遊西蕩鬼混著，有時住到北京三姨家來，也常到我家來，所以有一戰友在我家當我的面，說你爸是先把你媽給強姦了，然後才結婚有了你們。這一兒一女的厄運，當然使當媽的二姐心力交瘁痛苦不堪。雖然還有孩子，但都只躺在老爸樹下乘涼，對這老媽不大在乎。後來我們那老軍長去世了，我到南京去看望了已成遺孀的二姐，使我大為意外的是，她才剛到古稀之年，卻已衰老得慘不忍睹，整個人全變了形，說是中了風，嘴角不斷流著口水，話都說不清楚了，手還抖抖索索地，兒女都飛走了，家裏整天就她一個人呆著，一邊開著電視，一邊閉眼歪在沙發上，整個一副等死的架勢！且不說她當年出眾的美貌，就是若干年前她練氣功時的樣子，竟都毫無痕跡了！當年的美人，我們親愛的二姐，上哪兒去了？我見她時心痛極了，以後再去南京，明知她很孤獨，需要人關心幫助，我卻不敢再去看她，只在心裏時時惦念著她，想像著她現在的慘像，每逢看到見過她的人，都仔細打聽她的詳情近況。也就在這以後，又引發了一個不圓滿的故事。

我們老部隊另一老首長，即原二十三軍陳政委，妻子病故後，也正離休在家，他們只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孫子，兒媳離婚跑掉了，全家只剩老中小三根光棍，兒子上班孫子上學後，家裏就老政委一人呆著，他家是個獨院，一座小樓首長住，警衛員、公務員、炊事員和司機等等住在外圍平房裏，整個樓裏上上下下就他一個老頭子，雖然在位時家裏賓客不斷，退下來後卻門可羅雀，老政委年年月月和天天獨守孤電視，寂寞無聊簡直把他給憋死了。他才八十多歲，其兒子最早提出，給老爸重找個老伴，好有人陪陪他，托許多老同志幫忙物色，也找過我。我離休後與三妹住在一個幹休所的大院裏，有次我向她談起此事，她一聽就說，把我二姐介紹給他不好嗎？我覺得倒是可以，老軍長不在了，老政委夫人也不在了，兩家大人孩子早就相熟，正好合為一家。只是有個問題，這兩家一直不和，當年在老部隊時，軍長政委就有矛盾，先後都到江蘇省軍區，分任第二、第三政委，卻又不斷鬧整扭，我就親耳聽二姐罵老政委之妻“地主婆”，因為她出身不好；老政委老伴又向我嘮叨老軍長，說“這老傢伙愛整人”。我想現

在“地主婆”和“老傢伙”都不在了，留下的恩怨也該消解了，便把三妹的意思轉告了老政委，同時又想，現在二姐的健康狀況還不如老政委，連陪他說話的本事都沒有，加之兩家有著歷史恩怨，很可能老政委不幹。哪知我說後老政委竟有興趣，馬上親自去看了二姐，倒是二姐不予考慮，她不想老成這樣還要改嫁，寧願一人呆在自家，這件好事就沒撮合成。

誰知半腰又“殺”出一個“程咬金”，二姐和三妹有個異母小妹，這時才五十多歲，不知怎麼也是獨身，聽說此事後主動跑到老政委家，自薦上門願當填房來陪老政委。她到後就樓上樓下巡視一番，說自己還要帶幾個孩子過來，以後這住房將如何分配，她的人得佔多少，又囑咐老政委兒子道，你們得給我買多少人壽保險，並且從現在起就用專車接送他們來往。老政委之子聽了暗道，這“小姑奶奶”這麼厲害，還沒進門就要獨掌大權了，真要來了誰受得了？父子孫三人一致決定，決不接受這個“小姑奶奶”。這使老政委至今還是一人呆著，現在已經九十多歲了，我有次去南京再看他時，見他已養了條狗，雖然不會說話，卻整天陪著老人，一旦來了客人，那狗就連叫帶跳撒開歡，那老政委比小狗還高興，說我到南京怎麼不住他這來，不只有地方住，外出還有專車，其實還可以陪陪他，使這家裏有點人氣。可惜我不能常來南京，來了也自有住處。我一度參與的由三妹引起的老政委與二姐以及她們異母小妹的故事，也就不了了之沒有了尾聲。可是二姐呢，雖然早年青春美麗，後來又雍容華貴，過了幾十年首長夫人的生活，晚景卻極其淒涼，我看她之所以迅速衰老，全是由於她過得很不幸福、不愉快、不正常，這才造成她如今的慘像！

14、折騰一生最後卻成了“孤家寡人”

其實三妹的晚景並不比她二姐好，在她與第二任老公打離婚的同時，已經發現了淋巴癌等多種病變，以後的日子不是住在醫院，就是出來打官司，離婚官司已使她焦頭爛額，其癌細胞也迅速轉移並日

益擴散了，也許是心病引起了身病，或是身病加重了心病，使她五內俱焚，以致加速了自己生命的終結。不過三妹從來不是一個自甘寂寞的人，不肯放過任何一個使自己揚名出風頭的機會，她離休以後竟又籌建開了幾個什麼中華民族團結友好協會、中國婦女文化促進會特別是什麼毛澤東文化藝術研究會和毛澤東書法研究會，並且都自任會長，一面煞有介事忙忙叨叨，一面拖著病軀東奔西走。在她最後幾年居然也辦成了一件大事，不知她從什麼時候起，揣摩仿寫開了毛澤東書法，還寫出了一大堆，又為此辦了個展覽。我對此一直不以為然，曾說她是個沒有文化的文化部長，連中國字都認不全，哪能懂得什麼書法，還辦什麼書法展覽，就沒有關心這事，也沒有去看她的書法展覽，只從小報上看到有關的消息。還見到有篇吹捧文章寫道：“毛體”書法在中國只有兩個人得其真傳，且都是女性，一個是江青，一個是李×，很顯然，這與毛澤東的親傳是分不開的。這話說得既含蓄又露骨，就欠贊她也是毛的又一個“第一夫人”了。有的看過這一展覽的人，說展覽的作者介紹中，將她寫成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知道內情者就說，她確是在毛主席“身邊”，只是到底幹什麼“工作”，就不好說了。由她自任“會長”的“毛體書法”研究會，任命她二姐那個無業兒子為“秘書長”，在姨、侄二人到處活動和張羅操辦下，這個展覽除在北京展出，又先後辦到了南京、徐州、濟南甚至廣州等地，不只使她又大過了一把出風頭癮，更以此炫耀了她與偉大領袖的不一般關係。我雖然不懂書法，只看過她幾件作品，感到也僅僅是形似而已，要達到老人家書法的奔放俊逸和揮灑自如，又談何容易，她不僅沒有這個功力，也根本沒有這個功夫，這時她既要治病又要打官司，哪里還有多少精力時間呢？不過這事確成了她此生最後一個輝煌，雖然大大風光了一陣，卻又大大加速了自己生命的終結。

我離休後同三妹同住在幹休所一個大院裏，但她比我早進許多年，據說她住進來後，早晨參加院內老幹部舞劍等活動，她總是帶著小保姆為她抱著劍來，人們就說她是個帶“丫環”的女“貴族”，其實她早已既不“貴”更無“族”，只是一個不甘沉淪的離休幹部，並

在努力撐著一幅虛空的架子。有次我和妻子一起去拜訪她，又邀請她也來我家坐坐，我們三人是漫步來我家的，她坐了一會竟打電話回去，讓其女婿開車來接她回家，其實從我家到她家，至多只有二、三百米遠，可她就要擺這個譜，但也可能由於身體損耗太多，體力確已不支，實在走不了這點路了。此前我每次見她，都聽她沒完沒了地罵那“老流氓”、“老混蛋”，就如祥林嫂見人就說她的毛毛一樣，不免有點厭煩，也就很少上她家去。後來大院裏通報了一事，說她家被盜了，並且損失不小，我見到她問了此事，她懊喪地說，是有人請她出去吃飯時，不在意沒鎖好門，被賊鑽了空子，進去後把門從裏面鎖上，她回來時發現家裏有人，卻打不開門，好容易進了家，那賊已從窗戶逃跑了。後來檢查只丟了一些現款和存單、首飾之類，總共約有五、六萬元，她說自己多年的積蓄全完了！我卻慶幸她那批無價國寶文物，沒有被人發現更未丟失，也許是那賊人根本不識貨。她最後幾年內，二姐的兒子即她的“秘書長”常住她家，她在總參三部的女兒也和其女婿常回家住，另有小保姆伺候著，只是在院裏幾乎從不見她，也不再參加幹休所的各種活動，不是在住院，就是又出去辦書法展了。我妻子有一次看到她，見她瘦得已經變了形，哪知她竟很快“走”了！

二〇〇三年七月，我接到關於她病逝的電話，馬上去了她家，見她女兒在，精神極其頹喪，真是已喪考妣了。她是七月八日“走”的，享年只六十六歲，如今常說“八十、九十不稀奇，七十才是小弟弟”，三妹還不到“小弟弟”的歲數，就壽限已盡了！我安慰了她女兒，問她有什麼後事我可以幫著辦，她說已有幹休所在辦了。到告別儀式時，我和妻都去了，她的前夫、我的“鐵哥們”也到了，只是守在遺體旁她的親屬只有女兒一個，她前夫說女兒、女婿已經離婚，兩人又沒有孩子，兒子是由母親安排到深圳工作的，早已下了海，由於父母離異，一直未再回家，與父母也無聯繫，近年竟完全失蹤了，任何電話、位址都沒有，他母親去世了，竟通知不到他，這使守靈者只剩女兒一人。已離婚的前女婿看了於心不忍，主動上去陪其前妻一起站著，他要拉我的“鐵哥們”一起去，說是他們二人的身分其實是一

樣的。這位前夫卻不幹，說我站那兒算什麼？二姐在南京又在病中，自然來不了，哥哥正在上海沒能趕來，大姐倒在北京，也因多病沒有來，不知為什麼連二姐的兒子，即三妹的“秘書長”也沒到，這使多年風光的三妹，最後竟成為個“孤家寡人”，從逝前到身後，都報其孤獨淒涼，她的一生“功名”以至“輝煌”，從此灰飛煙滅毫無蹤影了！

告別儀式以後，我拉三妹的前夫，即我“鐵哥們”同來我家，想讓她就便去看看他們共同的女兒，但他沒有去，只和我商討怎麼處理三妹收藏的那批國寶級珍貴文物，我們一致認為決不能繼續放在家裏，因為她家只剩了女兒一人，孤門獨女，什麼事都會發生，最好存到銀行保險櫃中去，但也只能向其女兒建議，因為決定權在她。我那“鐵哥們”當天沒有去看他女兒，晚上仍回了自家，說是回去再給女兒電話，看來他們父女感情已很淡薄。他和三妹共同的兒子更是如此，竟多年不知音訊。再補充一點，他們這兒子小名為“小東”，似是三妹自起的。也許含有“小毛澤東”之意，不過他長相並不像偉大領袖，與其妹妹一樣，只像生母三妹，尤其是其特白的膚色。女兒由於家庭生活一直不正常，性格似乎有點孤僻，據說她早已轉業，也不知她在幹什麼。三妹這一家，已是四分五裂完全解體了，這又幾乎全是三妹自己折騰的結果。

15、如此一生，過得值嗎？

以上所記大都出自本人記憶，其中當然也並非事事親歷親見，有的也是聽說的，特別是關於三妹、二姐和偉大領袖的事，不過這也有書為證，如《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版第342至343頁，第346至348頁，就有關於“毛另一個‘女友’是鐵道兵政治部文工團團員”的記載，書中寫到的事我又另有旁證，決不敢對她們更不敢對偉大領袖“造謠誣蔑”。不過在一份小報上卻登了另一說法，有篇短文竟說因為三妹是烈士的女兒，毛主席在“親切接見”她時（不是在伴

輝時）說：“楊開慧是烈士，你母親也是烈士，你姓李，我也姓（過）李，你就做我們的女兒吧！”並且將她與毛的兩個親生女兒李敏、李訥相並提。但是文中對於她和毛“父女”間的那種事卻一字未提（事實上凡在國內未公開發表的，都一律不能也不准提），只講了毛如何關心幫助她，讓她好好讀書學文化，還幾次“資助”她寄錢給自己的父親等等，這些事我的“鐵哥們”，她的前夫也可作證。此文又把三妹吹成“共和國軍內外第一位女部長”，並在《國際名人錄》上被譽為“英雄氣概美人風度”的“東方才女”，此說肯定是誇張虛浮不實之詞，因為這種“名人錄”中的文字，都是由“名人”自己提供甚至自己寫的，其“名人”資格花些錢就能買到，因此小報上那篇短文的素材，看來也是三妹自己提供的，看來她自己一直追求、迷戀和陶醉於這種“美譽”。

大概也就因為三妹當了這種“名人”，二〇〇四年三月，她的老家江蘇邳縣派人來到北京，說是縣裏正在籌建“名人館”，三妹已名列其中，特來搜集她的資料及其文物。來人也找到了我，我應約介紹了她的部分可以公開的情況，也介紹了她的二姐和哥哥的簡要情況，又建議他們好好搜集瞭解關於她們烈士母親的事蹟和史料，據我所知，三妹的父母一九三九年來到新四軍後，又被派到敵佔區去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被叛徒出賣而壯烈犧牲，三妹這才被送到部隊並長大成人。我認為應該大力宣揚這樣的革命先烈，但是來人對此似乎並無興趣，原因是其母不是名人，更沒當過什麼“長”，他們只注重三妹這樣的所謂“共和國第一女部長”。我對此也只能搖頭嘆惜，我知道三妹是挺有“名”，不過只是因為她曾“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而這個“工作”偏偏是說不清道不明上不了臺面更見不得人的，所以對她的介紹只能“掩其一點，只吹其餘”，這種半假不真的粉飾改扮出的“名人”，不知有何值得崇敬之處？

到我寫作此文時，三妹已經“走”了一年多，她的二姐、大姐和哥哥雖已不“健”卻還仍“在”，倒是被三妹“休”了的前夫，即我的“鐵哥們”畫家，活得十分健康甚至自得其樂，他離開三妹後，一直埋頭作畫，因為沒有再婚，兒子又不在身邊，一人獨往獨來，過

得倒也瀟灑，因為此文涉及他和三妹等人的隱私，我只得一律不提本名，只述其事，以保留我黨我軍我國的這段“歷史的真實”。文中寫到的各位，各自都有過一段輝煌，如今卻早已成為過去，一切都已劃了句號。三妹晚年雖不如願，卻也撈到點虛名，又位列縣裏的“名人館”，還上過什麼“名人錄”，大概也可“死而瞑目”了。只是我在回顧她和其二姐等的一生時，心中便充滿了惆悵與惋惜，他們這樣度過一生，值嗎？

（二〇〇四年八月六日——十三日草於北戴河，廿四日——廿九日抄改於北京）



圖為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副主席、江青同志在天安門上接見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武漢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將時的合影。
這是作者手邊唯一有“三妹”的照片，右起第三人（林彪左手邊）為“三妹”——作者注

《紅色佳人淚》補遺

寫完李氏姐妹的事，還覺意猶未盡，因為除了三妹之外，我還認識或見過別的“紅色佳人”或“領袖寵妃”。其中之一是我原來所在軍分區司令員的女兒，她在空軍文工團舞蹈隊時，顯然也由於去中南海跳舞，結識了偉大領袖，後來也到了老人家“帳下”，並多次伴“君”隨“駕”去外地，據說其任務職責是為偉大領袖讀讀文件，主要是文藝資訊，所以這位女舞蹈演員自稱是老人家的“文藝秘書”，至於她當時還執行過什麼別的任务，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我瞭解到此事後，曾想道：她與老人家交往時，三妹當時也正在領袖身邊，她們二人為什麼沒有“撞車”，更沒有發生衝突，原因何在？

後來讀到寫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回憶文章後，才忽然想通了，老人家是偉大的軍事家，自能“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早已“調兵遣將”安排妥當，不使二人同時到他身邊，能把二人都培養成“寵妃”，卻能互不干擾，可見偉大領袖“戰略戰術”之精妙。至於在她們二人之外。老人家還有多少“寵妃”，怎麼排著隊——享受“皇恩”，在“私人醫生回憶錄”中已有披露，說明偉大領袖確是“日理萬姬”，並能“連續戰鬥”，即在一個戰鬥之後接著再打幾“炮”。使各路“部隊”都在他的調遣之下，實現著自己的“戰略意圖”。難怪有個“寵妃”在被“寵幸”之後，忍不住讚歎道：偉大領袖真是偉大，並且什麼都偉大，連那個都特偉大……！我還記得三妹對我說過一段絕密的“最高指示”，即老人家認為現在的婚姻制度並不好，應該實行一種“合同制”，即男女有意後，只訂一年的“合同”，第二年還有意就再續一年，反之則拉倒，免得離婚吵架惹麻煩。看來偉大領袖已在“試行”自己的“理想”了，不過他連“合

同”也沒訂，即使有，一年也不止訂一份，他在這方面確已切身實踐並已達到了“自由王國”的境界。

上述那位空軍女舞蹈演員，在“吾皇駕崩”之後，無君可伴也不想再跳舞了，通過她爸的老上級粟裕，找到正任總參副總長兼二部部長的我老丈人，由他安插到二部去做什麼外事工作，後來不知怎麼又到了南京空軍文工團搞創作，只是不知搞出了什麼創作。就在這時，她和我們在九江至武漢的江輪上相遇了，她和我老丈人本來認識，就隨我們一起進了武漢東湖領袖別墅“百花一號”，她說自己跟偉大領袖也曾住過這裏。幾年以後不知怎麼她又去了香港，並且甩掉她已婚的老公——南京軍區一個副司令的公子，獨自闖天下去了。一段時間後又聽說她在香港混不下去，一度生活無著，卻又聲言要寫一部“中南海宮廷秘事”，將交給臺灣出版。國內聞訊立即由安全部門把她給逮了回來並圍了起來，以防“黨和國家機密”被她洩露出去。但是在港臺有的雜誌上，還是登出了她透露的一些“宮廷秘事”，因此確為黨紀國法所不容，逮她圍她也理所當然。有一年我遇到她在南京的父母，問他們這個女兒現在哪里，他們說只知道在國內，卻不知道圈在什麼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私人醫生回憶錄”中，列述了若干“寵妃”，這一確有其人並且可能至今還在的一位，偏偏一字未提。可見那書中所述，仍有“漏網之魚”，而“漏網”者未必就她一個。我的朋友三妹自以為獨得領袖的“親傳”，因而常常不知自己算老幾，其實她只是眾“妃”之一，在那本回憶錄中又只寫其事，未提其名，能名列“經傳”者卻另有其人，她只算個“等外品”，空軍文工團那位更是提都未提，又不知後來被打入何處“冷宮”，甚至一直不知死活，即使在世，可能也正面對孤燈苦度餘生。她和三妹等人，以自己一度的美好青春，換來如此一生，過得都算值嗎？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補記)

毛澤東親家——張文秋之“家”

人們都知道，張文秋的两个女兒分別嫁給了毛澤東的两个兒子，也知道她這兩個女兒分屬兩位生身父親，卻未必知道她除了先後有過兩位真正的丈夫，還曾有四位戰友當過她的假丈夫，又有過一位雖已過門卻未成親的未婚丈夫，他們連真帶假共有過七位丈夫和“丈夫”，其中多數早已犧牲未能倖存，有的與張文秋的“共同生活”又極其匆促短暫。但是他們每個人都給張文秋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有的更為她留下了無窮的思念和終生的憾恨！

這裏我將張文秋與她這些真假丈夫們的故事，按時間先後依次說來。但願讀者能從中瞭解到，像張文秋這樣的一代女性，在中國革命中，有過多麼奇特的經歷，經過多麼慘痛的遭遇，受過多麼沉重的打擊，又付出了多麼巨大的犧牲！

一、徐大戶搶親逼婚 張國蘭大鬧新房

張文秋原是湖北省京山縣一戶退職官紳家的三小姐，小名前珍，學名國蘭，現名是以後起的。她出生滿月時，就由父親作主，與本縣首富徐家少爺定了親。徐少爺大號澤民，卻自小不思上進，恃仗家中



毛澤東與其岳母張文秋（前左）等，1980年代攝

有錢有勢，熱衷於吃喝嫖賭抽（鴉片），一二十歲了，斗大的字還不識半升。張小姐卻走了另一條路，十五歲就進了武漢女子師範。

當時正是中國革命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張國蘭在武漢女師時，其老師就是我國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的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董必武、陳潭秋，他們潤物細無聲地把革命思想傳播給了包括這位張家三小姐在內的學生，引導她們閱讀進步書籍和開始參加革命活動。在此期間，張國蘭又陸續結識了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實等青年革命家。當五·四運動新潮湧到武漢時，決心不再當“豪紳小姐”的張國蘭，已經成為學生遊行隊伍中一名慷慨激昂的少女鬥士，接著又成為校中“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成員之一，多年的父訓家教以至幾千年的封建陳規，再也鎮不住這位當年的“小姐”了。

她在武漢的“過激行為”，引起了京山那個“婆家”的注意，他們不能聽任這個沒過門的兒媳成為“亂黨”，決定為其少爺提前成婚。正向封建傳統衝擊的張國蘭當然不肯就範，她的父親當時已經去世，母親出於愛女之心，向“親家”提出，女兒正在求學，不宜馬上結婚，商求畢業以後再說。徐家回話說，此女已是徐門之人，如今在

外拋頭露面，有辱豪門家風，限令立即退學，回鄉完婚大吉。國蘭的母親已知徐家之子極不成器，又傳話過去道，我家女兒有才有識，豈能下嫁一個目不識丁的浪子？徐家聞言察覺張家有悔婚之意，便勾結官府誣告張家一女二聘，藉口女兒在外上學，實已另行許配他人。徐、張兩家對簿公堂後，張家也不示弱，反告徐家誣職造謠，企圖仗勢逼婚。這場官司一下子驚動了社會各界，人們大都同情張家，一些有識之士和頭面人物也出來主持公道，官府只得順應公論，公開宣判為：“張國蘭有志求學，堪可嘉勉……可候其女師範結業後再議婚事。”

徐家雖然官司打輸，被迫暫時停止糾纏，卻怎麼也咽不下這口氣，一心要挽回賠了“兒媳”又丟人的敗局。初戰告捷的張國蘭，則打算乘勝砍斷自己身上的封建枷鎖，索性與徐家解除婚約，走上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之新路。可惜就在這時，張國蘭的母親與哥哥不幸先後病故，她不得不回鄉奔喪，為老母長兄料理後事，一應喪事辦妥，她正準備回武漢繼續上學。預定離鄉之日的拂曉，勞累多日的張國蘭，忽聽屋外人聲喧嚷，只見房門被人一腳踢開，一群兇神惡煞似的壯漢悍婦，呼喊著衝進房裏，推開與國蘭同住的二位姑娘，七手八腳抓住國蘭，前拽後推地拖出門外，塞進一項舊式花轎，不管國蘭如何抗拒叫喊，他們鎖上轎門就要抬走。人們這才知道原來是徐家趁機搶親來了。

國蘭的姑母哭著追出喊道：“你們搶人，也要讓人穿上衣服嘛，哪能這麼不顧人死活呀！”

搶親的人這才允許向轎子裏塞進幾件衣服，推開趕出攔阻的人，抬起轎子就走。國蘭在裏頭掙扎哭喊得肝腸欲斷也無法脫身，只聽轎的親人們的哭喊聲越來越遠。轎子更顛得她七暈八倒，她在昏昏沉沉中心想，面對如此困境，只有一拼了事，反正絕不能向惡勢力低頭服輸。她摸索著邊套上衣服，邊想此後對策。不由想起古今的抗婚烈女，在花轎中自縊或剪斷脖子的慘事……

經過了“五·四”運動的張國蘭，決意不當封建祭壇上的又一犧牲品！

已被鎖入囚籠似的迎親花轎，抬到徐家的國蘭，只聽轎外鞭炮轟響，喇叭哇叫，震得她心驚肉跳，立即作好迎戰準備。當幾個高身大個的盛裝伴娘，將她從轎裏死拉活拽地拖了出來，左架右扶和前擁後搯地拉她去“拜堂”時，她忽然掙扎著推開眾人，昂頭挺身站定。人們這才吃驚地發現，她穿的竟是一身喪服。徐家人慌亂地嚷道：

“不行，不行！快把她的孝衣剝下來，換上嫁衣再拜堂！”

那群大個娘們又一擁而上，將她連抬帶抱地推進房間，七手八腳地要扒她的衣裳。國蘭見裏頭佈置得富麗堂皇，看來是個新房，她索性跳到紅漆大床上，拉過大紅綢被，緊緊地裹住身子，那些娘們怎麼也扒不開來。有兩個娘們上前拉她的手，她趁機抬手“吧！吧！”兩下，給了對方兩巴掌，又伸腿把圍在床前人們捧著的繡衣、臉盆和鏡子、花粉之類，連踢帶蹬統統掃落地上……

隨著新房裏這陣亂響，有的娘們喊道：“不得了，不得了！新娘子打人，造反了！造反了！”

一群漢子聞聲衝進，為首的還留著八字鬚，手裏握著一條皮鞭，揮鞭指著國蘭訓斥道：

“你如此撒野，不識抬舉，有辱我徐門家風，得用法治你！”說著揮鞭要打。

國蘭忙用綢被蒙住了頭，轉身朝裏不理睬他，氣得那八字鬚又罵道：

“如今你已是徐門之人，命你立即認錯陪罪，好生與我兒成婚。如若不從，我手中皮鞭絕不輕饒！”他一邊罵還一邊用鞭柄狠敲床前紅几。周圍的一夥男女，一時都不知如何是好。

正當他們無計可施時，張國蘭忽然跳起身來，站在床上居高臨下直指那八字鬚道：

“你這封建老朽，也不看看現在是什麼年代了，你們膽敢仗勢搶人，企圖強迫成婚，公理國法不容，我也絕不答應！”

嚇得連退幾步的八字鬚慌忙答道：“你這野蠻女子，我家本不稀罕，憑我徐門財勢，什麼樣的娘們都能弄到。只因為你家說我兒子配不上你，我才非要將你們配對，讓人看看到底是哪個高強？”

張國蘭踢開床上綢被，叉腰挺立對八字鬚道：“你這是妄想！你們搶來人，搶不到我的心，我寧死也不屈服，絕不向你這個老朽低頭！”

那八字鬚道：“而今你進了徐家門，就生是徐家人，死是徐家的鬼，你敢犯上抗婚，老子就行家法打死你！你死了會連狗都不如，我家死一條狗還埋一捆稻草，打死你我連草都不給，看你還兇不兇！？”

國蘭回道：“你敢！”心想同這老頑固無理可講，索性扭頭不再理他。

八字鬚第一次見這陣勢，吭哧半晌沒有新招，只得氣哼哼地拔腿出了門。

八字鬚走了一會兒，外頭進來一個小老太婆，捏著嗓子輕聲軟氣地對張國蘭道：“姑娘，我是你女婿澤民他媽，你得叫我婆婆。今天委屈你了，我們也是沒辦法，你可不要見氣，我們有話慢慢說。我家就澤民一個獨生子，我和他爹都老了，盼你早點過了門，好來接管家務。只要你同澤民成了親，徐家萬貫家財就歸你掌管，由你當家作主了。”

老太婆邊說邊掏出一把大鎖鑰匙，塞到國蘭手上，嘮叨地說：“你看，這是總櫃鑰匙，從今天起，我們就讓你當家。你還是遵照老例，同澤民拜堂成親吧！以後你想怎麼就怎麼，我們都聽你的。現在你就先聽我一句話吧！”

張國蘭心想，這老兩口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一唱一和地想逼我同那混小子成家，無非是要我從此當他們徐家的奴隸，可這是不可能的。想著就把鑰匙一扔，冷冷地說：“你們別廢話了，我不想當你們的家，也不會聽你們的！”

在門外等著八字鬚忙衝進發狠地道：“既然這樣，你且回個話，你是想死，還是要活？馬上同澤民拜堂，一切好說，再要抗上，就是死路一條！”

國蘭輕蔑地說：“你嚇不倒我，現在到處反帝反封建，皇帝老兒都被打倒了，你還兇什麼？告訴你，今天你們所作所為，已經犯了新

法。對於這件婚事，政府已經判決，等我畢業以後再說。現在我還正在上學，你們公然搶親逼婚，侵犯人權，對抗官府，這就是犯法。你膽敢整死我，就會要你償命！不信你等著瞧。”

那老太婆聽了著慌地哭道：“這怎麼好，怎麼辦呢？”

國蘭說：“告訴你們，現在社會要變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強迫包辦都不算數。再同你們挑明了吧，你們那寶貝兒子太不爭氣，這種浪蕩公子，我就是看不上，你們都死了這條心吧！”

老太婆還在叨叨地哭著：“這怎麼好，怎麼辦呢？”

“好辦得很！”國蘭接口說，“先馬上送我回家，有事重新商量。如果你們繼續強迫我，馬上告你違犯法律侵犯人權，同你們徐家一刀兩斷，還讓你們臭名遠揚！這兩條路由你們挑，我反正是豁出去了！”

這時進來一個瘟頭瘟腦的年輕男人，對八字鬚和老太婆說：“區公所和局子裏來人了，正查問今天的事，我看就拉倒吧，上頭的人不能得罪。”又低著頭對張國蘭說：“我就是徐澤民，你的話我也聽到了，本來是不該勉強你，把你搶來了，是對不起你。”說著又對自己父母說：“我看，還是送她回去吧！”

從未見過徐澤民的張國蘭，看著他那可憐巴巴的窩囊相，就大方地說：“對麼，你是年輕人，不能同老年人一樣，要看看新潮流，有事好好商量嘛，怎麼能強迫呢？”

她正同徐家小子說著話，兩個老的和身邊的人竟一起悄悄退出房間，又把房門一下子反鎖上。徐家小子還不知怎麼回事，張國蘭卻反應過來，忙對門外大聲斥責道：

“你們想幹什麼？馬上開門，放我出去！”

由於說得太響太急，一下被噙住了，連聲咳嗽起來。徐家小子忙笨手笨腳地端起一個痰盂，想來為她接痰。

國蘭不知何意，卻抬腳一踢，那痰盂噹啷啷在房間裏滾開了。

外頭不知房裏又發生了什麼事，八字鬚忙開門進來，見兒子嚇成那樣，氣得罵道：

“都是你，給我丟人現眼，死沒出息的傢伙。”

那兒子也惱火地說：“這能怪我嗎？是你們非要搶親，才搞得這樣子。我也不管了，誰插的漏子誰收拾去！”說著竟奪門衝了出去。

只聽外頭有人嚷嚷道：“新郎信跑了，新郎信跑了！”

八字鬚正要追出去，區上和局子裏果然來了人，要找徐老頭問話，又責令徐家遵守原判，等張國蘭結束學業再提婚事，現在不得強搶相逼。

徐家原想來個生米做成熟飯，不料卻弄得雞也飛掉蛋也打破，人財兩空大丟其臉，只得在官家和眾人的監督下，讓徐家一個女兒，陪送張國蘭回自家。這場搶親風波，以張國蘭的勝利宣告結束。

國蘭回到武漢繼續上學時，她在鄉下被搶親和鬧新房的事，也傳到城裏，校內校外各方人士特別是青年學生們，都來慰問和讚揚她，報館的記者也來訪問和報導了她的事，張國蘭一時成了反對封建禮教、爭取自由平等的青年先鋒式的新聞人物。她也趁熱打鐵，公開宣佈與徐家徹底解除婚約，完全掙脫了自己身上的一條封建枷鎖。

她的第一次“婚事”，也就此告終。

二、革命才子多情郎，棺材裏頭藏新娘

張國蘭在陳潭秋、董必武、惲代英和林育南等我國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直接教育影響下，立志投身革命，一九二四年加入了“CY”即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六年又轉為“CP”，成為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和職業革命者。她在武漢參加迎接和支持北伐軍的活動後，被派回故鄉京山擔任了黨的縣委副書記兼宣傳委員，又當選為全縣“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的副委員長。一九二七年初她又奉命回到武漢，秘密購買徵集槍枝彈藥，好回縣開展武裝鬥爭。她在執行這一秘密任務的同時，意外地與一位青年革命家相識並相戀了。

有一天，她的戰友和老領導惲代英，約她去聽一位北伐軍官的演講。演講者是北伐軍十一軍政治部宣傳隊的總教官、共產黨員劉謙初。他是位投筆從戎獻身革命的青年學者。去聽講的張國蘭，不僅被他的演說內容所打動，他那魁梧身材、英俊品貌和瀟灑風度，也使張

國蘭怦然心動。

會後，韓代英介紹他們相互認識了，以後張國蘭又聽了劉謙初的幾次演講，還在劉謙初為副主編的《血路》週刊上，拜讀了他才華橫溢的文章。劉謙初還邀請張國蘭參加了他主持的一次工農商學兵各界聯歡會，他的熱情活躍和多才多藝，不由地深深地吸引了張國蘭。不過她當時正黨的任務在身，只將開始萌動的少女情懷深藏心中。

也是他們有緣，張國蘭有次去女同學、山東籍黨員李桂英家，意外地碰上了劉謙初，原來他也是山東人，還是李桂英的親戚。主人要為他們介紹，劉謙初說他們早已認識了。他和張國蘭說了一會話，說自己有別的事要先走，讓李桂英出門送他一下。哪知主人一送就不短時間，回來後就分外關切地問張國蘭道：

“老同學，你現在還是一個人嗎？每天東奔西走，也該有個伴侶了吧！”

張國蘭說：“現在鬥爭那麼緊張，個人的事實在顧不上，當然還是一個人。”

李桂英說：“鬥爭越是緊張，越應該有個志同道合的人，相互幫助照顧，兩個人會比一個人更好。”

“你說得也對，工作忙的時候可以不想這些事，碰到困難和一個人時，真想有個人說說心裏話，有時候是有點孤單。不過這事要碰機會，我還沒碰上呢！”

“我給你創造個機會好嗎？”

張國蘭笑道：“別拿老同學開心了，你有什麼機會？”

李桂英卻認真地說：“當然有，還是個好機會。”她見張國蘭既疑惑又期待地看著自己，忙貼近她小聲道：

“你看劉謙初怎麼樣？”不等張國蘭回答，她又急切地說：“你不是聽過他的演講，讀過他的文章，見過他的為人，已經相互認識了嗎？”

張國蘭正猶豫著怎麼回答，李桂英又單刀直入地說：

“你老實說，是不是喜歡他？”

張國蘭不自主地默默點了一下頭，卻又馬上鎮定下來，用推諉

的語氣說：“人家水準那麼高，我哪比得上他？”李桂英高興地說：“我已經知道了，你們兩人都印象很好，可以交個朋友。”她見國蘭羞澀地想推託，又說，“告訴你吧，剛才的話就是謙初托我同你說的。我看你們兩個都已有意，謙初早已鍾情於你，就看你的了！”

她見張國蘭滿面緋紅不再推諉，又決斷地說：“好，明天中午，我請你們倆來吃飯，自己面談一切。你一定要來，還得早到！聽到沒有？”

張國蘭只得默認和應允了。第二天按時來到，劉謙初已經先至。主人去忙吃的，讓他們自己有啥說啥。張國蘭畢竟初涉情場，又窘又羞、半驚半喜地不知如何是好，劉謙初一時也不知該怎樣切入主題，隨手抓起主人家一把小提琴輕輕撥弄著。張國蘭心中一動，打破僵局地說：

“你，不是會拉這琴嗎？演奏一曲，可以嗎？”

劉謙初忙說：“可以可以，就來它一曲，不過我拉不好，請多指教。”說著便調整了弦，奏起了一首中國歌曲，邊拉邊哼著歌詞。

音樂無言地傳遞著深情，他們都在提琴聲中陶醉了……

雖然當天他們沒有馬上山盟海誓地“私訂終身”，只海闊天空地從音樂到人生、從政治到文學作了熱烈交談。這使張國蘭進一步發現劉謙初的知識豐富、才思敏捷，也更使他們感受到了一種少有的情投意合。

飯後，張國蘭隨劉謙初去了他的宿舍。六十多年以後，九秩高齡的張文秋即張國蘭，仍能一一歷數一直珍藏在她心中“謙初的世界”裏那特有的陳設：

一邊牆上掛著秀麗淡雅的江南水鄉風景畫，另一邊牆上是兩幅遒勁豪放的書法，一是岳飛的《滿江紅》，一是文天祥的《正氣歌》。書櫃裏排滿了中外古今的文史經哲書籍，書櫃頂上竟並排放著一座觀世音瓷像，一座維納斯雕塑……

劉謙初見張國蘭的目光停留在那座袒胸斷臂西洋愛神像上，輕聲問道：“你喜歡維納斯嗎？”

張國蘭卻說：“不，我喜歡觀世音，她更慈善、文雅和安靜，能

代表東方美。”

劉謙初說對，接著向她說了幾個關於觀世音的故事，後來才說自己更喜歡美麗熱情的愛神維納斯。

張國蘭笑道：“看來你也更愛西洋美人了！”

劉謙初也大笑道：“我喜歡的是一種熱愛生活、追求幸福的進取精神。”說著又話鋒一轉道：“你不也是這樣嗎？”

當天他們談了很久，直到謙初將國蘭送回到住處。

一對革命者的戀情，就這樣開始了。只是革命形勢不容許他們慢慢品嚐這人生的甘甜，不能不促成他們迅速結合，又迫使他們長相別離！

當時正是一九二七年春天，陽春期間，就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捕殺共產黨人，一批又一批革命者慘死在敵人的屠刀之下。劉謙初所在的部隊，奉命離開武漢，他在開拔前幾天給張國蘭發了一信，其中寫道：

“……自晤芳顏，神魂迷離，舉止動定，往往若有所失。雖一飲一食之間，亦見著倩影在我眼中。每一成寐，則魂夢縈繞於左右。天耶？命耶？誰使我癡情百結而不解耶？”最後又詩曰：“如疾如醉九迴腸，無悔無明暗自傷。曲曲黃河猶有盡，此愁更比黃河長！”

為張國蘭通信來的李桂英對她說：“謙初正等著你的回音，越快越好。”

其實她也迫切地想見到謙初，便在李桂英的安排下很快相見了。謙初告訴她，自己所在的部隊，四月底前就得開拔，希望在分別以前，她能答應自己一件事。

國蘭忙問：“什麼事呀？”

謙初答道：“終生大事！”

李桂英出來接著說：“你們馬上請我吃喜酒吧！”

國蘭又羞又窘地說：“這個形勢，還吃什麼喜酒呀，我也馬上要帶著徵集到的武器回京山去呢！”

謙初說：“那我跟你一起，帶槍同去京山吧！”

李桂英笑道：“國蘭，好啊！你來武漢搞槍，連拿槍的人也找到

了。”

不過他們都知道，這其實是不可能的，謙初和國蘭分屬不同的黨組織，無法真的一起走。李桂英笑罷，認真地說：“你們既然真心相愛，馬上就要各奔東西，何不抓緊良機，現在就辦喜事。”她見國蘭由於羞澀想要推託，又對她笑道：“你看謙初，儀表堂堂，才華出眾，你要錯過機會，就會被別的姑娘搶去了！”

國蘭也笑道：“他若是另一種人，就讓別人搶去吧！”

謙初忙說：“只要有了你，就誰也搶不走了！”又當著李桂英的面鄭重地道：“國蘭，我如果不能同你結合，必將抱憾終生，死不瞑目！”

李桂英忙打斷他道：“別說這不順氣的話，你們都聽我的，一切由我操辦，從組織批准到準備新房，不用你們費心，馬上就結婚成家。”

國蘭道：“那也太快了吧？”

李桂英道：“形勢緊迫，就得當機立斷！”

謙初也熱切而誠摯地看著她，輕聲說：“國蘭，你就答應了吧！”

無法拒絕也不想拒絕的張國蘭，雖然還低著頭，卻堅定地點了兩下……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劉謙初和張國蘭在李桂英家，舉行了簡樸的婚禮。二位新人的戰友和校友惲代英、董秋斯等同志，一齊趕來賀喜。謙初激情地對國蘭說：

“我們在動盪的戰鬥中結成伴侶，在革命風浪中建立愛情，今後無論何時何地，都將永遠心心相印！”

沒等他們陶醉在新婚的幸福之中，謙初得到命令，於四月二十九日隨軍開拔，他和國蘭過了不滿三天“蜜月”。

是日下午五時，國蘭去車站為謙初送行，列車開出很久，她還獨自佇立在月臺上，凝望著載著自己親人的列車，越去越遠，直至消失……

還是他們都在武漢時，曾一起拜訪了正在武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的毛澤東，他們參加了武昌農講所的開學典禮，聽過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報告，還幾次去過他和楊開慧的家，見到並抱過毛澤東和楊開慧的三個兒子——岸英、岸青和出生不久的岸龍。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張國蘭抱過的岸英、岸青兄弟，幾十年後都成了她的女婿，她和毛澤東竟結成親家。只是到了那時，謙初早已犧牲，連國蘭自己同謙初分別後不久，也幾乎成為烈士。

當年五月上旬，張國蘭作為湖北代表參加了黨的“五大”，會後立即回到京山。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鎮壓革命運動，加上中央領導的右傾投降方針，形勢急轉直下，京山等地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許多同志都被捕犧牲，江漢大地灑遍了烈士鮮血！

正阻困在京山縣內的張國蘭，被敵人追尋搜捕得實在無法存身，無論白天黑夜，不分大路小道，怎麼也闖不過敵人的關卡。最後想出了一個絕招：由幾個未暴露身份的同志，請來一批靠近我黨的基本群眾，讓張國蘭裝成死人躺在一口新棺材裏，謊說是能傳染人的急病，一路哭哭啼啼地將她抬出了關卡，這才使她逃出了一條命。

一時成了“死人”的張國蘭，想起自己剛剛當了新娘，不僅沒有坐上花橋，反而睡上了棺材，真令人不可思議。

三、新婚久別濟南重逢，雙雙被捕獄中生離

張國蘭躺在棺材裏逃出京山以後，在河南駐馬店和湖北洪湖等地區活動了一個短時期，輾轉曲折又到武漢，與湖北省委地下組織接上了頭，被任命為省委秘書處副處長兼機要秘書。當時她奉命化名為“李麗娟”，並且與省委秘書長劉先源同志裝成一對夫妻，以掩護省委的秘密機關，對於這段“婚史”，將另章專門敘述，這裏再接再說張國蘭和劉謙初的事。

一九二八年底，黨在武漢的地下組織也遭敵人破壞，許多同志被捕殉難，化名為“李麗娟”的張國蘭奉命隻身逃到上海，向中央彙報情況並請示恢復組織的事。中央聽取彙報後，改派別人去了武漢，

將張國蘭留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因為她一直掛念著丈夫劉謙初，分別後長期杳無音訊，就向中央組織部報告了，請組織上幫忙查找他的去向。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和江蘇省委（即上海市委）領導人羅邁（即李維漢），知道這事後也很關心，周恩來幾次向張國蘭詢問劉謙初的情況，讓她放心等待佳音，設法讓他們夫妻再見並團聚。

一九二九年三月，張國蘭忽然接到通知，中央組織部決定調她到山東濟南去工作。劉謙初當時是黨的山東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化名為黃伯襄，公開身分是齊魯大學的教師。在此以前，他曾擔任過福建省委書記，一個多月以前，才調到故鄉山東來。周恩來和中央組織部，為了照顧他和張國蘭的夫婦關係，特意將國蘭也調來山東，正好相互配合工作。國蘭來後，擔任省委執行委員、婦女部長兼省委機要秘書，對外則裝成一個普通家庭婦女“陳孟君”。他們的家實際上是黨在山東的一個地下據點和指揮中心，總指揮是被叫成“黃先生”的劉謙初，他的主要助手和最親密夥伴，就是他家的“師娘”陳孟君。後來以黨內大奸大惡聞名於世的康生及其姨妹，成了造成一次內部巨大劫難的禍根。

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軼歐都是山東人，曹軼歐的妹妹曹文敏和丈夫劉少甫，也是山東省委機關的秘密工作人員。曹軼歐在康生之前另有個丈夫叫李應臣，也是山東人，並且入了黨，他們同在上海工作時已生了孩子。康生趁李應臣不在上海時與曹軼歐私通同居，又設法擠走了李應臣。被挖了“牆腳”的李應臣，一氣之下叛變革命回到山東，當了敵人特務，立誓要斬殺“共匪”一報奪妻大仇。正當他對以前同志嗅蹤覓跡時，偶然發現了正在濟南的前妻妹曹文敏，在秘密盯梢監視之後，領來特務將曹文敏夫婦一齊捕獲。由於事發突然，他們沒能撤去住處的聯絡暗號，前來與他們聯繫工作的張國蘭不幸“撞網”也落入敵手。

曹文敏被捕後，在李應臣作證下，承認了自己及丈夫少甫的共產黨員身份，也供出了她所知道的黨的機關及黨的幹部。劉少甫同志卻堅持氣節，拒絕向敵人提供任何黨的機密，在他們以後被捕的張國蘭，因為一直偽裝為一個普通家庭婦女，正為自己“不小心走錯了人

家”而喊冤不止，敵人也沒有抓住她任何把柄，李應臣更根本不認識她，只算是個“共黨嫌疑”。不過曹文敏的被捕及招供，卻成了敵人追捕山東“共產黨巢穴”的導火線，他們抓著線頭很快又逮捕了省委書記劉謙初，不僅使他們夫婦先後都被捕入獄，又使來不及轉移的大批同志一一落入魔掌。

劉謙初是在發現妻子“失蹤”，知道發生了意外後，立即向外地轉移時，在火車上被敵人用照片查對出來的，被捕時已無法隱瞞身份。這時是一九二九年夏季，從張國蘭調來濟南算起，他們才共同生活了三個來月。正是這短短的三個來月，不僅成了劉謙初一生中僅有的一段最甜美的日子，也成了張國蘭即後來的文秋老人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珍貴回憶，雖然她當時並未意識到也不敢想像會是這樣。

儘管敵人沒有查出張國蘭的真實身份，她和劉謙初的夫妻關係卻是公開的。敵人將他們倆人一起過堂受審，企圖通過夫妻對質偵知黨的機密。劉謙初一見心痛欲裂的妻子，忙主動上前招呼道：

“孟君，我對不起你，我的許多事從來沒有讓你知道，反而要連累你，讓你陪我受苦了！”又說：“不過，因為你確實不知道我的事，早晚還能出去。只希望你出去以後，替我好生孝敬‘媽媽’，說我這個兒子可能難以為她老人家盡孝了！”

張國蘭聽出他的話意，要自己繼續隱瞞身份，爭取能出獄重新為黨工作，他本人因為身份暴露，已下了犧牲決心。張國蘭趁機哭天呼地地向敵人喊道：

“我家先生是個本份人，從來沒做過犯法的事，我們都是冤枉啊！”

敵人怒喝著不准她喊，指著謙初問她丈夫到底姓什麼。她一看謙初堅定的眼神，仍然咬住自己說過的話道：

“誰都知道他姓黃，是教書的黃先生。”

敵人說：“我們已經查出來了，他叫劉謙初，根本不姓黃，你還為他瞞什麼？”

敵人又指著謙初對她道：“我們還知道他是個大共產黨，你就老老實實招供吧！”

張國蘭又叫屈道：“麼子共產黨，我從來沒聽說過。他要是共產黨，我怎麼一點也不曉得？”

敵人又嚇唬她道：“你丈夫是共產黨，你也是共產黨，要不，你們一個山東人，一個湖北人，怎麼會搞到一塊？”

她卻故意喊道：“哎呀，你們當法官的，怎麼能無憑無據信口胡說？我家黃先生原本在武漢教書，常到我家開的小店裏買東西，同我爹特別說得來，我爹看中他有學問，人品好，做主讓我嫁給他，後來跟他來了濟南，從來沒聽說有什麼共產黨。你們不能冤枉好人！”

敵人說她不講實話又咆哮公堂，馬上對她上刑拷打，她更加放聲哭喊。可是怎麼審問和拷打她，始終還是那幾句話，又裝得無限委屈地說：

“我家先生對我最好了，你們說他是共產黨，他要真是，哪能不告訴我呢？”

有個審問者小聲笑道：“這娘們真蠢，共產黨的事，從來上不告知父母，下不告訴妻子兒女，她自己要不是共產黨，哪能知道丈夫的事呢！”

另一個審問者卻繼續詐她道：“告訴你，你丈夫就是共產黨，你是他老婆，當然也是共產黨，趕快招供吧！”

張國蘭馬上反譏道：“你說丈夫是共產黨，老婆也就是共產黨，那你是法官，你老婆也是法官嗎？”

氣得審問者發火道：“不准你胡攪蠻纏，再上刑，看你招不招！”

敵人對她連續壓杠子、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往手指縫裏釘竹簽……疼得她幾次昏死過去，被涼水澆醒後，再審問還是那麼幾句話，要不就哭天呼地地放聲喊冤，對敵人就是硬軟不吃，拒不招供。

無計可施的敵人，對她實在榨不出“油水”，只得將她打回牢裏長期關著。受刑以後的張國蘭，雖然身子十分虛弱，內心卻很充實，敵人沒有從她那兒撈到任何東西，自己不愧為黨的堅強戰士，也不愧為謙初的好妻子。不過她發現自己被捕以後，已二三個月不來“例假”，並且老是想嘔吐，以為自己又得了什麼病。

有一天又過堂時，她再次遇見謙初，兩人一見，謙初就問她是不是病了，心疼地說她怎麼氣色那麼差？

國蘭只得對他說了自己的“病情”，哪知謙初聽後竟高興地啾著她的身子直樂。國蘭嗔怪地說，自己那麼難受，你怎麼還樂！謙初忙悄悄對她說：

“好，你這不是病，是要當媽媽了，我們有後了！”說著又千叮萬囑地要她保重身體，愛護自己，一定要把這下一代保住，使革命事業後繼有人，為受難和犧牲者報仇雪恨。

不久，謙初和劉少甫等已經暴露身份的同志，都被敵人判了死刑。張國蘭雖無證據，也判了一年半徒刑。仍在活動的地下黨組織，利用各種關係和敵人的內部矛盾，將謙初等的死刑改為八年徒刑，國蘭的刑期也減為半年。地下黨還和獄中同志建立了聯繫，經常送一些食品衣物和錢進來。有一天又送東西來時，裝成“陳孟君的親戚”的來人，指著一包點心對張國蘭說：

“姑媽叫你一點一點地吃，裏面有好餡兒。”

國蘭一聽心中有數，趁人不注意時，掰開點心，發現一個紙卷，竟是一張小字條，一細看，原來是謙初親筆寫下的一首小詩。他給自己的妻子寫道：

無事不必寫憂愁，應把真理細探求。
只要武器握在手，可由細水變洪流。
忽聞南國春已至，且喜東樓日又長。
正歎落梅沉靜水，哪知新松出城牆。

原來謙初在獄中正組織被捕同志，利用時機學習革命理論，不斷提高政治文化水準。他的行動和詩作，都透出了他特有的革命信心和樂觀精神，給了國蘭極大的鼓舞。決心堅持到底，熬過難關，爭取出獄。

一九三〇年一月初，國蘭刑期已滿，敵人只得放她出獄。她走前執意要見見謙初，他們隔著監獄鐵柵欄見了面。謙初臉色蒼白，全身消瘦，到處都是刑傷創疤，加上手銬腳鐐，使國蘭見了心疼如絞。但謙初自己卻依然那麼樂觀，他為國蘭的終於出獄興奮不已。反復關照

她馬上回“家”看“媽媽”，又拿出兩封寫好的信，說是估計國蘭即將出獄，就給他的老同學、好朋友各寫了一封信，讓國蘭出去後設法找到他們，以便取得他們的幫助和照應。他又深情地對國蘭說：

“我特別特別託付你，一定要保護好我們的孩子，讓他安全生下來。我已經為他想好名字，不問是兒是女，將來就叫‘思齊’，要他永遠思念我們的齊魯大地，記住這裏發生過的一切。”

悲喜交加的張國蘭，關切地問謙初需要什麼，她出去後就設法給他送來。他卻說：

“我現在什麼也不要，城裏的‘親戚’會就近給我送東西來。只希望你早點回到‘家’，照顧好‘媽媽’和將來的孩子。我在這裏的一切，‘家’裏只管放心。”

兩人話還沒說完，一邊的看守就叫時間到了，一面將謙初押回牢房，一面往外趕張國蘭，他們只互相招了一下手，就被生拉硬拽地分開了。

這對革命夫妻，不僅就此生離，更將面臨死別，一場更慘的人間悲劇，正在等著他們！

四、南思北念生死訣別 血染齊魯淚灑滄江

張國蘭一出獄，就被黨的地下組織接走，又馬上派人將她送到上海回中央去。護送她的同志按照黨的安排和劉謙初的託付，讓她一到上海就直接去了謙初的同學知交兼戰友、翻譯家董秋斯家裏。董秋斯夫婦對她姐妹相稱，親如家人，使她這個長期無家、幸而有家又遭敵毀的革命流浪者，享受到了難得的家庭溫暖，她的身體也漸漸得到康復。她臨產時，中央又安排她進了紅十字醫院，順利地生下了一個女兒，這就是思齊。

她帶著思齊出院後，仍然住在董秋斯家，他們母女在秋斯夫婦無微不至的關懷照料下，大人迅速恢復健康，孩子不斷茁壯成長。只是每當國蘭與思齊獨處時，總是難以抑制地思念著還在獄中的謙初。自己和女兒正享受著無比溫馨的同志愛戰友情與黨的關懷，他們的親

人卻依然忍受著敵人的摧殘折磨。國蘭想，自己作為妻子不能與丈夫同甘共苦，只得把自己對謙初的思戀深情，傾注在約定的每月初一、十五兩封信中。

謙初的來信每次都有兩封，一封給國蘭，一封專門寫給“媽媽”，說自己在獄中如何心平意靜，已利用時機讀了不少書，還曾將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從英文譯成中文，分章傳遞給被捕同志學習。還說他們對敵人進行了有組織的鬥爭，已經取得了一些勝利。他給國蘭的信更是情深意切，對自己摯愛的妻子和未能見面的女兒思齊，用動人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深切思戀與無比關切。

國蘭將謙初的每一封來信，都整理順序編號收藏著，周恩來、瞿秋白和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都來看了這些信，瞿秋白說這些信“是真正的鐵窗中的詩篇，是一個共產黨員不屈不撓精神的真實寫照。”他打算將來根據這些信寫作長篇小說，使謙初的革命精神與鬥爭事蹟流傳於世，用以教育後人。任弼時看了信說寫得就像謙初本人那樣的“胸懷坦蕩，剛直豪爽，慷慨激昂”，“是一篇篇思想深刻、氣魄宏大的精采文章，就像他那高大魁梧的山東壯漢體型一樣，令人十分尊重敬仰。”周恩來等領導同志都叮囑張國蘭一定要保存好這些信，說它將是黨的珍貴文獻和生動教材。

組織上和同志們都用不同方式，表達了他們對謙初的關懷敬重。惲代英、林育南和李求實等戰友，分別為謙初寄去各種衣物、食品 and 書籍，林育南特地請人為謙初打了當時比較珍貴的毛衣毛褲，以使謙初既能禦寒又能保護手腕腳踝不被鐐銬磨傷。董秋斯、蔡詠裳夫婦不僅精心照料著國蘭和思齊母女二人，還在自己新出版的文學譯作、蘇聯名著《士敏土》的扉頁，特意印上題詞：

“這譯本獻給我們最敬愛的朋友‘C. C’。”

“C. C’即“謙初”二字的英文縮寫。

戰友們的贈品寄到獄中後，謙初全部拿出與難友們分享了。董秋斯的新譯作收到後，謙初馬上從頭朗讀給難友們聽，使身處黑暗牢獄的人們，感受到了來自外面的一縷陽光。

中央和山東黨組織一直在設法營救謙初等被捕同志，但是進展

很慢，成效不大，同志們都為此著急。黨和戰友對謙初的關懷特別是對國蘭、思齊母女的愛護，更使張國蘭深受感動。她為自己因為坐牢和生育，已長久不能工作而不安，一再急切地要求重返戰鬥崗位。正好當時中央籌備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準備委員會”（簡稱“蘇準會”），需要一大批鬥爭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其日常工作負責人就是張國蘭在武漢時期的老領導、老戰友林育南。中央決定調張國蘭到蘇準會工作，並且改名為“張一萍”，只是要她同林育南結為假夫妻，以掩護蘇準會機關工作，對於張國蘭和林育南的這段“婚史”，也將專章另說，這裏仍然接著說張國蘭與劉謙初真正婚史的悲劇尾聲。

張國蘭去蘇準會工作前，與黨組織和董秋斯夫婦商定將思齊留交董家照管，由他們出面租下了隔壁一間房子，請來一個奶媽住在那裏，專門哺育帶養思齊。孩子的生活由董秋斯特別是其夫人蔡詠裳具體負責，使張國蘭能集中精力做好黨的工作。

周恩來當時是黨在上海的主要領導人，張國蘭的工作也受他的直接領導。周恩來每次見到張國蘭，都要詢問劉謙初的情況，他為謙初的未能出獄十分焦慮。一九三一年初，他決定讓張國蘭去濟南探監，好瞭解和商討繼續營救劉謙初等同志的問題。臨行前他交給張國蘭五百元錢，說中央已與山東省委聯繫好，讓國蘭去後同他們商量並聽他們安排，這筆錢主要用於營救活動，再抽出一些貼補謙初等的生活需要。

一九三一年二月，已改名為“張一萍”的張國蘭，又成了“陳孟君”，到濟南與山東省委的同志接上頭，經過多方活動，獲得了探監的機會。這對飽受分離苦痛的患難夫妻，終於又分隔在鐵柵欄兩邊見面了。

謙初一見妻子，不等對方開口，搶先問道：“孟君，‘媽媽’還好嗎？‘兄弟’和‘親友’們，都怎麼樣了？‘家’裏的‘生意’，又發展了嗎？……”

國蘭飽含熱淚，先簡要含蓄地一一回答了他的問題。第二次探監是被安排在院內一個小房間裏見面。他們這次相見，由於看守不在身

邊，一口氣小聲交談了四個多小時。謙初說他們在獄中建立了支部，他是支部書記，一面組織同志們學習和集體對付敵人，一面分化敵人做看守獄卒的工作，在他們的教育影響下，有的看守已在為他們工作，支部正在進一步培養，準備吸收獄中的優秀者入黨。謙初又讓以後多寄送一些書籍刊物進來，理論和文藝方面的都要，可以學習和調劑精神生活。國蘭也把黨內的情況特別是同志們對他的關心，黨組織正在策劃的營救行動一一告訴了他。當她說到同志們的劫獄計劃時，謙初反復問清後，讓她回去請組織上重新考慮這事，說這一行動問題很多，有可能反而造成損失，影響黨組織和更多同志的安全，甚至會造成很大犧牲，他建議取消這一計劃，千萬不能為了營救他們再危及別的同志生命。他說自己已經作好長期坐牢的準備，上次要的那麼多東西，其實是分給難友們用的，有的同志無人接濟，生活困難，應該幫助他們。國蘭向他說到思齊時，謙初動情地說：

“我真想說她一下，哪怕只看一眼我們的女兒啊！”

國蘭遺憾地說，這次因為天太冷，孩子又太小，怕她受不了一路風寒，才沒有帶來讓你看看。等天氣暖和了，孩子再長大些，一定送來讓你們父女相見。謙初卻說：“不，應該爭取出去，回到自己‘家’裏，父女見面，全家團圓！”

可惜，他的這一願望，已經不能實現了！他和國蘭的這次見面，實際上是他們的最後訣別。不過當時還不知道。

張國蘭兩次探監以後，省委和中央都進行了一些營救活動，只是仍未取得預期效果。就在黨組織正實施又一方案時，早已回到上海的張國蘭，收到謙初於當年即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從濟南獄中發出的信，其中著重說：

“唯恐我病傳染他人”，致使黨和同志“偶一不慎，再罹危災”。又囑國蘭今後“月有一信往返已足，不須過事頻繁，致招不測。”還要國蘭“轉告母親，目前我無什麼需要，……俟有急切需要時，再當函告，希勿掛念。”

看來他正擔心黨為了營救他，反而危及組織及同志，要求黨不要再為他過於費心和增加負擔。國蘭和同志們看了這信，都意識到，謙

初已決心為黨犧牲自己了。

謙初這封信是四月初收到的，幾天以後，即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正在秘密機關工作的張國蘭，按每日慣例去拿當天報紙時，竟怎麼也找不到了。問了幾個人都支支吾吾地說他們也沒有見到報紙，有的還勸她別找了。這引起了她的奇怪，感到似乎發生了什麼事，越發決意查找當天的報紙，最後終於找到了一份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出版的《申報》，她急切地打開一看，一眼就發現了一條“山東槍決赤匪”的“最後消息”。這消息說：

“日前，山東省臨時軍法會審委員會議決，即日將已捕獲的赤匪共二十二名處以死刑。四月五日上午六時，將各犯驗明正身，用汽車載往緯八路刑場，執行槍決……”。在消息後面所附的“被處決的赤匪名單”中，赫然跳出了“劉謙初”三字。

張國蘭一見，只覺眼前一黑……

這悼會剛開過，張國蘭意外地又收到一封信，這是謙初臨刑前給她寫的，也是他的最後遺言，這封信很像一首短詩，全文如下：

我在臨死之際，謹向最親愛的母親和親愛的兄弟們告別！並向你緊握告別之手，希望你不要為我悲傷。

希望你緊記住我的話，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好好愛護母親，孝敬母親，聽母親的話！你千萬要保重身體，好好替我照顧孩子，千萬不要掛念我。你要振作精神，重新建立幸福家庭。你的快樂，也就是我的快樂！你的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

這一如詩遺言，張國蘭從此一直珍藏在自己身邊特別是自己心上。每遇坎坷危難，她都以此來激勵和鼓舞自己。令人惋惜的是，在幾十年後的“文革”大災中，她在黨內奸佞特別是康生、江青的直接迫害下，連續被抄家、追捕和關押，包括謙初最後遺言在內的一批已成革命文物的珍貴史籍，全被抄去並付之一炬！

唯有謙初給她的第一首情詩到這最後一篇遺言，銘刻在心永志不忘。

後來被稱為文秋老人的張國蘭，從一九二七年四月與謙初相愛結合，到一九三一年四月謙初不幸犧牲，正好整整四年。但是他們共

同生活的時間實際上只有三個月及最初新婚的三天。就是這極其短暫的三個月零三天，不僅為文秋老人留下了她和謙初的親生骨肉——思齊，更為她和女兒思齊留下終生享受不盡的無比珍貴豐富的精神遺產……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劉謙初及其戰友犧牲五十八周年時，中共中央和山東省委在濟南市英雄山上，建成了一座“四·五”烈士紀念碑。劉謙初烈士的女兒思齊，代表她媽媽去參加了落成典禮。她果然如父親當年所希望和囑咐的，不僅終生思念著，而且多次重返了浸透著父母雙親及許多先輩的鮮血熱淚和悲歡深情的齊魯大地！

五、死裏逃生初當假夫妻 再次遇險機關遭破壞

前文說到，張國蘭與劉謙初的婚史是從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一九三一年四月。就在這一期間，她還遵照黨的決定，先後與兩位男同志結為假夫妻，在她的革命歷程中，插進了兩段非比尋常的特殊“婚史”。

其中的第一次，是在與謙初新婚闊別以後不久。她從故鄉京山躺在棺材裏裝死人逃了出來，先在河南駐馬店地區，後在湖北洪湖和漢川地區，參加了當地的秋收暴動和武裝鬥爭，又潛回京山一次，想恢復那裏的工作。但是那裏的黨組織已遭嚴重破壞，她進去後仍然無法存身，只得再次逃出故鄉，秘密來到武漢，找省委的一個地下聯絡點去接頭，暗號是找她的“表哥”介紹工作。一個多星期以後，她才得到回音，讓她按規定時間用新的暗號到武昌首義公園去，與省委派的人見面。

她按時去後，與一個陌生男人對上暗號，那人對她近一時期的去向、活動和表現等等，作了仔細詢問考查，她一一如實回答後，那人叫她第二天再來這裏，接受黨給她的新任務。

她又如約到達，那人卻將她領出公園，過江到了漢口，進了三德里一棟三層樓小洋房，裏面有個三十來歲的男人正等著她。她正納悶

這是個什麼地方，這一位又是什麼人時，那人卻衝她笑道：

“你不是要找表哥嗎？怎麼見了面還不認識？”

原來他就是常駐湖北省委的中央特派員唐戈德，代號就是“表哥”。他指著領張國蘭來的同志說，這位是新任湖北省委秘書長劉先源同志，說著三人就坐在一起，對張國蘭今後的工作安排交談起來。

唐戈德和劉先源說，黨組織已經對張國蘭近來的情況進行過瞭解和考察，與她自己所說的完全一致，認為她經受住了嚴重的考驗，可以分配新的工作。唐戈德正式通知她，黨組織已經決定，張國蘭留在省委機關，擔任秘書處副處長兼機要秘書，受劉先源同志直接領導。這座房子就是省委秘書處的工作地點。唐戈德說：

“從今天起，你就是這裏的主要工作人員，對外要偽裝成一個家庭，由你來當這家的女主人，還給你派一位‘先生’來，好掩護機關工作。”他接著又特別交代說：

“從現在起，你的名字叫李麗娟，公開身份是一個小學教員，但是目前沒有教課，在這個新家當‘太太’，這個安排，有什麼意見嗎？”

一下變成李麗娟的張國蘭道：“我一直是做公開群眾工作的，很想直接參加武裝鬥爭，現在讓我搞地下工作，還要裝成一個太太，我可能不適應，恐怕幹不了。”

唐戈德說：“讓你當‘太太’，還要裝個假夫妻，是為了應付環境和對付敵人的，不用家庭名義就租不到房子。對外是夫妻，對內還是同志關係，但是公開場合要裝得很像，不能讓人看出破綻，這是工作需要和黨的任務。”

張國蘭又說：“可我已經結了婚，有了愛人。”

唐戈德說：“組織上當然瞭解，正因為這一點，才讓你裝成太太，沒有結過婚的才不合適呢。”他還說：“組織上還瞭解到，你很有應付敵人的能力和經驗，善於克服各種困難，相信你能做好新的工作，才把這副擔子交給你。”

劉先源也說：“我們還相信，你會安心工作的。”

張國蘭見二人都用期待的目光看著她，考慮一下後，下決心

地說：“好吧，組織上既然已經決定，我就堅決服從，努力做好工作。”

劉先源說：“好，共產黨員應該這樣，你會幹好這個工作。”

他和唐戈德又向她交代了今後的具體任務。設在這裏的省委秘書處，將負責中央與省委的聯繫，中央和省委的各種文件，也由這裏收寄、處理和分發，全省的組織機構和黨員名單等絕密檔案，也保存在這裏。唐戈德說：

“李麗娟同志，你不要小看你的‘太太’工作，全省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安全甚至生命，全捏在你手裏呢？”

張國蘭說：“我感謝黨的信任，一定盡職盡心，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他們又一起將房間使用、聯絡辦法、文件收藏和警號放置等具體問題，一一安排妥當，唐戈德和劉先源讓她以女主人身份去置辦傢俱，再雇請一個女傭，他們出去後再回來吃晚飯，一個新的“家庭”就正式建立了。

張國蘭遵命一一辦成，找到了一個姓許的四十來歲女傭，又讓她去買菜並做晚飯，等自己的“先生”回來開飯。

天剛暗，唐戈德和劉先源就回來了。那女傭忙問“太太”，進來的這倆位，哪個是這家的“先生”？

張國蘭這才想起，他們並未交代將由誰來扮演自己的“丈夫”。當著女傭的面又不好問，便機靈地擺出“太太”派頭道：“許媽，還不快去端菜盛飯，先生和客人都餓了，快去吧！”

許媽一走，他們都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笑了。唐戈德趕緊指著劉先源說：

“他是你的直接領導，也是你家的‘先生’，我還是你們的‘表哥’。”又悄悄對她說。劉先源化名為李文清。他的化名是汪清珊，都是中學老師，將作為一家人常在這裏，張國蘭馬上記牢了。女傭又來了，“太太”才將自己家裏人向許媽作了介紹，許媽見這家的“先生”、“太太”和“表哥”都是教書先生，人也和藹客氣，也就在這“家”安心呆下了。

當晚許媽為主人鋪床時，奇怪地問“太太”道：“你們還有行李在哪里？床上只有一套被褥不夠用啊！”

張國蘭心想糟了，這事又沒考慮到。正想法再打個馬虎眼，“李先生”卻上來故作親熱地說：

“我那套行李放在學校裏了，不拿也沒關係，和‘太太’先睡一個被窩嘛！”

張國蘭暗想這怎麼行？忙對女傭說：“許媽，你先去收拾自己的住處，這裏我自己會鋪床。你去吧！”

許媽一走，張國蘭不由對著床上僅有的一套被褥發起愁來，晚上這“戲”該怎麼演呢？

劉先源見狀，輕輕一笑道：“沒關係，我已經有準備了。”又指指樓下許媽的去處道：“既然裝就要裝得像，又不能露馬腳啊。不過我馬上再去弄一套被褥來，你就放心吧！”

“表哥”唐戈德也過來，讓張國蘭看許媽已經休息了，又關好樓上房門，嚴肅地宣佈了黨內地下工作的嚴格紀律，內容是：秘密機關在對外活動中，相互只有單線發生直的關係，不能多頭聯繫發生橫的關係；在一個組織中的同志，各自負責自己的事，不得過問和打聽本職工作以外的事；不准與工作無關的同志互相來往，對工作有關者也不能追問對方真實姓名、身份及來歷。有幾條紀律則是專為張國蘭面臨的情況定的，它要求：如因工作需要用假夫妻辦法來掩護秘密機關時，同居一起的男女同志不准談情說愛，更不得發生男女關係；如一方已有愛人，另一方絕對不准向其求愛；如果雙方都未結婚，並且相互愛慕願意結合，須報請組織審查批准，不得私自結婚；申請結婚必須雙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強求對方；在保持假夫妻關係期間，對外要儘量裝得很像，保證不出漏洞，一旦工作結束，解除“夫妻”關係後，雙方不能再互相聯繫和自行來往。此外，還有機關暴露或人員被捕後的各種應變措施和更嚴格的鬥爭紀律。唐戈德一條一條交代以後說：

“這都是保證黨的安全鐵的紀律，任何人都得無條件遵守。如有違犯，輕則給予處分，重則開除黨籍直至予以處決。李麗娟同志，你

沒有做過秘密工作，這些紀律應該牢牢記住和絕對執行。”

他們接著又商定了幾條具體工作規定，還從今晚起，在三樓臨街的一個玻璃窗口，掛兩條肥皂作為警號，正常時一直掛在那裏，一旦發生險情就取下來。外頭來的人先看清肥皂還在不在，再決定是否進來。

夜深後，唐戈德回自己住處，劉先源去送他後，又帶回來一套被褥、床單和枕頭之類，可是張國蘭心裏總是不大踏實，在女傭許媽面前，他們反正在演戲，當著唐戈德的面倆人也只是同志關係，如今只剩了他們“夫妻”二人，並且從此每天每夜共居一室，這“戲”可怎麼往下演呢？

劉先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輕輕將自己那套被褥，鋪到小套間一張小床上，笑著對張國蘭說：

“我睡那兒，你就在大床上休息，安心睡吧，明天早起，繼續演‘戲’。明朝會！”說著便自去睡了。

早上他們連忙收拾了，故意親親熱熱地一起洗漱和吃了早飯，劉先源出去“上班”了，“太太”讓許媽上街買菜，自己在家繼續收拾新居。

晚飯前，“先生”和“表哥”又一起回來，還帶回了兩口皮箱。當夜他們在樓上房間裏，等許媽休息後輕輕打開箱子，一個箱子裏是等待分發或要從密碼轉譯、作技術處理的秘密檔案，另一個箱子裏全是絕密檔案材料。劉先源向張國蘭一一交代後，又教她學會了處理檔案的技術方法，有的用米湯或藥液書寫的文件，得用火烤或塗別的藥水，才能看見並譯出字跡。張國蘭在劉先源和唐戈德的指導幫助下，開始了這項新鮮而神秘的工作，她和自家的“先生”與“表哥”，合作得也很愉快。省委對他們的工作，也一再表示滿意，只是唐戈德和劉先源後來回“家”越來越少，許多重要工作，都是張國蘭獨立進行了。

當年秋初，由於張國蘭已經獨立工作並很有成效，“表哥”唐戈德和“先生”劉先源奉命調往別處，唐戈德的工作由化名為“胡正卿”的王為憲接替，他的妻子褚志元是湖北省委的秘密交通員，與張

國蘭早已相識。劉先源的繼任者叫李振亞，原名卻不知是什麼。他自稱是“太太”李麗娟的“堂兄”，讓張國蘭告訴許媽說，她家“先生”去上海做事了，近期內不回武漢來，只得請她的“堂兄”來為李先生代課，同時幫助照料“堂妹”家裏，平時常在這裏。許媽是個老實人，照常為這家服務著。

哪知過了不久，省委另一個秘密機關不慎被敵人破獲，新任中央特派員王為憲不幸被捕。李振亞立即通知張國蘭迅速轉移，所有檔案全部清理帶走，一紙一字也不能丟失，又要走得不露聲色。張國蘭先將三樓窗口掛的肥皂摘掉，表示這一秘密機關已經撤銷，又將文件材料等都收拾起來鎖進箱子，家裏的生活用品則一切照舊。她告訴許媽說今天要送一個表妹去外地，讓許媽去叫一輛黃包車來，把表妹存在這裏的兩個皮箱給她送去。說著又給許媽留了一些錢，關照她看好家，自己這一兩天不回來住。黃包車一到，她就帶著兩個箱子走了。

就在這天以前，王為憲的妻子褚志元，正巧要生孩子，已由張國蘭安排住在一家婦產醫院裏。從自己“家”裏轉移出來的張國蘭，坐著黃包車帶著箱子先來到褚志元所在的醫院，悄悄向褚志元報告了剛發生的緊急情況，對王為憲被捕一事向她作了安慰，又故意聲稱褚志元的丈夫正在上海，妻子生育一時趕不回來，托自己為他照顧產婦。又說原來租的房子不巧被房東收回了，自己馬上要重租一處房子，只得把兩箱東西先放在這，她趕緊出去租新的住房，等孩子生下來再接出去。她囑咐褚志元必須用生命保護好兩個箱子，自己立即出去另租房子。幾天後連箱子帶產婦加嬰兒，一起轉移到了一個新地點。自己的全部生活，也從此發生了又一次重大變化！

張國蘭一安下新“家”，趁一天晚上悄悄回到原住處的附近，遠遠看見幾天前的“家”裏燈光通明，許多人進進出出，還有不少人在門口圍觀著。她裝著好奇地向一個看熱鬧的老太婆問怎麼回事，回答說是那家的主人都是共產黨，幾天前就跑掉了，家裏只有個女傭人，她也不知主人去哪里了。警察局派人等了幾天，一個人也沒抓到，今天正在那裏抄家和審問女傭人呢。張國蘭故意若無其事地“哦哦”著悄悄走開了。立即找李振亞報告了情況，同時得到通知，讓她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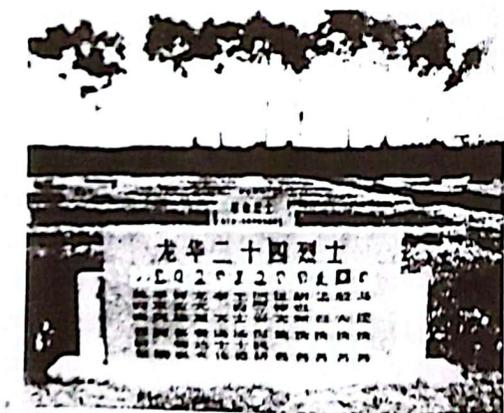


林育南

(1898-1931)

林育南

1898年 出生在林家大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团中央书记、代理湖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常委会委员兼秘书长，是“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和五卅工人大罢工，八七会议后，参加领导湖北的秋收暴动。1929年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为恢复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任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被捕，2月7日牺牲于龙华。1945年4月20日毛主席在党的六届七次会议上，对林育南等20几位同志进行了高度评价，说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



龙华二十四烈士

把文件和褚志元母嬰安置好，根據地下組織的指示，準備離開武漢到上海去。

原來這次省委機關又遭到嚴重破壞，已有三十多位同志被敵人捕獲並慘遭殺害，褚志元的丈夫王為憲同志也在其中。倖存的李振亞說，省委決定派張國蘭立即去上海向中央報告這一嚴重情況，要中央迅速派幹部來恢復和加強這裏的工作。

張國蘭回到新住處，做好了褚志元的工作，將兩箱文件檔案重新作了穩妥安排。兩天後，她懷著極其沉重悲涼的心情，在淒風苦雨之中乘船離開了武漢。一路上江浪滔滔，前景茫茫，今後生活又將怎樣？似乎一切都在雲深不知處！

六、蘇準會時又裝“闊太太” 親人遇難兩次成“寡婦”

張國蘭的第二段假夫妻“婚史”，是她在一九三〇年從山東返回上海以後。本文第四章已經提到，她回中央在上海生下了思齊，身體逐漸康復，便積極要求工作。中央決定她去正籌組的“全國蘇堆埃準備委員會”即“蘇準會”去坐機關。一九三〇年四月，她奉命去指定的地點找一位叫“趙玉卿”的同志接受任務。她去後，見到的卻是一位西裝革履還架著墨鏡的洋式闊佬，看樣子也才三十多歲，派頭卻不小。她正嘀咕這是個什麼人時，那人卻取下墨鏡，用一口湖北話對她說：

“怎麼，認不出啦？你再看看，我是哪個？”

原來這位叫趙玉卿的，是張國蘭五四時期和大革命時在武漢的戰友、領導兼老鄉林育南。他將作為蘇準會機關負責人直接領導張國蘭的工作。

林育南說，他現在的公開身份是南洋歸來的華僑資本家，張國蘭將裝成他的“太太”，共同主持一個不小的“家庭”，以掩護他們正進行的工作。他讓張國蘭改名為“張一平”，張國蘭一想，自己連年到處奔走，飄泊不定，不如取個浮萍的“萍”字，也更像女人名字，林育南說這樣也好，同意了她的意見。至此，先後叫做李麗娟、陳孟

君的張國蘭，又成了“張一萍”，並且成了一位更為闊氣的“資本家太太”。她就這樣，揭開了假夫妻“婚史”的新一頁。

“華僑資本家”林育南和“太太”張國蘭的任務很重大。三十年代初期，全國各個革命根據地內，紛紛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中央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以統一領導各地的革命政權，便決定召開一次具體籌備的會議，為將來的蘇維埃中央政府討論和制定必要的政策法令和基本條款。當時中共中央領導正在上海，考慮到上海在人員集散和生活條件上更為便利，就將會議地點定在上海，並抽調和集中了一批得力幹部，負責籌備和組織這次會議，化裝成“僑商”及其“太太”的林育南、張國蘭，是這一工作的具體負責人。

他們“夫婦”二人，先四處尋找租賃房子，要求既符合身份，適合住家又能用作開會，更便於保密和疏散。他們在市內找了兩天，選中了現在北京西路和常德路口的一處兩棟相連的三層樓房，前有院牆和鐵門護衛，進門後是一片樹木花草，正好遮掩了小樓，更可取的是另有後門和通道，既有氣派，又很安全，是一處鬧中取靜，外人難進的理想地點。他們以每月六十兩白銀重金租下了它，租期為一年。地點確定後，全部工作人員也陸續前來報到，還成立了蘇準會機關總支部，選舉林育南為書記，他是蘇準會機關總負責人。一九二七年入黨的湖南長沙大學畢業生彭硯耕，是辦公廳主任兼行政秘書，被選為總支組織委員，對外則裝成了主人的表弟。“太太”張一萍是辦公廳副主任兼機要秘書和總支宣傳委員。保衛、接待、交通和生活等各項工作，也都有專人負責。林育南和總支成員，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和守則，內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彭硯耕和張一萍主持。

按照當時的公開身份和工作需要，“老闆”趙玉卿和“太太”張一萍住在二樓的豪華臥室裏，裏面有高級鋼絲床、紅絲絨沙發、大小衣櫃和寫字臺、穿衣鏡、梳粧檯，還有書櫥、衣帽架和茶几等等，又陳列著各種擺設和盆花等欣賞品，下鋪進口地毯，牆掛名人字畫，頂上吊著琉璃華燈，好一副富豪氣派。張一萍一面自己動手佈置，一面不斷讚美歎息，以為這太講究太費錢了。林育南帶中央領導人周恩來

到這裏檢查，看得十分滿意，只是關照張一萍在臥室的衣帽架上，掛上男人的睡衣睡帽，在床前再放上男人拖鞋，使之更像“趙老闆”休息生活之地。

其實當時林育南不僅另有住家，還已有妻子和女兒。他的愛人叫李蓮貞，孩子已經三歲，她們和林育南的秘書李平心夫婦住在愚園路的全國總工會機關裏。林育南原是“全總”的秘書長，他調來蘇準會後，原來機關的人按規定不能和他公開接觸，相互關係和稱呼也得改變。有一次李蓮貞收到一份緊急文件，必須立即交給林育南本人處理。她只得帶著孩子趕來蘇準會機關，因為這時林育南公開的“妻子”是張一萍，李蓮貞來後只得稱林育南為“大哥”，自稱是他的“妹妹”，張一萍則被稱為“大嫂”。林育南和李蓮貞的孩子聽了，連說不對不對，爸爸不是媽媽的哥哥，媽媽也不是爸爸的妹妹，又指著張一萍說，這個阿姨也不是我們家的人。把幾個人都逗得笑了。

林育南卻嚴肅地批評了李蓮貞，說這樣太危險了，根本不應該帶孩子來，萬一碰上敵人，由孩子說漏了嘴，就會暴露黨的機關，誤了大事。說罷他和李蓮貞趕緊辦完正事，讓母女二人迅速離開這裏，以後也不能再來。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日，“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趙公館”秘密召開了。這座樓內陸續集中了各地代表和工作人員共八十餘名，其中有來自全國十九個革命根據地的代表，他們都是當地黨和蘇區的負責同志。大會開幕那天，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秘書長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周恩來和項英、李維漢、羅章龍、李求實等領導人，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等青年黨員作家，也趕來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在參加人數之多、代表面之廣以及級別、規格之高，在當時確是極為不易的。所以中央對這個會特別重視甚至不惜代價。

當時上海正在國民黨統治者的嚴密控制之下，敵人的軍警特務和“包打聽”等到處都是。為了掩護這次重要會議，周恩來和林育南等設計了非常巧妙的偽裝辦法，由林育南、張一萍以僑商“趙老闆”及其“太太”的身份，對外宣稱要為趙家“老太爺”過八十大壽，將由

海內外趙氏子孫親友來拜壽祝賀。林育南讓張一萍等特地佈置一個像模像樣又十分排場的“壽堂”，裏面擺滿了壽桃、壽麵、佛手、大蛋糕等等各種祝壽禮品，正中牆上掛著巨大的金色“壽”字中堂，兩邊還有“壽比南山，福如東海”之類的對聯賀幛。為了裝得逼真，特意請來一位同志的老父親，把他打扮為“趙老太爺”，讓他在套間裏休息待命，準備隨時出來作接受人們拜壽的表演。全體與會人員和工作人員，都統一了口徑，不論什麼人來或發生什麼情況，都一口咬定所有的人都是來“慶賀趙老太爺八秩壽辰”的。中華全國第一個最高紅色政權的籌備會議，就這樣在充滿封建色彩的掩護下，於反動統治和白色恐怖下，順利召開了。

這次會議開得十分圓滿，制訂並通過了《蘇維埃組織法》、《土地暫行法》、《勞動法》等一系列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針政策文件。儘管這些文件本身，不論在後來還是在當時來看，必然有著這樣那樣的問題，特別是在召開這次會議的前後，中共黨內的第二次“左”傾錯誤，即後來所說的“立三路線”錯誤，已經開始並且發生了，這次會議也難免打上了“左”傾錯誤的烙印。

可惜由於黨的第二次“左”傾錯誤，特別是“立三路線”受到批判否定，原來按其指示決定進行的活動以至被重用的人員，都陸續受到株連，成績不再宣揚甚至不被承認，人員也被調離甚至遭到貶斥，有的機構、組織也奉命撤銷甚至解散，其中不幸也包括了林育南、張一萍等主持的並付出了大量心血的“蘇準會”機關。他們都奉命一一離開了那座興旺紅火的“趙公館”，中共花重金租用一年的那處樓房，只使用了幾個月就退還了。“老闆”林育南和“太太”張一萍也解除了“夫妻”關係，全體人員都被分配了新的工作。張一萍和彭硯耕到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軍委聯絡處”，並且搬到法租界漁陽里的一座小樓裏，在那裏設立了中央軍委與中央蘇區的一個秘密聯絡點。

一九三一年一月，即王明等人正式登臺並遭到許多同志公開反對以後不久，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彭硯耕和作家胡也頻等一批同志，在兩家旅社分別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抵制王明等的錯誤做法。哪知有人向敵人告了密，軍警密探們突然包圍了會場，將全體與會者

“一網打盡”，一舉“破獲”了兩處“共黨秘密集會”地點。他們被捕了二十天后，即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兇殘的敵人將他們在滬南龍華一一秘密殺害，全部壯烈犧牲！遇難者共二十四人，其中有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龍大道和彭硯耕等黨的領導人與傑出活動家，還有胡也頻、柔石、馮鏗和殷夫等年輕黨員作家，後來史稱此事為“龍華慘案”。

當時正在上海的中央領導人周恩來，最初不知這批同志的確切下落，只探聽到他們被捕後關押到龍華監獄裏，為了查明情況設法營救，便派張一萍仍以林育南“太太”的身份和他真正的妻子李蓮貞用原定的“妹妹”身份，加上李求實的妻子陳怡君，一起找到龍華的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看守所，藉口來探監以探明這批同志的情況。他們去後又遇上了作為胡也頻妻子的作家丁玲，四個人艱難曲折地打聽到同一結果：林育南等同志已經全部遇難，無一倖免。同來探監的李蓮貞、陳怡君、丁玲和張一萍，三個是真妻子，一個是假太太，全都成了寡婦。張一萍和林育南的“夫妻”關係，雖然不是真的，但是她對於失去了林育南這樣勝過親人的生死戰友，所承受的精神打擊和悲痛感情，絲毫不亞於李蓮貞等同志。當時更沒想到，不到兩個月後，她竟成為真正的寡婦，正關在山東濟南監獄中的丈夫劉謙初，不久也被害犧牲了！

大半個世紀以後，耄耋之年的文秋老人，憶起當年慘事，仍然難以自制。她對筆者說：那年林育南等同志的被捕和犧牲，實際是王明等人造成的，是他們一夥故意將林育南等同志開會的時間、地點和名單，洩露給了敵人，結果使他們被敵人“一網打盡”並且無一倖存，王明是借敵人之手殘忍地排除了自己黨內反對者！

當年的張一萍，與林育南的“婚史”，就是這樣劃了句號。

七、三年“克格勃”秘史，一位德國籍“丈夫”

又改名為張一萍的張國蘭，在“蘇準會”工作結束後，調到了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軍委聯絡處。由於女兒思齊一直由董秋斯夫婦代為

照管著，她就經常去董秋斯家看思齊。董秋斯是位文學翻譯家，有許多外國朋友，張一萍在她家認識了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隨著接觸的增多，他們也成了好友。史沫特萊請張一萍詳談了自己的革命經歷，然後根據她的敘述寫成報告文學，送到國外發表並出了書。就是關於張一萍的那篇題為《女共產黨員單菲》。

史沫特萊考慮到張一萍正在從事地下工作，有意將女主角的名字和籍貫等改動了，以免被敵人尋蹤覓跡不安全。史沫特萊在上海時，與共產國際駐華機構的人來往密切。蘇聯在中國的情報人員，當時由德國共產黨員、著名的情報專家理查德·佐爾格領導，他在黨內以共產國際遠東第四局的名義進行活動，史沫特萊與他關係很深。佐爾格聽史沫特萊介紹了張一萍的情況，對這位中國女黨員產生了很強的興趣，就在史沫特萊的陪同下，把張一萍約到董秋斯家一起見了面，實際上對她進行了當面瞭解與考查。此後不久，周恩來有一天親自帶著張一萍，坐著他的汽車去共產國際與蘇聯在滬情報機關，將她領到佐爾格面前說：

“佐爾格同志，我黨中央同意您的意見，按照您的要求，把張一萍同志給您調來了，她今後的工作，全都由你們安排。”

說著就將張一萍向佐爾格作了介紹，並且交代她，從今天起，她的關係就轉到了共產國際遠東四局，在佐爾格領導下工作，又對她提出了希望與要求。

佐爾格對她表示了歡迎，周恩來走後，佐爾格對她說：“我們早就知道和注意你，我們這裏很需要你這樣的同志，我向中共中央指名要你來。”

接著又向她介紹了這裏的工作情況。原來佐爾格領導的共產國際駐華情報組織，專門負責搜集全國各地特別是國民黨上層的軍政動向和社會情況，整理出情報資料後密報給莫斯科的情報中心，作為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瞭解情況和制定政策的參考依據。當時在上海的這個情報組織，被人稱之為“佐爾格小組”。

儘管張一萍對以後甚至當時的許多事都不清楚，但是她作為“佐爾格小組”成員之一，事實上也為當年的“克格勃”服務過。遵照組

織紀律，她在那裏的工作和活動情況，絕對不准對外洩露，使她的這段經歷，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史，在後來的審幹時，總是說不清楚，惹了一些麻煩。不僅如此，她在“佐爾格小組”時期，還奉命與一位德共黨員結為假夫妻，在她的革命經歷中，增添了一段不同尋常的異國“婚史”。她的這第三任假丈夫，也是“佐爾格小組”的一個負責人，不過卻是一位德籍華人。

張一萍向佐爾格報到後，佐爾格馬上讓她見了那位同志，並說張一萍的具體工作，將由他負責安排。他的中文名字叫吳照高，出生在德國，祖籍是中國福建，父親是德國的華人資本家，他卻加入了德國共產黨。由於他的華人身份及其相貌，又能說一口標準中國話，並會幾種外語，適合來中國工作，佐爾格就通過共產國際將他調來，成為他在中國做情報工作的主要助手。遵照佐爾格的安排，他將和張一萍以“夫妻”名義，另租一處住房，作為“佐爾格小組”的又一辦公地點，內部工作由吳照高具體領導，對外則由張一萍負責掩護。

吳照高和張一萍在法租界租下了一處三層小樓，置辦了各種傢俱和生活用品，按吳照高的要求對各個房間作了佈置，還雇了一個上了年紀的女傭，開始組成實際是裝成了一個新的“家庭”。這個“家”裏的一樓用作客堂、廚房和女傭住房；二樓主房間是男女主人的臥室，另外又佈置了幾間小辦公室；三樓卻又佈置了一間臥室，不僅比二樓的更講究。並且主要是洋式傢俱，辦公設備也很齊全，還專門裝了一部電話。張一萍遵照地下工作紀律，只幫吳照高作了佈置安排，從不問個為什麼，樓上的房間將由誰來使用也一字不提。

一切安排妥當以後，吳照高分別領來幾位中國同志，一一分派在二樓幾間辦公室內工作。張一萍看出，他們有的專管抄寫文件資料，有的專管外文翻譯，有的管打字，有的管譯電報，還有專管警戒和交通的。張一萍遵照規定，凡是吳照高沒有主動說的，她對那些同志的身份來歷甚至姓名，都不細問，使張一萍感到奇怪的是，吳照高又領來一位金髮碧眼的外國女人，直接上了三樓那間洋式臥室，並且規定，除了他和張一萍，任何人都不准上三樓去。那外國女人來後，吳照高每天多數時間都在三樓和她在一起，夜裏也睡在那裏，吃飯則由

張一萍每天送上去一些牛奶、麵包和灌腸、火腿、雞蛋之類，由他們共同食用。吳照高除了下樓分派工作，有時也同張一萍一起吃一頓中式午飯或晚飯，每隔兩三天，又帶著那外國女人出去吃一頓“羅宋大菜”西餐。張一萍發現，她不會說中國話，每次見到只是友好地微笑和點點頭，她和吳照高全是用外語交談，有時又用捲舌頭的俄國話，在電話上向什麼人長時間地報告著什麼。張一萍對此仍是什麼也不問，只埋頭幹好自己的事。由於吳照高日夜都和三樓那外國女人在一起，張一萍每天在二樓“獨守空房”地佔了一大間臥室，倒也安然自在。

只是當吳照高向這裏的工作人員，一一宣佈內部紀律及工作任務時，張一萍心裏暗暗打起鼓來。這裏嚴格規定，凡是到共產國際機構工作的人員，都與原來所屬的黨組織切斷聯繫。張一萍等中國同志，不僅不得與中共黨內的組織和同志相互來往，也不准與所有的親友甚至熟人私下接觸，連在街上偶爾見到熟人，也不能招呼 and 說話，更不准暴露現在的工作地點及其活動情況。全部工作人員只分別接受佐爾格—吳照高的直接領導，除工作必要，任何人不得單獨外出和接觸別人，一切活動都得向吳照高報告。

張一萍的工作任務，看來也很簡單甚至枯燥，她負責搜集和閱讀上海、南京、北平等各大城市的報紙，將其中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報導，分門別類摘錄出來，整理出文字資料，交給吳照高，由他自己或分派別人譯成外文，再交給佐爾格去審閱處理。張一萍除了出去購買、訂閱報紙外，整天坐在自己房間裏，讀報、摘抄和編寫資料，使她這個本來好動和風風火火的人，憋得十分難受。特別是讓她切斷了與中國黨和所有同志、親友的聯繫後，感情上確也難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服從組織決定，硬著頭皮繼續工作著。

幹了一段時間，張一萍逐步瞭解到，她所做的工作只是“佐爾格小組”的許多任務之一。佐爾格本人及其小組成員，已經滲透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上層和各個方面，用種種手法獲得了許多機密情報，他們將這些情報，與張一萍等整理的公開報導一一加以對照查證和分析綜合，就能發現許多問題，佐爾格審定以後，就由小組內轉為密碼

或作縮微、化學等技術處理，陸續發回莫斯科。其中有些重要內容，又由共產國際轉發給中共中央，幫助他們瞭解敵人內部情況和全國動向。張一萍對工作熟悉以後，業務上也不斷提高，吳照高對她十分滿意和尊重，並且悄悄告訴她，三樓那位外國女人就是自己的妻子，也是蘇聯的情報人員，她負責校訂情報資料的外文譯稿，再翻成密碼或作別的技术處理。有些重要問題和臨時情況，也由她負責及時向佐爾格在電話上作請示報告。

張一萍在這裏的工作，雖然很有意義，畢竟過於安靜甚至刻板了，她難免有點不太安分，結果違反了一次紀律。

有一天別人都下班離開了，吳照高在三樓妻子那裏，二樓就剩張一萍一人。她正感寂寞時，忽聽樓下街上熱鬧起來，原來今天是法國的一個什麼節日，全上海的法國人都到這法租界來，結隊提燈遊行。張一萍心想反正現在既沒事又沒別人，就悄悄下樓站在門口街邊看熱鬧來。看了沒多久又悄悄回到樓上，哪知進門就見吳照高怒氣衝衝地坐在自己房間裏，劈頭問題：

“你幹什麼去了？去了哪裏？多長時間？見到什麼人？碰到熟人，說什麼話沒有？”

張一萍只得如實報告了。吳照高卻繼續嚴厲地問道：

“你可不能隱瞞，如果在外頭碰到熟人，讓人發現你在這裏，就會暴露我們的機關，後果將很嚴重。你一定要說實話，萬一有了問題，我們好採取措施。你必須彙報真實情況，不能有任何隱瞞。”

張一萍見他這樣不信任自己，很不開心地說：“我已經說了，沒有見到熟人，沒有就是沒有！”

吳照高卻不依不饒地說：“沒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經違反紀律，必須承認錯誤！”

張一萍想頂嘴，但已底氣不足，只得低頭承認錯了，接受批評，絕不再犯。不過吳照高卻通過這次事件，進一步瞭解了張一萍的性格和作風，特別是她挨批評之後，更加埋頭認真工作，並且不斷取得成績，在與佐爾格商討之後，決定發揮她的好動性格與敢闖精神，任命她為駐華情報機構的南方站站長，負責南方幾省情報網的組織和聯

繫。吳照高在同她談話時說：

“我們的工作同前線作戰和群眾運動相反，不能轟轟烈烈地幹，一時也不見自己工作的作用和意義，只能當默默無聞的無名英雄。但是你的性格不是這樣，所以組織上還是決定，把你放出去活動，免得把你老憋在房子裏。”

張一萍感謝領導上對自己的關心，接受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去香港傳達一項重要指示並取回一批秘密情報。由於這一指示極其機密，不能見諸文字，她反復背熟記在腦子裏，化裝為一個貴婦人安全去了香港，用口頭傳達了指示，又把情報資料製成縮微膠捲，縫在貼身襯褲裏帶了回來，圓滿完成了任務。一路只出了一個小漏子：

她在去程的英國豪華客輪上，為掩飾身份在船上舞廳停留時，正在舞廳的孫中山之子孫科來邀他跳舞，她不認識孫科，也不想並不會跳舞，就隨口拒絕了，弄得孫科下不了臺。好在她很快尋詞推託並離開了舞廳，以後就更小心了。

佐爾格和吳照高對她的香港之行十分滿意，為她不同孫科跳舞的事，佐爾格提醒她作為一個情報人員，要能同各種人打交道，更要會與敵方高層人士周旋並取得信任，許多重要情報常是在舞廳、酒席上獲得的。

張一萍在佐爾格、吳照高的指導和佈置下，又連續執行了幾次任務，一再受到佐爾格等的讚揚，由於她的工作出色，佐爾格打算把她送出國去學習，培養她為一個高級情報人員，哪知正在此時，莫斯科命令佐爾格立即離開中國改去日本，不久吳照高也被調去日本，致使共產國際駐華情報機構發生了很大變動。張一萍出國的事就被擱下了。

吳照高離華前夕，張一萍親自做了幾個菜，為他設宴送行，還按吳照高的要求，把女兒思齊帶給他看看。吳照高見到思齊後，抱住她親了又親，稱讚她真是個小美人，又十分動情地對張一萍說：

“我永不忘記我們一道工作、並肩戰鬥的日子，特別珍視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後我們不必再裝成‘夫妻’了，不過我想當你的哥哥，我會為有你這樣一個妹妹而高興。如果你同意，就讓孩子叫

我‘舅舅’行嗎？”

張一萍一說同意，吳照高馬上又抱起思齊說：“好，你快叫我‘舅舅’，叫‘舅舅’！”

思齊乖乖地叫了，使吳照高十分興奮。張一萍端起酒杯真誠地說：

“照高同志，我在佐爾格和你領導下工作幾年，得到很多幫助教育，我非常感謝你們，也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特地敬你一杯水酒，祝你一路平安，工作順利！”

吳照高接過一飲而盡，又說：“今天，我要向你道歉，過去我對你關心照顧很少，那年還為你出去看提燈會，批評得很過分，希望你能原諒。我相信會有一天，中國革命勝利了，全國人民都來遊行慶祝，那時我一定爭取再來，和你們一起歡呼勝利。來，為那一天早日到來，乾杯！”

他連著豪飲幾杯。臨別時又緊緊抱住思齊道：“來，對舅舅說：再見！”

哪知他一去就沒能再見。

佐爾格和吳照高走後，莫斯科派華爾頓來主持駐華情報工作，張一萍又被任命為華北站站長，一直工作到一九三五年初，因華爾頓被捕，國際情報機構奉命撤銷，張一萍等中國同志才回到中國黨內，她在那兒工作了近四年。

如今從共產國際到佐爾格、吳照高和華爾頓等，都已成了遙遠的歷史煙雲，有的連痕跡也未留下，但在當年的張一萍、今天的張文秋老人心上，始終銘刻著那幾位異國戰友的英名，連她與吳照高那段過於嚴肅、枯燥的“夫妻”生活如今想起竟感到一陣特有的溫馨和意味深長。

八、浦東又遇好“先生” 三當“遺孀”去投親

還在吳照高離開中國以前，共產國際遠東局為了深入瞭解上海工人運動情況，調查幾家英美企業中外勾結的活動，通過中共地下組織

將張一萍派去上海浦東，打入那裏的英美煙廠，專事搜集所需情報。

當時擔任浦東區委書記的是李耀晶同志，他按黨的指示為張一萍作了安排。張一萍去後，公開身份是英美煙廠子弟小學的老師，通過學生家長和工會組織瞭解各方面情報。李耀晶還讓她參加了區委會，不斷瞭解和參與領導各廠的工人運動，以掌握和搜集全面情況。又在工廠附近為她找好並租下一處合適的住房。

李耀晶來接張一萍過去時說，那裏的房東不肯把房子租給單身女客，只讓有家小的人住，他只得說自己和張一萍是夫妻關係，並且以他的名義租下了房子。他又向張一萍提出，要她把孩子也帶來住在一起，有個小孩就更像個家庭了。

張一萍心想，自己和吳照高假夫妻的戲還沒全部演完，又要在這同李耀晶另裝“夫妻”，還要建立一個像模像樣的小“家庭”，真成了戲中有戲了。

於是，李耀晶繼劉先源、林育南和吳照高之後，成了她的第四位假丈夫，從而揭開了又一頁“婚史”。

新的“家庭”組成後，張一萍和李耀晶訂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對外李耀晶是這家的“先生”，但平時不在這裏住，只能在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來這裏與他的“太太”見面，實際是來交換情況研究工作。張一萍每週去一次共產國際機關，向上級彙報和遞交情報資料，平時就在學校教課並在廠區和家屬區活動。

張一萍的工作使她的領導都很滿意，她也為自己能回到工人群眾中，重幹自己熟悉的工作，又能和女兒思齊天天在一起，更是分外滿意。有一天晚上她正帶著思齊在窗口玩，見到李耀晶從外頭慢慢走了進來。他剛一進門，張一萍就嚴肅地說：

“今天不是規定的碰頭時間，你怎麼來了？再說……”

李耀晶連忙插緊門，對她笑道：“別著急，按照規定，我晚上不能來，更不准在這過夜，可是我今天應該來。”

張一萍說：“組織紀律不能違犯，我可是要嚴格遵守的。”

他又笑著歎了口氣道：“唉，你也不想想，如果我一直不來，外人不是反而會懷疑我們，這家的先生怎麼老不歸家？這裏是我的

‘家’，我常來才更安全。今天更是有事情才來的，應該馬上同你說說和商量一下。”

“什麼事情，你快說吧！”張一萍催他道：

“組織上向我透露，說共產國際方面對你的工作和表現非常滿意，認為你是個很有才能和發展的同志，打算對你進一步培養深造，已經和中央負責同志商量的，想送你到國外去學習，中央讓我幫你考慮和安排一下，我就先同你通個氣，讓你有個思想準備，組織上將要正式找你說這件事。”

張一萍聽了，喜不自禁地說：“好事兒！謝謝你先來告訴我。”正說著，思齊半睡半醒地叫了一聲“媽！”她不由發愁地說：“要是我走了，思齊怎麼辦呢？我已經沒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給誰呢？總不能帶出國吧！”

李耀晶說：“我來找你，就是為了這件事。我已經反復考慮過了，你要能出國深造，我也為你高興，願意為你分擔一切。有這麼個辦法請你考慮，能不能就利用我們現在這種公開的‘夫妻’關係，索性把思齊當作我的孩子，由我把她交給我家裏，讓我母親負責撫養她。告訴你，我母親早在催我結婚，正盼著抱孫子呢。我們給她送個孫女去，不是正好嗎？只要說是我的孩子，我媽肯定會照管得很好！”

張一萍覺得這事不小，來得太突然了，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就同李耀晶認真商討著各種可能的情况和妥貼的辦法。兩人傾心交談著，不知不覺夜已深了。張一萍忽然警覺道：

“啊呀，這麼晚了，你——該走了！”

李耀晶卻搖搖頭道：“這麼晚了，我就不能走了！你想想，你‘先生’好容易回來，到了半夜又要走，人家會怎麼說，這不是反而引起懷疑，自動暴露目標了嗎？我看，還是不走了，你說行不？”

張一萍發愁地說：“那你——怎麼住？可不能——犯紀律啊！”

李耀晶悄然一笑，也嚴肅地說：“你就放心吧，我們都是黨員，還是負責幹部，當然遵守黨的紀律，這麼辦吧——”他說著就抱起一床閑著的被子，鋪到牆角地板上，又向張一萍要了個枕頭，對她說：

“不早了，你也休息吧，安心睡個好覺吧，我可也睏了！”然後連著衣服，用被子一裹，在地板上倒頭就睡。

張一萍見了，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擔憂、敬重、憐惜、甚至遺憾，什麼都有。她坐在床上愣了好久，眼看天快亮了，才和衣倒在床上，幾乎一夜未眠。

天一亮，李耀晶就輕輕起身。張一萍裝著睡熟了，聽他疊好被子放回原處，又輕輕打開門帶緊了，還同房東打了招呼，說是有急事要早走，“太太”和孩子還睡著呢。說完就匆匆走了。

李耀晶走後，張一萍動情地想道，真是個好同志、好黨員啊！就像他的名字，真有著一顆耀眼透亮的水晶般的心呢！她為自己能有這樣親人般的好同志，感到無比的幸福和溫暖。

正如李耀晶所說的，組織上不久就同張一萍談了打算送她出國學習的事，她也同意把思齊交給李耀晶家照管。李耀晶馬上給他在江蘇沐陽的家裏寫了信，說自己早已在上海結了婚，並且有了個女兒，因為自己和“妻子”事情太忙，收入有限，帶孩子有困難，想把“女兒”送回老家跟奶奶過，使自己在外頭做事更方便。

這封信寄出後，沐陽那位思子盼孫心切的老奶奶竟喜出望外，馬上覆信表示歡迎，還給她不僅未見過也沒聽說過的“兒媳”和“孫女”寄來了錢，讓他們趕緊回鄉去讓她看看。哪知就在這時，張一萍和李耀晶共同的“家”，又被突然破壞了！

李耀晶有次去市區開會，在路上被一個叛徒發現告了密，當場被捕關進監獄。敵人對他嚴刑拷打，逼問黨的機密，他始終一字不露，敵人就重刑對他摧殘折磨，結果慘死在獄中！

張一萍得到消息後，如同以前聽到劉謙初和林育南犧牲時一樣，悲痛得簡直難以自制。組織上讓她以李耀晶“妻子”的身份，出面處理了烈士的善後工作，使她第三次成為烈士的“未亡人”。她料理後事以後，又很快給李耀晶家去信報喪，告訴他母親說他因急病突然身亡，正用家裏剛寄來的錢，由同事們幫助理後事，自己和孩子都不能馬上去蘇北了。

李家奶奶自然極其悲痛，好在李耀晶還有兄長，他們一起安慰老

母，又回信勸慰已故兄弟的“遺孀”，讓她節哀保重，帶好“李家骨肉”。還表示以後將每月寄錢來，用以撫養李耀晶留下的“女兒”。

就在這前後，中共黨內以至共產國際內，都發生了一些事故變化。佐爾格和吳照高的相繼調離中國，加上李耀晶的不幸犧牲，不僅使張一萍出國學習的事辦不成了，也使她的工作和生活再次改變。她不久就離開浦東並且調出共產國際駐華機構，回到了中共黨內。由於當時上海白色恐怖極其嚴重，中央機關和許多同志都陸續撤走，轉移到革命根據地去了。張一萍在地下組織的安排下也要去江西中央蘇區另行分配工作。蘇區正在進行反“圍剿”戰爭，不可能把孩子也帶去，張一萍又為如何安頓思齊犯了愁。正巧李耀晶家又給她來了信，李家老奶奶十分關切張一萍母女的情況，說兒子突然去世，就格外想念他的“妻子”和“女兒”。不由觸動了張一萍，李家既然已經確認思齊為自家“骨肉”，不如順水推舟，仍然遵照李耀晶生前的安排，將思齊送到李家靠老奶奶去。她把自己的想法向組織上彙報了，正好有位也要去蘇區的同志，他的老母親無人照管，就讓她作為思齊的保姆，和孩子一起去李家安身。組織上肯定了這個辦法後，張一萍馬上給李家去信，說準備把孩子及其“保姆”都送到沐陽來。李奶奶見信後馬上派李耀晶的哥哥趕來上海，專程迎接“弟媳”及“侄女”等回鄉。

張一萍和李家，雖然並不存在真正的親屬關係，卻因李耀晶結成了一“家”，並且帶著思齊及其“保姆”，真的投親來了。

李家奶奶一見張一萍母女，不由悲喜交集，十分憐愛兒子留下的這對孤兒寡母。不過張一萍在李家住了幾天以後，漸漸發現了一些問題，感到這裏未必是能久留之地，幾經考慮並與同來的“保姆”商量，還是改變了原來的想法。

原來李家的家境並不十分富裕，李奶奶對思齊倒是很好，掌握家政大權的長房兒媳，對於家中平添兩個吃閒飯的人，表現出很不歡迎的樣子，又對突然出現的“弟媳”“侄女”及其“保姆”，感到“來歷不明”又無憑無據，李耀晶已死也無從查對。張一萍從“大嫂”的冷眼中，預感到思齊和“保姆”將來必受冷遇，把他們留在這裏，日

子不會好過，自己也放心不下。加之思齊一直在上海生活，那“保姆”也是南方人，吃慣了大米，沭陽那兒偏偏不產大米，他們吃不來麵食雜糧，只能用高價去買或換一點大米給他們吃，那位管家大嫂更是冷言冷語冷面孔。“保姆”擔心自己和思齊將來會飯都吃不上，思齊更是堅決不肯再離開媽媽。張一萍只得決定，將孩子和“保姆”仍然帶回上海。

她先同李家大哥說了，孩子和“保姆”過不來這裏的生活，也不願使“家”裏負擔過重，他們還是都回上海去，另外再想辦法。李奶奶雖然捨不得“孫女”，但見“兒媳”說得也在理，大兒子也認為不宜強留他們，便同意他們一起返回了上海。

幾經周折後，形勢又發生了變化，由於敵人對革命根據地加緊封鎖和“圍剿”，中央蘇區進不去了。不久，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了戰爭，張一萍只得滯留在上海，後來由地下組織安排，一面參加市內的抗日救亡工作，一面帶著思齊過了一段極其艱難的流浪生活。

他們飽嘗艱辛，幾經危難，熬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中共中央已經定居陝北延安，組織上才決定，張一萍可以帶著女兒，經過西安到正在延安的黨中央去，他們這才真的可以回“家”了。

離開上海的火車一開動，一直興奮著的張一萍，忽然心頭一陣沉重。她看著車窗外疾速遠去的一撥又一撥人群，一座又一座房屋，一條又一條道路，不由想起自己在這裏的一個又一個“家”，一個又一個比親人還親的戰友和同志，特別是同他們並肩戰鬥以至“共同生活”的一個又一個難忘的日子，他們有的已經不幸犧牲，有的也是不知去向，有的還得繼續生活在敵人的魔爪和屠刀之下……

她在心中無聲地呼喚著：“親愛的戰友、同志和親人們，再見——不，有的是永別了！”

她忙閉上淚眼，只覺眼前閃過了無比熟悉、親切的林育南、吳照高和李耀晶等“丈夫”的面貌和身影……

九、奔赴延安母女歸家 獨腿戰將喜結良緣

共產黨人常把黨比作“母親”，黨組織也就成了黨員的“家”。

領著烈士遺孤思齊的烈士遺孀張文秋，進入了延安真像回到了家裏見著了媽媽。她參加革命以來，一直在白區活動，如今在解放區，只覺天空格外晴朗，大地分外壯美，見到每個同志都感到特別親，她和思齊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特有的溫暖和親情。

張文秋母女還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時，每天都見到一位拄著雙拐的傷殘同志，聽說他是位紅軍指揮員，在長征途中負傷失去了左腿，治好後正準備回延安去。紅軍和長征，張文秋早就嚮往和敬仰了，對這位長征紅軍，她充滿同情，更對他的傷殘不便，本能地表示關切。年已七歲的小思齊，也引起了這位紅軍叔叔的注意，有一次他叫住了思齊，問了她的名字和年歲後，又問道：

“你爸爸呢？”

思齊按照媽媽事先的囑咐說：“上前線去了！”

那同志又問她爸爸叫什麼，在哪里等等，思齊回答不出，就去問媽媽。

張文秋已經瞭解到，這位同志叫陳振亞，原是湖南的一個放牛娃，一九二六年投身北伐軍並入了黨，參加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後，在井岡山和蘇區反“圍剿”中多次立了戰功……她覺得對這樣的同志應當說實話，就將謙初犧牲的事告訴了他。陳振亞聽後，心情沉重地摟著思齊說：

“這麼小的孩子，就沒了……這麼好的同志，又……太可惜了！”接著又對張文秋說：“你們在白區那麼多年，真不容易，很不簡單，可苦了你們了！”

張文秋感到，陳振亞不只是一員武將，還是位情感深沉的同志。後來他們就常來常往，思齊常去聽陳振亞講故事，張文秋也就幫他做點因傷殘不便的事。西安辦事處用卡車送一批同志回延安時，他們正好被安排在一輛車上，陳振亞讓思齊跟著他，一起坐在卡車駕駛室

裏。開車以後，他一路上用身子為思齊遮擋風寒，車子一顛，他就用雙手緊抱著思齊，生怕她被磕著碰著。途中在黃陵休息時，他又給思齊講黃帝的故事，給張文秋講黃陵的古跡，過渭水時又講了姜太公釣魚和周武王伐紂的故事。這不僅使思齊更喜歡這位陳叔叔，也使張文秋越來越敬重和願意親近他。

車過三原八路軍接待處時，凡過往同志都按照規定在這裏換裝，進邊區的同志開始穿上八路軍軍服，去白區的同志也得換上便裝。陳振亞馬上脫掉在西安穿過的便衣，換上了整潔精神的軍服。第一次穿軍衣的張文秋也覺得自己從內到外都煥然一新。只是思齊因為個子太小，怎麼也找不到她能穿的軍衣，她為自己不能和媽媽與陳叔叔一樣，也當上英勇的八路軍，懊喪地把小嘴噘得老高。

陳振亞忙說：“思齊，咱們不急，你沒看見，我在西安時，沒穿軍衣，照樣是個八路軍，你現在就是還穿著原來的衣服，也是個天生的小八路軍。是不是八路軍，不靠外表，全靠自己有沒有八路軍的心，你說對不？”又答應她到延安以後，再想辦法為她專門找一套特小號的軍衣。

車到延安時，思齊同陳振亞竟難捨難分了，他的言行也深深地打動了張文秋的心。由於他們分屬不同的組織系統，張文秋帶思齊住進了中央組織部的招待所，陳振亞去中央軍委報到。他們分手時相約，安頓下來以後，一同出去觀賞一下延安的風光景色。後來張文秋被分到陝甘寧邊區政府法院作文書，陳振亞去抗日軍政大學，邊學習邊擔任校黨委宣傳委員兼學員大隊支部書記。

正式上班以前，陳振亞約張文秋帶思齊登上清涼山，遊了延河灘，清涼山有許多石窟佛像等古跡，延河灘已成為八路軍的操練場和延安軍民的遊憩地，陳振亞又給他們講了許多從歷史到現代的故事，使張文秋及女兒在遊覽中又得到了許多知識，她不由贊佩地說：

“振亞同志，你不是沒上過學嗎，怎麼知道那麼多事，有這麼多的學問！”

陳振亞笑道：“說了你別笑話，我肚裏這點東西，全是‘偷’和‘搶’來的！”

原來，陳振亞小時曾為一個地主少爺當書僮。先生給那少爺講課時，他一直在旁邊陪著，所有的書籍文具等等也都由他負責收管。可那少爺從來聽課不用心，下課根本不看書，反讓陪著他的書僮聽會學到了許多知識，“偷”著了不少學問。他參加革命以後，每次打土豪或收繳戰利品時，只要見到書本報刊，他都搶先抓來，抽空一一閱讀，又“搶”到了許多知識。所以他已是所在紅軍部隊中的一個小有名氣的“土秀才”。張文秋在瞭解這些以後，陳振亞在她心目中，已不再是個傷殘老戰士，而是一位外剛內秀的真正男子漢。

當時的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是張文秋的直接領導，也還沒有結婚，她對張文秋的來到十分歡迎，不時來逗思齊玩。由於他們同在一個單位，住處又緊挨著，雷經天還特別喜歡思齊，見她吃不來小米，就設法弄來一點大米，用搪瓷茶缸在炭火盆上煮成飯，有時還從哪兒找到一個雞蛋，給這個可愛的烈士後代一點“特殊待遇”。這不僅使思齊與他親近起來，也使張文秋對他十分感激。結果發生了一點小誤會。

有一天，雷經天的警衛員對張文秋說：“我們首長好像對你很有意思，你有沒有這個意思呢？”

張文秋連忙說：“你可能誤會了，雷院長對我們是階級友愛，關心烈士後代，我對他是尊重和感謝，沒有別的意思。”又嚴肅地說：“你剛才說的話，可不能對別人說，不然會對首長影響不好。”

警衛員歎氣道：“我是替首長著急，才來問你的，不會讓別人知道。要不是誤會多好！”

雷經天當時確也關心張文秋的“個人問題”，他們有次談起了這件事，張文秋坦率地告訴他，自己已經有了一位男朋友，就是經常來看她的陳振亞。雷經天說自己也認識他，那是位好同志，又說：

“振亞同志為革命流了鮮血負了重傷，他應該得到幫助和關心，如果有了你對他的照顧，他會很幸福的。我見他對思齊真心喜歡，孩子應該有個這樣的爸爸。”

星期天陳振亞又來時，雷經天特意請他和張文秋母女一起去吃飯，真誠地為他們祝願。過了一段時間，雷經天問張文秋同陳振亞談

妥婚事沒有，張文秋說還沒有。雷經天竟催她說：

“他這樣真心愛你，每次帶著傷殘來看你，出門一次多不容易，我看你們不要久拖了，早點成家，互相好有個照顧。”

其實張文秋已經向陳振亞表示了，自己到延安還不久，想先好好做些工作，等一等再結婚。陳振亞也理解和支持她，兩人說我們就算已經訂婚了吧。

一九三八年初，中央決定開辦一座“抗日軍人家屬文化學校”，由於張文秋過去上過師範學校，就抽調去當教員。臨離開邊區法院時，老領導雷經天專門為她設“宴”餞行，並且請來陳振亞作陪，使這對未婚夫妻及其女兒思齊，充分享受了革命大家庭特有的同志愛和戰友情。

張文秋去報到後，又擔任了抗屬學校的總務主任，還兼任了邊區魯迅小學的語文與歷史教員，工作任務很重。由於她忙起來就顧不上思齊，就把她送進了邊區的托兒所。

陳振亞還是一到星期天就來看他們母女。有一天剛下過雨，那時延安都是泥路，陳振亞腿腳不便，結果一跤滑倒，滾到山下水溝裏，殘腿又受了新傷。張文秋得知立刻趕去，把他接到自己住處，只顧為他擦洗護理，一時沒管思齊，陳振亞讓她去照管思齊，她說：

“你們兩個人，一個是小孩子，一個是大‘孩子’，不過我現在，只能先管大的。”讓他就在這裏養傷。

陳振亞感到不能因為他影響了孩子，他們還沒有結婚，更不能住在這裏，也不能耽誤張文秋的工作，他執意要回抗大去。張文秋拗不過他，只得找來一副擔架，由幾位同志抬著並親自護送他回去。她幫助抗大的同志把陳振亞安頓下來後，關切地問他剛才折騰得傷處疼不疼，他說：

“有你在身邊，我就忘記疼了，真的。”又說：“我已經不疼了，你還是快回去，思齊正在家裏，她比我更需要你，快去照看孩子吧！我這裏有同志們幫助，你就別管了。”說著堅決把張文秋給“趕”走了。

張文秋哪能放心得下呢，她三天兩頭跑去看望和照看陳振亞，

天黑了還得走山路趕回去，既耽誤了工作，影響了孩子，又增加了負擔，陳振亞不安地說：

“讓你這樣跑來跑去，實在於心不忍，想留下你，又不合法，不讓你來，你又不肯，老是這樣怎麼行呢？”

張文秋說：“這些日子我也想過了，你為了看我摔傷了，我覺得很對不住你。你這樣關心和體貼我們，我也不願再失去你，我看我們就給組織上打報告，申請批准一塊過吧！”

陳振亞笑道：“感謝老天爺，我早就等著你這句話了。咱們馬上寫報告，請求結婚，不再兩頭跑了！”

於是兩份同一內容的報告，張文秋送了一份給中央組織部，陳振亞一份交到了中央軍委。兩天後，兩份報告都批了下來，准予陳振亞、張文秋結婚。哪知到了喜日子，雙方單位卻發生了爭搶新人的爭執。

陳振亞所在的抗大，很快為他準備了新房。張文秋所在的抗屬學校，也為她騰出了結婚用房。兩個單位為當婚禮主辦者引起了爭執。抗大人多勢眾，說自古只有女方嫁到男家，男的上女家，就成了倒插門女婿，說抗大的人只娶媳婦，不當上門女婿。抗屬學校馬上反攻，批評對方是封建思想，要新事新辦反封建，把男的“娶”到女方來。

兩邊真是公說公理、婆說婆理，最後還是張文秋自己出來說，陳振亞有傷來去不便，還是她上抗大去，按老規矩嫁到陳家去吧！

雙方都為新娘如此體貼新郎而不斷讚歎，為此共同作出決定，把婚禮辦得更紅火些，一起都到當時最氣派的中央軍委禮堂舉行新婚典禮。新郎新娘的所在單位及戰友同事，還有各個兄弟單位的領導、同志，紛紛趕來賀喜。剛從前方回延安的彭德懷副總司令，聽說自己的老部下辦喜事，也趕到他們新居來賀喜。彭老總來時，陳振亞忙讓思齊來叫彭伯伯，彭總把思齊拉到自己懷裏，對陳振亞說：

“你要承擔好父親的責任，照顧好烈士遺孤，好好教育培養她，使她成為一個對革命有用的人。”

彭總又問了他們一些情況，憐愛地撫著思齊，臨走時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包，說是留給孩子的。他一走，陳振亞和張文秋打開一看，

裏頭竟包著六十元錢。那時延安一般幹部每月才兩三元津貼，高級幹部也只有五、六元，這六十元真是一筆鉅款。陳振亞、張文秋早知彭總自己一向艱苦樸素，覺得不該接受他的厚贈，連忙給他送回去。彭總卻說：

“這是給孩子的，算是我的一點心意，你們給孩子買點吃的用的，把她的身體養好，孩子和你們過去吃過很多苦，應該改善一下，我們多吃苦，不就是為了他們能享福嗎？”

最後還硬是讓張文秋把這筆錢收下了。

陳振亞在抗大學習結束後，由軍委分配到設在雲陽的八路軍一一五師留守處任政治處主任，張文秋還留在延安。雲陽離延安雖然只有幾十里路，夫婦二人卻是分居兩地。分別時陳振亞特別捨不下思齊，孩子同樣也離不開他。思齊和媽媽將爸爸送出路口，戀戀不捨地回到家裏，忽然發現本來要給爸爸帶走的枕頭丟下了，連忙抱起枕頭追去，跑了很遠很遠，一見爸爸的身影就連聲大喊：

“爸爸，慢點走，你把枕頭拉下了，我給你送來啦！”

接過枕頭的陳振亞，止不住熱淚漣漣，抱住女兒親了又親，顫聲說：

“謝謝，好女兒！”又對趕上來的張文秋說：“辛苦你了，替我好好照顧孩子，你自己請多保重。我先去那裏，以後想法來接你們過去，還是在一起好。”

到了春天，張文秋剛剛懷孕，他們打算將來生育時就都到雲陽去。在此期間，張文秋抓緊時機進了抗大，當了五個月既帶著孩子又懷著孩子的媽媽學員。學習期間，她同陳振亞只能通信往來，只有思齊老是催問媽媽，說爸爸為什麼還沒來接他們去雲陽。

當年九月，張文秋學習結束，組織上根據她和陳振亞的情況，分配她也去雲陽，擔任了一一五師留守處的秘書，還主編一份內部刊物。去後不久，她就生下了一個女孩，這就是後來的邵華，最初叫做安安，取其希望從此生活安定、全家安樂之意。

可惜，這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當年的政治風雲和戰爭形勢，使他們的日子過得不僅並不平靜，反而屢遭變故，歷盡坎坷，直至最

後，竟以又一場人間悲劇使他們渴望擁有的家庭幸福之夢破滅了！

十、出國不成葬身異鄉 支柱又折深情永存

陳振亞和張文秋所在的一一五師留守處，一九三八年底改編為八路軍榮譽軍人學校，又由雲陽遷至旬邑。陳振亞是榮校領導人之一。旬邑地處邊區與白區的交界地區，國民黨軍隊常來挑釁襲擊。一九三九年五月，敵人調集大軍又要進犯旬邑，我軍在這裏只有一個獨立營加一個警衛連，其餘都是榮校的傷殘學員。由於敵軍來得猛，已來不及請求延安派援兵來，就由陳振亞指揮僅有的兵力迎擊敵人。戰鬥打響前，張文秋說要求參戰，陪著陳振亞同上前線，卻被他拒絕，說不能丟下兩個孩子。張文秋說孩子有專人管，她只是對單腿的陳振亞不放心，堅持與他並肩出征。惹得陳振亞對她吼道：

“我是作戰指揮員，任何人都要服從我的命令，我不准你上前線，你就不能去！”

兩人正吵著，榮校別的領導人忙拉開張文秋，指定她負責組織不能參戰的老弱病殘轉移疏散，隨時準備參加後備隊支持前線。她只得執行任務去了。

陳振亞因為只有一條腿，坐著擔架上了前線。張文秋在駐地聽到前面槍聲一響，一顆心立刻懸了起來，儘管她從來不信神，卻為自己丈夫的安全和戰鬥的勝利暗自祈禱著。激戰開始不久，就有傷員烈士被抬下來，每下來一個人，張文秋都要去看看，並且責備自己在振亞出發時，不僅沒有好好寬慰支持他，反而同他吵了一架。萬一……她真不敢往下想。

打到半夜，戰鬥才告結束，進犯敵軍全被擊退。快天亮時，陳振亞率隊勝利歸來。張文秋撲向他坐著的擔架，見他雖然滿頭滿身都是煙塵黑灰，卻沒受傷。陳振亞高興地向榮校別的領導人招呼著，向他們報告作戰經過，接著又向延安報捷。

第二天，當地軍民舉行了祝捷大會，歡慶“獨腿將軍”指揮打了勝仗。中央軍委和毛主席、朱總司令也派人趕來，傳令嘉獎保衛邊區

作戰有功的部隊和人員，特別表彰了指揮員陳振亞，人們都說他用一條腿就打垮了敵人。

為了讓陳振亞補上一條腿，好對革命作出更大貢獻，中央決定他和一批傷殘同志一起，去蘇聯治傷安假肢，讓張文秋和孩子陪他同去。

他們告別邊區，經過西安、蘭州，輾轉來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在那裏等待蘇聯用軍用飛機來接他們出國。哪知就在這時發生了蘇芬戰爭，蘇聯抽不出飛機來了。他們在迪化機場白等了幾天，只得轉到市內的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待命。不料不久又發生了新的更嚴重的情況，當時統治新疆的軍閥盛世才，最初為了投機，一度裝著傾向革命，同蘇聯友好並歡迎共產黨人來新疆，八路軍辦事處就是那時設立的。但是隨著國內外反動勢力加強，自己也已羽翼豐滿，便翻臉不認人，公開投靠蔣介石反共反蘇，不僅中斷了與蘇聯的交往，也對新疆“八辦”進行封鎖包圍和嚴密監視。這使陳振亞他們既去不了蘇聯，也回不了延安，陷入前進無路、後退無門的境地。

陳振亞他們只得長住下來，並在“八辦”的統一組織下，利用這個機會進行政治和文化學習。從一九三九年底開始，他們集體學習了《聯共（布）黨史》、《政治經濟學》、《新哲學大綱》、《中國革命問題》和兩大厚本的《資本論》。還認真學習了中共中央的各種文件指示，每人結合學習檢查總結了各自以往的工作和思想，使“八辦”的小招待所，成了一座學習馬列和政治文化的新學校。陳振亞在學習期間，寫了不少筆記，看到的人都說他寫得內容豐富又聯繫實際，做到了工農分子知識化。

國內外形勢的惡化，使陳振亞他們在新疆一困幾年，思齊和安安也漸漸長大了。他們在市內太悶也活動不便，一九四一年五月的一天，和“八辦”同志一起，帶著孩子去了郊外，到了南山腳下一個叫札磨溝的地方。那裏有一條河，河上有座古老的木橋，思齊見對岸正野花盛開，高興地喊：

“爸爸快看，那麼多花，多好看啊！”

特別愛孩子的陳振亞，一高興就要過橋去摘。他拄著雙拐一步一

顛到橋上，哪知這橋看來完整，實際已經腐朽，他剛到橋中間，就聽橋上嘎吱亂響，橋柱直晃，橋板欲墜，張文秋慌忙大喊：

“不好，橋要塌，振亞，快下來！”

她正要跑去接，就見橋身一歪，斷柱破板四散，灰土煙塵飛濺，只聽一聲轟響，振亞和整座橋都不見了！張文秋連聲哭喊：

“振亞，振亞！”

已無人答應。她又哭著叫道：

“快救人啊，老陳掉河裏啦！”

她自己搶先下了水，人們紛紛趕來，從水中救起振亞，張文秋見他額頭被碰破，流了一臉血，身上也有幾處青紫，振亞不顧自己急急問道：

“孩子呢？都沒事吧？”

直到看清驚魂未定的兩個女兒都完好無損，才放心下來。

他們馬上回到“八辦”，張文秋為振亞換衣擦洗，來包紮的衛生員說他可能還有內傷，應該進醫院檢查治療。振亞卻不願組織上為他費心，說這裏的醫院是為軍閥官僚服務的，未必肯收治他這個八路軍，不想去醫院。但是“八辦”缺醫少藥，領導上擔心他萬一內傷嚴重會危及生命，還是決定將他送醫院，由張文秋陪他去。

檢查結果表明，傷勢果然不輕，已經導致舊傷復發，殘留體內的彈片、碎骨引起血液中毒，必須手術治療。誰知真被陳振亞不幸言中了，為他主治的外科主任就是個從蘇聯跑出的白俄，本來就仇恨共產黨，他在手術前，竟採取了一種特殊的療法，連續給患者抽了十幾天血，每天抽出半碗血水，使陳振亞更加虛弱了。張文秋不斷提出疑問，那白俄醫生卻不理她，她只得回“八辦”報告，並且弄來幾個雞蛋，讓振亞補充一點營養。但在白俄醫生的“治療”下，振亞的病情傷勢越發嚴重，最後只得由“八辦”出面和患者家屬堅持，才停止所謂“抽血療法”，又草草地做了手術。手術傷口還沒完全癒合，那醫生就讓振亞出院，“八辦”領導上和張文秋都認為，手術後療效並不明顯，應該再觀察幾天，不同意馬上出院。白俄醫生又藉口病房緊張要進新患者，陳振亞不出院也行，但其家屬不能再在此陪住，當晚就



張文秋（前中）、鄧華（前右1）、毛新宇（後中）等，1980年代攝

將張文秋趕走。

第二天一早，張文秋就趕到醫院，推開振亞所在的病房，只見振亞一動不動半昏半醒地躺在牀上，她連忙輕輕呼喚，振亞沒有反應，又連推他幾下，振亞才艱難而遲緩地半睜開眼睛，斷續地說：

“我，不行了，回不去了！這裏，在害我……”

她連忙催向，才慢慢弄清，昨天自己走後，護士就給振亞拿來一包藥，說醫生要他一定吃下去。他只得遵囑吃了。不久就覺得腸子都要斷了，一夜連續嘔吐二十多次，整個人都被掏空了似地難受。

張文秋見他變形的臉，心中傷悲，眼淚滾滾而下。陳振亞艱難地說：

“你，快回去，報告領導，再把孩子，都帶來，給我，再看一眼……”

當時領導新疆“八辦”的，就是張文秋早年的老師、黨的“一大”代表陳潭秋。他得訊就趕到了醫院，振亞一見他來，就掙扎著說：

“我被，敵人，暗算了！我不能，為黨工作，也看不到，勝利

了……”

他見張文秋把思齊和安安都領來牀前，又斷續地說：“這兩個，苦孩子，我只能，託付給……黨了！”他竭力伸出手，抓住兩個孩子，柔聲道：“我的，好娃，爸，不行了，看不到你們，長大了！你們以後，要聽媽媽的，陳伯伯的，和黨的話，做個，革命的，好孩子……”

張文秋止不住哭出了聲，陳振亞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說：

“文秋，我對你，不起，沒能為你，分擔一切，你太苦了！只求你，千萬保重，帶好，我們的，孩子……”話沒說完，就暈了過去。

陳潭秋忙叫醫生，醫生讓護士給打針，正要打時，陳振亞卻一下醒來，雙手縮起，連續用氣音說：

“不，不打，他們，會害我！”

陳潭秋和張文秋忙找醫生問，是不是就別打了。那醫生卻怒道：

“你們懂什麼，病人已經神志不清，不打不行！”命令護士，強行扒開振亞的衣被，按住四肢，狠狠地紮了一針，然後一起揚長而去。

他們剛走，張文秋見振亞迷朦地半睜開眼，嗓子裏咕嚕道：

“我，捨不得……真捨……”

話沒說出，就身子一挺，再也不動了。張文秋顫抖的手放近他的鼻孔，呼吸已停，沒等她喊出聲來，就昏倒牀下……

等她醒來，陳振亞已被送進太平間……

幾天後，新疆“八辦”在陳潭秋主持下，舉行了陳振亞的追悼大會。入殮前，陳潭秋找來一套呢制軍服和一雙軍用馬靴，和大家一起為陳振亞換上，右腳套上馬靴，左膝下放著另一隻……

振亞剛去世，蘇德戰爭就爆發了，盛世才徹底露出了反動面目，將“八辦”人員由軟禁改為逮捕，無論男女老少包括幾歲的安安和思齊，一齊投入監獄。張文秋在獄中為振亞生下了遺腹女——少林。直到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毛澤東主席在重慶談判時，要蔣介石放出被囚禁在新疆和全國各地的革命者，又經過張治中先生等的努力，張文秋才帶著三個女兒和許多同志一起，走出監獄，離開新疆，奔向延安。

這時，未出娘胎就在山東坐過牢，後來在上海出生的思齊，已長成為一個十六歲少女。她在陰暗的反動牢獄中，和媽媽、妹妹及叔叔、阿姨們一起，度過了自已人生只有一度的青春花季。她和妹妹枯黃著小臉，終於回到了延安的陽光下，但是，他們摯愛的爸爸陳振亞，卻永遠留在了新疆。在那片血腥的土地上，埋葬了他們的親人，也埋葬了媽媽來之不易的幸福！從此，媽媽沒有再為他們找過爸爸……

思齊的生父劉謙初、繼父陳振亞以及雖然當過媽媽家的“先生”卻不是她爸爸的林育南、李耀晶兩位烈士，還有一直不知去向和不明生死的武漢的“李先生”劉先源，上海的外籍華人“吳照高”，加上那個京山的徐家少爺，把媽媽的一生，活活地“切”成了一段又一段，一塊又一塊，哪一段、哪一塊都不堪回首甚至慘不忍睹！

不是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嗎？張文秋老人如今還健在，享有著可貴的生命，她也曾有過“高價”的愛情，高得不僅是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的，還多次連自由也“拋”掉了，她從二十年代末在山東，到四十年代初在新疆，沒想到六十年代中的“文革”時，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蹲大獄，她自覺為了革命或被迫因為“革命”（“文革”也叫革命），“拋”得除了“低價”或“無價”的生命，幾乎一無所有了……

後人難道不是可以從她的不凡經歷特別是多次犧牲中，看出、想出和悟出一點什麼嗎？

（一九九四年春草）

附：找黨誤入“紅燈區”

——張文秋軼事

解放前的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曾是個男盜女娼群魔亂舞的“紅燈區”。一九二八年底，剛剛從武漢逃出白色恐怖的女共產黨員張文秋，一進上海，竟誤入了同樣危險的“粉色陷阱”。

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從事秘密工作的張文秋，由於黨的地下機關被敵人破獲，三十多位同志先後被捕，又一下被殺害了二十四名。她隻身逃出武漢，乘輪船來到上海，尋找黨中央報告情況並請示工作。

她當年才二十五歲，一九二四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二六年轉為中共黨員後，一直在武漢和故鄉湖北京山等地，做黨的機關工作和群眾工作，從來沒有到過上海。這次來時只帶了一個作秘密聯絡用的通信地址，對於上海這個著名的花花世界，簡直是兩眼一抹黑，更不知道中央機關的隱藏地點。她在武漢至上海的江輪上，由於傷心、焦愁和勞累，更怕被敵人發現也被抓去，上船後就蒙頭睡著。買了船票後身上只剩了幾塊錢，又不知到上海後能不能馬上找到中央，所以一分錢也不敢亂花，雖然身上穿了掩護身份的旗袍，一路卻只吃了一個大餅和一碗白開水，鄰座旅客見她吃得太少感到奇怪時，她就推說自己暈船什麼也吃不下，好容易挨到了目的地上海。

輪船一靠碼頭，她就混在旅客人流中，低著頭捂著臉，匆匆地下了船。只是兩腳一踏上這塊陌生的土地，下一步就不知往哪兒跨了，自己將在哪兒落腳，也毫無主意，連東南西北方向都弄不清。她被人群擁到碼頭外的大街上，只見一片燈火，馬路邊上停著一溜拉客的黃包車，不少車夫迎到碼頭出口處招徠顧客，她正不知往何處走而急得手足無措時，有個車夫過來招呼她道：

“少奶奶，去哪里，要車嗎？”

她一愣，發現那車夫在叫自己，原來她身上的那件體面衣服，使人將她看作是“少奶奶”了，她索性掩蓋了自己的不安心情，裝出很隨便的樣子，心裏卻打著主意，還是先找個旅館住下，然後再去尋訪黨組織，為了便於活動和隱蔽自己，最好住在交通方便比較繁華的地方，就對車夫說：

“找個旅館，要在熱鬧地方的。”

車夫說：“那就去四馬路，那裏旅館多，最熱鬧了。”

她也不知四馬路在哪兒，就順口說：“好吧，就去哪裏。”

車夫又指著路邊一個“租車處”說：“去四馬路的，要上那裏領個牌子。”

張文秋鬧不清這是什麼規矩，便按車夫所指處去拿了個牌子，見那上面有個旅館名字和車資錢數，還刻了一條紅色的道道，也沒問問是什麼意思，就上車讓車夫拉了就走。

車夫撒開兩腿，跑出了港區碼頭，七彎八拐地進了一條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繚亂的鬧市街道，車夫說這就是四馬路。

她見這裏果然十分熱鬧，各種旅館一家挨一家，許多門上都掛了格外醒目的紅燈，一些油頭粉面的男男女女，不斷從那裏進進出出。車夫按她拿的牌子上的旅館店名，拉到了那家門口，放下車子說：

“少奶奶，到了，請下車。”

張文秋下了車，按牌子上標的價錢付了車資，拿著簡單行李就要進去，裏頭有個茶房忙迎了出來，接過她手上的牌子和小行李包，領到樓上一個房間裏，讓她就在這裏住下。

張文張一看這房間，不由十分奇怪，裏面的陳設不僅很花稍華麗，還佈置得像個辦喜事的新房。一張鋼絲彈簧雙人大床上，掛著半透明的紅羅帳，鋪著繡花的緞面被，還有一對有著鴛鴦戲水圖案的鬆軟枕頭，床邊有裝著大鏡子的紅漆梳粧檯，油亮的八仙桌、茶几和幾張椅子，也都一色是紅漆的。她不知上海的旅館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只估計這裏的房錢一定少不了，一面擔心自己會付不起錢，一面又覺得暫時無別處可去，只得住下再說，加之她確已又累又餓又發愁，打

算先安下身定定心，明天早點去聯絡地點，只要找到中央就有辦法了。

茶房將她領進房間後，又出去為她打來熱水，她因為一路沒吃什麼東西，就故意端著架子問茶房，這旅館裏現在有沒有飯吃，能不能送到房間裏來。那茶房聽了，卻奇怪地朝她看了看，疑惑地說：

“要吃飯？那要問問老闆娘，看看她怎麼安排。”

張文秋說：“那就去問問，隨便吃點就行。”

茶房卻說：“老闆娘現在不在，這事別人做不了主，要等她回來才行。”說著又指指梳粧台，將熱水倒在花臉盆裏說：“還是請你趕緊梳粧打扮起來，不要錯過時間，別的事回頭再說。”提起大水壺又去別的房间了。

張文秋心想，這是怎麼回事？不吃飯，竟要梳粧打扮，還不能錯過時間，這上海的規矩，怎麼同別處不一樣，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她想不清楚也就不想了，就著熱水洗了把臉，打算索性早點睡覺，一切明天再說。

茶房卻又推門進來對她說：“現在外頭人正多，你還不快點出去？”又指指左右房間說：“人家可都上街了。”

她以為是讓她出去吃點東西，心想不如就出去一下，見識見識這上海還有什麼奇怪事情，便隨口說：

“好吧。我也出去看看。”跟著茶房下樓出了門。

一上四馬路，果然熱鬧得很，一派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紛繁景象，最扎眼的是各個旅館門口，都守著幾個打扮得過分妖豔的女人，不斷嬉皮笑臉地招呼著過往的男人，有的竟動手動腳地逗引甚至拉扯起來。這些女人小的看來只有十七、八歲，大的也有三十上下，一個個都是滿臉脂粉和花枝招展，旁若無人地和男人打情罵俏著，有的沒說上幾句話就拽著扯著進了旅館房間，有的纏住個西裝闊老就不放，還故意嬌聲嗲氣地說：

“來嘛，進去吧，開開心，我喜歡你！”

有的被男人厭惡地一推道：“去，去！不要你。”

張文秋過去一直上學和從事革命工作，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面。

心想這些男女肯定不是夫妻，也不是在談戀愛，可能就是什麼妓女之類，但是這種見不得人的骯髒事，竟公然出現在大街上，這上海真是很不象話。她走了一段，見這裏到處都是這樣，實在看不下去，開始還想買點什麼吃，後來竟噁心得什麼胃口也沒有了。決心回旅館去，闖進自己房間，安靜休息一下，遠離面前那些污七八糟不知羞恥的男男女女。

哪知她所在的旅館裏，也有著她在外頭見到的那些男女，連她隔壁房間裏也傳出了淫蕩的調笑聲。她正生氣地想怎麼躲也躲不開這幫傢伙，就見茶房進來問道：

“怎麼，你不接客了？老闆娘馬上就到，你要沒接到客，她不會答應的，連我也擔待不起。現在還來得及，你還是快出去，接一個回來吧！”

她這才開始明白，原來這裏的所謂旅館，是專門幹這個的，這茶房顯然也把她當成了那種人，不由生氣地說：

“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我是來住旅店的，什麼接客不接客，老闆娘來又怎麼樣？我可不是你說的那種人！”

那茶房把她從上到下重新打量了一番，怔怔地說：“那你，怎麼來我們這裏了？”

“我哪知道你們是這種地方！”張文秋說：“我只想找個旅店歇歇腳，沒想到進了你們這裏，早知道這樣，說什麼也不會進來。”

茶房連連搖頭道：“啊喲喲，太太，你走錯地方了，我們這裏都是‘吃外飯’的，四馬路是個有名的‘野雞窩’，你怎麼也沒問問就來了？”

她這才著急地說：“我是從外地剛到上海的，哪想到這裏是這樣子，一下輪船就被拉到這裏，這可怎麼辦呢？”

茶房輕輕問道：“太太從哪裏來的，是漢口嗎？”

張文秋點了點頭道：“就是，頭一回來上海。”

茶房又改變成和緩語氣說：“聽口音你是湖北人，我也是湖北來的。你是走錯地方投錯店了，這條街上許多是妓院，到這裏開房間的都要接客，老闆娘按時來收錢。平常人家的太太小姐，從來不到這種

地方。也怪我沒有問問清楚，就把你領了進來，我們都搞錯了，這裏可不能隨便進來呀！”他悄悄一想，又悄聲說：“這樣吧，你不要聲張，趁老闆娘還沒有來，你馬上離開這裏，趕緊出去，這裏由我來收拾一下。”

張文秋又發愁地說：“天都這麼晚了，我現在該上哪兒去呢，我到處人生地不熟，該怎麼辦呢？”

茶房說：“這樣，我幫你再叫輛黃包車，到別的地方另找個店住。你快拿上自己東西，跟我出去。”

張文秋問他是不是也該付點錢，茶房說趁別人還沒注意，趕緊走吧，就算老鄉幫了一回忙。說著讓張文秋跟他避開眾人下樓出了門，自己去攔來一輛車，對車夫交代了幾句，讓張文秋快快上車。當她向這個好心的茶房表示感謝時，他說：

“你快去吧，讓老闆娘知道就麻煩了。”接著又特地叮囑道：“記著，下回乘車，千萬不能拿帶紅杠杠的牌子，那是專門到這種地方來的記號。”

張文秋連他的名字也沒問，就離開了這個陌生的老鄉，被黃包車拉到另一條街上，住進了一家普通的旅店，總算安全地脫了險。

她重新安下身來以後，心裏還在撲通通亂跳，想不到號稱“十里洋場”的大上海，竟給了自己這樣一個“見面禮”，今後還有些什麼樣的怪事、險事呢？她真不敢想像。

果然，她的下一步行動仍然不順利。

她在旅館中時睡時醒地過了一夜，第二天就按帶來的通信地址，找到了位於江灣一帶的大夏大學，哪知卻沒找到她要找的人。

原來作為收信人的姓名只是個化名，其本人根本不在這裏，而是利用這個通信地址，定期到學校收發室來自取信件。張文秋去找人時，門房問她要找的人是教師、職工還是學生，又是哪個系哪個年級的，她卻什麼也回答不出，只估計是個教員，但門房查不到這個名字，讓她到學校教務處去問問，還是誰也不知有這個人。門房見她那失望和著急的樣子，答應再幫她打聽打聽，讓她過一兩天再來，她只得快快地回到了旅館。



本書作者（後左）、柳明（後右、《家庭》主編）與張文秋，1990年代攝

下一次又去時，仍然沒有結果。她到上海已經幾天了，卻見不到同志找不到黨，不只是無法報告湖北省委機關被破壞的嚴重情況，她僅有的幾塊錢，也早已花完了，被迫賣掉了兩件比較講究的衣服，也只夠這兩天的飯錢和車錢，再這樣下去，誰也找不著，這日子該怎麼過……

門房見她發愁，關切地問她地址姓名對不對，她說沒錯，過去一直是這麼寫信來的，每次都收到還回了信，這回來上海前就來過信，這信已不在收發室，說明已被本人取走了，看來收信人就在這裏，只是一直見不著。張文秋忽然靈機一動，馬上出去按原來的地址姓名寫了一封信，告訴對方說自己已經來滬，正住在何處，請對方見信後立即去找她。

信發出以後她回到旅館，每天關門不出，在屋耐心等待，兩天過去了，還是沒人來，等得她白天茶不思飯不想，夜裏也躺不下睡不著，簡直是度日如年。

一天清晨，她正迷迷糊糊地躺著，忽聽有人在輕敲她的房門，並且小聲叫著她的化名：

“李麗娟，麗娟！”

她先以為是在夢中，凝神一聽聲音還在繼續著，連忙翻身下床，一邊穿衣服，一邊輕聲問：“誰？”

“我——你表哥！”外面有人答。

“表哥？”她將門打開一條縫，只見一個頭上壓著禮帽，身上穿著長袍的大個子男人。她又問：“你找誰？”

那人把禮帽一摘，露出臉笑道：“怎麼，不認得啦？我不是你要找的‘表哥’嗎？”

她定睛一看，驚喜地叫道：“啊呀，老天，是你啊！”

那人忙止住她，朝自己身後左右一看，迅速閃進門來，又輕輕關上門，對她笑道：“小點聲，別激動，我這不是來了嗎？”

來的這一位，張文秋早就認識，他原是中央在湖北省委的特派員，他們曾在武漢一起工作過，並且對外以表兄妹相稱。他離開武漢調回中央後，湖北省委就按照他留下的地址，與中央保持通信聯繫，收信人就是他的化名：唐戈德。因為他本人其實不在大夏大學，所以張文秋到這裏根本找不到他，但是一有他的信，馬上就會被取走，這是地下組織秘密聯絡的一個辦法。

張文秋終於見到了“表哥”，喜出望外的同時，眼淚也奪眶而出，她滿腔辛酸地對這位並無血緣關係的親人哭道：“可見到你了，再找不到，我就愁死了，急死了……”

“表哥”連忙安慰她，叫“表妹”不要傷心，又用暗語說中央已經初步瞭解到武漢的情況，正等著她來報告具體情況。還說她動身前從武漢寄來的信，中央也已收到，知道她到了上海，也在到處找她。昨天晚上見到她在上海發的信，不等天亮就找來了。

張文秋眼淚汪汪地說：“可把我找得、等得苦死了，也險死了，再找不到人，真不知要出什麼事呢！”

唐戈德說：“我們也很急，怕你會出事，都為你擔心，現在就好了，總算見了人。”接著又對她說：“我現在就接你出去，這裏也

不是說話的地方，有話我們回了‘家’慢慢說，‘家’裏人都在等你呢！”

唐戈德到旅館櫃檯上為張文秋結了帳，幫她收拾和拿上簡單行裝，一起走到街上，搭了一輛馬車，真像一對兄妹似的，一路說笑和觀賞著街景。已到上海幾天的張文秋，第一次感到心裏踏實和輕鬆起來，也第一次發現，大上海不僅有著“四馬路”那樣的骯髒地方，也確是相當繁華和美好的。她跟唐戈德到中央機關的秘密招待所住下，向中央領導同志彙報情況時，說起自己到上海當夜的險遇，同志們都笑了，她卻說：

“你們還笑，我想到就後怕，沒找到黨，落到那種地方，怎麼向組織交代啊！”

(一九九〇年夏草)

後 記

校閱完這部書全文校樣稿，心中有些忐忑，不知當代特別是中國大陸以外的讀者，將怎麼看書中記述的，已經成為歷史的這些人和事。當年我們都敬服和遵從了一個不是神的“神”，其實他也是人，不過比別人更聰敏、精明和高明，致使許多人特別是其身邊的人被其吸引、誤導和利用了，以致有人至今還沒有醒悟過來，或者反過來正為自己利用著他和他的名聲。為了揭穿這個當代神話，我將自己知道的他和他身邊人的事寫下來，為後人留下一段真實的時代紀錄。因為是在不同時期寫的，有的仍未擺脫“神話”的影響，僅在此向讀者作個交代。

首篇《從“山大王”到“紅太陽”》，寫於1993年“老人家”百年誕辰時，某刊特約我寫了此文，發表前應由有關方面審定，某權威部門閱讀後表示，此文所寫史實都有根據，但這樣來評述偉人前所未有，審閱者不便也不願對此承擔責任，儘管他個人欣賞其所言，卻不能蓋公章予以通過，致使此文未能發表。後由南方某報連載，竟受到讀者歡迎。第二篇《以夷制夷 為我所用》，與此是同一主題，也因此從未發表過。

第三篇《軍報“震源”肖力》，原是我長篇“文革”親歷實錄《軍報內部消息》中的一部分，此書在大陸未能正式出版，現將其中與毛澤東、江青及其愛女直接有關處抽出單獨成文，可見他們的當年“政績”。第四、第五篇紀述了二位“龍女”的獨特經歷和遭遇。第六篇是對“太子”及其“王妃”生平的獨家報導，與國內“正面宣傳”完全不同。第七篇《紅色佳人淚》又是作者獨家的，生動反映了中國現代的“宮廷”生活和上層軼事，大都與毛密不可分。

這些文章在國內當然不能發表，只得在此書中公之於眾。友人建議另用筆名以保安全，我想自己已至八旬，算是高齡甚至高壽了，不妨“垂死掙扎”一番，將要說該說的話說出來，國家憲法不是給了包括我在內的人民以“言論自由”了嗎？我如不享受就白不享受，總比屈辱和窩囊一生好些。即使為此將遭不測，我也豁出去了，因為夠本了！借用一位名人（注）的話：無所謂了。

第八篇是毛家親家張文秋的故事，雖然有些老同志對其人其事不以為然，但她的奇特經歷和慘痛遭遇卻令人深思，人們為了中國革命即毛澤東的事業，作出了多麼大的奉獻與犧牲？當年千千萬萬人，或主動或被動，追隨、聽命于“偉大領袖”，有的確是真誠的，因而值得後人理解、諒解和敬重的。不過她的女兒邵華不屬此例。此文曾被從東北到華南許多報刊所連載和轉載。書中史實及其觀點如有錯誤，敬請讀者、學者們批評指正。

作者 2010年2月10日於北京

（注）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1989年5月19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的話

作者簡歷：

洪爐，筆名盧弘，原姓郭。1931年6月出生於江蘇泰興農家，13歲參軍，18歲入黨。長期從事軍隊宣傳文化和新聞工作，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國內外戰爭。曾進中央美術學院學習繪畫，擔任《解放軍報》美術編輯近30年，創作、發表過大量美術作品。1980年後轉為文學寫作，為老革命家代筆回憶錄多部，發表、出版傳記文學、紀實文學、長、中、短篇小說和影視劇作等多部，主要作品有《我們十八歲》、《王稼祥一生》、《李伯釗傳》、《解謎李德與長征》、《軍報內部消息》、《伍修權傳》等。曾創辦並主編《炎黃春秋》雜誌，是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理事。